

出 版 说 明

这本文集，收入刘少奇自一九二三年至一九六四年论述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著作共五十七篇，其中绝大多数没有公开发表过。

刘少奇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立下了不朽功勋，受到了工人群众和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他善于把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又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他的著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工人运动的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极宝贵的思想财富。他的著作不仅对我们研究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工人运动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对于我们研究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推进工会的改革，亦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收入本书的著作，凡是刘少奇留有手稿的，或者过去

F260/08

公开发表过的，都保持原貌，只做了少量文句和史实的校正。对于讲话记录稿，作了文字整理。为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这些著作，编者做了题解和注释，题解在各篇第一页的下边，注释按顺序号附在书末。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华全国总工会

一九八八年四月

目 录

对俱乐部工作的回顾	1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日)	
俱乐部组织概况	12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	
“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	16
(一九二五年四月)	
悼孙中山先生	21
(一九二五年四月)	
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方针	23
(一九二六年五月)	
工会工作中的三个问题	27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论陈赞贤同志在赣被害事	33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七日)	
最近中国职工运动，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 与赤色工会目前的任务	37
(一九三一年夏)	
关于工运的意见	52
(一九三一年十月五日)	

建立辅助组织问题	57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	
加紧领导工人的自发斗争	62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	
在目前反帝运动中赤色工会应努力的工作	66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罢工策略	70
(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	
国民党封闭永安二厂工会及逮捕工人，我们 应否号召工人反对?	81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七日)	
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	88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	
某某兵工厂罢工斗争的经过和教训	94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职工运动中的两个问题	102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	
苏区阶级工会的会员成份	117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再论苏区工会的会员成份并驳锹同志	130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日)	
停止“强迫介绍”与救济失业工人	150
(一九三三年六月)	
在两条战线斗争中来改订合同	155
(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	

-
- 农业工会十二县查田大会总结 161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
- 与忽视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倾向作斗争 167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日）
- 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 172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日）
- 论国家工厂的管理 176
（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 在苏维埃政权下工会的作用与任务 185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 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 191
（一九三六年四月）
- 怎样进行群众工作 199
——给群众工作的同志们一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
- 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 212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
- 关于群众运动的政策 222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
- 工会工作大纲 227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八日）
- 民众运动讲话大纲 252
（一九三八年）
- 论组织民众的几个基本原则 261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278
(一九三九年五月)	
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304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日)	
关于城市群众工作问题	309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关于召开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问题的谈话	316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关于北平工作问题	321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	
对天津国营企业职员的讲话	331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44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关于工会工作问题的报告	358
(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	
在中国劳动协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382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日)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应明确划清	386
(一九五〇年八月十八日)	
在全总扩大的常委会上的讲话	387
(一九五一年二月三日)	
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	401
(一九五一年)	
在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	410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日)	
工会应帮助党和政府向不良现象作斗争	415
(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	
给范明庆并转安源镇工会诸同志的信	416
(一九五五年七月八日)	
先进帮后进和职工业余教育	417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纠正强迫工人、职员进行业余活动的现象	419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的祝词	424
(一九五六年四月三十日)	
关于研究工人阶级问题的谈话	433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为全总第一个会所遗址问题致信赖若愚	441
(一九五八年二月四日)	
在四川省劳动工资座谈会上的报告	443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关于半工半读问题致马文瑞信	454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半工半读，亦工亦农	460
(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	
实行固定工和合同工并存的劳动制度	466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注释	469
后记	489

对俱乐部^{〔1〕}工作的回顾*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日）

我们抱定社会主义的思想，从最黑暗的家庭奋斗出来，到中国这样沉寂的社会里面，干这种改造社会的事业。去年奉到我们的总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2〕}——命令到安源来帮助路矿工友办事，至今已是一年了。这一年过去的事实，实使我们得了许多很大的教训，关于将来进行的方针，也因此得以稍事计议。此时我将个人所感觉的，用极真实的态度披露出来，使大家对俱乐部得一种系统的观念，以便批评指正。

社会改造的步骤，我们所主张的是：（一）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养成无产阶级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二）实行夺取政权，用政治的力量消除社会一切阶级的压迫——人的压迫；（三）在产业公有制度底下以极大的速力发展实业，减少

* 一九二二年秋至一九二五年春，刘少奇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本文是他为纪念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一周年写的题为《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一文的前一部分的节录。全文载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出版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现题是编者加的。

人类所受自然的压迫。

(二)、(三)两项是我们无产阶级终极的目的。以中国现在的情势看来，这样幼稚的无产阶级当然说不上马上就拿来实行。既是很远的事实，也用不着说很多的话来讨论他。在(一)项里面又应该分为下列几个步骤：(1)由争得工人直接的利益——加工资——使各个工场的工人团结起来；(2)由争得工人第二步本身利益——减少工作时间——使各地同产业的工人形成产业的大联合；(3)以过去奋斗的经验切实教育工人，使工人明了自己阶级在现在及将来社会上的地位，工团终极的目的与达到这个方法，养成极健全的奋斗者，成功无产阶级有方法的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的大组合。

由上面社会改造的步骤看来，工人以罢工手段要求普遍增加工资和减少工头职员无理的压迫与剥削，并不是我们工人的目的，乃是一种手段，即是利用群众的“利害”心理，划清资本家与工人之界限，使工人阶级自觉的团结起来。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这种经济的奋斗，在工人将来全部的利益上看来是很小的，但是我们必得要做这种利益很小的运动，才能使工人目见利害的关系团结起来，才能训练工人的奋斗能力及方法。这是工人解放运动最初步的工作。

我们安源自去年九月罢工胜利以后，继续至今，所得的胜利——增加工资，打破包工制度——要算已经成功第一步的工作——工人解放运动最初步的工作。在这一点点的

成功里面，我们已经用了许多的力量，经过了许多的危险，做出了许多的错误，这总算使我们这些缺少奋斗经验的人，在这里面得到了很多的教训；在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不使前日的成功失败，赶紧引导全体工友向劳工解放运动的正确道路前进。在以上两个意义里面，所以我不惜把俱乐部过去的一切，切实批评一番；把俱乐部将来的计划，具体的向大家宣布。

代表：代表可说就是工人的领袖，上年代表在组织上算有系统，能尽责任，并且还是很努力的。不过有一部分因自己居在领袖的地位，对于俱乐部的宗旨和目的，或者还有些不大十分明了，以为俱乐部是行政机关，以为自己有很大的权力和威风。因此自己渐习于一种官僚绅士的态度，对工人的态度和说话，多骄傲不和悦；且久而见只有牺牲没有权利，就不快活了。还有些不知道我们帮大家工人做了事，虽然有点功劳于俱乐部和大家，自己是不应该居功，不应该求报酬的，所以有功不得大家的恭维，不得俱乐部的报酬就灰起心来，生起气来，在旁边说坏话。还有以为自己要帮助工人，对于工人无理的要求，也一概赞助的。这些都是去年代表中确有的错处。这都是不诚实的努力，有用意的努力，工人领袖如果都是这样，那我们的事业便非常危险。因为我们将来的事业还很大，还要管理世界一切的，假若各人都要得相当的报酬，那不又把社会弄到很不平等，有很多阶级吗？那我们就用不着改造现在不平等的社会了！我们既为改造社会而尽力，我们只知道牺牲，不知道权利，把自己心理洗

刷得清清洁洁，然后不致做出违背主义的事情。他方也须把改造社会的步骤和现在外面的大势看清楚，然后在我们处置事情的时候，不致有手段上的错误。

还有些以为工人是无产阶级，办事情不应该有秩序，不应该有时间的限制，这种观念是很错误的。因为我们的组织不是只这样大就止了，将来组织还是极大的，将来的事业还极多极复杂的，假若现在不养成办事的秩序和守时刻，将来不会弄成一桶乱糟样吗？

还有，我们大家既是为改造社会努力，我们的心理就早应洗刷清洁，我们既同是很清洁又抱同一的主义，我们做起事来，当然会相同。其余对于私人的态度不好，意气不对，都是不成问题的小事，我们哪应该闹个人的小意见而妨害我们工作的进行和前途？上年有些工人领袖对于这种地方不十分明了，闹出很多个人意见的乱子，这是不应该的，是我们的过错。因为感情的意气不消除，于是彼此间就有些意外的猜疑，这种猜疑是错误的，是危险的。望各工人领袖再不要做出这种错误来！

上面说的是各级代表——工人领袖——普遍的错点，现在分述如下：

(1)总代表：总代表在俱乐部及工友中所负责任很大，作事更多，在上一年各处总代表大部分是努力尽责的。但有一共同的弊病，就是每次在俱乐部开会后，回去不将结果报告大家，以致弄成工友与俱乐部中间有很深的隔阂，这是总代表的错。工人代表——工人领袖——一面固替工友解

决各种临时发生的事，但一面必须引导工人，训练工人，使工友有相当的明了，事事归于正轨。上年各总代表对于工人训练没有尽多大的力，这也是一个缺点。

(2)百代表：在上年俱乐部组织的系统上说来，百代表在会议上只有复决最高代表会提交案件及接受最高代表会议决案的报告。在办事系统上，负十代表责任与总代表接头。但上期百代表常因责任分析不清，不知自己所负的是那些十代表的责任，十代表也找不着自己的百代表，以致弄成百代表无事可做，若有若无，这是百代表不明了自己责任的错。

(3)十代表：十代表在俱乐部基本小组织——十人团——上面，负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十人团组织得好，十代表能尽责任，俱乐部的团体基础就稳固了。对于办事上极为灵敏，就是有人有不正当的行为或谋害俱乐部者，也很容易找出。上年俱乐部的十人团的组织，不十分坚固，职权和界限都分不大清楚，十代表除缴常月费外，其余都不负责，所以十人团根本的职能也不能做到，这是各十代表对于十人团的团结没有尽到力量。

部员：安源的工友——俱乐部员——在极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之下作了二十余年的工作，大家的心里只知道作工伏受雇主们的欺侮，绝不想本身有团结反抗这种压迫的可能，绝不觉到能有这样的俱乐部来做拥护自己权利的武器。去年罢工胜利以后，事实已明明白白的在大家的面前表现，各工友都是出乎意外的打破从前一切的糊涂观念，

很猛勇的趋向俱乐部这一线之光明。所以大家团结的能力，奋斗的精神，以及在罢工时能服从统一的指挥，都是极令人佩服的。就是从俱乐部经过各种危险，大家能够消除内部一切的纷争，专心对外，这点有阶级认识的事实，也是表现得清清楚楚。但是我们大家在这一年里面，也做出不少错误的事实和表现出许多错误的观念。

我们工人的组合，是一个极大的组合，全世界都要联成一气，并要组织得和军队一样，才能与那有坚固组织的资本阶级奋斗。我们那里能够分出什么省别县界来呢？但我们在安源去年的事实上看来，还有些工友不能免掉这个观念，如认某桩事情是“排外”哪！“我们是这一帮的”，“他们是那一帮的”等话，都是同乡观念的表示。又如关于两省或两县工友的纷争及两段或两处工友的纷争，总是较难解决，彼此都要争个高低，不服这一口气。在平时这种有界限的纠葛，俱乐部也来得不少。以后我们大家都要努力消除这个观念，关于有界限的纷争，两方都应该特别谅解些，不要坚执，这样，——俱乐部的大团体，才不致破裂！

大家组织俱乐部，固然是拥护我们的权利，减少对我们的压迫。工友受雇主或外界人无理的欺凌，俱乐部在可能范围以内，都是应该保护的，但我们俱乐部总不应该庇护工人不正当的过犯，或助长工人欺凌外人的威风。我们工友在去年以来有些以为“现在我们有了俱乐部保护，闯出祸来有俱乐部承肩”，于是就只凭自己的气愤，一意横行。这是何等的错误？如打张万发铺店，与军警盘查所发生殴打的

冲突,以及各个人在外面闹出各种不正当的乱子等,都是绝不应该的事实。当工人还没有能力支配社会的时候,我们大家应该极端明了,不要闹出这种问题,弄到外面的人,个个痛恨俱乐部,使自己生命一样的团体受危险。

我们安源俱乐部的力量虽大,但是还要靠着外面各地的工友联络,互相援助,才能立脚。所以我们有些事情,应看外面的形势如何,全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怎样才着手来办,我们不能只看安源工友的力量可以办到,就不顾一切的做起来。这种幼稚的毛病,盲目的奋斗,有些工友犯得很深。如遇事就要罢工,在此时就要减少工作时间等,都是这种幼稚病的表现。当中国这样幼稚的无产阶级,我们不能事事冒险直冲,使全部劳工运动受打击。

工人组织团体的目的极为远大!将来还是要管理世界一切的。增加工资,不过为争得目前很小的利益,使大家认识阶级的利害而结合团体的一种手段,绝对不是我们工人的目的。我们俱乐部第一步替大家做的事,固说是加工资,但是俱乐部绝对不是只加点工资就完了的,而且工资是绝对不能时常增加的。安源的工友有好些认为,增加工人工资就是俱乐部的目的,以为工资既已加了,就是目的达到了,俱乐部就抛到侧面去了;或者总望俱乐部怎样第二次普遍加我们的工钱;或者又要求普遍加工钱。这都是认俱乐部以加工资为职志的错误。还有些只知道加几个钱,其余一切什么“联合”、“训练”、“阶级争斗”等,都不关他的事,概不过问。这种错误的观念,实大足以妨阻团体前途远大

的发展。望大家都认清自己阶级的地位和真实的目的，努力前进！

俱乐部在现在社会之下，为自己立脚起见，不得不与环境稍加妥协，故他——俱乐部——在现社会的地位只是一个正式“公团”，他的职权只能行使在他的范围以内。他绝对不是一个“衙门”，不能受理或干涉社会上一切事情。有些工友误认俱乐部是“青天衙门”，什么事情都拉扯到俱乐部来办，范围以外的事情，都去干涉，呈文禀牒纷纷往俱乐部呈递。这种错误的认识，望各工友明了改掉。

罢工是工人的武器，不是好玩的，是对待敌人的，不是对待自己团体的。我们工友有些因要求不遂，即行部分的罢工，以为罢工随便可以举行；或者以罢工来对待俱乐部，这是怎样的错误？望各工友切不可轻于动武！不要拿武器杀自己家里的人！

我们大家都是工友，世界一家，是兄弟一样，应该怎样的互相亲爱、互相帮助？就是别人对我有点不好，也可原谅下去，总不要记仇记恨，不要闹起来打起来。但是我们工友有好些因一点小事便打得皮破血流，互争长短，到俱乐部来又要受罚、送警、开除。这是何等痛心的一回事呵！并还有工友不关自己的事，看见别人家闹乱子，无故暗地打伤别人。又有些因为闹乱子恐怕理由失败，便邀一些人来帮助，横直要争了这口气。如是就邀茶哪！结盟哪！为自己将来吵架子有一伙人说话。此一帮，彼一派，到俱乐部来几天还扯不清楚。唉！我们大家都是兄弟一样，何必这样不能谅

解！何必这样记仇记恨分成一些界限，使大家的团体不能结紧！上年俱乐部所办的事，工友争斗案件占一大半，请大家一看裁判委员会的报告，则我们工友之好争斗可想见了。俱乐部办事人因大部分的力量办了这些无益的纷争，反使很多重要的事不能办了。工友争斗的害处，真是说不尽！并还有许多危险。望各工友切要自己明了，不要争意气！不要记仇恨！不要打架！更不要无故打伤别人！大家和和气气，亲亲爱爱，才是正理。

我们都是相信社会主义——工人的主义——才到安源来帮大家做事的，并且都是劳动组合书记部命令我们来做事的，我们绝对不是为名为利个人跑得来的，所以大家工友既相信我们做事是帮助大家，不致害大家，就应相信其他相信社会主义的人来做事也是帮助大家，不致害大家。大家不要相信某一个人，应该相信是社会主义者的人，应该相信劳动组合书记部派来的人都是一样的；倘使各工友只相信一个人，不找这个人的来历及为什么使大家相信，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一个人不能守着大家做几十年几百年的事。并且各工友还要相信自己团体是可信的可靠的，不能永远靠一个人的。望各工友相信社会主义者，相信自己的团体。

有了事情，俱乐部万余工友不能人人各干各的，必须有统一的指挥，有规则的动作，因为万余工友必须服从指挥才有办法。又俱乐部的议决案，总是顾及大局，顾全万余工友的，或者有少数工友有不得利益的地方，也应为大局的关系而服从。这样俱乐部才有办法。这点以前工友的精神甚

好，但后来也有少数对于指挥上或议决案表示很难服从的样子，以为“谁也不要服从谁”，这是很大的很危险的错误。俱乐部是奋斗的营盘，大家要组织得和军队一样，应该要保存以前那种服从的精神。

我们既要组织团体——俱乐部，就要有人和地方来办事，既要人和地方办事，就要用费，这种用费要大家凑拢来，每人凑多少，就看用多少来决定。俱乐部要收常月费，也是这样一回事。若是大家不缴常月费，俱乐部就无从维持了。所以俱乐部规定对于三月不缴常月费的即行开除。但还有些工友把常月费拖欠的，或者私地瞒没不缴的，这都是无心保护团体，只要明白点的人都会知道是不对的。

我们痛苦，我们要增加工资，要减少压迫，但我们不能吃了饭不作工。“吃饭不作工”是我们社会主义最反对的。我们很多人作工，又不能不有一种系统和秩序，所以工厂也要一种正当的厂规。有些工友以为厂规是资本家订的，不管他正当与否，故意不守，工头职员在工作上正当的指挥，也故意不听，如是工头职员也落得不去干涉，大家不负责指挥。工友见工头职员不负责，以为没有人管他了，也效尤对工作不负责，偷懒起来，如是使出产及工人秩序均受很大的影响。这种错误我们也是有的。我们应该守正当的厂规，我们应该自治，保持自己的秩序，不要人家说我们的坏话。

我们每天作十多个小时的工，得了一点子工钱，身体是很疲倦的，生活是很困苦的，哪里有时间去赌去嫖！又哪里有钱去嫖去赌！嫖、赌，我们工友都不应该去做，而且种种作恶

的缘因，都是赌、嫖，我们应该归正轨做各种发展的事业。有好些工友对于嫖赌仍是深好不改，这是极不对的！这种不良的习惯，堕落的嗜好，我们工友应切戒切戒！

俱乐部的敌人很多，他们都想办法来破坏俱乐部。他们时时刻刻到工友里面来放散谣言，以图扰乱俱乐部的秩序。工友常常有受这种谣言的引诱而蜂动，而怀疑俱乐部，或向俱乐部吵闹的。这种误会很危险。我们不要听信谣言，有事尽可正式来俱乐部很诚恳的质问。

无论什么人做事，不能够没有过错，做事越多，过错越多；但我们做事绝对不要怕错，绝对不要隐瞒自己的过错。因为过错越多，经验越多，下次就可以不再错了。俗话说的好：“错一事，长一智”，我们应该把这句话牢记着。俱乐部已经有了一年的历史了，这一年里面各人所经过的错误，我已用极诚实的态度将其大而易见的批评在上面，各位以为正确么？“往者已矣，来犹可追。”我们应该虚张胸怀，把我们一年来所做出这些历史上错误的经验，一点点都灌了进去，努力革除，才不致辜负这一年的苦劳，才得以发展将来的事业。同志们！工友们！勉哉勉哉！

俱乐部组织概况*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

在资本主义支配的社会里面,工会的意义是:(一)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二)反抗资产阶级的作战机关——营垒;(三)加深工人的“阶级觉悟”,训育工人抵抗的能力与产业管理的知识。工会的组织必须十分严密,极有系统,和军队一般,如此,在工作上才能完成它的使命,才能达到它真实意义的目的。

考察世界各国最完善的工会组织法,皆有下列两种共同的原则:(一)由极小的基本组织而至于极大的阶级组织,(二)采用民主的集权制。

俄国工会的“可罗波”(группа),法国工团的“辛迪加”(SYNDICAT),都是工会中极小的基本组织。工会是一种极大的群众组织,若无此种极小的基本组织深入群众内部,则必无法指挥群众的行动,群众的行动只是盲目的,极无系统的。而且群众运动的热度是不能持久的,若无此种

* 本文系与李求实[3]合写,原载《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出版。收入本书时略去了表格和有些部分。

基本组织，则运动过后，群众气冷，即成一盘散沙，无法使之维持永久。又当资本家压力极重不能自由集会的时候，必须此种极小的基本组织来作秘密的运动；否则工会一经封闭，群众的团结也必随之而涣散，再无法收拾了。所以此种小的基本组织，于工会的生命及其前途的发展都有极大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至于工会组织采用民主的集权制，在历史上实有很多的事实告诉我们了。“没有组织集中的有系统的工团，不能与组织集中的有系统的资本阶级奋斗”，此语已成工人运动里面不移的诚语。我们只有采用资本阶级的组织法——民主的集权制——极严密地组织自己的团体，才能与有组织的资产阶级厮拚，才有战胜的一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就是根据上面两种原则组织而成的。其组织之大概如下：

俱乐部的基本组织是十人团，即部员每十人（或十人以下）联成一团，选举十代表一人；再由十个十人团（或十个以下）选举百代表一人；每工作处⁽⁴⁾选举总代表一人。总代表、百代表由各该处十代表选举之。

由各处总代表组织最高代表会，为俱乐部最高决议机关。俱乐部各种较大事项，皆须在最高代表会通过。最高代表会每月一号及十六号各开常会一次；有要事即开临时会。会中由各总代表互选书记一人，开会时为主席。

再由各百代表组织百代表会议，为俱乐部复决机关，每月一号开常会一次，报告俱乐部一月中之经过，或议决最高

代表会提交之复决案件。

全体十代表会议原定每月开会一次，后因十代表共有一千三百余人，俱乐部没有这样大的会场，所以改为每月开每工作处全体十代表会议一次，会期轮流。开会时由各该处总代表为主席，报告俱乐部一月份经过之大事，讨论各该工作处之问题，并由讲演股负责讲演。

各工作处部员大会也因会场关系，未曾实行。全体部员大会定期五月一日一次，有要事时，召集临时大会。此种大会只能简单报告，余则全为演讲。

俱乐部办事系统，则由全体百代表会议选举主任四人（总主任一人、窿外主任一人、窿内主任一人、路局主任一人）组织主任团，总理俱乐部一切部务，各级代表会议闭会期间，主任团为俱乐部最高机关。再经最高代表会之通过，由主任团委任股长八人，各股委员若干人；由各股股长及主任团组织干事会，为俱乐部办事机关，主任团为干事会的首领。因事实上的需要，俱乐部只设八股，即：教育股、互济股、会计股、文书股、庶务股、讲演股、游艺股、交际股。每股各设股长一人，委员人数随事实的需要而定，各股办事另订细则。

因俱乐部经济扩充，事实上需要一监督与保管的机关，遂由最高代表会决定推选九人组织经济委员会；又因部员间或部员与非部员间纠纷繁多，事实上需要一裁判机关，遂由最高代表会决定推选七人组织裁判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为最高代表会的直辖机关，各自有其简章。

各股及各委员会之组织详情，参看各该股或该委员会，

之报告。如事实上的需要，最高代表会或主任团得组织各种临时委员会，如罢工委员会、改选委员会、纠察团、监察队等。

“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

(一九二五年四月)

中国的工人运动，自民国十二年二月七日京汉罢工⁽⁵⁾失败后，所有各处的工会，除广东以外，差不多都被封闭，或无形消灭了。一直到今年二月七日，仍是继续这种情形。但是在这种全国工人运动极沉寂的时期里面，独有一个安源路矿工会，偏偏不是这样，偏偏还能打破一切障碍发展自如。

“二七”失败以后，全国空气十分恶劣，安源工会也经过很多的危险；资本家时时想法来破坏，甚至勾结军阀，贿赂官厅，豢养工贼……，从种种方面设法来破坏工人的组织。安源工会眼见全国工会的失败，立取守势，并劝戒工人不要骄傲，不要乱动，竭力团结内部，以防资本家之进攻；一方对资本家的破坏，奋斗到底，毫不退缩。结果，因为工人能够服从指挥，一致奋斗，资本家的破坏手段着着失败，工人反能更加团结坚固，声势日大。

* 本文原载《中国工人》第四期，一九二五年四月出版。

安源工人在“二七”失败后，不独没有被资本家取消已得的利益，并且还争得不少的胜利条件：如矿局每月津贴工会教育经费一千元，每日工资在一元以上之工人增加工资百分之五，学徒每年考查成绩一次，以后矿局增加工人工资须通知工会同意，路局按月送给工会长期免票三张，年节、中秋、端阳工人回家者咸用半票，矿局增加工人或添补工人尽先由工会劳动介绍所介绍等，都是“二七”后所争得的利益。此外还争得各种小的部分的利益，不计其数。

安源工人在“二七”失败后，创办了不少的事业。如设立工人学校七所，工人读书处五处，工人图书馆一所，有工人子弟学生七百余人，工人补习学生六百余人。又办有消费合作社二所，资本二万元。建筑大讲演厅一所，能坐听众二千人，购买房产三栋，并有化妆讲演，各种游艺。又组织有青年部，经常纠察团，裁判委员会等。现在安源的工人，作完了工可以读书，可以看戏，可以听讲，又可以做各种游艺。子弟读书不要钱，秩序有自己的纠察团维持，不受兵警的蹂躏；犯事有自己的裁判委员会裁判，不致受腐败法庭的虐待；青年工人有工会的青年部游戏教育，不致年长失学；买东西有自己工会的合作社，不致受商家的剥削。此外工会订购有各种报纸，印刷各种传单小报及工会纪念册等，工人处处都可看到的。

安源工人在“二七”失败后，各种大的会议及示威运动，仍是继续公开的举行，并无一时停顿。如两次“五一”纪念，均举行大游街。一万三千会员，个个加入。罢工胜利纪念，

“二七”纪念，列宁、李卜克内西⁽⁶⁾纪念，黄、庞⁽⁷⁾纪念，十月革命纪念等均有数千人之公开集会，游行讲演，及扮演新戏等。此外如学校之游艺会，成绩展览会，及各例定代表大会等时常举行。每次游行及集会，群众精神异常振作，秩序异常严肃，旗帜、口号、呼声等，莫不惊振一时。

安源工人在“二七”失败后，不独强固自己的工会，竭力向前发展，并于援助同阶级的伙伴和谋全国工人的团结上，尽了很多的力。如以经济援助唐山、京汉、水口山、汉阳铁厂等处失业工人者近二千元；援助株洲长沙被水灾的难民千余元；又尽力联络各处工友组织汉冶萍总工会，湖南工团联合会，粤汉铁路总工会，又加入全国铁路总工会，并每月缴纳各总工会联合会之月费百五十元。

“二七”失败以后，全国各处的工会都被军阀解散，反动势力弥漫全国。安源工会处在这样黑暗的环境里面，为什么做出那样光明的事业呢？军阀、资本家为什么不用军队去压迫他解散他呢？资本家的破坏手段，为什么次次失败呢？这是我要替安源工友告诉全国各处工友的。

安源工友其所以在“二七”失败后能做到这样好的原因，就是工友能够齐心，能够奋斗，又能够看清环境。“二七”失败后，军阀、资本家向工人进攻，安源工会在那时候，能够立取守势，叫工人团结内部不要乱动，不要骄傲，莫假敌人以破坏之机；又能乘着资本家与军阀勾结未深，资本家内部党派分歧之际，拿拢地方绅商，制止资本家之破坏手段。资本家之诡计无从施展，工人反能借资本家破坏工会

之口实，提出种种要求。资本家内部党派分歧，彼此都想凭借工人势力，推倒异己，巩固自己地位。结果，工人得利用其党派取得种种实际的利益，而自己不为任何派别利用。此为阶级斗争的手段，巧妙复杂，除“二七”以前所用之硬的方法外，还有软的方法，也可以对付资本家致胜。

安源，市镇甚小，工人集中，每当工会危急之际，个个工人无不拚命保护工会。常自动的做侦探，把口子，四处逡巡，日夜不息，满市只见工人密布，如何尽力维护工会，如何向资本家示威恐吓。如有工贼，工人即群起提至工会，加以惩戒，或在工人寄宿舍禁止其自由行动。所有各军警部门及重要机关，与邮政、电报、电话等交通机关均有工人暗中把守。如此在一小市镇之中，万余工人全体动员出发，资本家稍有动作，工人即刻知道，如是资本家的秘密不能保守，行动不能自由，工贼的破坏无从下手。在工会方面，一切秘密反能保守，行动反能自由，工会能够知己知彼，所以百战百胜。资本家彼此消息不能互通，更不知道工会的消息，所以百战百败。如果资本家以军队包围工人，工人即包围工厂，包围资本家、职员等，要死即行大家死在一块，资本家终有投鼠忌器之忧，不敢与工人流血。又工人每当工会危急时，内部意见及扯皮打架等事即刻完全消灭，一心对外。资本家当这种时候，意见就更加分歧，互相倾轧。故安源工人能够齐心、奋斗，所以能打破一切障碍，拥护自己的工会日见坚固发展。

安源工友办得这样好，我们无不羡慕。但原因不过就

是工友能够齐心、奋斗，与看清环境取决阶级争斗的手段而已。我相信，无论哪处的工友只要能够齐心、奋斗，并能服从指挥，看清环境，也一定能够致胜，能够办得安源工会那样好或还要更好。工友们！注意！注意学安源工友的战术——齐心、奋斗、看清环境决定自己战斗的方式！

悼孙中山^[8]先生*

(一九二五年四月)

全中国的工人们！为中国民族谋独立自由向帝国主义与军阀行猛烈攻击之国民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已经与世长辞了！被几重压迫的中国民众，一旦失掉了一个如此伟大的领袖，是何等的悲伤！何等的恸悼！

处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阶级，还是受了外国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的两重压迫，所以最近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目标，是积极的推倒外国帝国主义与军阀，促成中国的国民革命。

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固然是中国全民族的胜利，也是工人阶级与世界革命的胜利。中山先生是领导全民族革命的，中国工人阶级亦在此全民族革命运动中努力向前奋斗，以冀这个革命的早日成功。可是现在这个指导者中山先生没有了。

中国工人的生活是何等的痛苦，地位是何等的卑贱！工

* 孙中山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后，刘少奇写了此文。原载《中国工人》第四期，一九二五年四月出版。

人的罢工运动受帝国主义者无理摧残，受军阀无情的惨杀！中山先生却能尊重劳工利益，颁布工会条例，发表辅助工人团体发展的宣言。中国工人阶级正在拥护中山先生的主张，推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势力，以冀地位得以增高，生活得以改善。可是现在没有中山先生了。

中山先生没有了，我们失掉了伟大的领袖；我们是何等的悲伤！何等的恸悼！

可是，中山先生虽然死了，中山先生的革命主义是永远不死的。革命的国民党是继续存在的。中山先生死了，中国工人阶级以后的责任加重了，要拥护中山先生的主张，依照中山先生的策略，继续中山先生“革命数十年如一日”的精神整齐队伍，不断的向帝国主义与军阀奋斗。中山先生的主张，工人阶级的胜利，仍然在我们的努力奋斗中实现。

受几重压迫的中国工人们呵！起来！追悼孙中山先生！追悼是不够的，起来！继续中山先生的革命！

压迫我们的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呵！要你们在全国民众继续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中发抖！

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 与职工运动方针*

(一九二六年五月)

(一)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有极大之发展,尤其在“五卅”运动^[9]中,更有长足之进步。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能领导一切民众向帝国主义与军阀进攻。各地惨杀案均因镇压罢工而起,惨杀结果以工人死伤为最多。工人阶级在“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牺牲为最大,主张最为急进,奋斗最能坚持,力量亦表现得非常伟大。在各种奋斗事实中,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

(二)一年来,职工运动均被军阀压迫与摧残,尤其在“五卅”运动时,奉直军阀^[10]摧残工人阶级更为惨酷。由这

*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至十三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刘少奇是大会秘书长,受大会主席团委托,作《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报告分五部分:一、第二次劳动大会的意义及其前后的中国职工运动概况;二、“五卅”运动;三、反奉战争;四、全国职工运动之现状及其趋势;五、结论与进行方针。收入本书的是第五部分,原载这次大会会刊第十一期。现题是编者加的。

些事实，更可以明了国内军阀是帝国主义之工具和走狗。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永远是群众的敌人，也即是国民革命的对象。同时，又可以证明必须打倒军阀，方能使反帝国主义运动得到胜利。

(三)中国资产阶级本来受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他们有参加国民革命之可能，但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终究是妥协的，不能彻底的。而且当无产阶级起来参加革命时，或要求生活改良时，资产阶级就马上反动起来了。“五卅”运动中，上海资产阶级的反动行为，已够我们领教了。我们工人阶级在某一个时候，即在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冲突最厉害的时候，应与资产阶级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以增强反帝国主义运动之势力。但当资产阶级一有妥协之倾向，或压迫工人运动时，工人阶级应极力反对，以防备资产阶级骗卖自己。

(四)中国小资产阶级，包括小商人、学生，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过去一年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中，证明小资产阶级是有力量的，能革命的，工人阶级应切实与之联合，建立联合战线。工人阶级并应促进小资产阶级之左倾，以补救其游移保守之根性，而不为大资产阶级所利用。

(五)农民为国民革命之重要势力，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中国工人阶级应切实提携农民，进行中国的革命。各处的工人应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及指示奋斗方法，在农民的一切奋斗中，工人应以实力援助之。工人阶级确定

自己奋斗的方式时，必须顾及农民的利益。

(六)中国工人阶级在组织上已有极大之进步与发展。全国工会会员不但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增加，且能改良他们的组织。现在各处工人群众都有统一工会组织之呼声，比如香港、广东工会之统一运动，及上海工人群众在严重压迫之下，尚能有二十万工人在秘密组织之内，且能不时为各种问题而奋斗。以此即可证明，中国工人阶级之组织已非反动势力所能消灭的了。

(七)工会为工人群众之经济组织，所以必须公开。现在中国的工会尚不能得到法律上的保障和社会的承认，中国工人阶级为要发展中国的职工运动，必须积极地公开地开展争工会条例的运动，即使不能争得工会条例之颁布，亦可引导中国工人群众走到政治争斗的路上。中国职工运动，必因此种争工会自由的运动而发展。

(八)过去一年的职工运动，固为反帝国主义之政治争斗，但其中处处都可看到工人的经济要求。中国工人阶级劳动条件之恶劣，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因此，今后职工运动之方针，应加强各种经济争斗。工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要求其经济上之利益。经济问题，工人在所必争。经济争斗之发展，即为中国职工运动之发展。

(九)中国工人阶级在过去一年的伟大奋斗中，已经惊动了全世界，世界工人阶级均起而注意中国工人运动，中国工人阶级与世界工人阶级联合因此更加密切。如在“五卅”罢工中，各国工会来文电援助者、示威捐款援助者、派代表

来华联络者，已不知若干起。今后中国工人阶级应在各种行动及组织中，与世界工人阶级建立更亲密之联合，促进世界革命。

(十)中国职工运动迅速发展，工贼亦同时猖獗。各处工贼破坏我们的力量非常的大，我们应设法对付工贼之破坏，工会中应有自卫的组织。

工会工作中的三个问题*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一 工会代表会

(十二月二十六日)

工会是群众的、奋斗的机关。工会的权力，应该十分集中，才能奋斗；同时又一定要是民主的集中，才能容纳大多数人的意见，不致为少数人所包办，变成专制。

所谓民主集权制，就是工会的权力集中在大多数人的会议上，不是集中在个人身上，即凡事须经过大多数人的会议决定。一决定以后，即必须实行。各会员在一事未议决以前，均可自由地发表意见，若一经会议议决以后，则无论什么人均须服从。这样，一方面可以容纳群众的意见，一方面又可一致地与敌人作斗争。

有了上面的理由，所以每一个工会要有一个代表会。

* 在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中，为了指导蓬勃发展的职工运动，加强工会的组织建设，刘少奇撰写了《工会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和《工会基本组织》三本小册子，由当时湖北全省总工会宣传部印行。本文是这三本小册子的三篇序言。

有了代表会，才可把工会的权力集中起来，同时又是民主的集中，不是少数人的专制。所以，工会的代表会是集中工会一切权力的机关，一切权力归于代表会。这样，于工人的团结、工会的前途，均有莫大之效益。

一个工会，如果没有真正的工人代表会，这个工会就不能接近群众，就不是工人的工会，就变成了少数领袖的工会。工人与工会一有隔膜，工会的团结就不坚固了，敌人乘隙进攻，从事破坏，制造谣言，煽惑群众，工会前途因而危险。所以，代表会是什么工会不可缺少的组织。没有代表会，工会就危险；有了代表会，工会就坚固。

工会全体会员大会，应该是比代表会更高的权力机关。但事实上会员大会不能常开，且以人数众多，难于讨论各种问题，故在组织上反不及代表会之重要。

现在武汉的工会，没有代表会的很多，望各工会赶快按照规定，把代表会组织起来。已有代表会的工会，望切实整理，使代表会真正能够行使职权，按期开会。各工会代表会的组成，就可使各工会的团结巩固，各工友、各工会的办事人不可不切实注意。

二 工会经济问题

(十二月二十七日)

经费问题，是工会中时常发生的大问题，可以使工会分

裂，可以使工会塌台，可以使工会不信仰他们的领袖及工友。所有的工友，尤其是在工会的办事人，应该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求得解决这个问题方法，预防这个问题的发生。

工会无钱，经济困难，固然可以减弱工会的力量，但若为充裕工会的经费起见，勉强向会员征收多量之会费，引起会员之反感，则于工会前途，将更多不利。

工会有钱，若使用不当，支配不平，则所发生的问题更多且大。在工会无钱时，大家为工会尽义务，不要钱不吃饭，努力奔跑，十分齐心；若是工会有了钱，大家就不能尽义务了，不给钱不供饭吃不能跑了，因此就不齐心了，彼此争吵起来了，工会反而不好了，这样有钱倒不如无钱的好。有时工会职员并无黑幕，若买了一顶新帽，置了一身新衣，会员大家看了，心里就疑惑起来，以为这位职员一定在工会里揩了油，不然，何以置了新衣新帽呢？若有工会职员在一个地方打了一次牌，喝了一次酒，那更是了不起的事，马上就争闹起来了。何况真有不争气的职员，真的侵吞公款，弄出黑幕，有账目不清等事，工人群众，那有不群起而攻之？如此一来，此帮彼派，互相争打，工会分裂了。工人领袖们！工友们！工会的经济问题，是工会进行中多么大的危险呵！

工会的钱，是在工人身上抽取来的极苦的血汗钱，工会办事人拿了个钱，应该怎样的小心谨慎来使用！那里可以在门面上形式上浪费一文？那里可以把自己的津贴及生活费定得很多？领袖是为群众谋利益的，牺牲自己，努力作

事，努力奋斗，是应该的。作事比一切人多，拿钱比一切人少，这才是工人的真正领袖。作事比别人少，拿钱要比别人多，这是一切工会职员所不应该的呵！

所有的工友都要懂得，工会中经济的纠纷发生了，是极困难解决的问题。大家要有很大的责任心去监督工会的经济，要订出很多的章程法则，预防这类问题的发生。这种技术的工作，是革命中很重要的工作，与工人阶级的幸福有极大的关系。

我因为看到这个问题的重要，特把这个问题写成一本小册子，望各工人领袖及工友们尽量采纳施行，工会前途幸甚！

三 工会基本组织

(十二月二十八日)

工会这个群众的奋斗机关，在革命中所负的责任，极为长久重大。因此，工会必须有严密的组织，才能克尽所担负的使命。所谓严密的组织，就是在执行委员会之上，有真正的工人代表会，在执行委员会之下，有群众中的支部基本组织。

工会的群众很多，若无支部等基本组织，而仅有工会的执行委员会和工会的招牌，那会员愈多，愈加散漫。这样的工会，是不能奋斗的，执行委员会是无法统率群众的。比如

军队，若只有一个司令部，底下没有营连排等下级组织，则这个军队就没有法子进行战争。所以，一个工会若没有支部、小组等基本组织，或有支部、小组而不起作用，则这个工会的组织就不健全，行动的时候就必感受很大的困难。我们要懂得，支部、小组是工会的基础，工会是建筑在支部、小组之上，支部、小组若不坚固，工会的基础就不坚固，有了好的支部和小组，工会的基础就有了保障。

工会有了支部及小组之后，工会的行动就非常敏捷便利。一旦有紧急的事情发生，执行委员会会议决之后，即刻通知各支部及组长与会员，在一二小时内，全体会员均可动作，而在形式上不费什么手续。若无支部及小组，如要使全体会员动作，则非开大会、发传单或出布告不可。如此，非费一二日之时间不能使会员全体知道，但若费去一二日之时间，时机已过，虽行动亦无效果了。这于工会是何等大的损失啊！

此外，工会有支部及小组，可使工会的行动秘密起来，不致为敌人所破坏。工会对于工人的训练和教育，也可便利施行。各方面的消息亦极灵通。工会易明了工人的真实情形，工会的工作情况可常向各支部报告，使工人与工会之间的关系密切起来，不致发生什么误会和隔膜，于群众的团结亦有极大的效益。工会若无支部等组织，则工会的行动无法秘密，工人训练与教育亦难施行，消息既不灵通，情形又多隔阂，如此而想工会有力量，团结得坚固，实为不可能。所以基本组织在工会中真有极大之功效。凡各工会及工友

不可不努力进行组织。

工会代表会、执行委员会及支部均是工会必要的组织，缺一不可。现在，武汉工会的执行委员会已经通通有了，但还有很多工会没有代表会及支部。同时工会的经济问题也极为重要。我们为武的工会在加过工资之后，更进一步地团结和巩固起来，并消除内部的危险，特费了几夜的工夫，很简要地写成《工会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及《工会基本组织》三本小册子，交总工会宣传部印行，以备各工会及工友采纳施行。望我工友过细观看，如有错误之处，仍希指正。

论陈赞贤⁽¹¹⁾同志在赣被害事*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七日)

工人是革命的先锋队，中国的革命发展了，我们工人阶级的热血实在流得不少，尤其是工人的领袖死于军阀帝国主义者刀枪之下的更是很多。可是没有象陈赞贤同志这样死得奇怪的。

陈同志是江西人，曾充广东南雄县总工会的委员长，兼县党部的常务委员。去年七月间他到广州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我谈话。他说“现在国民政府北伐，江西的工人，没有很多组织，请全国总工会派我回江西，先到赣州去秘密组织。将来一方面在战争上可以帮助国民革命军，一方面在公开后工会就有了基础”。当时我以他能舍去现任委员长，去江西秘密的工作，很是佩服他，就即刻写了一张委状给他，委他回江西工作。不久我到汉口来了，没有接到他的报告。

陈同志工作是很努力的，到江西没有数月，就组织了数万工人，又被选为赣州总工会委员长，我们都以为在蒋总司

* 本文原载《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七日出版。

令坐镇的江西，得到政治上相当扶助，陈同志将来正是未可限量的。但现在竟以被秘密枪毙闻！

陈同志是革命工人的领袖，在革命的蒋总司令坐镇之江西，在革命军新编第一师驻防地赣州，是如何被枪毙的呢？这不得不使我们奇怪！在孙传芳⁽¹²⁾张作霖⁽¹³⁾统治下的上海、天津，枪毙工人领袖，固然是常事，但我们从没有把现在的江西放在上海、天津同一感觉之下，如今事实上的表现，却不得不改变我们对于江西前此的观念了。

查陈同志完全是死于反革命封建军官之手。这些反革命的军官在江西拼命分裂工人的组织，勾结旧封建势力压迫真正工人的运动，枪毙陈赞贤就是反动派最猛烈的进攻。我们看枪毙陈同志的原因，据二月十二日赣州总工会向国民政府请愿书上说：“赣州工会自组织以来，迭遭旧社会一部分人之诬陷。如洋货绸缎布匹店员因往二女师看戏被拒，在校门上写了二句骂刘淑贞之文字，乃系工人个人一时错误行动，而该校长欧阳魁即电上峰解散工会……并归罪于陈赞贤……。又赣党部筹备处谢溥泉等违法舞弊引起同志不满，致代表大会未开成，乃纯系党内之事，而代表许迪献等电蒙上峰，诬工人代表推翻桌椅，痛殴书记，并牵涉与此事毫无关系之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而倪党代表（新编第一师倪弼）乃利用旧社会一部分人……借解决纠纷为名，制造纠纷，诬及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秘密严缉。……借此摧残工会……。”我们看了上面的话，就可知道枪毙陈赞贤的罪状了。请愿书上又说：“倪党代表往工

会讲演谓‘各工人工会皆甚好，唯有陈赞贤不好，如你等能打倒陈赞贤，我当时常来指导你等’。工人不服，又谓‘你们拥护陈赞贤便是反革命’。”请愿书云：“陈赞贤是国民党员又负有党的重要职务……。陈赞贤是工人的真正拥护者，若倪责其不应真正拥护工人，我们即俯首帖耳任人宰割可也。我们只知拥护陈赞贤为自身谋解放，他人之离间中伤，不与计较。”由此可知工人是如何拥护陈同志，反动派是如何去分裂工人的组织了。

现在江西的党部中军队中有少数的反动派把持，不承认真正的工会，把应给工会的津贴去培植一班反动派，去组织假工会。他们曾说，凡没有经过他们备案的工会，都要解散。可是真正的工会去备案他们又不肯。现在江西反动派十分猖獗，已经在总司令的面前有军官枪毙工会委员长，这件事的发生，值得国民政府及全国革命民众严重注意。蒋总司令如果没有改变他前此拥护工农拥护民众利益的主张，断不能纵容一班反动派如此凶横残杀工人领袖。应该采取断然的手段，枪毙凶手，肃清一切反动派，保护真正工人的工会，并从优抚恤死者。如其不然，那我们不能不怀疑现在总司令所坐镇的江西了。

建筑在革命民众上面的国民政府，对于这件事的发生，应实行其最高威权，严令江西当局肃清一切反动派。同时并应有政府自行解决的办法。

全国革命团体及革命民众应该认为江西这事件的发生，是摧残革命，是革命战线内反革命的开始，大家应一致

起来斗奋，督促政府及党部肃清一切反动派，并竭力援助江西的革命民众，务必达到国民革命之完全成功。

最近中国职工运动, 国民党 工厂法、工会法与赤色 工会⁽¹⁴⁾目前的任务*

(一九三一年夏)

一、危机的深入

在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之下, 中国的危机是更加深入。上海有三个纱厂关门, 一个纱厂停止日工, 失业者达一万人, 又有两个纱厂换三日班。丝厂在年初大部关门, 失业者达四万人, 现在新丝上市, 还有许多关门。上海电汽电话要裁减工人三千人。彩印失业者六百人。江南纸厂裁减工人四分之三。外国轮船公司有很多轮船停航, 实行合理化, 大大裁减工人, 如大东公司以前每船用一百三十人到一百四十人的, 现在只用四十六人; 渣啤公司以前用七十一—八十人的, 现在只十五人; 昌兴公司每船减少六十人。太平洋航

* 一九三〇年六月, 刘少奇率中国工会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上, 刘少奇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第五届执行局委员, 会后留在执行局工作。本文是他在任职期间以刘祥笔名写给赤色职工国际的报告, 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线每船亦减少数十人。海员在上海、香港等工作，经常在四万人以上，包工头对他们的剥削特别加重。铁路上如北宁路裁工人达八百人，京汉路有裁去工人四分之一的消息。中国资本的矿山大部停工，仅贾旺煤矿恢复一部分工作。太原兵工厂裁工人二千人，各地小棉织厂很多关门。以前停工的烟厂、火柴厂、油厂等还是继续停工。失业工人是大大的增加。因银贱影响，贸易低落，出入口减少，商店在全国各城市关门者及缩小范围者极多，店员很多失业。农村经济的破坏还是继续深入。一般物价增长得特别快，房租也大大增加了。同时，革命的危机也在增长起来。广大的农民战争，红军的发展与胜利，动摇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国民党的各派虽然在用全力进攻红军和苏维埃^[15]区域问题上联合一致，但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内部的矛盾，不独没有消灭，还是继续加紧，酝酿军阀战争。

二、工人斗争的继续高涨

经济危机的深入，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广大发展，城市工人斗争也是继续高涨的。工人的斗争包括了许多产业部门，有了比较大规模的罢工，在斗争中表现工人阶级的反攻。在上海和北方都爆发了许多罢工运动。在铁路上有北宁路失业工人的斗争，胶济路总厂罢工十二天，反对国民党取消年关休息及路局苛例，沪宁路总厂的怠工，粤汉路总厂工人包围武昌公安局，京汉路工人反对强迫开车及索薪的斗争等。海员在黄色工会^[16]领导下每月增加工资六元，有开滦运煤海员的罢工，南洋失业海员要求面包包围华民政

务司,大连、香港海员反对开除工人的斗争等。在纺织业中:有天津纱厂一万二千人自发的罢工(仅二日被武装压迫上工),上海有四十余家丝厂约二万女工的罢工要求恢复原有工资(仅三日被压迫上工),上海、青岛、汉口纱厂丝厂还有许多个别的罢工(日华、申新、统一等厂)。此外上海英美烟厂八千工人怠工,邮务工人要求十元房贴的斗争,公共汽车工人的怠工,海关报关职员罢工,人力车夫、马路工人及码头工人的斗争,店员有典业、帽业、酒业的罢工,兵工厂要求年关双薪的斗争,以及上海二十几次的年关斗争等。在天津有自来水工人的怠工(要求加工资,承认工会代表权及开除工人须工会同意与开除工贼等共十二条),电车工人的要求。北京制油工人的罢工。山东猪鬃、发网及医院女工的罢工。太原兵工厂三千工人捣毁工厂合作社(因合作社强迫工人购物,价比市价高)。唐山矿工的斗争。蚌埠工人和商民总罢工罢市,反对国民党征收米捐及枪杀帆船工人(在商会领导下)。由上面的事实可以看到工人阶级的斗争在各地都是不断的爆发,在工人中普遍的酝酿了极端的不满和斗争的要求。但是这些斗争大部分都是自发的,散漫的,缺乏组织,没有自己阶级的工会来作领导,以致许多斗争都在国民党黄色工会的武装压迫和欺骗手段之下控制起来。还有一些经济斗争是完全在黄色工会领导下进行的(如海员的加薪,天津自来水、电车等)。绝大部分的罢工在国民党的黄色工会的仲裁、调解和交涉、怠工之下解决。

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国民党黄色工会的现状及其在斗

争中的作用。国民党黄色工会并不是一样的东西，有内部各种派别，欺骗群众和压迫群众的方法也各有不同，但他们——黄色领袖一致的口号就是“劳资合作”、“服从国民党和政府的指导与法令”、“服从国民党的调解与仲裁”。如果不能完全压住群众的时候，他们在某几点不重要的地方表示一些不满意国民党的态度，为的是欺骗群众，用交涉、请愿、调解等等方法来对付工人斗争；再不能压住工人的时候，就用和平息工的办法来代替工人的罢工。他们对共产党和赤色工会是用直接的逮捕和告密的方法来破坏。此外还有一些国民党工会是直接压迫工人剥削工人的机关（如汉口、青岛及其他地方的），因此常常引起工人来反对这些工会，捣毁会所，殴打工会职员及征收会费人员，甚至工人起来罢工反对工会（如嘉兴人力车工会）。

在上海还有一些新的黄色工会成立，如出版业工会^[17]成立（包括编辑及印刷工人），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国际联盟^[18]劳工局在上海分局局长均到会；发起成立上海纱厂工人联合会，并有内外棉纱厂工人代表到国民党请求组织工会；其他如轮船、木业、闸北丝厂、瑞康玻璃厂均成立黄色工会。有些黄色工会还组织有工人俱乐部、工人学校、工人子弟学校、互助社，及武术团、京剧社等。国民党的海员工会本来是空机关，现在因为向各轮船公司交涉加了每月六元工资，拟召集全国代表大会，上海人力车夫也呈请国民党组织工会，但国民党均没有批准。上海邮务工会因为反对国民党改组及要求增加房租，工人对工会的幻想又增加

起来。

最近国民党的黄色工会在群众中还大部保存其固有地位，在工人斗争中表现的作用还有些增加。

三、国民党向工人阶级的进攻——反动工厂法、工会法及改组工会

红军和苏维埃的发展，工人斗争的高涨，给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以极大的威胁。消灭红军和苏维埃区域，隔断城市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的联系，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继续维持其统治的唯一条件。国民党已经派遣三十万大军进攻苏维埃区域，与红军发生激烈的战争，同时颁布土地法、工厂法、工会法，召集国民会议等，来缓和群众的不满，并向群众的革命斗争施行有系统的进攻和镇压。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施行的第一步，就是命令“改组”一切的工会，实际上是解散黄色工会，禁止工人罢工，及一切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

根据国民党的工会法与改组工会的命令，现存的邮务工会、铁路工会、市政工会以及所有兵工厂、人力车夫等黄色工会，及各地店员工会均需解散，其余一切的工会均重新改组，不许有全国性质的工会组织。上海分成十区组织区联合会，上海市总工会解散，即最反动的广东总工会也需解散，法西斯的机器工会禁止开会。据国民党的报告，上海有九十二个工会需要改组或解散。以前黄色工会与业主订的条件须经过重新审查，认为不合法者取消。在改组期间禁止一切工人集会、结社及罢工。很明显的这是国民党向工

人阶级举行大规模的进攻。

国民党为什么要解散和改组黄色工会？其原因：1. 因为国民党大举进攻红军，城市工人的每一次群众行动都要妨害国民党的后方，国民党以前所能允许的黄色工会的行动，现在对国民党都是有妨害的了。2. 工人斗争的高涨，群众的行动常常不是黄色工会所能范围得住，需要用更进一步的方法来压迫群众。3. 要保证将要召集的国民会议的工人代表完全是政府的忠实走狗，所以对于现在不十分可靠的黄色工会，要予以解散或改组。

因此，国民党施行工厂法、工会法，解散和改组工会的政策，与进攻红军及召集国民会议的政策，是不可分离的。

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在群众中发生了很多的反抗（当然有许多工会依法改组，并且宣传一定要改组成为合法的工会，才能保护工人），单根据反动报纸的消息就有以下的事实：

1. 上海工会为和平苦争工会改组案，拟乘年关大休息，不居罢工之名而行罢工之实。先由邮务发动，次为报界。又十三日邮工大会议决坚持十元房租要求，否则取最后手段。
2. 上海南货业等店员工会反对与同业公会合并。
3. 国民党因恐酿成邮务工潮，允许邮务工会继续存在。
4. 国民政府为谋店员职工参加同业公会补救办法，修改同业公会法第十条：同业公会代表在每超过十人以上之店铺，得选派店员一人为代表（原法只有店主可为代表），但最多不得超三人（店东反对这条修改，提议店员代表至多不

过二人)。店员要求改善待遇得呈请党政机关调解；以前与店主所订条件，允由党政机关重加审查，予以保护，其有不合法者取消之。

5. 上海药业等三十二个同业公会联名呈请中央，店员除参加同业公会之外，不应再有任何组织，请明令即日解散店员工会。

6. 对于铁路工会国民党颁布了一种“铁路工会分事务所组织简则”。

上海邮务、报界等工会曾发表宣言及告工友书，他们提出“反对改组，维持现状”、“反对任何改组”、“要求列入特种工会之例”等口号，并有“对现在政治痛苦流涕”之语。同时还有一些工会也发布告工友书，提出“必须依法改组”、“改组后就成为合法工会”、“合法工会才能保护工人”等口号。上海国民党及社会局连日召集各工会代表谈话，许多工会代表赞成改组。又据工人报上的文章，取消派⁽¹⁰⁾等也提出如黄色工会一样的“反对改组，维持现状”的口号。

赤色工会对国民党的工厂法、工会法及改组工会问题提出什么策略呢？全国总工会会有决议宣言，工人报上的文章及各种传单等，并在纪念节的工作及经济斗争的宣传煽动中都提出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口号。我们的中心口号是：“反对工厂法、工会法，反对国民党黄色工会破坏工人自己的工会，为组织工人自己工会而斗争！”全总提议用什么手段来反对工厂法、工会法呢？对于这一问题在各种文件中都没有正式的提出而给以回答。在各种文件中有“应当用加工资，

加米贴房贴,反对加重工作,反对开除工人,组织工人自己工会等要求,来反对工厂法、工会法”。“应当有步骤的来揭破黄色工会的欺骗”,“应当参加黄色工会的会议,用赤色会员个人的资格来部分的或全部的提出关于这一斗争的纲领。”仅在全总宣言上提到“以怠工罢工包围资本家的行动,力争集会罢工组织工会之自由”的口号。从各方面知道中国同志中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不能反对国民党改组工会,为的是怕帮助了黄色工会,更形成我们工作的困难。在赤色工会中这种意见似乎是占了领导地位。在各种文件中都没有说出对于国民党解散工会改组工会我们所取的态度。似乎是这样认识:我们只反对国民党及黄色工会来破坏(或者解散)赤色工会;至于国民党去解散或者改组国民党“自己的”黄色工会,我们就无须管他,用不着去反对,因为所解散的不是工人自己的工会。所以在邮务斗争中我们只号召工人坚持十元房贴,打倒黄色工会。还有一种意见:我们只要宣传苏维埃区域实行的八小时工作、劳动保险、保护童工女工及集会、结社之自由等,号召工人推倒国民党的统治为苏维埃而斗争,至于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就用不着提出这些要求向国民党斗争,因为这些要求国民党的统治是不会给工人的,如果提出这些要求只是增加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上面这些意见在莫斯科的同志中也有赞成的,我们在东方部的讨论中曾经发生过争论。其他改组后的黄色工会,及工厂会议,中国同志决定我们是要参加。但在这里的同志是主张不参加工厂会议。关于这点我还有些动摇,倘若全厂工人

都去选举代表，我们不参加，让国民党包办选举一些工头工贼，于工人又有什么好处？还有同志主张赤色工会的积极分子根本不应该参加黄色工会的执行委员会，但我是主张有条件的参加。

还有几个同志的意见以至我的意见，不能拥护全总规定的策略和立场。

第一，我们应当反对国民党的反动工厂法、工会法，同时我们应当提出工人阶级的要求纲领，和国民党对抗，作为群众反攻的口号。在要求纲领上应当规定八小时工作，青工六小时工作，保护女工童工，最低工资标准，失业救济及工厂卫生疾病死亡之抚恤等，工人集会结社言论罢工之自由，工会工厂委员会之代表权。认为这些要求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在群众革命斗争逼迫之下没有部分的实现的可能，一切都要等到国民党统治推倒之后苏维埃政府成立才来实现的主张，这是中国同志很旧的机会主义主张。就是放弃部分斗争的主张。

第二，国民党及其政府来解散工会改组工会干涉工会的一切行动，我们无条件的是应该反对的，不管他解散的是赤色工会或者是黄色工会。因为国民党不承认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取消工人阶级的一切自由。认为国民党解散赤色工会我们就反对，解散黄色工会我们就不反对，这是狭隘的宗派主义。认为国民党可以解散国民党工会（他们认为苏维埃政府认为必要时也可以命令解散或改组赤色工会或苏维埃区域现存的黄色工会，李立三〔20〕解散全总，武

汉时代的总工会曾以强力改组过一些工会等，都是一贯的)，就是根本不了解工会的独立性，认为我们不要帮助黄色工会的群众反对国民党解散他们的工会，我们只反对国民党、黄色工会来破坏工人自己的工会，这就是站在运动之外，抛弃与黄色工会群众建立联合战线夺取黄色工会群众的任务，将运动的领导权送给黄色领袖。他们的认识是：要么我们不管黄色工会只为赤色工会而斗争，要么我们就作黄色领袖的尾巴。

第三，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纲领用我们的口号与黄色领袖的口号对立起来，揭破黄色领袖的口号的妥协和叛卖工人阶级的作用，与黄色领袖争取对运动的领导权。应该向工人提议联合所有的工会及无组织的工人共同反对（实行广泛的下层联合战线），召集各种会议及代表大会，提议用同盟罢工示威的方法来反对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及解散工会。号召群众起来改组黄色工会，推翻那些出卖工人阶级的黄色领袖的领导。在斗争中联系到工人的经济要求（尤其是被取消的于工人有利的条件），联系到“反对国民党进攻红军，反对国民会议”的口号。如果认为只“用加工资，要米贴的口号去反对工厂法、工会法”，我们不能向群众提议用政治罢工和示威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要求，我们不在“经济斗争中来联系到政治口号，联系到争自由的口号”去反对工厂法、工会法及国民党解散工会，这就是以经济斗争来束缚我们自己，就是抛弃政治斗争，就要落在可耻的黄色领袖的后面。黄色领袖还提出和平罢工反对改组的口号。

此外在全总的文件刊物中还有许多个别的错误，不去说他。

四、赤色工会的现状与工作

全总新委员会开始工作不到二月，已经规定了自己的工作计划。恢复中央的刊物，注意到职工国际⁽²¹⁾决议和路线之传达与研究。组织女工委员会，把自己的工作转向到下层群众工作。在上海恢复了一些企业中的职工小组，建立了四十个以上很小的辅助组织(如俱乐部、姊妹团、饭堂、茶馆等)，还领导了很少的日常斗争，并得到胜利。开始了我们的妇女工作并得到了一些成绩。“三八”我们领导一个纱厂停工叫口号，开了三个庆祝会，后来在日本纱厂中领导罢工胜利。开了一些女工会议，在会议上报告苏联女工生活，提出要求纲领及讨论她们的斗争等，上海纱厂丝厂烟厂中有十多个女工辅助组织。出席五次大会的女代表回去发生很好的作用。在天津、满洲、香港还有很少的职工组织，现在正才派人去。海员、矿山也有很少的组织。全国白色区域的产业工人目前与我们有联系的还只有二千人到三千人。全总还组织了不多的工人到红军中去，对苏维埃区域的工会运动已组织了一个有力的委员会派去。出版了不多的小册子，准备研究黄色工会的工作。

在以上的工作中看来，全总的工作的确是转变到下层的群众工作方面来，抛弃了过去空叫空喊的路线。但这种转变是否足够？在工作中发生了什么错误和缺点？我们现在根据很少的传单宣言及刊物的研究，可以说出下列几点：

第一，在经济斗争中没有运用下层联合战线。我们在许多经济斗争中，在黄色工会群众起来作经济斗争时，我们的口号总是“组织工人自己的赤色工会”，“打倒黄色工会”，工人的斗争才能胜利。他们认为在赤色工会还没有建立以前，在黄色工会还没有打倒以前，再没有别的办法使工人的经济要求能够达到胜利。因此总不向工人提议罢工委员会、斗争委员会的办法。用这样的口号来掩盖他们对于领导经济斗争的消极，站在群众及黄色工会的经济斗争之外去另外建立工人的赤色工会。比如上海工联^[22]准备电汽车工人斗争已经有四星期，工人已被开除一百多人，斗争还没有发动。工联在告工友书上提议下面三个办法：1. 我们要建立工人自己的工会，在各车间各班成立赤色工会的小组，这就是准备斗争前必要的先决条件；2. 我们要积极参加工人自卫队和纠察队，保护工人自己的工会；3. 我们在上海工人自己的总工联领导之下，坚决斗争，反对仲裁调解。在其他的许多传单上均没有提出罢工怠工的办法，还提出“大家抱义气”的口号。我们活动四星期的结果，范围只进到三百人（全体二千多人）。工人中就有提议去请国民党来调解，因为工人再不能等了。在青岛铁路工人的罢工中，我们也只说出组织自己工会，打倒黄色工会，罢工才能胜利。下层联合战线的策略，在这样的办法之下是被取消的。

第二，把各种纪念节的工作，作为赤色工会的中心工作，纪念节工作的目的就是游行示威。不是把纪念节的工作，游行示威的目的，来服从赤色工会发展和领导经济斗

争，提高群众的情绪，建立赤色工会基础，争取群众的主要任务。他们似乎是这样想的：以前号召南京路示威，总罢工是不对的，现在号召分区示威，厂内集会关车，总对了。一切的工作方法通照过去一样。结果在这些纪念节的运动中常常不能使群众更走向我们，反而更离开我们。赤色工会在企业中的组织在纪念节的关车和示威中消灭了削弱了（“三八”纱厂关车被开除数十人，闸北和沪东的失业工人组织因工作方法不好，又弄到工人不敢再来了），群众更畏惧起来。还有在纪念节工作中联系到经济要求，是十分机械的，甚至忽视各纪念节的政治宣传（上海工联“三八”传单全部是经济要求，没有一个关于“三八”的口号）。我们的口号一般的也是如此：用加工资、要米贴、反对开除工人等口号，来纪念“二七”、“三八”、“三次暴动”等。

此外，在文件中还表现有许多具体的错误，表现同志们在各种实际问题中思想的杂乱动摇，没有一贯的清楚的立场。如对黄色工会的策略还表现有许多不正确的观念，海总反对国民党工会全国代表大会的通告没有说出一定的策略办法，对失业工人委员会一定要隶属赤色工会之下的主张，在辅助组织中不宣传赤色工会的纲领，各种刊物文件及工作方法之特别抽象不群众化等。此外还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就是全总新委员会发行的职工国际五次大会〔23〕的决议的译文，错误到一塌糊涂，与在莫斯科的译文有许多不同。原文有二十三条，他们的只有二十一条，自由的加些话上去，又自由的去掉一些话。许多语句简直把原文的意思

和路线都改变了。这简直是对职工国际的路线开玩笑！虽然这译文是以前的，但全总有俄文很好的同志，将这样的译文印成小册子在刊物上发表，发行到群众中去，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五、赤色工会目前的任务

赤色工会目前的任务主要的如下：

1. 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与黄色工会的群众建立统一战线，反对国民党的反动工厂法、工会法，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解散工会、改组工会及一切干涉工会的行动，反对取消工人的一切自由。提出工人阶级自己的要求纲领，号召群众用罢工示威来反对国民党向工人阶级的进攻。并联系到反对国民党进攻红军，反对国民会议。

2. 反对黄色工会所提出的口号，用赤色工会的口号来代替，揭破黄色领袖的欺骗和叛卖工人阶级的作用，号召群众推翻黄色领袖，选举革命的工人来代替。

3. 为争取对于经济斗争的领导权而斗争，组织脱离黄色工会而独立的罢工委员会、斗争委员会，力争由这些委员会来解决罢工，反对黄色工会官僚的谈判、调解和仲裁。

4. 扩大与群众的联系，在每个企业中建立革命职工小组，并扩大这些小组，使他们巩固起来。在企业中建立工厂委员会、工厂代表会，切实来考察和指导这些小组的工作。把工作重心放在企业中。

5. 普遍的建立辅助组织，使辅助组织能帮助赤色工会的发展及基础的建立，帮助工人的经济斗争。注意失业工

人运动,使失业工人委员会变成广泛的群众组织。注意女工青工中的工作。

6. 使领导机关的工作群众化,改善刊物,注意分析群众实际生活,回答群众一切所关切的问题。

7. 与实际问题联系来研究职工国际的决议和文件,使这些决议通俗化,传达到群众中去,肃清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和立场。

8. 反对右派,暴露他们的罪恶,揭破他们的欺骗,号召在右派影响下的群众回到职工国际路线上来。

关于工运的意见*

(一九三一年十月五日)

中央：

前次职工部会议，我们在几个问题上有意见分歧。关于目前工人斗争形势问题，因为中央早有决定，故我只能和你们来讨论。对这个问题在会议之后，我还有许多疑问，故我提出以下的许多问题给你们。同时我以为对于有分歧意见的问题，应该平心静气的在组织范围内作彻底的讨论，因为这样能发现我们的错误和纠正我们的错误。

一、工人斗争的形势，是防卫的反攻的或是进攻的，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呢？我以为应根据下列三点：第一，资本进攻的形势，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在斗争中力量的对比关系；第二，在斗争中工人所提出的要求和斗争口号；第三，斗争中力量的重新组合，斗争口号和要求的如何转变。

二、我们为着什么要确认工人斗争形势是防卫的反攻的和进攻的？我以为是为着要规定我们在职工运动中的策

* 这是刘少奇写给中共中央的信。

略和我们用什么口号与要求去鼓动和组织工人的斗争。

三、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危机中，资本继续进攻，还是不是严重的事实呢？还是严重的。减低工资，延长工时，加重工作，开除和裁减工人，欠发工资，物价高涨，关厂停业，克扣工资，合理化等等。同样，国民党黄色工会和雇主与帝国主义联合一致向工人阶级继续进攻，也还是不是严重的事实呢？也还是严重的。禁止罢工，解散和改组工会，强迫调解与仲裁，完全剥夺工人集会、结社的自由，逮捕工人领袖，开除工人活跃分子，厂警搜查和武装镇压等。

四、以上资本进攻与国民党黄色工会雇主的联合进攻，是不是最近许多工人斗争中的重要问题呢？反对减工资、加工时、加重工作，反对开除、裁减工人，反对物价高涨，反对克扣和罚工资，反对关厂，反对包工头的剥削等，是不是最近许多工人斗争中的重要口号和要求呢？这些口号和要求在今天以后是不是还是重要的呢？同时反对禁止罢工，反对解散工会和剥夺工人的自由，反对强迫调解、仲裁，反对逮捕工人，反对厂警搜查和武装压迫等，又是不是今天以前和以后的重要要求和口号呢（而且土面的要求和口号不仅仅是引起斗争的导火线而已。）？如果我们承认最近许多工人斗争是为反对资本及国民党的进攻，同时又承认工人斗争“绝不是防卫的，而是反攻的与进攻的”，这又是不是矛盾呢？就是在今天以后，如果有人把反对资本及国民党进攻的口号，放在毫不关重要的地位，又是不是正确的呢？

五、我们还应该注意一种事实。当我们的鼓动家拿着

全总的要求纲领（改良工人生活的要求）去鼓动工人的时候，工人答复我们说：“这个纲领好是好，可是目前做不到。”这是说明什么呢？为什么在“二七”以前，“五卅”以后，武汉和广东时代，听不到一次工人对我们有这样的答复呢？海员最迫切的要求是什么呢？反对洗马沙〔24〕，反对开除，反对海关搜查，反对改用银币发工资等。铁路工人最迫切的要求是什么呢？发清欠饷，按月开支，发给花红〔25〕、年终双饷和储蓄金，反对军队强迫开车等。这是说明什么呢？

六、最近有许多工人斗争是在积极要求改良生活的口号下面进行的（如上海装订、印刷，天津、唐山等），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虽然要求是由黄色工会提出来，但也只有在群众的逼迫之下黄色工会才提出来。但我们不能仅仅承认这一方面（进攻），而否认另一方面（防卫），实际情形完全不是一致的。在中国政治经济不平衡的条件下，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情形。如果我们只承认一种而否认其余的或者毫不重视他们，这是否对的呢？

七、自然，我们应估计到目前反帝高潮及国民党的工厂法对于工人斗争的影响和关系。工人愈是积极起来参加反帝运动，则工人将愈加会要为本身利益起来斗争，国民党的“劳资合作”与“提高生产”也是阻不住的。但因为工人组织不够和敌人压迫，工人还没有如“五卅”时期那样广大的参加和表示自己在反帝运动中的威力。目前我们号召工人广大的参加反帝运动，并组织工人向雇主和国民党的反攻与进攻，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又不要忽视国民党与土著

资本家正利用提倡国货与增加生产的口号更加紧的向工人阶级进攻。反对资本进攻，还是很重要的。

国民党为得欺骗工人，在工厂法上规定工人一些权利。我们利用法律的条文组织工人的反攻与进攻，也是完全必要而正确的。但我们不要忘记工厂法、工会法是保障和便利资本进攻的。

八、在职工国际五次大会^[23]决议上，认为工人的经济斗争不只是防卫，而且有许多提出了反攻的要求。这当然没有指明中国来说，但也没有把中国除外。在决议另一地方说：在中国、印度工人的经济斗争与一般革命形势相交错。在中国，经济斗争包含了无产阶级的主要群众（矿山，北方铁路，南方海员等），及至今还站在斗争之外的群众（青工女工）及落后区域（四川自流井等），组织罢工委员会，提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在经济斗争中加强了反帝国主义的意义（大意如此）。这是指着具体事实简明的说法。比“防卫”、“反攻”、“进攻”抽象的说法易懂多了。那末我们现在可否这样说呢？“……已经有整个产业的全盟罢工（丝厂），……在斗争中不仅反抗资本家国民党的进攻，而且有许多斗争积极提出改良工人生活的要求，……在斗争中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

此外，某同志说：“在革命危机存在的时期，工人斗争再不能是防卫的。”当他说工人斗争形势不能与总的政治形势分开时，作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公式是否正确的呢？

以上的问题希望你们尤其研究过问题的同志详细考虑

一下，并给我答复。你们如将这信转给TOSS⁽²⁶⁾，那对解释我的疑问将更有益。

仲 鏡
十、五

建立辅助组织问题*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

一、什么是辅助组织？

工人阶级的组织，有政党，有工会，还有辅助组织（工人合作社、俱乐部及其他文化的、互助的工人团体）。政党和工会是为工人阶级全部利益的斗争组织，而辅助组织，则只是帮助政党和工会能解决工人阶级或某一部分工人的某些单独的任务。比如，工人消费合作社，可以帮助工人在购买消费品时减少商人的剥削，又可以在罢工时从经济上来帮助罢工。工人的文化教育团体可以帮助党和工会来教育工人群众。工人互济会可以帮助罢工及被难和遭遇不幸事件的工人。所以辅助组织，是工人群众在某些个利益需要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组织，他们（辅助组织）不能代替工会，更不能代替政党。他们本身并不是罢工的领导机关，而是罢工辅助机关。他们的组织也不拘一定的形式和系统，可以是全国范围的国际的组织（如欧洲的合作社、互助会、体育

* 本文原载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的《工运指南》第一期，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会等有几十万至几百万的会员，及国际工人互济会，国际戏院，国际海员俱乐部等），也可以是某一部分工人的组织。他们是能适合最落后工人的组织形式，在各种环境下面都能够公开。

二、我们为什么要建立和参加辅助组织？

辅助组织对我们是有作用的，所以我们要在工人中建立辅助组织。对于国民党黄色工会，及基督教、青年会所组织的这样的团体，我们也要参加进去活动。因为我们可以借着这些团体：

（一）取得公开半公开的机会，来进行赤色工会所要做的一些工作；

（二）利用这些团体团结一部分工人，扩大我们与群众的联系；

（三）我们在这些团体的群众里面和会议上，可以扩大自己的宣传影响，用赤色工会的纲领来教育工人，并可在这里面吸收会员等；

（四）在罢工中或准备罢工时，发动这些组织来帮助罢工。

我们参加和建立辅助组织，就是为得要达到上列各项目的。如果我们参加了或组织了这些团体，而不在里面进行上列各项工作，那就是无目的的行动了。同时有一些人（尤其是黄色工会和基督教徒）反对这些团体来帮助罢工和工人斗争。我们应该坚决打击这种主张。此外还有一种观念，夸大辅助组织的作用，把他们看作与工会、工厂委员会

有同等的作用，当作赤色工会最主要的任务来进行。甚至还有人说：工人阶级只要这些辅助组织就可以得到完全的解放。这是一种幻想。至于在立三时代〔27〕，要把一切辅助组织转变成为赤色工会，要把这些团体都变成罢工领导机关，大家已经知道是非常的错误的。但是还有以下两种特殊情形：①有些工会常常假用“俱乐部”、“互助社”等名称，但实际是工会（中国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事，所以有些工人把辅助组织看作就是工会）；②当工人爆发了斗争，仅仅只有一个辅助组织的时候，这个辅助组织就常常自然的成为斗争的指挥机关。

三、我们怎样来建立辅助组织？

我们在工人中建立辅助组织，首先应注意下列几点：

（一）要适合群众的需要，比如，电车汽车工人常常压死人要吃官司，那末互济会律师对他们是需要；海员到岸要买很多食品和货物，那末合作社对海员是需要，寄宿舍和俱乐部（演戏等）对海员也是需要的；外省工人常常被人欺侮，人地生疏，那末同乡会、问事处、互助会等是需要的；车夫码头工人需要茶馆、饭店，青年工人需要体育队、音乐会；失业工人需要找工作等。如果我们能够在群众中考察工人的迫切需要，在这些需要上来组织工人，帮助工人，切实能够满足工人某些需要，那末这种组织一定能够吸收很多工人来加入，变成群众的，以至广大群众的组织。过去我们建立辅助组织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一点，所以有很多塌台，我们去租好了房子，可是群众不来。

(二)不要助长工人的封建行会^[28]思想。有些口号能够吸引工人,但是与赤色工会的纲领是冲突的,如帮口、拜把子及同乡会等。我们只能完全在另外的纲领之下来利用这些名义和方式来团结工人。如有些上海工人“拜把子”的纲领是“保护工会,为全厂工人利益作事。不替厂家国民党当走狗”。应反对工人中的封建行会思想。

(三)应该联络企业中的工人来发起建立,在工人中征收一些经费。因为只有如此工人才感觉这个组织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才积极负责。而且一经建立以后,一定要实际去工作,有经常的工作,给群众一些成绩看,方能支持发展下去。并且作事要庄正有秩序,完全公开,群众才感觉到是正式替他们作事的,不是拆烂污和利用他们的,他们才敢来。尤其开始进行我们宣传的时候,要很慎重的采取很好的方式,不要使群众一看就知道是“另有作用”。并且要常常召集会议,报告工作及帐目,引起大家的讨论和建议。过去我们建立辅助组织,完全不预先通知工人,又没有经常的工作和成绩给群众看,工作方式又不好,而且不公开,又没有专门主持的人,甚至还有借此向我们敲竹杠的,所以总是收不到多大的成绩。但是还有些辅助组织可以不必要工人在群众中发起也可以办的,如工人学校等。

(四)要有专门的主持负责人。辅助组织要办得好,一定要有几个忠实热心积极的人来主持。而且这些主持人中有赤色工会会员及同志才好。

中国历史上的经验可以说:工人学校(子弟班与成年

班), 俱乐部与儿童团, 是有过很大的作用的。“二七”以前,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2], 开始就是派人到全国各地联络工人办工人学校, 以后再组织俱乐部, 由俱乐部准备罢工。差不多大半都有极大的成绩。后来还从工人学校中训练出大批干部。学校主持的人活动得最好的, 所收的成效也很大。过去的经验, 现在有些地方(如满洲)还可以用, 就是上海也还是可以用的。

此外, 工人中原有的组织, 如海员的宿舍、水手馆等, 各地工人的同乡会、帮口、行会等, 我们也应参加进去工作, 进行我们的宣传, 在罢工时就鼓动这些团体来援助罢工。还有在技术工人中普遍有一种“请会”的习惯。有些工头利用“请会”放高利贷。但也有一种完全是工人互助储蓄性质的“请会”, 过去在营救被难工人问题上是有过作用的。我们应把这种“请会”扩大变成工人储蓄的组织, 反对高利贷性质的“请会”, 尤其在“援助罢工”、“营救领袖”、“开办合作社及工人学校”等问题上来“请会”, 是很有意义的。这是中国工人中很普遍的习惯, 我们应想法来利用此种方式。

加紧领导工人的自发斗争*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

最近在上海以及全国各地差不多每天都有工人的斗争爆发,但是这些斗争差不多都是自发的,得不到革命工会的领导。国民党和黄色工会正在积极进行他们的武断宣传,用尽种种方法来欺骗和镇压工人的自发斗争。因此揭破国民党黄色工会的欺骗宣传,领导目前工人的自发斗争,来反对资本家进攻,及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政治反动,就成为赤色工会目前特别重要的工作。赤色工会必需面对着日益发展的工人斗争,提出自己的独立主张,来组织自己的独立领导。目前工人的自发斗争,只有在赤色工会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他们的应得的结果,和发展到最高的阶段上去,并形成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大罢工。

赤色工会应使自己的工作不拘束在狭小的秘密组织之内,必需逐渐使工作开展到一切企业中和斗争的群众中去。要求赤色工会的领导机关及其一切组织,能够拿住一切工

* 本文原载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的《工运指南》第一期,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人的斗争问题，对于每个斗争（不管在组织上有无关系）都有详细的讨论和分析及策略方法上的决定。赤色工会就把自己的分析和决定作成提议或通知，普遍的传播到斗争的工人中去。赤色工会应宣布自己坚决拥护工人的切身利益和一切反抗资本家、国民党的斗争，并尽自己的能力来给斗争的工人以种种帮助。

如果借口我们的组织过于薄弱，就不去领导目前的工人斗争，或者在没有我们组织的企业中爆发了斗争，采取不管的态度，这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消极。我们应该想出各种方法，克服各种困难，推动自己很小的组织，来给客观上日益发展的工人斗争以领导。我们只有在领导斗争的过程中，才能扩大我们的组织，强大我们的力量。

赤色工会应想出种种方法使自己对于各个斗争的分析和策略，能够普遍传达到工人中去。固然应该动员自己的组织与会员，去找斗争的工人谈话，设法参加工人会议，派代表慰问，组织后援会等等，使工人的自发斗争受到我们的影响和领导。同时还要利用工会的刊物、传单和写信等来传播自己的主张。要求工联、海总及一切赤色工会的同志们，每天从报纸上和自己的组织那里得来的一切有关工人斗争的消息，都经过讨论和分析，都有一篇文章或几个传单散发到工人中去，并且在组织上还设法与工人发生联系。你们不要忽视任何一次工人的日常斗争，同时应集中力量去领导那些中心产业工人的斗争，应在那些还没有爆发斗争的工人中来组织斗争。

出版工会的定期报纸，是我们主要工作之一。应该想出各种方法，划出充分的人力财力来出版铅印的定期刊物。应改善报纸的发行，特别使报纸发行到斗争的工人中去（尤其是刊载有这个斗争文章的那一期报纸）。传单应以铅印的公开的为主（因为工人不看油印的传单），不一定要用工联、海总等名义。能够发动工人来写，凑钱去印去散发为最好。

赤色工会在每次工人斗争中应向工人提议，组织自己的斗争领导机关——罢工委员会、斗争委员会等。联络各厂工人共同奋斗，不要到国民党去请求调解、仲裁，组织自己的力量去战胜资本家、国民党，揭破黄色工会的欺骗和贩卖行为，批评斗争中的缺点和错误，以及指出斗争的原因和最后的出路等等。应举出各种事实证明赤色工会的主张完全正确，使工人从斗争中来认识赤色工会的主张和纲领。

赤色工会应使自己的工作方式有彻底的转变。善于领导最落后的工人，特别注意采用公开的方式，在群众前面表示自己对工作的庄重负责和勇敢，丝毫不苟且，不空谈，不失群众的信用，不向群众用任何的手段，使群众了解只有赤色工会是最忠实的帮助他们。过去我们用了许多力量去帮助工人，而工人反说我们是利用他们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方式不好。这是值得每一个同志注意的。

罗佐夫斯基⁽²⁹⁾同志在五次大会的报告中说，组织和领导工人日常的切身利益的斗争，是我们一切组织的工作的中心。如果有一种工会专门去从事那些远大的政治问题，对于工人日常的切身利益的斗争随随便便，那末，这种工会

是完全不行的。

同志们！加紧领导目前工人日常的切身利益的斗争！
不要错过任何的机会！

在目前反帝运动中 赤色工会应努力的工作*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向中国进攻，帝国主义列强在进攻苏联的问题上，默认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暴行，积极瓜分中国的企图，国际联盟⁽¹⁸⁾已经完全暴露它是帝国主义掠夺弱小民族的工具，使国民党倚赖国际联盟“主持公道”的政策完全破产。同时国民党政府更进一步公开进行卖国勾当，请求帝国主义来共管中国，和日本进行卖国外交。蒋介石的北上，实际上是到河南准备第四次进攻红军，对付冯玉祥⁽³⁰⁾、韩复榘⁽³¹⁾等反蒋联合。这样一切的事实，使民众对国民党的幻想很快的肃清，使反帝运动更进一步的开展，已经走上反对国民党的坚决斗争。

目前反帝运动的特点是：（1）由反帝而集中力量来反对国民党政府；（2）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共管中国；（3）由和平请愿的行动而到示威游行与军警冲突及群众的直接行动；（4）运动的范围和所

* 本文署名仲篪，原载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的《工运指南》第二期，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吸引的群众更加广大。各地学生的请愿带着示威的意义，北大学生示威团的行动，上海学生包围市政府，上海民众救国联合会的组织通过罢工、罢课、罢市、民众武装救国的决议，公开的召集示威大会，这些已经是超过了国民党统治的行动，和国民党包办的抗日救国会对抗起来，走上了群众的公开的政治运动。国民党虽然用尽一切野蛮的方法来镇压群众运动，但已表现它（国民党）手足的错乱，在群众的坚决威逼之下，不得不向群众作某些让步（如上海市政府撤办公安局长，通缉陶百川及将凶手交给群众，铁路上承认开学生的专车等）。

但是目前反帝反国民党的群众运动，还包含了很多的缺点：主要的就是还没有广大的工人罢工，工人群众还没有积极的广大的参加，成为运动的领导力量。参加运动的群众基础还是不广大，力量还不充足，群众还没有完全跑到我们的口号之下来，群众还没有走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行动，同时也还不能说国民党已经没有力量来压迫目前的群众运动了。

要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走上更高的阶段，吸引更多广大的群众，就必须实现工人的总罢工，号召广大的群众来积极参加运动，集中力量在群众中打击在野的各反动派别及各种各色的主张和口号。建立群众的组织，充实民众救国联合会的群众基础，消灭国民党的抗日救国会，努力发展群众武装组织，自动取得武装，与国民党、帝国主义的武装作斗争，冲破国民党、帝国主义的武装压迫，才能使群众运动

更进一步的走上推翻国民党的斗争。在城市中发动广大的群众运动，是对苏区和红军的直接帮助。

目前在工会一方面，应积极的在工人中作广大宣传鼓动，将国民党卖国的事实，压迫反帝运动的事实，国际联盟进行瓜分中国、进攻苏联的事实，以及目前的群众运动的情形，作为每日向群众宣传的材料，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

工会应努力动员工人群众来参加一切群众反帝反国民党的运动，派代表参加民众救国会及其所召集的一切会议，参加示威，参加请愿并将请愿转变为示威。使工人成为群众运动主要的领导的成分。

工会应努力组织反帝反国民党的罢工，使罢工与示威汇合起来。工会应集中力量推动自己在企业中的组织来准备和发动罢工。应号召群众在工厂门口、工厂中、工人宿舍举行示威，举行群众的鼓动，使罢工得到发动。应在民众救国会的大会上来讨论罢工的具体办法，无情的打击那些反对罢工的黄色工会的领袖，逼迫下层的黄色工会组织宣布罢工。并对罢工工人的救济问题通过有实际办法的决议，如没收日货及提取救国基金，救济罢工工人；没收日厂的货物原料，没收卖国贼的财产救济罢工工人；罢工工人不交房租；举行广大的募捐运动来救济罢工工人等。

应使工人的经济罢工与反帝反国民党的罢工联系起来。坚决的无情的打击“劳资合作，一致救国”的反革命理论。这是国民党、资本家压迫工人的理论。应发动各厂各

业的经济罢工，与那些发生劳资纠纷的黄色工会的群众建立广大的下层统一战线，号召罢工工人去参加反帝反国民党的示威和大会，在经济罢工中提出释放被捕的工人、学生，反帝及罢工的自由等要求。

赤色工会应在群众中提出自己的独立主张和口号，打击各反动派别的主张。对于群众所提出的每一个口号，赤色工会都应该给予批评，并努力转变群众的妥协的口号成为革命的斗争口号。赤色工会应在群众中提出下列的口号作广大的宣传鼓动。(1)反对帝国主义共管中国！(2)反对宰割中国的国际联盟！(3)反对卖国外交，否认国民党政府有订立国际条约的权利！(4)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5)反对借“国难”来压迫工人！扩大工人的经济斗争！(6)释放被捕的工人、学生、民众！(7)一切压迫民众运动的长官交民众处决！(8)没收日货及卖国贼的财产救济罢工工人！(9)改组国民党的抗日救国会！(10)民众武装起来驱逐帝国主义！(11)工人有组织工会、罢工及言论、集会的绝对自由！(12)反对国民党进攻红军！拥护红军和苏维埃！(13)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

执行以上的任务，须要我们善于以很小的组织来领导广大的群众，须要我们善于利用公开来作非常有效的活动，须要使我们的主张能够广大的普遍的传播到群众中去。上海工联、海总、铁总及天津、满洲等地，工会应出版经常的日报，并保证报纸的发行能够大部分到工人手上。这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罢 工 策 略*

(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

中国经济恐慌继续深入的情形下，资本家日益加紧的向工人生活水平进攻。减少工资，加重工作，进行生产“合理化”，开除工人，缩小生产，改三日班五日班，以至关厂停业等。资本家这样把恐慌的重担压在工人阶级的肩膀上，就必然推动工人群众反对资本进攻的斗争向前开展和激烈化。资本家在恐慌和阶级斗争的威吓之下，就更加采用暴力来镇压工人阶级的斗争，更加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政权机关结合起来；黄色工会更加法西斯化，并与资本家、国民党打成一片。他们破坏罢工的手段更复杂了，残酷了。这样又使工人的罢工斗争遇着很大的困难。罢工斗争的失败经常威胁着迫切要求斗争的工人。

取消派^[19]和右派在罢工的困难和失败的威吓之下投降了。他们说，在经济恐慌和资本家进攻的严重情形之下不应该罢工，因为罢工也是要失败的。可是工人群众总不

* 本文署名仲競，原载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的《工运指南》第三期，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出版。

能完全服从取消派的“真理”，即使是如何的困难，如何的希望很少，工人群众还是不断的起来斗争的。“左”的立三主义者⁽³²⁾和取消派相反，他们并不看也不估计目前罢工的困难，他们异常轻率的玩弄罢工，使工人受到悲惨的失败。取消派和立三主义者消灭工人斗争的情绪，是一样的。

经济恐慌使罢工更困难了。可是罢工的推动力更伟大了，罢工的内容更丰富了（现在差不多每个工厂的工人都酝酿罢工，都有群众的巨大的不满和许多迫切的要求），罢工的锋芒更尖锐了（都有一触即发的形势，一经发动就是极残酷以至武装的流血斗争），同时使一切的罢工都带着浓厚的政治性质（任何罢工都是违法的）。因此我们的任务，并不是要工人“不罢工”，也不是去玩弄罢工，我们是要把广大群众的深刻的不满表白出来，把群众组织起来，建立广泛的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配合各厂工人的发动，准备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斗争的决心，克服一切的困难，去战胜资本家、国民党、帝国主义及黄色工会之联合的压迫，取得罢工斗争的胜利，打开阶级斗争的伟大的顺利的前途。同时我们还要去领导那些群众的自发罢工，使群众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去应战。

赤色工会必须努力求得罢工斗争的胜利结束。因为赤色工会是最忠实的拥护群众的切身利益，是最忠实的为群众切身利益而斗争，这是赤色工会争取群众发展组织所必须拿住的关键。可是怎样才能使罢工胜利？使罢工胜利的条件，是群众的广大的发动，广大的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的

建立，和群众勇敢的坚决的有组织的斗争。只有群众的力量和正确的战术，才能战胜已经联合一致了的敌人。因此学习最近的经验，研究敌人破坏罢工的方法，研究罢工的策略，是目前每个觉悟的工人应有的责任。

罢工的正面敌人，是资本家和国民党（在每次经济罢工中，国民党都成为与工人短兵相接的正面敌人），在准备罢工时就应告诉工人不独是要准备力量来对付资本家，而且要准备力量来对付国民党。帝国主义的巡捕房^[33]虽然表示他“不干涉”工人的“合法罢工”，但无疑的是罢工最坚强的敌人。罢工一实现之后，资本家、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就必然从各方面来进攻工人。这时候最要紧的就是工人能够回答这一切的进攻，使敌人的每次进攻都受到打击和失败。只有敌人用尽了一切办法还不能破坏罢工的时候，敌人再没有方法来对付工人的时候，敌人才在工人面前屈服，罢工胜利。最近敌人主要是用些什么办法来对付工人的罢工呢？

（一）在罢工还没有发动，工人的准备还不充分的时候，资本家就坚决的向工人进攻，开除积极的工人，封闭工人的团体等；

（二）宣布工人罢工为无理捣乱，要求是无理要求，把罢工的责任加在工人身上；

（三）宣布工人罢工为“不顾国难”，为“摧残本国实业”，为“破坏劳资合作”，这是资本家、国民党压迫工人罢工的理论基础；

(四)宣布罢工是共产党的煽动，或是少数不良工人的捣乱，工人是被威迫或被蛊惑而罢工的，把罢工的责任堆在几个领袖身上，作为逮捕枪杀领袖的张本，并使工人与领袖分离；

(五)宣传工厂待遇工人是如何良善，工厂如何注意改良工人生活，工厂的营业是如何困难，如何不能支持，如何无力来答应工人的要求；

(六)宣布罢工是违法，布告禁止罢工，命令工人复工，颁布各种限制和禁止罢工的法令；

(七)逮捕工人领袖，枪杀罢工工人，宣布军事戒严，直接用武装压迫罢工；

(八)封闭罢工领导机关，禁止工人开会；

(九)用关厂政策对付罢工；

(十)开除全体罢工工人，另招新工，利用失业工人，警察、巡捕保护新工上工；

(十一)收买工贼流氓，组织法西斯队伍，破坏罢工；

(十二)不和工人的代表谈判，不承认工人的代表权，答应工人的经济要求，打散工人的团结，开除工人的领袖（外国资本家用这个办法最多）；

(十三)承认一部分工人的要求，而拒绝另一部分工人的要求，引起工人内部的分裂和冲突；

(十四)布告工人复工，限期工人复工，在发给工资时强迫工人复工；

(十五)指使工头、买办等出来，假意调停罢工，与工人

谈判，作不负责的答应条件欺骗工人；

(十六)请求商会的援助，在报纸上作宣传，在工人中制造各种谣言，作种种威吓动摇工人及其领袖；

(十七)再没有办法的时候，资本家就假意答应工人的要求，骗得工人上工，等资本家一切都准备好了的时候，马上宣布取消这些条件，或开除工人领袖。

除开上列各项办法之外，国民党还设立劳资调解与仲裁机关，来罗致工人，使工人放弃罢工的武器，走上国民党调解仲裁的圈套，工人一经走上调解仲裁的圈套之后，工人的手足全被束缚，就保证了资本家的完全胜利。在工人情绪很高涨时，国民党的调解仲裁机关也可以假意的给工人规定一些有利益的条文，使工人“满意的”去复工。当工人复工以后，资本家准备好了，国民党又要资本家否认调解的结果，不履行条件，使工人不能再起来罢工。

资本家和国民党为得消灭工人的斗争，在大多数的情形之下，还需要黄色工会这个工具来加强上列各项办法的效用，来补充上列各项办法之不足。需要在工人中造成一些能够欺骗工人的破坏罢工的黄色领袖，来拥护上列各项破坏罢工的办法，来执行这些办法。如果这一批走狗不能骗工人了，那末可以换上另一批来，由西山会议派⁽³⁴⁾、蒋派⁽³⁵⁾、改组派⁽³⁶⁾，以至取消派、右派等，尽可以够资本家、国民党的应用，黄色工会许多次的改组，不过是资本家国民党这种政策的执行罢了。

资本家和国民党、帝国主义与黄色工会用这些“法宝”

来对付工人的罢工，工人如果不能制服这一切的“法宝”，罢工的胜利就很少可能。最近许多罢工的失败，这就是主要的原因。

罢工策略，是要一方面能够击破敌人这一切的进攻，组织群众的反攻；同时又要调集群众的力量，向敌人举行进攻。了解客观的形势，庄严的估计群众的情绪，精密的计算敌我两方的力量，了解自己的弱点，选择恰当的时机，寻出敌人的要害并利用敌人的弱点分配群众的力量，拿住一切转变的关头，来领导群众，指挥群众作战。在罢工中要使群众不断的取得精神上战略上的胜利。群众的情绪不断的提高，发动的群众日益广大，罢工的威力不断的震撼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力量的重新组合日益有利于工人，群众的觉悟程度日益提高，使冲突日益接近统治阶级的营垒，这是运用罢工策略的目的。同时在退却的时候，就应该使群众作有组织的有计划的退却，不使群众的情绪消沉，不使群众的组织瓦解并能继续加强，继续的准备下一次的进攻。

资产阶级消灭工人斗争情绪，压迫工人斗争的理论，必须在群众中给以致命的打击。“劳资合作”、“增加生产”、“劳资一致共赴国难”等是资本家、国民党和黄色工会压迫工人斗争的理论基础。不在群众中消灭这种理论，群众不起来公开的抵抗和反对这种理论，资本家、国民党就会站在这个理论上来打击工人罢工。如果工人在理论上承认劳资合作的原则，那工人就应绝对的担负罢工的责任。罢工与“劳资合作”是完全不能并存的东西。过去我们打击这种理

论还是异常不够，我们应详细分析这种理论的危害，使这种理论受到致命的打击。

必须坚决反对黄色工会的群众中的合法观念。现在是一切的罢工以至一切工人斗争，都是犯法的，也是违反劳资合作的，要合法就只有任凭资本家如何来鱼肉工人也不斗争。黄色工会所唱的“合法”、“不作轨外行动”、“防止不良分子的捣乱”等，应无情的揭破。工人在罢工后宣布“严守秩序”（资本家的秩序）、“静候解决”，都是应坚决反对的。黄色领袖用怠工来代替罢工（因为罢工犯法更大），罢工后又维持最重要部分不罢工（怕影响社会治安，实际是怕打击资本家太厉害了，如华电怠工照常供电给电灯电车，天津自来水工人怠工照常供给饮水，秦皇岛玻璃工人怠工照常维持机器间的工作等）。不去扩大罢工，不去请求其他工厂工人以实力援助自己（大东工人怕犯鼓动罢工之罪，不去请商务等实力援助），这些东西是最能打散罢工工人的情绪，削弱罢工的力量及同盟军，助长资本家、国民党的凶焰。最重要的部分不罢工，工人宣布“守秩序”、“不乱动”，工人自己放弃最有力武器，资本家、国民党就包管不着急了。可是工人这样做了之后，工人还是犯法的，资本家和国民党还是用“目无法令，擅自罢工”的罪名来逮捕枪杀工人。我们应该告诉工人，只有使用自己全部的力量和所有的武器，去战胜资本家，打击国民党，才能使资本家、国民党让步屈服，使罢工胜利，使国民党不敢逮捕枪杀工人。工人要求得自己的生存，就完全不能“合法”，应坚决与国民党的法律作斗争，

工人愈怕犯法，国民党、资本家就愈用法律来压迫工人，一直压迫到工人完全抛弃自己的武器，不能生存为止。“罢工要合法，就是工人的自杀！”

罢工和打仗一样，正是“你死我活、惟力是视”的时候，工人还要讲点客气，怕破坏了劳资的和平，怕违犯了国民党的法律，怕扰乱了社会的治安，怕使用那些足致敌人死命的武器。可是敌人一点客气不讲，敌人发动一切政府、党部、工贼、走狗、法律、黄色工会，以至军队、警察、监狱和报纸等来对付工人。不是希望罢工失败，不是叛卖工人的黄色领袖，不会有这样的战术。

提出罢工的要求，应特别注意以下各点：（一）要是工人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二）要简单明了一切工人都有利益都能懂得，而且要是中心的要求；（三）要是资本家多少能够答应的要求；（四）最重要的部分要求。因此工人应注意资本家的企业的营业状况，经常调查原料、生产、工资、货物的销售、各方面的契约等，调查资本家在罢工后有无别的资本家来帮忙？应该选择于工人最有利的时机提出要求，举行罢工。要使群众坚决为这些要求而斗争，只有经过群众来提出，不可由几个领袖包办。过高的包括一切的大要求，在目前是很不适宜于进行罢工的。不是群众最迫切的政治要求，不要强迫群众提出，尤其不要把那些无具体内容的空洞的口号（如反对合理化！反对白色恐怖！反对失业等）写在要求上。在罢工过程中一定会有些新的要求加上去的，如释放被捕工人等，但这些新的要求不可过多，使工人忘记了

原来的要求(罢工是为这些要求发动的)。

罢工必须组织罢工委员会来领导罢工。罢工委员会，由全体罢工工人来选举，包括各部分的积极工人，应拒绝那些黄色领袖及工贼、走狗来参加罢委。罢委中应有中心的领导者，消极动摇的委员可以由群众随时撤回另选。罢委应经常举行会议(每天一次或隔日一次)，应有系统的分工，应吸引一切积极的工人来参加罢工中的工作，应使各种问题的解决和执行非常迅速。最重要的就是罢委不要脱离群众，要与群众有亲密的联系，能够很迅速的调集工人，能够完全了解群众情绪的变动，感觉到群众脉息的跳动。应每日将罢工的消息和经过报告群众，一切的重要问题应经过群众的大会或代表大会的通过。秘密的半公开的罢委会，应有几处和群众接头的公开的地方，委员的一部分应在群众中公开的活动。罢委会应注意资本家、国民党各种破坏罢工的手段，很迅速的设法对付，并应在资本家那里布置侦探(各方面都要)，探听各种消息。有健全的罢工领导机关，并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是使罢工胜利很重要的条件之一。指定罢委或由少数人选举罢委，罢委与群众脱离，他找不到工人，工人也找不到他，罢委不能应付罢工中的事变或中途瓦解等，这是罢工中很危险的现象，必须为消灭这些现象而斗争。

应使罢工有广大的发动，应发动一切的力量来援助罢工，应使罢工不断的扩大走上整个产业的全盟罢工。在准备罢工的时候，开始就应将罢工的要求和计划等征得本企

业中各部分工人的同意，再进而向同产业各厂工人活动，请求他们的同情、援助和一致行动，以至与罢工有关系的各方面凡是能够帮助罢工的，都应预先有接洽。这样在罢工的准备中就有了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的结合。尽可能联合各部分的各厂的工人作一致的发动。在罢工发动之后，罢工委员会就应该向各厂的工人、工会以至革命的群众团体大批派出代表，带着罢工的宣言、传单、刊物和罢委的信，到各方面的群众中去活动，召集他们开会，报告罢工的经过情形，请求他们的援助，要求他们发宣言、募捐、组织后援会，警告资本家、国民党，以至同情罢工等。罢委会并可召集各厂各工会的代表及新闻记者等，报告罢工经过，请求援助。这样使工人方面的统一战线进一步的组成，并推动各厂各业工人罢工的发动，以至提出共同要求，组织共同的罢工委员会，实行同盟罢工，并可在各厂工人中订立互相帮助的正式的条约（如一致的复工或胜利复工的工人以工资的几分之几援助未复工的工人，共同拒绝国民党来破坏，对于被捕被难工人的共同救济，抵御武装压迫的一致行动，以及其他）。这些工作愈作得充分，愈能动员工人群众及社会的力量来援助罢工。用这种力量来对抗资本家、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联合压迫，迫使敌人向工人让步。在最近的罢工中群众是不是充分的做到了这些工作？可以说完全没有充分做到。相反的，在黄色工会方面倒是组成了他们破坏罢工的统一战线，他们常常召集代表会，组织后援会，发表联合宣言等，要工人“合法”、“尊重党政机关的命令”、“不要破坏劳

资合作”等。罢工工人应反对这种上层职工官僚的破坏罢工的统一战线。这种上层统一战线，是资本家、国民党反革命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和补充。

大东罢工中门市部工人没有一致行动，公共汽车罢工中开车没有一致行动，华电职员罢工工人中未一致行动（并有黄色工会的阻碍），中华、民智怠工，商务、大东、世界，未一致行动。研究最近的罢工、怠工，工人的统一战线完全没有自觉的组织起来。即有也不过是精神上的以至物质上的援助。但资本家、国民党就利用了工人的弱点，分裂工人的战线，挑拨工人内部恶感和冲突，削弱工人的力量，再从而制服工人。我们应告诉工人一致的联合起来，这是工人的力量的来源。工人内部的冲突，是完全可以调和的。反对资本家、国民党的挑拨和分裂政策，揭穿黄色工会破坏工人统一战线的罪恶。我们应在这些问题上教育和引导工人，在阶级的立场上一致团结起来。

国民党封闭永安二厂工会 及逮捕工人，我们应否 号召工人反对？*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七日）

上海吴淞永安第二纱厂，因工人要求发给花红⁽²⁵⁾四个月，该厂工会是国民党领导的黄色工会，工会为着欺骗工人，组织要求花红代表团，向厂主“交涉”。当然代表团只是“交涉”，以至几次毫无效果，资本家并还以关厂来恐吓工人。如是工人在愤激之下，又受到客观的革命影响，直接罢起工来。厂主乃调动大批国民党军警，武装压迫工人。工人愤不可遏，群起捣毁工厂机件及写字间，军警开枪，死伤工人甚多。工人继续罢工，提出要求花红，抚恤死伤，惩办凶手等要求。资本家为着进攻工人，依照国民党的工厂法工会法，向法院提起刑诉，控告黄色工会委员及要求花红代表团指使捣毁工厂。国民党法院，就逮捕了黄色工会的委员及要求花红代表，交法院审判。军警占驻并封闭该厂工会。

* 本文署名仲鹿，原载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第三十期，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这时候我们的工联，在向群众提出的口号中，没有“反对国民党封闭工会”、“反对逮捕工人及要求释放被捕工人”等口号，“工人有组织工会的绝对自由！”也没有提出来。在《上海工人报》(第一期)上的文章，简直连反对国民党枪杀工人、反对武装压迫罢工，及抚恤死伤、惩凶等口号都没有提出来。在文章上只写上几个经济口号。这篇文章完全落在事变的后面，不会把经济的罢工转变为政治罢工。表现得连黄色工会还不如。

现在只问我们为什么没有提出“反对逮捕工人！要求释放被捕工人！反对国民党封闭工会！”等口号呢？原因当然不只是简单的“忘记了”，大概我们的同志以为被捕的工人，是黄色工会的委员们，封闭的工会是黄色工会，而不是赤色工会及赤色委员，所以就用不着反对了吧！如果要反对的话，那似乎就是“投降”了黄色工会。被捕的工人是黄色工会的委员们，被封闭的工会是黄色工会，与“我们”有甚么关系呢？不正好吗？“我们”何必反对？何必要求释放他们？他们出来了，不又来“反对我们”吗？我们对于国民党来逮捕工人和封闭工会，或者还可以站在旁边这样“幸灾乐祸”一下。但是这种态度，是不是赤色工会应有的呢？很明白，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关门主义。

因为：(一)国民党资本家逮捕黄色工会的委员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委员们)是黄色领袖(主张劳资合作的领袖)而逮捕他们，也不是因为这个工会是黄色工会而封闭它，而是因为要进攻工人，严厉惩罚工人的暴动，而又不能把几千

“暴动”工人都逮捕起来，所以才逮捕他们。因为惧怕这个黄色工会被工人群众拿到自己手里变成对付资本家的机关，因为黄色工会不能完全实现资本家的任务，所以才封闭它。国民党资本家逮捕他们，封闭工会，是进攻全体工人的，是给颜色全体工人看的，全体工人（不只是我们）就应该反对国民党资本家的这种进攻。如果“我们”不反对，就恰恰是帮助了资本家。

（二）我们应反对国民党资本家逮捕任何工人，封闭任何工人团体，不管这个工人和工会属于任何政治派别或是否是赤色工会的会员。因为我们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和信仰的绝对自由，工会是工人阶级独立的组织，不允许资本家国民党来剥夺和干涉工人的自由，封闭工人的工会。如果认为资本家可以逮捕这个工人，那同时就可以逮捕那个工人。这个工会要封闭，那个工会就更该要封闭。我们不能承认国民党资本家有任何逮捕工人封闭工会的权利，即使出卖工人阶级的工贼，也只能由工人阶级自己来惩办，绝不能由敌人（或利用敌人）去惩办。黄色工会不好，只能由工人自己来改组，绝不能由资本家国民党去改组。惩办工贼改组工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丝毫不能假手他人的。如果我们仅仅因为资本家国民党逮捕的工人，封闭的工会是黄色工会及其委员，我们就不反对，我们就等于承认国民党资本家有逮捕工人封闭工会的权利。这自然是国民党资本家所欢迎的。照国民党说来，逮捕黄色领袖封闭黄色工会，不应该反对，逮捕赤色领袖封闭赤色工会，是更不应该反对的。

(三)黄色工会及其领袖，因为他们假意的领导工人来要求花红，还有很多工人在这种欺骗之下，拥护他们，因为他们被捕被封，工人对他们的幻想更深，以为他们真是为工人群众的利益而牺牲。我们应该一方面号召工人“反对逮捕工人”、“反对国民党封闭工会”、“要求释放被捕工人”、“要求工人组织工会的绝对自由”；但同时，应该向群众指出现在的工会及其领袖，是勾结资本家国民党，出卖工人阶级的黄色工会黄色领袖。揭破他们的错误和欺骗，号召工人群众自己来惩罚这些领袖，自己来改组工会。我们只有这样，才可以和幻想他们的下层群众建立统一战线，向资本家国民党斗争。这当然不是投降黄色工会，而是争取它的群众。当然黄色工会的委员们释放出来了，还要反对我们，但我们绝不怕多了这几个敌人就没有办法。我们正可以在他们的行动上来证明他们的欺骗给群众看，打破群众的幻想。如果我们不反对国民党来逮捕工人及封闭工会，事实上我们就是无形与国民党资本家联合(所谓利用敌人)，来反对黄色工会(实际是反对工人)。

在国民党颁布工会法，改组和解散工会的时候，我们曾有人主张“不要反对国民党的改组”，为的是怕(固然是该怕的)增加工人对黄色工会的幻想。上海邮务报馆等工会下面的群众，为得反对国民党来改组工会，酝酿着同盟罢工，许多店员工会已经罢起工来，反对与同业公会合并。这时候我们不去领导，不去号召工人实行罢工，反对国民党来改组和解散工会，号召工会与国民党断绝一切关系，工人自己

组织工会。我们在告邮务工人的传单上，只提出“坚持要求房贴十元，组织工人自己工会”的口号。仿佛当时国民党来改组解散工会，用不着反对，工人去组织自己的工会好了。只有当国民党来改组或解散这个渺茫的未来的邮务工人自己工会的时候，才号召工人反对。工人现在只去要求房贴好了。这一严重的关门主义的错误，到现在还没有揭发出来。当时黄色领袖欢迎国民党的改组，如果我们不反对国民党的改组，我们就这样与黄色领袖结合在一起。

假说一个例子：上海邮务工会的工人，问我们在邮务工会中的反对派说：“国民党社会局来解散我们的工会，工会的领袖不能领导我们起来反对，你们（反对派）是不是来领导我们反对呢？”如果我们答复说：“你们另外去组织赤色工会好了。”这样答复，显然的不能使工人满意。如果我们答复说：“你们应该坚决起来反对国民党社会局来解散工会，但是你们现在的工会不是好的，领袖是勾结资本家国民党的，同时你们应该自己起来改组工会，驱逐黄色的领袖，使工会变成我们自己的工会。”这样工人就能满意了。

很明显的，我们号召群众反对国民党来改组、解散或干涉任何工人团体，并不妨害我们同时反对现在的黄色工会，指出现在黄色工会是不好的，领导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来驱逐黄色领袖，组织工人自己的工会。这里当然最容易发生拥护和帮助黄色工会的错误，应该给以严重的注意。比如“反对改组工会”的口号，实际上与黄色领袖“维持现状”的口号一样。我们并不是反对改组黄色工会，打倒或消灭

黄色工会，我们只是反对国民党资本家来干涉、改组或解散工会，反对国民党来干涉工人自己的事情。因为国民党现在所解散的虽是黄色工会，实际上国民党政府是解散一切的工会，剥夺工人一切组织工会的自由，所以必须反对。若是工人群众自己来改组，或打倒黄色工会，我们就完全赞成而且领导。因此我们反对国民党资本家来改组或解散工会时，应特别加紧反黄色工会的宣传鼓动，指出黄色工会勾结国民党出卖工人阶级的罪恶，号召工人群众自己起来改组黄色工会，驱逐黄色领袖，组织工人自己的工会。这种工作如果放松了一点，我们就是帮助了黄色工会。

我们队伍里有这样的观点：以为黄色工会是属于国民党的工会，国民党及其政府要来改组、干涉及解散他们自己的黄色工会，是他们应有的权利，工人不要反对。同样的，这些人认为赤色工会是“属于共产党的工会”，那么共产党及“共产党的政府”，用直接命令来改组或解散赤色工会，也是应有的权利。如果下面的群众起来反对的话，也是不妨用“反动分子捣乱”的罪名来镇压一下。所以苏区就常常发现党和苏维埃政府，用命令来组织工会、改组工会及解散工会，禁止罢工等事实。全总苏区执行局几个人到苏区，就把中央苏区总工会解散，他们自己来代替。李立三⁽²⁰⁾也就以命令来取消全总及各地赤色工会。一九二七年以前，在武汉长沙等地，也有许多强迫改组及解散工会，逮捕工人到工会打屁股坐监狱（仅仅是因为反对改组或解散）等事实。这种否认工会独立性的观点，把工会看作是党和政府的附属物

的观点是有了长期的历史。但是到现在我们队伍里还是非常严重。这是国民党的观点，资产阶级的观点。过去我们揭发这种错误还是非常不够，所以到现在还有许多同志在那里不断的重复犯这样的错误。现在我们必须在各种事实上来给这种错误以致命的打击。

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

因为大东书局的工人退出出版业工会〔17〕，引起我们中间一个争论。就是赤色工会是否应该训令自己在黄色工会中的革命反对派及其所领导的群众（他们在黄色工会中还是占少数），从黄色工会中退出来？

在我们所有的决议案上，都没有规定过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不知道同志们为什么现在提出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来。有同志说，现在的客观形势比几个月前大不相同了。似乎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在几个月前是不正确的，到现在就变为正确的了。可惜这位同志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目前客观形势的变动，使我们对黄色工会的策略必须转变，必须提出退出黄色工会的口号。

在我们的决议案〔37〕上都是这样规定的：赤色工会应使自己的会员打入（或加入）那些有群众的黄色工会（没有群

* 本文是为反对白区工人运动中一种“左”倾错误策略而写的，署名仲镜，原载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第二十八期，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出版。

众的黄色工会,不应加入),在里面建立革命反对派,争取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当着黄色工会之下的群众大多数到了反对派的领导之下,就可从黄色工会中分裂出来。决议案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一)觉悟的工人应加入黄色工会;(二)只要有群众的黄色工会,我们能够到里面去接近群众、争取群众,就应该加入,不管这个黄色工会是一个工厂的或几个工厂的,或是黄色工会的总工会;(三)在革命反对派领导了黄色工会大多数群众的时候,就可以分裂出来;(四)承认觉悟的工人和革命反对派在黄色工会里面去争取和接近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比在黄色工会外面要好些、容易些;(五)革命反对派还只在一个工厂、店铺的工人中占有大多数,但在整个黄色工会的会员中还是少数的时候,不应该分裂出来,更不应该消极地退出来。

现在正是我们加紧执行上列决议案的时候。群众已经到处起来反对黄色工会,国民党的各派正从黄色工会里面和外面利用群众的不满来争夺黄色工会的机关。赤色工会和革命反对派应该和群众在一道,扩大自己独立的宣传鼓动,团结群众,领导群众,反对国民党的各派,揭破各派的欺骗,进而驱逐各派的黄色领袖,从新建立群众的赤色工会,与国民党各派断绝关系,消灭黄色工会。目前我们的策略并不是需要转变,而只是要加紧执行。在目前的变动中,有些蒋派的黄色工会,过去是有群众的,将来会变成没有群众或被消灭;同时又有些新的改组派⁽³⁸⁾的黄色工会起来。但我们的策略在原则上并不需要变更。那些已经没有群众的

黄色工会，我们就不要加入或留在里面；那些有群众的黄色工会，我们还是应该加入或留在里面的。

在目前，如果有人主张与黄色工会中国国民党任何一派联络去“打倒”另外一派，这结果就不过是把蒋介石的人换上汪精卫^[38]的人，或将来又换一批国民党其他派别的人，但工会总还是国民党工会。这完全是投降国民党的右倾机会主义。但如果有人主张革命反对派要退出那些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实际上就是要使我们脱离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让这部分群众去受黄色工会领导的欺骗和愚弄，结果也就是维持了黄色工会的存在。

有同志认为：在包括许多工厂企业的黄色工会（如出版业工会，报馆工会，铅印工会等）中，革命反对派虽然在整个黄色工会之中还是少数，但在一个工厂占了大多数，就应领导这个工厂的工人退出黄色工会，成立这一个工厂的赤色工会，与黄色工会对立。同时号召其他工厂的工人也退出黄色工会，与黄色工会对立，成立各自的独立工会。他们想用这种“退出”的策略来消灭黄色工会。这种策略的错误在什么地方？（一）这个工厂的工人退出黄色工会，就会取消或削弱黄色工会中的革命反对派；（二）这个工厂的工人更难接近还留在黄色工会下面的其他工厂的工人，就是与其他工厂的工人更脱离；（三）一个工厂的工人或者几百人、几十人、十几人，他们组织一个很小的独立工会与几千人的黄色工会对立，于工人不是有利的（国际五次大会^[23]决议上说：任何情形之下都要建立独立工会是有害的主张）；（四）

由一个统一的工会分裂成许多独立的小工会（一个厂一个工会），实际上是一种分裂政策，这种分裂对于工人阶级不是有利的（虽然在对于工人阶级有利的情形下，我们是不怕分裂的）。

有同志说：这个工厂的工人退出黄色工会之后，可以不再受黄色工会的欺骗，更易于反对黄色工会领袖出卖工人利益，还易于争取其他工厂的工人和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并且还可以加紧做其他工厂的反对派的工作。相反，如果这个工厂的工人不退出，那就一切都难以进行，并且到明天黄色工会领袖来个欺骗，这个工厂的群众就有对黄色工会领袖发生幻想的危险，所以非在今天立即退出黄色工会不可。这是什么话！这难道不是完全否认了我们的决议吗？我们号召觉悟的工人加入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在黄色工会里面建立反对派，难道不是因为到黄色工会里面去更容易接近群众，更容易揭破黄色工会领袖的欺骗，更容易反对黄色工会领袖出卖工人利益，更容易争取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更容易消灭黄色工会吗？如果说，觉悟的工人站在黄色工会外面进行这些工作，比在黄色工会里面更容易些，那加入黄色工会建立革命反对派的决议就是发疯！如果这位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那不独革命反对派应退出黄色工会，连加入黄色工会的策略就根本是错的。

有些自称觉悟的工人，他们惧怕明天黄色工会领袖来一个欺骗而成为黄色工会领袖的俘虏，他们连黄色工会的名字也不愿听，他们一天也不能忍耐，自己马上要从黄色工

会的“泥坑”中退出来，以便保留自己的“清白”，做个“模范”，好叫那大部分还留在黄色工会的“落后”的工人们看了，照自己的样做。如果有人不赞成他们这样做，他们就说“你们打击了我们反黄色工会的情绪”。这是标本式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好听的言词下掩盖着右倾的消极。我们应该向这些人说：你们好是好，可是你们不是布尔什维克^[39]，布尔什维克是能够跑到黄色工会的“泥坑”中，进行长期的耐性的艰苦工作，把那大部分陷在黄色工会“泥坑”中的“落后”工人们拯救出来。有同志对这种说法不能忍耐，他说：等到什么时候那大部分工人才觉悟过来呵，这是等待主义啊！同志，这不是等待主义，这只是叫那些觉悟的工人暂时留在黄色工会里面，加倍努力地进行反黄色工会和争取群众的工作。为进行这种工作，就不能因为厌恶黄色工会这个“泥坑”而裹足不前，因为在这里还有大部分的群众呢。

黄色的总工会是否应该加入呢？我们只问：在这个总工会里面是不是有群众？我们是不是到里面去能够接近他们下面的群众，做自己的宣传？如果是的，那我们就应该加入。在我们的决议案上，并没有规定只准加入黄色工会在企业中的下层组织。

有同志说：脱离黄色工会的组织后，赤色工会还可以派代表参加黄色工会的会议，提出自己的主张。我不知道怎样可以参加！

有同志以为争取赤色工会的公开活动，就要革命反对

派退出黄色工会，来建立独立的赤色工会。实际这不是使我们的活动走向公开，而恰恰是走向秘密。

至于大东书局的工人退出工会，主要是资本家利用工头号召工人退出工会，好向资本家去要求复工。我们当然不赞成资本家这种破坏罢工的策略。

某某兵工厂 罢工斗争的经过和教训*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一、斗争开始时是因工人们要求增加工资，首由枪厂发生怠工，后因该厂的某同志鼓动的结果，工人们都停工，关车，并一致的向厂外冲出去。行到厂门口时，枪厂的领工前来阻止，当时工人群众多不敢前进，经某同志的鼓动得法，最后工人们仍是冲出厂门外去了。厂方见领工无法制止，随即又派一代表(国民党员)出来企图欺骗，亦无结果。

二、工人出厂后，又忽闻该厂本年所得的红利约十二万元完全被蓝牌(上等职员徽章的颜色是蓝的)职员秘密分尽。我们的同志当时立即发表宣言标语，指出职员们分赃的事实，并号召工人非但应当要求增加工资，并应要求平分红利，决定午饭后即宣布同盟罢工。果然完全得到工人赞成，当时午饭后就开始罢工了。在罢工时工人曾将厂长从自行车上推倒在地上，并将厂长自行车打毁。嗣后厂方收买——

* 本文署名仲，原载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第三十二期，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八日出版。“某某兵工厂”是指当时的河南巩县孝义兵工厂。

以前的工人（现在是国民党员）向工人群众宣传说：厂方已经允许了阳历年关发给双薪和增加工资的条件。枪厂的工人们多数都相信了这种欺骗，如是第二天枪厂工人就开始上工了，同盟罢工亦告停止。厂方惟恐工人一齐上工又有变化，故决定枪厂六点半上工，其他各厂均于七点钟上工，以防意外。但此种决定事先都未通知全体工人，而全体工人仍照以前的时间（六点半）一齐进厂，见厂方只发给枪厂的牌子，其他各厂的上工牌子均扣留不发，工人们都非常的不满。虽经厂方解释说因活儿不多，各厂都迟一小时上工。但工人们仍是愤极不理。后来到点，厂中虽拉了三次上工的汽笛，工人们直噪到九点才开始上工。此次各厂工人，在厂外噪闹时，枪厂工人因已进厂工作，而不知道他厂的工人在外面鼓噪的事实，故未能取得一致行动，而重复实行罢工。工人出厂吃午饭的时候，某同志虽曾通知于午饭后仍准备再发动同盟罢工，继续要求均分红利，因由奉天来的新工人首先进厂上工，罢工仍不能发动。计此次斗争若断若继共三日之久，但全体工人罢工的时间合计只有一天。

三、工人上工后，厂方马上出一布告：“国难当头，工人们要帮助政府努力工作，同御外侮，平定内乱，国有工厂绝对禁止有轨外的行动，严密调查这次反动分子，给以严惩……等。”同时厂方又用一种欺骗政策，来缓和工人斗争情绪，由厂方拿出一万元来替工人采办粮食，要求政府发给减半火车上运费的护照，现政府已批准（在未罢工前二星期已有此计划），来麻木工人群众，而且还要工人选举代

表来监督采办员（我们的同志拒绝当代表是错误的），然而代表大多数是指定的。代表们所发出的宣言内容是“物价高涨，工人生活困难而发生此次斗争事件，厂方知道工人的痛苦，拿出一万元采办粮食，照价作给工人……等”，欺骗工人。

在这次罢工中，我们得到什么教训呢？

（一）证明我们支部在自己的经常工作中，完全没有准备来领导工人的斗争，所以我们落在群众积极性的后面。枪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在发生怠工之后，我们才去领导。工人罢工出厂之后，才“忽闻”本年红利十二万元为上等职员所分尽。我们平日干什么去了？我们平日没有去注意群众的不满，探听群众的要求，把群众的不满和要求表白出来，变成简单明了的要求纲领，并宣传给每个工人都知道，组织群众为达到这些要求而斗争。我们的支部根本不知道群众有什么不满和要求。或者知道了，也不去注意拿住，对群众的不满和要求随随便便的放弃不管（这是最严重的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等到群众自动起来为自己的要求斗争时，我们才去“领导”，所以我们只能作群众的尾巴。

如若我们的支部，是时时刻刻都准备领导群众起来斗争的，那早就根据群众的不满提出了群众最迫切的要求，早就在墙壁上、厕所中、壁报上及工人住宅上都写上了这些要求，没有一个工人不知道这些要求，拥护这些要求。我们的同志早就发起召集各厂积极分子会、工人代表会；在群众中选出斗争委员会、罢工委员会；早就派人探听敌人的消息，

分析敌人的力量，看清敌人的弱点，估计群众的情绪，组织群众的力量（纠察队、宣传队、罢工基金、候补的领导者等），消灭自己的弱点（如帮助新工人等），选择适当的时机去发布罢工的命令。在罢工实现之后，立即召集群众大会，通过罢工纪律，组织所有罢工工人来参加罢工中的工作（在罢委直接指挥之下），最大限度提高罢工工人的情绪，号召工人誓死坚持，奋斗到底。并准备与敌人的武装作斗争。如果我们作到了这些，我们就真正能够领导罢工。可惜我们一件都没有作到！

我们在企业中的全部工作，应该是这样组织的：争取该企业全体工人、职员在自己的领导和指挥之下；用最大的力量保护该企业整个工人与职员的利益。如果我们不经常注意准备和领导工人的日常斗争，就无法完成上面的任务。这次罢工完全暴露了该厂支部及其上级领导机关，过去在工厂中的工作，是完全空虚的！

（二）在枪厂工人怠工发生之后，对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①把怠工转变为罢工；②把工人的行动最大限度的组织起来；③联合各厂工人一致行动；④正式提出能包括全厂工人利益的要求。关于第一项是作到了，但是全凭个人的英雄领导（虽然在这时候也是需要的）作到的。群众大会没有召集，没有通过要求条件，罢工委员会没有组织，没有罢工纪律，没有交涉代表，没有宣布“不得罢工委员会的命令，不得私自上工”。一切纠察队、宣传队、标语布告等都没有。工人的行动是散漫的完全无组织的。所以厂主只放一个谣言

(要求已允许了),罢工就溃散了。就是“英雄”,到了这时候也无法可想。

(三)在上工时,工人群集厂门口鼓噪几点钟,我们不乘机利用开群众大会,通过再罢工,推举代表,向厂主把条件交涉清楚之后再上工,及选举罢工委员会等。我们把这样难得的机会放过了。

(四)新工人对于罢工是不坚决的。我们没有预先看到工人的这一弱点,想法补救,特别加紧在新工人中工作,取得他们对罢工的一致。不消灭自己的弱点,敌人必乘着工人的弱点向工人进攻,这是一切罢工中应特别注意的。

(五)当工厂出布告说“国难当头,工人帮助政府,努力工作……”时,我们没有十分有力的打击国民党这种反动宣传,没有告诉工人,推翻国民党政府,是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反对国民党借口“国难”来压迫工人。当厂主要严办反动分子时,没有组织群众的力量来防御敌人的进攻。

(六)当厂方拿出一万元来替工人采办粮食时,我们没有向工人宣传:这完全是上次罢工所得到的结果。工人不罢工,厂主是不会这样办的。工人不能以这点利益为满足,只有工人继续向厂方斗争,才能得到更多的利益。工人绝不可因此放弃斗争的准备,工人如果不准备斗争,厂主随时可以进攻工人。厂主指定我们当代表去监督采办员,同志拒绝厂主这种指派是完全对的。但我们可以提出要求,将这一万元完全交给工人,由工人自组委员会去采粮或作合作

社基金等。但无论如何不能因此放弃增加工资、年终双薪的要求，不能放弃斗争的准备。代表们的宣言，应在群众中无情的揭破。

以上这些缺点和错误，是我们落后于群众的主要原因，是这次罢工失败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不发生这些错误，这次罢工是完全有胜利可能的。

工人上工后，斗争并未完结，为什么我们又不能发动第二次的罢工呢？原因当然不是群众不要罢工了（因为群众自动要求红利）。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自己错了。错误是什么呢？

第一，同志分析这次罢工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所得到结论是：因为“党的意见不一致”，因为“各部分的工作发展不平衡”，因为工人的“帮口太复杂”，因为“罢工发动的不一致”，“宣传鼓动工作太不够”，“没有抓住积极分子在自己的周围”等。因为对罢工的教训没有拿住中心，并推到客观原因去负责，自然就不能根据第一次罢工的教训，去准备第二次罢工，而且又重复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第二，他们准备第二次罢工的要求纲领是：①要红利全部发给工人；②一律增加五元工资；③实行八小时工作制；④夜工四小时作一工，八小时作双工；⑤反对罚金；⑥反对规定物价；⑦要求年关双薪，放年假工资照给，免费乘火车；⑧反对无故开除工人；⑨反对指派代表；⑩打倒吃工人血汗的国民党；⑪打倒出卖中国工农给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政政府（豪绅、地主、资本家）；⑫打倒进攻苏联压迫中国工农

的帝国主义；⑬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新的进攻苏区；⑭拥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组织工农自己的政府。

这个要求纲领真是好极了。只要一次罢工，达到这十四条，工人阶级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可惜这种是立三主义者⁽³²⁾脑筋中间的幻想。这个要求的后半部明显的不是群众迫切的要求，不是切实的分析了群众的不满情绪之后，所提出来的要求，断然没有吸引企业中的工人来共同制定（职工国际决议），又经过多少群众同意和通过的要求。而只是一个或几个立三主义者，坐在屋子里写成的“佛经”。我们的立三主义者拿了个这个纲领到工人中去，照和尚念佛经的样子，去念他娘的千万遍，或者会“显圣”吧！工人群众将会“不得不”在这十四条之下起来罢工吧！除此之外，我们就不能解释这个要求纲领的“正确”。照我“凡人俗子”看来，这十四条恰恰是要葬送罢工的，落后的工人看过了我们这十四条，就会要离开我们，怕和我们接近。工人群众脱离我们之后，厂主就可以很简单的把我们几个“光干”同时开除了事。

根据报告上看来，群众最迫切的要求是：增加工资，分配花红。开始工人只在增加工资一个要求之下，起来罢工。这两条是工人愿意用最大的牺牲来要求实现的。那我们就应该在这两条之下，领导工人起来坚决的斗争。这两条胜利之后，工人是愿意提出第三条第四条的。我们的同志不这样作，机械的勉强的加成十四条。并且还把党的根本的战术任务的口号，也机械的加上去。以为要求愈多愈好，愈革

命。以为把经济要求与政治口号写在一起，就是经济与政治联系，就是罢工政治化。实际上使工人不知道为哪一个要求而斗争才好，使工人看了这些“苏维埃、红军”的口号之后，连经济罢工都怕发动起来了。这只是昏乱，糊涂！把群众目前的迫切要求和宣传鼓动的政治口号，混淆到一塌糊涂。这只有葬送罢工。这就是第二次罢工不能领导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里，经济与政治应如何联系？比方：工人觉得工资太少，要增加。我们就可以向工人解释说：工资不够维持生活的原因，是物价高涨，物价高涨的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战争的破坏所发生出来的结果。因此工人要解除本身的痛苦，就必须驱逐帝国主义和消灭军阀战争。怎样驱逐帝国主义和消灭军阀战争？那就只有苏维埃和红军。苏区如何实行劳动法？只有苏维埃和红军的胜利，工人才能够大大改良本身的生活。工人应为本身利益斗争，同时就应为红军和苏维埃而斗争。我们在罢工中这样向工人宣传解释，使工人不懂的懂了，使工人的觉悟提高。工人如果赞成了我们的宣传，就可以告诉工人目前应该怎样来帮助红军，要他们参加红军，募捐慰劳红军；或制造炮弹枪械时，如何使这些炮弹枪械不能使用；在军事紧急时举行罢工等。这样就使工人的经济罢工，和拥护苏维埃的任务联系起来。这比在要求纲领上加上苏维埃的口号（纸上的）要好多了，实际多了吧！这只有糊涂虫才不懂得！

职工运动中的两个问题*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

一 最近的工人斗争和党 与赤色工会的领导

(一)经济恐慌继续的深入，资本家更利害的向工人生活水平进攻，本来是极可怜的中国工人的生活程度，不断的往下低落，广大的失业工人更是无处谋生。由对日经济绝交所产生的痛苦，几乎全部加在工人劳苦群众的身上(由经济绝交而营业发达的民族工业，借口“国难”更加重工人工作，延长工时；由经济绝交而营业低落的民族工业，也借口

* 一九三一年秋，刘少奇由莫斯科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本文是他为中央职工部起草的一九三一年职工运动的总结报告的第一、二部分。报告全文共四部分。第三部分谈苏区工会问题，第四部分主要介绍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职工部及各产业工会的基本状况。文末附有《九月半起至十二月止中国工人斗争统计表》。原载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第三十一期，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出版。现题是编者加的。

“国难”来减低工资，延长工时，裁减工人，以至关门停业不给工人救济费等），因此推动工人阶级的斗争不断的向前发展。同时反帝运动的高涨，红军和苏维埃的胜利与发展，也给了工人斗争一种有力的推动。但在另一方面，资本家与国民党帝国主义更加联合一致来压迫工人的斗争，更加采用一切的暴力与残酷的方法来镇压斗争的工人，黄色工会更与资本家国民党打成一片来破坏工人的斗争，因此使斗争遇着很大的困难，罢工的失败经常威胁和压迫着要求斗争的工人，赤色工会还没有来得及准备群众的力量去克服客观上所给予的这一切困难。

目前的形势是：工人的斗争更困难了；可是斗争的推动力更伟大了。在群众中蕴藏着的革命斗争的内容，更丰富了普遍了（不仅上海的黄色工会有四十九件未决的劳资纠纷，差不多每个产业部门每个工厂中都蕴藏着群众极大的不满与愤怒，都有许多迫切的要求），斗争的锋芒更尖锐了（都有一触即发的形势，一爆发就成为武装冲突），一切斗争都带着极浓厚的政治性（一切斗争都是违法的，都与国民党的统治直接冲突）。目前最主要的就是赤色工会的正确领导和群众的组织力量，去冲破客观上一切的困难，打开阶级斗争的顺利的前途。

最近有同志估计“工人斗争的情绪还不够”，取消派在困难的前面投降，要工人“不应罢工”；立三主义者⁽³²⁾不估计到客观的困难与主观的力量，去玩弄罢工，都是发展工人斗争的前途的障碍。最近的事实完全可以证明：工人群众

虽然处在万分困难的环境之下，胜利的希望那怕是如何的微小，可是工人还是要不断的起来斗争。统治阶级所给予斗争的困难是完全消灭不了工人的斗争。同时工人群众绝不愿意玩弄罢工，不轻易发动罢工。我们的煽动家许多次得到工人这样的回答：“你们所说的是对的，可是我们暂时还不能照你们说的那样做。”

(二)资本家国民党用一些什么办法来对付工人的斗争呢？主要的更多的是采用赤裸裸的暴力的压迫，但统治阶级的欺骗的宣传并没有减弱，而且是加紧了。尤其在满洲事变以后，国民党几次命令和布告禁止工人罢工及一切劳资纠纷，甚至以死刑来镇压工人(汉口)，同时国民党“劳资一致、共赴国难”的宣传，更加紧了。改组派及黄色工会更在工人中提出许多欺骗工人的纲领(如上海总工会主张民众运动的独立与自由，取消工会法工厂法，一切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救济失业，工人有罢工自由等，取消派则认为这是改组派及黄色工会的“一个进步”)。

工人的每一个罢工和斗争，资本家和国民党都采用以下各种办法来对付：①当工人准备斗争还没有好的时候，就坚决向工人进攻，开除工人领袖，分裂工人；②宣布工人的罢工斗争是“无理取闹”、“捣乱”、“不顾困难”、“破坏劳资合作”、“摧残民族工业”，把罢工的责任加在工人身上；③宣布罢工是“少数不良分子”的捣乱，大多数良善工人是被威胁的，使工人与领袖分离，把罢工责任加在少数领袖身上；④宣布罢工怠工是“违法”，布告禁止工人罢工，命令工人复

工；⑤如果还不能使工人屈服的话，就限期工人复工，过期全体开除，另招新工；⑥警察巡捕保护工贼及新工上工，逮捕工人领袖及积极的工人；⑦如果工人反对逮捕、对付工贼及包围资本家和示威等，国民党帝国主义就不惜以大队武装来枪杀大批工人，施行军事戒严；⑧在工人中组织法西斯队伍，收买流氓工贼及失业工人，破坏罢工；⑨再没有办法就答应一部分工人的经济要求，而否认另一部分工人的经济要求，分裂工人。或者布告答应工人的经济要求，否认工人的代表权，不与工人代表谈判，打击工人的团结；⑩资本家相互间订立共同对付工人罢工的契约（如上海华商纱厂与英日纱厂），资本家彼此间相互援助；⑪在报纸上作宣传，在工人中制造各种谣言，制造假的共产党的证据，动摇工人；⑫再不然，就假意承认工人的要求，等资本家准备好了，否认自己所承认的条件，开除工人领袖，向工人进攻；⑬用关厂政策来对付罢工。

除开上列各项资本家所通常采用的办法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国民党的劳资调解仲裁机关。国民党宣布一切的劳资纠纷只能由他的调解仲裁机关来“解决”，宣布调解仲裁机关“能公平解决一切劳资纠纷”，但劳资纠纷一到国民党的机关里去，就保障资本家的胜利。国民党在调解仲裁机关里这样来对付工人：①要工人立即复工，不作轨外行动，静候解决；②要工人遵照国民党的指导按工会法成立工会之后，才有资格派出代表，提出条件，来请求调解或仲裁；③拖延至很长的时间（常至六个月以上）不解决以疲劳

工人，以便资本家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对付工人；④用各种的恐吓及花言巧语来对付工人；⑤调解不成可以完全不顾工人的愿意与否，执行强迫仲裁；⑥调解仲裁机关一方面决定解决纠纷的条件，一方面又要资本家不履行这些条件，使工人受尽各种牺牲之后，一无所得。

除此以外，国民党资本家还在工人的内部造成很多的黄色工会和狡猾的黄色领袖，来拥护并执行上面各项破坏工人斗争的办法。

国民党资本家压迫和破坏工人斗争这一切的系统，是非常严密的，是从工人群众的内部与外部齐来的。在工人一方面如果不能击破资本家国民党这一切的进攻并使之失败，那斗争的胜利就是很难取得的。试问在工人群众一方面，在赤色工会一方面，是不是能够对付资本家国民党这一切的进攻呢？

(三)国民党资本家向工人阶级的进攻，是遇着了工人群众不断的反抗的，工人群众还是不断的提出要求向资本家国民党举行斗争。工人斗争的反攻带着更多的进攻的性质。上海工人是用许多罢工、怠工(印刷、市政、纱厂等)来答复国民党禁止罢工和纠纷的命令；用捣毁工厂、与巡捕武装冲突，来答复国民党帝国主义的武装压迫(永安纱厂、大新织厂、商务等)；特别是工人反黄色工会的斗争更不断的爆发起来。工人对于反帝运动已开始积极的参加，反帝斗争正在酝酿着，主要产业工人牵入斗争中间，同时那些小城市的手工业工人也不断的举行罢工(如陕西、直南)，而且还

更多的得到胜利。但在工人斗争中还表现了许多缺点。这些缺点是：

①斗争还是各个的爆发，工人群众还没有自觉的组成广大的下层统一战线，联合许多工厂起来同盟罢工，在工人中还流行“等人家胜利之后再说”的情绪，所以敌人就得以各个击破；②斗争大部分是自发的，没有很好的组织和领导机关；③在工人中还保存一些“合法”的观念。比如：以怠工来代替罢工（怠工虽然也是工人必要的斗争手段，但最近的许多怠工，并不是根据群众的需要而采用怠工，而是因为怕罢工犯法更大，所以才怠工），以退职来代替反日罢工。在罢工后宣布“严守秩序”、“静候解决”、“不作轨外行动”，最重要的最能打击资本家的部分不罢工（如英电怠工，电灯电车照常供给等），不作游行示威，不向各厂工人请求援助及鼓动各厂工人罢工等。④不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向敌人的武装作斗争，许多武装冲突都是无准备的突然的爆发。工人中的这许多缺点，表示黄色纲领在群众中还没有完全被抛弃，这是许多斗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最近两月来，工人更多采用直接斗争的方式，罢工、怠工、包围和捣毁，是要多过从前；请愿、派代表交涉，比以前要少。斗争的发动还是一个企业或一个企业的一部分工人，下层统一战线在工人方面完全没有作到，甚至整个产业的工人都有斗争（如上海印刷、水电、纱厂等），但完全没有联系起来，只是分开个别的发动。斗争的大部分是失败的，尤其是那些主要的产业工人的罢工和怠工，胜利的很少，但

是那些部分的极小的斗争倒是有许多胜利的（如工联和海总所领导的）。有很多要求条件的斗争，极大多数是失败的。经过武装冲突及屠杀之后，工人情绪更高涨、斗争更扩大的是没有，都是工人散漫，没有继起的领导者，由国民党包办来“解决”。这是我们统计最近几个月来的工人斗争所得到的结论。至于由日本企业中退出来的工人，除开彩印工人还有组织外，其他的工人都散走了。

（四）赤色工会和党领导工人斗争的情形是怎样呢？完全在我们领导下的五个主要企业的罢工（上海大东、公共汽车、冷作和彩印与河南兵工厂），只有冷作胜利外其他都是失败的。而冷作工人的胜利，是因为工人全体罢工，几次包围，只是向大包头要求加工资。以后工联所给予工人的指导大体上虽是对的，不过罢工委员会有许多没有执行。但在后来，恰是罢工要胜利时，工联疏忽了对工人的指导，而且是错误的指导，以至完全失败。本来资本家以罢工损失太大，无法雇用新工，各股东责备经理处置失当，巡捕房^[33]也警告经理不要延长罢工，各方对工人均表同情，客观上工人完全占着优势，只要能坚持罢工，资本家是可以屈服的，但在这时候工联没有看见资本家的阴谋。黄色工会与资本家勾结，恐吓工人不应参加示威，将领袖吓走，将工人从房屋中赶出来，断绝工人的伙食，工头就来（资本家叫他来的）号召工人跟他去，他给工人房子住和饭吃，领导工人退出黄色工会，到工厂复工。工人复工后还抱怨我们。工联此时没有将工人领袖拿住，没有反对黄色工会赶工人出来，没有揭

破工头的阴谋，并且还赞成了工人退出工会。

河南兵工厂的罢工，我们是完全没有运用罢工的策略，完全没有组织工人，完全没有准备工作，而遭到失败。这个罢工如果在主观上不错是完全有胜利可能的。上海公共汽车罢工的失败虽然主观是有错误，但新工人的上工，资本家破坏罢工之厉害，实是给我们很难解决的困难。彩印罢工虽然现在是无法解决的，但我们在组织上政治上还是胜利的。工人有个时期不听我们的话跑到国民党方面去，但是现在事实上完全证明了我们的话是对的，所以工人完全回来了，表示完全愿听我们的指挥。

研究上面几个罢工失败的原因，主要还是我们主观上的策略上的错误。

此外还有许多与我们有关系的工人斗争。我们总是不能把工人的斗争组织起来，表现我们组织斗争的无能。比如上海法电的斗争，电话的斗争，商务、民智、报馆的年关斗争，海员驳船的斗争等等。这些斗争经过我们很长时期的准备，至今不能发动起来，实际的准备工作还是一点没有。固然在企业中没有我们得力的干部是很大的困难，但我们不能够说服那些活动分子，说服工人，告诉工人许多具体的办法，把斗争的环境前前后后的告诉工人，很好的来运用罢工的策略等。工联和海总的同志还不能够对每一个斗争从各方面来作全盘的估计，不能从各方面告诉工人要如何才能使斗争胜利，即在说服工人方面，缺少具体的实际办法。

“工联对于工人斗争的领导和布置，比以前是进步些”（工联报告），我认为这是对的。他们已开始把领导工人斗争问题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不象以前专门忙于纪念节的工作。有几个同志已开始来运用罢工策略，说服工人，开始用些实际的办法告诉工人，经常在工人中指出到国民党去调解仲裁是毫无效果的，实际上领导了一些小斗争得到胜利，并且他们还开辟了一个工作（如大东、冷作及青工等），运用公开路线等。但他们还只是在开始转变，在斗争中来学习国际路线的实际运用。

我们领导了许多斗争，还有许多斗争与我们有关系我们参加了领导，但一般说来，我们领导的不好，尤其我们在组织上没有收到显著的成绩。学习领导和组织斗争，是党和工联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我们在领导斗争中发现了些什么缺点呢？

（1）不会准备斗争，没有一个斗争我们要群众在各方面都有过准备工作的。有些同志还以发动斗争为目的，甚至借口不要“等待”来反对在罢工之前有充分的准备工作。固然有许多临时问题的爆发使我们来不及准备就要发动罢工的，但在目前这样困难的环境下，我们要慎重的来准备，选择时机来发动罢工。比如有许多罢工已经酝酿了几个月至半年，当工人已决定罢工，要工人有几天在罢工之前进行某些必要的准备工作，这完全不是等待主义。在目前没有准备的罢工，是很难坚持到底的。相反的，在许多临时问题上可以发动罢工的，我们又常常拿不住，把机会放过了。

(2)对于工人自发斗争的领导是不够的，大半是没有去领导。我们没有对每个自发斗争来讨论、分析，提出许多办法告诉工人。我们的工作还有些限制在狭小的秘密组织之内，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

(3)我们的组织还不彻底了解企业中的情形，不能提出群众最迫切的要求。还有些同志以为要求愈多愈好，尤其河南省委提到兵工厂的斗争纲领，有十几条，把拥护苏维埃等口号都写在纲领上。

(4)没有提出共同的要求纲领来组织同盟罢工，没有说服工人必需配合的发动斗争才能使敌人屈服。我们还不能把许多个别的斗争配合起来，限制在领导那些零碎的个别斗争上。相反的，有同志忽视小的部分斗争的发动，专门来“空叫”同盟罢工。

(5)我们还没有能够组织起有工作能力的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罢工委员会、斗争委员会等。

(6)我们还没有调集一切的力量来争取某些罢工的胜利，组织同情罢工，扩大罢工，我们还没有过任何成绩。

(7)组织失业工人来同情和援助罢工，还没有成绩，只有大东罢工，上工的新工是自动辞工了。

(8)我们还没有系统的向工人提议，要工人有组织的有准备的与国民党帝国主义的武装作斗争。我们只是简单的要工人毫无准备的去示威、包围和武装冲突。

(9)我们还没有充分的揭破国民党调解仲裁机关的作用，没有告诉群众怎样去反对调解仲裁。

(10) 我们不会击破敌人一切阴谋和进攻，不会利用敌人的弱点，不会临机应变，不会补救自己的弱点。

总而言之，我们领导斗争的能力，我们的方法，还远不足以应付敌人，我们并且还落在群众后面，群众到处起来斗争，我们不能站在前面去领导，还与群众联系不起来。

(五) 党和工会动员工人群众来参加反帝运动，还非常不够，工联、海总最近才有一些工作。我们组织反帝罢工，还没有一个地方有成绩。从日本企业中退出来的工人，除上海彩印外我们都没有工作，日华纱厂的罢工我们的工作也很弱。在工人中建立反日组织，在上海最近才有一点成绩，如申一、永安、驳船、码头和印刷工人中已有了公开的群众反日会，并加入了民众反日联合会起了相当的作用。几次动员工人来参加反帝游行示威，虽然没有很多的群众，但是每次都是成功的，参加的人情绪更提高了。不过大东工人参加十三号大会后，因为黄色工会的恐吓和罢工的失败，没有好的结果。反帝运动与工人经济斗争的联系，我们还作的不好。开始我们没有有力的来反对国民党资本家借“国难”来压迫工人经济斗争的理论，没有提出许多经济口号来发动工人的罢工，没有在群众中作广大的宣传号召和组织工作来准备反帝罢工。对于黄色工会在反帝运动中所宣传的口号，我们没有给以致命的打击。对于国民党的改组派企图引起工人与学生运动对立的阴谋，没有在群众面前揭破。

二 赤色工会的组织状况

(六)赤色工会的会员,因为没有材料,无从作出完全的统计。现就各地报告有数目字的,统计有会员一千一百四十八人。计上海六百六十六人,厦门七十二人,海员三百十九人(码头、驳船在内),哈尔滨七十一人,胶济路二十人。除此以外,海员有线索的三十六人,津浦济南站有线索的四十一人。附属组织上海有六百九十二人,青岛二十人。连会员线索,附属组织共一千九百三十七人。这个数目是除开河南、满洲各地,及铁路、矿山未计算在内。在全国估计有三百万产业工人,与我们有联系的大约有三千人,我想这不会过分的。当然这还得除开有些党的支部不算在内。

我们在企业中的支部有很大的领导作用的,有河南兵工厂、北宁路关外及胶济路。只有这几个支部能领导几百上千的工人。其他我们有领导作用的有上海的印刷,海员的驳船,法电,哈尔滨的皮鞋工人等。在上海工会的会员非党员占多。会员还是流动的。同时还有些工厂虽然没有我们的组织,但到斗争的时候工人还是来找我们领导(如大东)。工会支部和小组大半是没有经常活动,与上面的关系又不很好,作用是非常小的。在城市除上海工联外,有哈总,厦门和奉天都预备成立总会,而哈总大半是在业工人来参加工作。在天津、北京、汉口、香港、广东、唐山等工人多的地方,

没有我们的组织。香港派去恢复关系的人又被捕了，天津派去的人还无成绩可言，武汉虽然苏区派了人去，但与我们无关系。

会员流动的原因：工人个别的入会又出会的现象还少，主要的是整个支部的建立和塌台。比如有些工厂我们的基础很好，但过一个时期，我们的基础完全丧失了。丧失这些支部的原因：是由于我们的错误使斗争失败，由于敌人的破坏，或者是同志会员的消极。在立三时代〔27〕许多支部的塌台是由于盲动。至于新支部的建立，大半是由于领导和帮助工人的经济斗争，或者是得力的同志参加了生产。这些现象在上海表现得很明显，是值得严重研究的。但我们在海员方面，会员还是保留在旧的基础上。我们现在对于那些好的支部如河南兵工厂、胶济路等，更应慎重的指导他们，使基础能更加巩固扩大并向各方面开展工作，不要一下子又使这些好的支部塌台了。

在企业中的干部，能够执行我们路线的非常少。工会和党又没有注意来培养企业中的干部（须要整个的计划），派同志参加生产的成绩，现在还很少能看得见。

发展赤色工会的方式，我们现在还是一个一个的介绍加入小组、支部的办法，和介绍党员差不多。我们还没有能够利用各种可能来建立工厂委员会及群众的工会。上海工联曾经企图在冷作、彩印建立包括大多数工人的工会，但现在还没有成功。许多同志对“小组”还不认识，常把他独立起来。怎样来争取企业中工人的大多数，怎样来建立群众

的组织，我们同志还是很少办法的。

附属组织我们所收到的效果很少。许多附属组织还是不公开的，群众很少的，或者我们没有派得力的同志去担任这个工作。如上海组织了有四五十人的工人学校，也没有在组织上收到效果。我们没有组织起适合群众需要的有很多群众加入的公开的附属组织。

发行工作是最不能令人满意了。发行的东西是很少的，还不能发到群众中去，群众不看我们的东西，影响几乎没有，但在哈尔滨那些地方是比较好点。工会和党的文件在工会支部、小组中很少看见，甚至工会工作人员不看上面的文件，至于研究这些文件，更是少极了。

(七)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最近到处起来反对黄色工会，改组派利用群众的情绪来夺取黄色工会的机关。可是我们的纲领和口号在群众中还是看不见，仅仅只有空洞的“工人组织自己工会”的口号。我们提出从工会中驱逐一切国民党员，工会与国民党各派脱离关系，剥夺国民党员在工会的选举权等口号，下层还没有执行。工联也没有提出自己的纲领来对抗国民党上海总工会的纲领。甚至还有人去联络改组派(如商务黄色工人)。

反对黄色工会，在胶济路、北宁路我们是得到胜利的。同志对黄色工会的策略还有许多错误观念未弄清楚。有人不去个别的分析某个黄色工会，一概的主张加入，就是没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也加入。又有人主张退出那些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在黄色工会里面组织赤色工会的支部、小组(五次

劳动大会决议)，在里面组织革命职工反对派（职工国际五次大会决议），建立工人自己的工会（独立工会），三个口号我们各地都在应用，并且同时提出，写在一张传单上。同志还分不清这三个口号有什么不同，要用在什么时候才恰当，我们还没有在那些有影响的黄色工会中，建立有力的有组织的革命职工反对派。

苏区阶级工会的会员成份*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建立阶级工会”这一口号，在各苏区都提出来了。但是执行这一口号，首先就要确定加入阶级工会的会员成份，必需是工会的组成分子，尤其是他的领导成份，都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成份，然后才能保证工会的阶级路线的执行。现在各苏区的工会，都发生了这一个问题：哪些人是应该吸收入工会的？哪些人是应该从工会中清洗出去的？因为中国乡村中间的复杂情形，和乡村中间许多半无产阶级的成份，及苏区土地革命后的情形的变动，把苏区许多同志的脑筋弄糊涂了，各个苏区的工会对于这个问题的决定不一致。这里我们必须采取严格的态度，来辨别乡村和小的城市中的劳动者，哪些是阶级工会的会员成份。这里，我们不说到阶级地位很明显的工厂、作坊、矿山中的工人，也不说到“驱逐资本家、富农、地主残余、和尚、道士及 AB 团等出工会”的口号，因为在这里我们没有不同的意见。

* 本文署名仲篪，原载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第三十九期，一九三二年五月二日出版。

在过去全总的文件上及现在各苏区来的文件上，都可以看到“独立劳动者”这个名词；并且认为“独立劳动者”不是工人，是小资产阶级。因此，一致的提出“驱逐独立劳动者出工会”的口号，和驱逐 AB 团、富农、老板出工会的口号列在一起。只有湘鄂西总工会决定“独立劳动者”加入工会，因此，洪湖不雇请工人的独立捕鱼的渔民，也加入工会。此外，在鄂豫皖总工会正在清洗所谓“中农工人”及“富农工人”出工会。在赣东北及中央苏区对于雇农苦力在分得土地以后是否应该退出工会这一问题，不能解决。在中央苏区还提出了驱逐“师父”出工会的口号。

所谓“独立劳动者”所指的是一些什么人？这在许多文件上都没有明显的界说过。湘鄂西的同志们是把一切个人独立从事生产的劳动者，看作“独立劳动者”，渔民、手工业者，以及贫农、中农都是。但是这就没有理由允许这些人都来加入阶级工会。中央苏区的同志们对于“独立劳动者”的界说，可以在下面一段文字中看出来：

“建立真正的阶级工会组织，彻底洗刷非阶级分子出工会，这里对于独立劳动者要有明确的划分：只是自做自卖，以及沿门卖工，中间不经过资本家剥削的，是不属于独立劳动者（如裁缝、剃头、木匠、泥匠、篾匠中之一部分的个人劳动的），不是工人，不能加入工会；只有资本家的工厂，老板的作坊、工厂中，卖劳动力换工钱的方算工人。要从阶级上去团结工人群众，才能建立真正的阶级工会。”〔40〕

这里是把一切“沿门卖工”的个人劳动的裁缝、剃头、木

匠、泥匠、篾匠等手艺人，都看作“独立劳动者”，不是工人。凡不在“资本家的工厂，老板的作坊、工厂中，卖劳动力换工钱的”都不算工人，都不能加入工会，要彻底洗刷出工会。这样一来，如是散在乡村和城市中间的手艺人、雇农、苦力、短工等，都要被驱逐于工会之外。工会里面只留下在“资本家的工厂，老板的作坊、工厂中，卖劳动力换工钱的”工人（连在苏维埃企业，国家机关作工的工人都除外了）；同时又说：在苏区简直没有什么工厂作坊，工厂作坊都关门了，资本家老板都跑了。如是，工会就只有取消。这当然不是什么阶级路线，而是雇主喜欢这样做的。

我以为凡属“以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活的主要来源”的工人、职员、雇农、苦力，都是阶级工会的会员成份，都应加入工会；不管他出卖劳动力的形式怎样（整年整月的卖，或是一天一天一刻钟一刻钟的卖；卖给工厂作坊固定的主人，或者是零碎卖给其他的个人；很多人集体的出卖，或者是散在乡村中个人的出卖），或者还有很少的自己的工具，作为他出卖劳动力的必需的条件（他有自己的工具，不是为着经营独立的生产，而是为着便于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为他没有资本，没有原料，没有地方出卖商品，单有自己很少的工具，还是不能从事独立的生产）。

散在乡村中的裁缝木匠等，天天带了自己很少的工具，到雇请他的人家去作工（即所谓沿门卖工），原料是雇主的，缝好的衣，作好的台子（生产品——劳动的结果），也交给了雇主（不是属于他自己所有），得到了工资的报酬（年底月底

或当日付给，或者是货币，或者是自然品）。这难道不是卖劳力的工人吗？是工人！

乡下的散漫的剃头匠，天天到农民家里去剃头，有时就在他自己的家里给人家剃头。结果他得到工资（那怕怎样零碎），靠工资过活。他也是工人。

乡村中及小城市里面的小车夫、挑脚、抬轿的苦力，他们也有自己的小车和扁担等，但他们也是十分不固定的出卖自己的劳力，只要他们主要的是靠着替人家挑脚、抬轿和推车的收入来过活，他们也是工人。

乡村中的泥水匠、建筑工人，是乡村无产阶级重要的一部分（除开极少的包工头外）。我们完全不能设想世界上会有“盖好房子出卖”的泥水匠和建筑工人，盖房子和建筑工程是可以由“个人劳动”来“独立生产”的（除开小的修葺）。但是中央苏区的同志们认为泥水匠是“独立劳动者”，要“驱逐泥水匠出工会”。这难道不奇怪吗？

我们应该明白的认定，乡村中“沿门卖工”的那一部分“个人劳动”的裁缝、剃头、木匠、泥匠、篾匠等，有许多是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活的主要来源的工人，是无产阶级的成份，是应该加入工会的。中央苏区的同志们认为这些人都是“独立劳动者”，都要驱逐出工会，是错了的。这些“沿门卖工”或零碎卖工的工人、雇农、苦力，就不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吗？不然，一样的是要受到雇主的剥削的。不管雇主是什么人。

但是乡村中间的情形，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必须注意下

面的几种情形：

一、乡村中有许多木匠、篾匠、鞋匠、裁缝等，他们一方面出外替人家做工，一方面又在自己的家里生产一些商品出卖，或者作一些“定货”，或者还有自己的一块土地自己耕种。这些人的阶级地位，的确是不明显的混合的。那就应在个别的情形下面来辨别他们。如果他们的收入主要的是靠替人家作工出卖自己的劳力得来，就应加入工会。如他们的收入是主要靠出卖生产品或作“定货”，或经营土地得来，出卖劳动力只是附带的，就应加入手工业者联合会或贫农团。同样的半无产阶级雇农（他生活的来源主要的是出卖自己劳力得来，经营土地只是附带的），应加入工会。半无产阶级的贫农（他生活的主要来源经营土地得来，出卖劳动力只是辅助的收入），就应加入贫农团。

二、在乡村中有很少一部分手艺人，虽然他们自己也到人家去作工，但是对于同行伙计进行一种“工头式”的剥削，又剥削学徒，或者还作“定货”，还出卖生产品，或者经常向人包工，作包工头，剥削伙计。比如甲的手艺很好，资格也很老，乡下的人大家都要请他去工作，徒弟都要向他学手艺，如是他有很多徒弟，有很多雇主，有工作不了，他就相当的“垄断”了乡村中的雇主。同时他的同行伙计乙，因为手艺和资格都不好，很少人去请他做工，他就常常闲着没事做。这种情形就使乙去找甲，跟甲一道到甲的雇主那里去作工，即所谓“作甲的雇主”，如是甲就从雇主那里把乙的工资领来，再付给乙，甲就从中剥削一部分（约十分之一二）。

同时因为甲有很多学徒和伙计，他常常从雇主那里包些工作来在自己的家里作。甲又有机会去买些原料来作些“定货”，或生产一些货物出卖。如果有比较大一点的困难一点的工程，雇主总是要找甲去计划和指挥，或包给甲（因为他是有了信仰的），如是甲就常作包工头。这在乡村中的裁缝、木匠、篾匠、泥水匠中是常有的。我们或者把甲这类人叫作“半工头”。但是这种情形并不是一定对伙计有剥削的。比如当甲忙不开的时候，甲可以请乙来帮忙，当乙忙不开的时候，乙又可以请甲来帮忙。在泥水匠中有时是甲作包工头乙作伙计，有时又是乙作包工头甲作伙计。工会在乡村中要反对这种“工头式”的剥削。苏区工会更应根据劳动法来消灭这种“工头式”的剥削和包工头。因此对于这种带有很多“工头式”的剥削的，又剥削很多学徒的，或者经常向人包工的“半工头”，在目前是不允许他们加入工会的，即令在苏区这种剥削消灭以后的一个时期。

三、在乡村经济中及城市中还有其他一部分劳动者，虽然他自己也劳动，但他同时又剥削伙计。如城市中的理发店的主人（伙计并不是雇请来的，伙计赚来的钱与老板是四六分账或二八分账），有些成衣店的主人，有些运货物的大车、帆船、驳船的主人（有许多也是四六分二八分），在湘江和赣江有些小码头上的老码头工人（霸占了两根三根“扁担”，常常把自己的“扁担”租给别人），城市里有些洋车夫、小车夫（他自己有一辆车，自己拉半天，又租给别人拉）等，工会也是应该反对这种剥削的。那些有自己的作坊，有自

己的工具，同时又利用自己的作坊或工具来剥削伙计的人，是不能加入工会的。但是有些洋车夫是自己从车房里租一辆车，自己拉半天再转租给别人拉，又有些码头工人、小车夫仅仅在自己病了或有事抽空时才把自己的“扁担”和小车租给别人，这种人还是不能把他们屏之于工会之外。

除开上面几种情形以外，还可以说到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师父”。在我们的乡村中并没有一种专门带徒弟的师父。原来行会的行规，是徒弟三年出师，加入行会之后，就有作工带徒弟的权利。乡下手艺人一生完全不带徒弟的是很少的。但实际上总是那些手艺好资格老的“半工头”，手工作坊的老板等，大多数是经常带徒弟的，甚至有好几个徒弟。师父对于徒弟有很厉害的剥削和虐待。工会要为解放徒弟而斗争，苏维埃也应颁布保护这些学徒的条例。这里，对于反抗苏维埃政府条例剥削徒弟的“师父”，是不能加入工会的（或者开除他一个相当的时期）。但一般的提出“驱逐师父出工会”的口号是不对的。乡村一切手艺人可以而且应该带学徒，只要他遵守苏维埃政府的法律待遇学徒，是可以加入工会的（那些“半工头”和老板当然在外）。尤其被雇在工厂、作坊、店铺中的“师父”，是和学徒一样被工厂、作坊、店铺的主人所剥削的，这些“师父”并没有剥削学徒，工会绝对不能把这些“师父”驱逐出工会。

第二，家庭工人。有些工厂、作坊不把工人完全招到工厂里来作工，把一部分原料甚至工具分发给附近的农民、贫民去作（如火柴厂把盒子分发给厂外的去糊）。这些家庭工

人，应该组织在工会之内，联络他们一致向工厂作坊主人作斗争。但他们加入工会组织的条件是要“变通”的。如果他们一家人男女老幼都是作工的，都要加入工会。不能因为他们一家的生活主要来源不是由作工得来，就不把他们组织在工会之内，他们对于工会所交的会费等应比一般的会员不同些（照他们作工的多少来计算）。但这种家庭工人中常发生有“工头式”的剥削。有些人到工厂领回许多工作，自己一家人作不完，如是就把自己的亲戚及附近的人招来工作，或者再分发给其他的家庭去作，从中剥削。如是经常进行这种剥削的人就不能加入工会。工会是要消灭这种中间剥削的。

第三，还有一种家庭手工工人。如家庭织布工厂，织袜工厂，差不多已经普遍到了中国的乡村。有些家庭从商人那里把原料买来，自制工具或者从商人那里把工具买来租来，一家人从事生产。生产品向城市和乡村的商人出卖。他们受商人的剥削是非常厉害的，有些就是一个商人，供给他们原料，供给他们工具，同时又购买他们的生产品。商人的这种“供给”是以借贷的形式，更有一种利息的剥削。这种独立的家庭手工业者，应该组织在手工业者联合会里面，反对商人的剥削。被雇在家庭工厂作工的手工工人，就应加入工会。

第四，季候工人，临时工人。如乡村修堤、筑坝、修路、春季采茶、冬季伐木等，常常有很多的工人聚集在一地工作，这种工人大半是农民，临时被雇来的。工会应该去帮助

这些季候工人、临时工人组织起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工会应派人到这些地方去召集工人大会，选举他们的领导机关，讨论他们的劳动条件，并帮助他们进行工作。不管在这里的工作只有一个月或几个月，都要将工人组织起来。但组织这些工人是要用比较特殊的方式，要使在这个地方作工的全体工人，都能加入。

第五，独立生产的小手工业者。不雇请工人（或者有一个学徒，或者雇请一个助手），有自己的工具和原料，用自己的劳动力生产商品，或作“定货”，主要的以出卖商品或“定货”来维持生活。他们是应组织在手工业者联合会里面。

一切以剥削别人为生的剥削者，不能让他们加入任何组织。一切被雇佣的工人、职员、雇农、苦力、学徒、助手，都应加入阶级工会。一切不雇请工人的独立从事生产的小手工业者，家庭手工业者，加入手工业者联合会。一切摊担小贩，不雇工人的卖肉的屠夫等，加入小贩联合会。不雇请工人的洪湖独立捕鱼的贫苦渔民，组织贫苦渔民联合会。判别一个劳动者是否属于阶级工会的会员成份，标准应当是看“他的收入，生活的来源是否主要的从出卖自己的劳力得来”出发。

苏区的许多同志过于重视“有没有自己的工具”这一个条件，他们认为凡是有自己一点工具的工人，都是独立劳动者，都不是工人。在他们看来，码头工人有一根扁担，外国的建筑工人和中国大工厂的许多机器匠，常常有自己值百元以上工具，都不能算是工人。他们看不见这些人的简

单的工具，仅仅是为着便利自己出卖劳动力的一个条件，而且“独立劳动者”这个名字，是一个太笼统的名字。

在苏区土地革命胜利之后，在经过工人群众激烈的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及劳动法实行之后，情形就会有很大的变动。很多工人、雇农、苦力分得了土地；工头包工头的剥削，师父对于学徒的剥削，消灭了或减到最低限度；许多生产合作社劳动公社组织起来等。这些对于工会的会员成份，是有些影响的。在这里所发生的问题有：

（一）雇农苦力在分得土地以后，是不是应该马上退出工会呢？不。雇农苦力虽然在土地革命中得到了一块土地，但他还是完全没有保证保住这块土地；因为他没有工具、资本及经营土地的经验技术，时时都有丧失这块土地的可能。工会不能在他分得土地以后，马上就要他退出。但在这里是应该有一个限制的，就是雇农苦力在分得土地以后，经过了两年三年，还是继续专门经营土地，完全不作工了，这就应该退出工会了。因为他这时候对于工会的要求和劳动法等，已经不感觉什么兴趣了，他感觉兴趣的是另外的东西。中共中央关于苏区赤色工会的任务及目前的工作决议上说：“工会会员在六个月至一年完全不作工，变为经济独立者（如经商、经营土地等），亦不能再留于工会组织”。这里是不是与决议的上述条文冲突呢？不，决议上说的是：因为乡村的阶级分化，极少数的工会会员，以种种原因，个别的脱离了工人阶级。所以只在一年之后，就应该退出工会。这与土地革命中雇农苦力骤然得到土地的情形，是不同的。现

在我们的苏区里面，因为敌人的封锁，经济的破坏，工会没有去发展工人的经济斗争，劳动法还大部未实行，工人生活的改善还非常少，使得乡村中的阶级分化不是很快的进行。所以雇农苦力还不是很快的就抛了自己那块没有味道的土地。这时候保留这些雇农苦力在工会的会籍，是应该的。从这里就批评到：

(二)鄂豫皖总工会的“凡一年做一百八十工以上可加入工会”的规定，是否正确？凡一年做一百八十工的工人可以加入工会，这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已是全年的大部分时间(除去疾病休假等)出卖劳力。但把“一百八十工”作为加入工会的唯一标准还是不妥当的。因为①有些工人虽然每年没有作到一百八十工，但其收入已经是他全年生活主要来源了。短工，季候工，苦力大半是夏天工作赚钱作冬天的用途。尤其在北方他们常常是做不满一百八十工的；②有些工人是因为疾病、失业及其他原因而作不到一百八十工，而其收入是要作为全年开支的；③在这一规定之下，已经把分得土地的雇农苦力等，一下子全部弃之于工会之外了，而且即使他还作雇农，只是每年不到一百八十工；④工会会员发生很大的流动，而这种流动不是代表会员中真正阶级地位的变动。从工作时间上来观察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固然是可以的。但我们不能这样机械的规定。一个工人原来是工会的会员，他在一年之内虽然只作了很少的(两三个月)工，但工会在一个相当时期内，还可以保留他的会籍。我们不能那样害怕着，工人会变成小资本家(这总是工人中的极少

数)。但吸收新会员来加入工会的条件,就应该是这个工人的工人经济地位已经明显了的时候。若是组织家庭工人和季候工人,简直还不能用这种条件来限制。

(三)鄂豫皖总工会的报告上说:

“在鄂豫皖区的手工业工人,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与农村经济密切联系着,在这种带有农民性的手工业工人,他一方面在农村中有土地,一方面在农闲的时候去做手艺,他有土地又做工,所以他家庭经济地位多属中农,而且有的是富农者。这种带有农民性的手工业工人,是否可以加入工会为会员?……现在各地工会已在清洗的口号之下开始清洗所谓‘中农工人’,有些地方还根据着以前‘每年做一百八十工以上者可加入工会’的原则,仍保留所谓‘富农工人’……”

鄂豫皖的“中农工人”、“富农工人”是从那里来的,是因为在土地革命后,“他有土地又做工”,所以他的收入多一点,生活过得好一点。我们的同志害怕工人生活过得“太好了”,就认定他已经是“中农”或者“富农”,把他赶出工会之后,好来打他。鄂豫皖的同志仅仅从这个人收入的多寡,生活的好坏,来判定他的阶级地位,而不是从这个人是否被人剥削,或剥削别人的观点上来判定。我以为这样的手工业工人,只要他的收入主要的从卖工得来,他不雇请工人(或者只是帮助的性质),是应该留在工会里面的。他对工会及劳动法是感到兴趣的。为什么在土地革命中得了一块土地,就要被清洗出工会呢?难道他不应该得这块土地吗?

但这种人的收入比较丰足，每年或者还有些剩余，有的就开始放高利贷，或者又雇请雇农来种地，对于剥削和投机事业感到了兴趣，逐渐变成了乡村中的剥削分子，这时期将他驱逐出工会是应该的。

清洗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成份出工会，这在苏区工会是绝对必需的。但这不是官僚式的决议案所能做到的，这是需要发动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彻底去改良工人生活，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各种复杂的情形，进行坚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才能够建立真正的阶级工会。从消极方面去清洗，从积极方面来发动群众斗争，是必需相互联系的。而且这是目前苏区工会的经常的工作，在苏区应提出积极的建立手工业者联合会等口号。清洗小手工业者等出工会的口号，和驱逐 AB 团、富农、老板等反革命分子出工会的口号，是不能摆在一起的。

再论苏区工会的会员 成份并驳锹同志*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日)

自从我写了一篇“苏区阶级工会的会员成份”的文章，在《红旗周报》第三十九期上发表以后，已经引起了同志们的注意和讨论，并在《红旗周报》第四十四期上看见署名“锹”同志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但锹同志在这篇文章上表现他的思想，是做了托洛茨基⁽⁴¹⁾主义俘虏和取消苏区工会的倾向，在这里非得清楚的揭发出来不可。

锹同志在他的文章上这样说：

“我们都知道工人（包括手工业工人）是无产阶级。农民和手工业者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土地，乡村经济的工具，器械等），他们中间有一部分是剥削雇佣工人的。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是居于两大斗争的阶级之间，不停的向这两大阶级中分化。他们的前途是有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另一部分则将变成大资产阶级。所以

* 本文署名仲篪，原载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第五十一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在目前革命的阶段上，富农和城市的大手工业者是站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阵线上，半无产阶级的贫农跟着失掉土地成为完全出卖劳动力的雇农苦力站在无产阶级的阵线上，中农和一般的小手工业者则动摇于两者之间。”（《红旗周报》第四十四期）

锹同志在这里说：在中国“目前革命的阶段上”，只有“资产阶级的阵线”和“无产阶级的阵线”的对立，完全没有说到（全篇都没有说到）封建残余地主阶级与帝国主义。他说：“中农和一般的小手工业者”（即城乡小手工业者），在目前的革命阶段上，就“动摇于两者之间”。他在这里认为目前的革命阶段，已经完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这难道不是完全的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吗？！

锹同志站在托洛茨基的这一思想上，就认为一般的小手工业者，“是拥护私有财产的，他不会和无产阶级一起反抗资本主义剥削的统治”（以为现在就是要消灭私有财产），小手工业者的联合会，是要成为“反革命的堡垒”，小贩的联合会是要“成为富农凭借着来反对来破坏合作社事业的一个武器”，分了土地的雇农很快的就有一部分（而且是不小的一部分），“走进了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去”，认为一切的职员“都是资本家压迫工人的工具之一，很得力很厉害的工具”，都是“工人的死对头”，反对在苏区要吸收职员加入工会等。

锹同志的这种思想，难道与党的路线有丝毫相同之点吗？党的路线是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阶段，还是在无产阶

级领导下的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的工农民主革命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中农和城乡的小手工业者(他们是不雇请工人不剥削别人的劳动者,有时还出卖自己的劳力),不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无产阶级是要吸收和领导他们积极参加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斗争的。中农、贫农及城市贫民(小手工业者和小贩在内)在目前革命阶段中还是主要的革命动力之一。党现在提出的“联合中农”的策略,“领导城市贫民的革命斗争”,“争取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到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这在党内是已经决定没有争论了的问题。敏同志不能是不知道的。为什么他要反对这一正确的路线呢?这难道不是因为他完全做了反革命托洛茨基主义的俘虏吗?

* * *

中国的革命工会是不是要组织小手工业者和小贩呢?
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大会组织问题决议案上说: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工会,必须特别注意组织与吸收半无产阶级的分子、小手工业者、不雇佣劳动者参加斗争。为了这个目的,必须利用现在的传统的行会组织、兄弟会……等,由他们中间赶走商业资本主义的分子,在德谟克拉西的基础上改组他们,并与相当的革命职工会发生关系。”

从职工国际的指示看,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革命工会,是要把小手工业者,不雇佣劳动者特别组织起来,与“相当的革命职工会发生关系”的。

同时苏联的小手工业者是组织在“手工业者联合会”里面。政府和工会帮助他们组织职业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在全俄第三次苏维埃大会中，曾决议用力发展并巩固手工工业。在一九二六年社员已达六十多万人，政府给予的物质帮助，值四百万卢布。苏联的同志不是如讷同志那样向小手工业者宣传：“这些小小的企业是要不断的向前发展……就有发展为工厂主的前途”，“将变成大资产阶级”等。而是用列宁的话来教育他们，他们要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联合工人运动，为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是受资本主义压迫的，他们的前途，是穷困与破产，只有极少数才能“发展为工厂主”。所以苏联的同志就能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的条件下，领导他们组织集体的合作经济，走上社会主义。

小手工业者和小贩在中国是非常广大的群众（在中国应以百万来计算），在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的作用。他们自己劳动，不雇请工人，不剥削别人，但是他们有自己的工具，车、船或牲畜等，他们出卖自己的生产品或作“定货”（消费者直接的定货，如农民向铁匠定锄刀等），或者以贩卖的形式，替店东商人推销商品。他们中间的大多数还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补助自己的收入。他们受着帝国主义、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商人、高利贷者的残酷压榨。他们对于国民党的统治站在坚决的反对地位，对于把持行会的老板工头和商业资本主义的分子是反对的。他们是行会里面的下层群众。他们在已往的革命斗争，完全可以证明

这一点。所以组织他们，吸收他们来参加革命斗争，不论在白区和苏区都是应该的。以下几种人，就是他们的主要群众：

一、城市和乡村的小手工业者及手艺人，主要的出卖自己所生产的产品或作定货，同时又去沿门卖工。他们不雇请工人不剥削学徒。

二、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的）的社员。他们同为劳动者，同时又是合作社作坊和生产产品的主人（但由失业工人及手工工人组织的生产合作社，开始一个时期应加入工会）。

三、城市和乡村的皮匠担子、修伞的、磨刀的、钳碗的担子等（一九二七年在汉口组织了三千皮匠担子。在上海他们坐在每个弄堂门口替人修鞋的）。

四、乡村中的铁匠、铜匠、锡匠、锅匠等。他们有自己的工具、原料和燃料等，挑着担子到农村中去做定货。他们不雇请工人。

五、江河海岸的划子舢板（一九二七年在汉口组织了七千人），不雇请工人的驳货船、帆船，城乡载人载货的马车、货车及野鸡包车等。他们有自己的车、船及牲畜等，不雇请工人。

六、在城市和乡村提篮子、挑担子，或者在马路上、墙壁下摆摊子的小贩（一九二七年汉口组织了八千人。上海不知有多少万人？）。他们大多数从高利贷者那里借来很少的资本（上海的印子钱大都放给这种人），以贩卖的形式，替

商店老板商人推销油条、大饼、瓜子、花生、香烟、水果、以及油、盐、杂货、鞋、袜、布匹等。还有卖馄饨、饺子、油炸豆腐的担子等(一九二七年在长沙组织了三千人)。在上面这些人中,铁匠是要有助手来帮助的或者是几人合伙作分账(因为一个人是不能打铁的),生产合作社有时要雇请人来烧饭扫地等。雇用这样的劳动力,是辅助的性质,他们的收入主要是自己劳动的结果,不能把他们看成剥削者。

组织这些人在革命工会的周围,在革命工会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对巡捕、警察的殴打与驱逐,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压榨,行会的束缚与压迫,以至提高他们的劳动条件等这是必要的。这种组织,不是行会(恰恰是破坏行会的。行会才反对这种组织,行会是禁止这些人“营业”与工作的自由并与官厅勾结剥削他们),不是“反革命的堡垒”和“富农的武器”,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群众的革命组织。

锹同志以为在白区可以建立这种组织,但在苏区就不需要了。因为在苏区他们已经被解放了。他们已经没有什么需要拥护,也没有什么需要反对了。“他们在时代车轮的转动之下”,横直极大部分是要破产“走进无产阶级营垒中来”的,如果他們要组织起来反对他们的贫困与破产及使他们贫困与破产的原因,那就是违反“时代车轮的转动”,就是反革命。最好苏维埃实行一种办法使他们更快的破产,以便他们更快的走进无产阶级的营垒中来“革命”,这才算是推动“时代车轮的转动”。但他们在苏区是要自动组织起来

或要求建立组织的(在革命高涨时他们是一定要求组织的,一九二七年的事实就是如此),在国民党统治下他们已经建立好了的组织,到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他们是不愿意解散的。这时候镞同志就好用机关枪来对付他们。镞同志的这种思想难道不是托洛茨基更明显的反革命思想吗(托洛茨基在一九二六年提议苏维埃剥削农民)?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来组织他们的问题。在苏区照职工国际八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是要组织手艺工人的工会。那末,除了手艺工人的工会之外,是不是还要组织小手工业者和小贩的联合会呢?那些以出卖生产品或作定货为主的手艺者及上面所列举的那些人,是不是也将他们组织到手艺工人工会里面去呢(现在已有人这样提议)?或者仅仅组织职业合作社的社员联合会呢?这是现在应该来考虑的问题。

洪湖的贫苦渔民,应组织到贫农团里去,这是完全对的。

镞同志反对在苏区要吸收职员(也可称为雇员或服务人员)加入工会。为什么呢?他说:

“职员是一个什么东西呢?上海的工人告诉我们是‘饭桶’!……职员不做工只是吃了资本家的饭专门替资本家压迫工人。……这些家伙都是资本家压迫工人的工具之一,很得力很厉害的工具。……这些‘饭桶’是工人的死对头。……”“职员不是工人阶级一路的人。”

这就是说：职员都是资本家的走狗，都是反革命。工人阶级不独不能允许职员加入工会，还应打倒职员和打倒资本家一样。但是锹同志只看见那些“饭桶”是职员，而看不见广大的受资本家剥削与压迫的职员群众；只看了那些“饭桶”是压迫工人的资本家的走狗，就得出结论说一切的职员都是资本家压迫工人的工具，是工人的死对头。但是我们所了解的职员，恰恰与锹同志所了解的相反。我们所了解的职员，恰恰不是那些工厂里的经理、厂长、工程师、管理人、监工及工头等直接管理工人的人，而是另外的广大的职员群众。这些人就是：商店的店员，一切银行、公司、行号、局处、交易所、堆栈、邮电、海关及其他政府机关与企业机关的职员。

这些职员并不是代表资本家管理工人的。有些还离开工厂作坊和轮船很远，坐在招商、怡和、太古那样的公司里服务。或者他们在上海服务，工厂还在伦敦和纽约。他们的薪水是很小的（薪水大的也就是代表资本家负某部分责任的），生活是很苦的，经常受着资本家及高级负责人员的压迫剥削和贱视。所以他们也不断的起来斗争反对资本家（如各地店员行会的罢工，“五卅”省港罢工中洋行、码头的职员，广州、汉口银行海关职员的罢工，以及从前北京政府的雇员罢工等），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这些职员是不是反革命应该打倒的呢？还是应该吸引他们加入工会，站到阶级斗争的战线上来呢？职工国际第五次大会⁽²³⁾组织问题决议案这样说：

“赤色职工会及职工反对派，在企业中的全部工作，应该是这样组织的：使得能将全厂工人职员吸收进来，用最大力量保护本企业整个工人职员的利益。”这里所说的职员，并不是指的那些厂长、经理和管理人。

从职工国际的指示看来，革命工会是应该吸收职员来加入的。最大多数的职员就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是能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反抗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是工人阶级一路的人。就是在赤色职工国际之下，有一个职员工会国际。德国有政府机关的吏员工会，欧洲许多国家有雇员工会。在中国“武汉时代”，因为银行钱庄和帝国主义的洋行捣乱，收藏现金，曾经动员店员洋务和银行职员工会，很快的就将武汉的现金集中起来。所以我们在白区内吸收一切职员（除开少数薪资特别大与资本家有密切联系的及直接管理工人的职员外）加入工会是必要的，在苏区内更是必要的。在苏区，国家机关及苏维埃企业机关，学校教员与高等学校的学生等，一切的职员，连国家工厂的厂长（不是旧时的厂长）在内，均应该可以加入工会；因为他们都是为苏维埃国家服务的劳动者（**铤**同志以为是工厂委员会雇用的是不对的）。

不允许职员加入工会，职员加入工会一般的剥夺他的选举权与被选权，笼统的一般的反对职员，这是中国职工运动中历史的错误观点之一（今天**铤**同志还认为这是一个新鲜的问题），这是应该纠正的。但是职员是有他们的缺点，容易动摇妥协，狭隘的行会观点，看不起工人等，这些缺点

我们是应该反对的，应在教育中纠正他们这些缺点，同时他们应在生产工人的领导之下。

* * *

关于“师父”的问题，锹同志犯了什么错误呢？锹同志这样说：

“第二，如木匠，泥水匠（除包工头），他们大都有学徒的，他们剥削学徒，虐待学徒，但他们的生活主要的来源是靠自己出卖劳动力。这两种师父当然不应驱逐出工会。恰恰相反，工会应该一方面做教育工作来纠正行会遗留下来的虐待与剥削学徒的恶例（这不只是恶例，而是封建的剥削制度之一种——种），一方面要加紧学徒中的工作，领导他们向老板斗争！我们在工会工作中必须注意不使学徒与师父（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活的成年工人）对立……。”

这就是说：（一）剥削学徒的师父，也要加入工会。（二）工会不要组织学徒向剥削他们的师父斗争（不要对立），应在教育工作中来“纠正”……。一种剥削关系（这种剥削，是最厉害的，师父与学徒的利益矛盾），可以不用斗争来解决，只在“教育工作”中就可以“纠正”过来。这完全是基督教式的幻想。

锹同志说：学徒与师父，应共同向雇主斗争。但是师父剥削学徒的制度如果不取消，就是雇主增加了学徒的工资，还是要加给师父的（中央苏区的实例）。这就是锹同志所想象不到的。

被雇在工厂店铺的师父，他们不剥削学徒（有些大工厂

包工下的师父也是剥削学徒的), 他们与学徒一样受工厂主店东的剥削, 对于这种师父当然应吸收他们加入工会, 应教育师父联合学徒一致向资本家斗争。就是对不剥削学徒的手艺工人的师父, 也应该如此。但是对于那些不遵守苏维埃政府与工会的法令和章程, 进行剥削学徒的师父(不管他自己是不是卖工), 是不能让他们加入工会的。他们在工会里面一定要阻碍工会解放学徒的直接任务的执行。若是工会的领导机关被剥削学徒的师父所占驻, 这个工会固然不会来教育师父纠正“剥削学徒的恶例”, 也不会来“惩戒”那些“顽固的师父”, 更不会组织学徒的斗争来消灭这种剥削。

* * *

锹同志批评鄂豫皖苏区的“中农工人, 富农工人”, 及每年“凡做一百八十工以上的都能加入工会”的规定, 他仅仅在一个“做”字上来作文章, 而且大大的误解了鄂豫皖工会的这一个“做”字。鄂豫皖的这个“做”字的原意, 是替雇主做, 不是替自己做。这在报告的文意上可以看出来, 在另外的文件上(去年来的雇农工会的决议)已经明白的说出来了。锹同志因为他误解这个“做”字是替自己做, 所以他完全说到另外的问题, 而把实际的错误放过了。至于每年出卖自己一百八十天的劳力给别人的人, 是否可加入工会呢? 可以! 因为这是全年的大部分时间出卖劳力。但把它作为加入工会唯一的条件, 是不好的。毛病是在把失业工人及分了土地的雇农苦力, 与许多每年卖不了一百八十工的短

工，季候工苦力，和因疾病等原因而卖不了一百八十工的工人等，屏之于工会之外了。这我在前一篇文章上已经写的明白。谝同志为什么要咬文嚼字呢？

谝同志说：“把中农富农与工人联成一个名词当然是非常之错”，是，错的！但错误不只在这个名词的形式上。事实上中国工人阶级里面有许多人（可以说有一部分）是一方面在城市和乡村中卖工，另一方面在乡村中又有一块土地，或者兼营买卖与其他的副业。但这块土地的大小是不一样的，极大多数是因为他经营这小块土地不够吃，所以跑出来卖工，把这小块土地租给别人种，或者雇人来种，或者在工余的时候自己兼种。还有的就因为卖工不够吃，再去租来一块土地兼种。但是也有些工人（自然是极少数）自己在工厂、铁路、轮船上作工，而他在乡下有一块很大的土地。他在工厂里是工人，在乡下则是小地主、富农，或店铺的股东等。他们的阶级地位是混合的。在苏区土地革命之后，雇农、苦力及手工艺工人都分得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多数是自己种，还有的就以种种原因，不得不出租这块土地，或雇人来种，而自己仍然去卖工。那末，对于这些人加入工会的问题，在白区和苏区怎样办？这就是鄂豫皖工会所提出来问我们的实际问题。所谓“中农工人富农工人”及中央区的“半农半工”者，和湘赣边的“半做工”者等，都是从这种事实反映中产生出来的名词。在鄂豫皖的报告上说：

“在鄂豫皖的手工业工人，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与农村经济密切联系着，在这种带存农民性的手工业工人，他

一方面在农村中有土地，一方面在农闲的时候又去做（是替别人做的意思）手艺，他有土地又做工，所以他的家庭经济地位多属中农，而且有的是富农者，这种带有农民性的手工业工人，是否可以加入工会为会员？……。”

这就是对“中农工人富农工人”的解说。

鄂豫皖的同志在报告中已将问题提得很明显。但敏同志不来答解这样的实际问题，完全站在名词上来批评，说鄂豫皖的错误，是由于这个错误的名词产生的。这完全是陷入了形式。而且敏同志根据这种形式的观察，就向鄂豫皖工会提议，将所有“中农工人富农工人”（百分之九十的手工业工人）赶出去。

凡是自己有一小块土地，因为经营这块土地不够吃，而逼得他全年或以全年的大部分时间出来卖工的人，不管他把这块土地出租或者雇人种及自己兼种，或是租来的土地自种，都是可以加入工会的。在苏区土地革命之后，雇农、苦力及手工艺工人等分得了土地，但以各种原因自己无法耕种这块土地，不得不将土地出租，而自己仍然全年或全年的大部分时间去出卖劳动力者（甚至他还跑到城市里去），也是可以加入工会的。有人主张这种人是不能加入工会的。为的是“工会要领导农民来抗租时，他将因为有一小块土地出租要减少他的收入，他将反对”。在没收土地的时候，也应该将他这一小块土地没收，另外分给他坏的土地，还要以他自己回来耕种这块土地为条件。苏维埃政府也应剥夺他的公民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我认为这种主张是非

常有害的。他把城市和乡村有一小块土地的无产阶级分子（他们的数量是不很小的），完全当作富农看待。逼得他们来反对土地革命。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尤其在苏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与农村经济密切联系着），如果只允许工人阶级中与土地完全断绝了关系的分子加入工会，认为与土地还有某些关系的工人是反革命，这是非常错误的。

在苏区手艺人分得土地之后，因为他不能耕种这块土地，或者因为他自己的劳动力比较一般雇农的劳动要高贵些（因为他有手艺），所以他自己还是以全年或大部分时间出卖手艺，而将这块土地出租或者雇人来帮助他种（这对于他的收入，是有利得多）。工会是不是应驱逐这种手艺人出工会呢？我想是不能。他这样雇用雇农，是辅助的性质。同时他自己又是卖苦力的工人。至于手艺工人在农忙时他自己种地（因为分得了土地），在农闲时去卖手艺而且一年又要卖一百八十工以上，他不雇请工人又不剥削学徒，这种手艺工人在土地革命之后当然不应清洗出工会。但是当他长期专门经营土地，完全不卖工，或者他间或还去卖工，在农村经济中，已经变成了富农的地位，去剥削别人，如增加耕地、放高利贷，或招收学徒、开办作坊，或进行其他的投机事业等，这就应该清洗他出工会。

在白区城市工厂铁路上的工人，他的家庭在乡下是小地主或富农，他为着工资工时劳动条件等，要求加入工会来共同反对资本家，工会是否应拒绝他加入呢？我想是不可以。但在土地革命中，他的土地是要被没收的，他是可能反

革命的，那我们就应该用对待反动地主的办法来打碎他的反抗。

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等及其家属，在土地革命之后，他们是不得不去作苦力雇工及租别人的土地种。但工会是完全不能让他们加入。虽然他现在作苦力雇工。

* * *

雇农苦力等在分得土地之后应吸收加入工会。但是锹同志在这里这样说：

他们（分了土地的雇农苦力）“有一部分要逐渐失掉了他们的土地成为纯粹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甚至有一部分也成为剥削他人剩余劳动的剥削者。因之雇农工会的会员成份跟着这个农村阶级的分化吸收进许多新的雇农，也有一部分原来的雇农因着阶级地位的变动（去剥削人）而被清洗出去”。但“这是不能够单纯的以时间来解答的问题”。“土地革命的胜利以后，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将有一个飞速的进行；试想两三年的时间，这批老雇农中间的一部分，也一变而为剥削别人劳动力的剥削者……蜕化成富农，走进了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去……仲篾同志见了怕也要吓一跳哩！”

这里是说：①分了土地的雇农苦力，要等他们失掉了土地，“成为纯粹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的时候，雇农工会才“跟着”把这“许多新的雇农”吸收进来。雇农苦力分得的土地如果还没失掉，他们自己要耕种的话，工会是不吸收他们进来的。②完全取消①项，“原来的雇农因着阶级地位的变

动”，还只是贫农中农，不到富农“去剥削人”时，工会就不要清洗出去。③这是不能以时间来答复的问题。雇农苦力从分了土地的第二天起，他的土地没有失掉，就已经不是雇农苦力了；或者他专门经营土地到十年九年，只还没有“去剥削人”时，他也不应从工会中“被清洗出去”。④两三年的时间，那已经是了不得的长久，苏区的老雇农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小的一部分），早已飞快的一变而为剥削者了，“走进了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去”。现在我们的中央区、鄂豫皖区、湘鄂西区土地革命之后已经过了两三年，那里还没有失掉土地的原来的雇农已经变成了吓死人的东西。这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谎，玩什么花样？

我们认为雇农是农村中革命的先锋队，雇农在分得土地之后，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不独没有因为得了这块土地而减弱雇农的革命性，丧失了雇农原来的阶级地位，而且要把雇农的革命积极性提到最高限度。我们不独不欢迎雇农分得的土地很快的就失掉，而且要帮助他保住这块土地（保住这块土地就要保护苏维埃），要经过苏维埃实行种种办法（如帮助他的耕具、种子、牲畜，免除捐税，组织耕具的合作社等），使雇农能够耕种这块土地。我们要使雇农得到最好的土地，在他无法耕种时，还能出租出卖（对富农是不允许的）。我们完全不害怕雇农会因为苏维埃这样帮助他，他将变成富农，反过来反对苏维埃，而稍稍松懈一点组织帮助和教育雇农的工作。我们在教育工作中必须向雇农指出，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你们的贫困是不能避免的，变成富农去

剥削别人是没有希望的（而且不应该希望），只有实行土地国有及乡村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才能根本消灭雇农的贫困。我们必须这样做，使雇农在事实上了解苏维埃政权是他们自己的政权，用他们所有的忠诚和勇敢来拥护苏维埃。可是这样把我们的锹同志吓坏了。他认为在苏区雇农发展的前途，是“变成剥削者、富农，走进了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去”，是变成苏维埃的死对头（？）。苏维埃帮助雇农的结果，是把雇农送到剥削者、富农、反革命的营垒中去（？）。照这样，那最好使雇农分得的这块土地，很快的就失掉（也就是送还给地主），苏维埃最好不要帮助雇农耕种这块土地，对雇农加一种压迫使这块土地更快的失掉，这样就使分了土地的雇农更多的“成为纯粹”的无产阶级，以便雇农工会来“吸收进许多新的会员”，更少的跑进“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去”，免得吓坏人。这是对于雇农——农村革命先锋队的诬蔑和侮辱。在立三时代〔27〕，怕乡村没有无产阶级，所以不分土地给雇农。锹同志更进一步：认为分了土地给雇农，雇农要“走进了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去”。

土地革命是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土地革命后农村的阶级分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要加速的进行。但是这种发展是要使广大的农村劳动群众受到痛苦、贫困和破产，是要使资本主义的矛盾（包括资本主义制度与小私有者利益之间的矛盾在内）极度的紧张起来。在这种基础上，无产阶级与苏维埃就要拥护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就要来组织、吸引、领导和教育他们，使他们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

取得他们的拥护和赞成，来实行限制富农发展（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准备革命的转变。但是锹同志在说到“农村阶级分化”时，估计到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广大的农村劳动群众（雇农、贫农、中农、小手工艺者、小贩等），并不是受到痛苦的，他们都是在热烈的拥护资本主义的发展，不管中农、贫农、小手工艺者和小贩，就是雇农的一部分也要“发展成为富农”，无产阶级与苏维埃是不能组织、吸引、领导和教育他们来反对富农的发展的。所以他就提议：把雇农的一部分赶出工会，小贩的联合会解散，小手工艺者的联合会取消，任凭这些“过渡阶级”“在时代车轮的转动之下”去自然的分化。这在客观上锹同志不是拥护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什么？

我们不否认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分得土地后的雇农，也许有千分之几变成富农，但这是特殊的。然而锹同志是把雇农变富农，雇农变反革命，当作苏维埃政权下农村发展的必然的历史前途呵！

苏区有些同志（锹同志也一样）惧怕雇农苦力农村工人在土地革命后变成富农和反革命，比惧怕在土地革命中失掉了一切的地主残余，还要利害。他们严格的防范了土地革命前的雇农苦力农村工人，用种种条件限制他们加入工会；但没有防范原来的地主豪绅及其家属——他们在土地革命后不得不去作雇农苦力或租别人的土地种，而在各方面让他们混入了工会，或者把他们当作“新雇农”吸收入工会。甚至使他们把持了工会领导机关。这是危害革命的观点。

分了土地的雇农苦力，应吸收他们加入工会。但有少数的在很长的时期内完全不卖工，确定的变成了农民，他可以退出工会。观察一个人的阶级地位是否已经变动，离开时间是不能答解的。应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考察他们。一般的限制雇农苦力在分得土地后的一定时间内，不再作雇农苦力，就一律清洗出工会的机械规定，是不对的。现在我们苏区的“老雇农”，没有“走进了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去”，还应大胆的吸收入工会，保留他们在工会里面。“苏区雇农工会在雇农群众的积极参加下，还要制定关于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纲领”（国际雇农委员会决议）。

* * *

总而言之，**饿**同志在这篇文章上从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以至具体的策略，都犯了系统的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他认为现在中国社会里面只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完全忽视了农民与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他估计中农小手工业者及城乡贫民在目前革命阶段中已经不是革命的动力了，而是“动摇于两者之间”或反革命了。他忽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似乎除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外什么也没有了。

他对于革命转变问题也是一种托洛茨基主义的了解。而且他对于中国革命是悲观失望的（雇农要变成富农，农民小手工业者要反革命，怎么办呢），对于苏区工会是取消的（雇农要变成富农，一切职员是资本家的走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与农村经济密切联系着的苏区工人——即所谓“中农

工人富农工人”——一概赶出工会，工会不取消作什么呢)。

目前的革命阶段，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革命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农民小手工业者及城乡贫民还是革命的主要动力之一。无产阶级是要组织吸引和领导他们来积极参加革命斗争。一般的职员是工人阶级里面的一部分，一个阶层，除开极少数的管理人外，应吸收加入工会。剥削学徒的师父是不能加入工会的，工会是要组织学徒和剥削他们的师父斗争的。“每年出卖一百八十工”的人是可以加入工会的，但这不能作为加入工会的唯一条件。有一小块土地的工人、雇农苦力，只要他常年为工钱而劳动，工钱是他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是要吸收他们加入工会的。分了土地以后的雇农，没有“走进了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去”，土地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减低组织雇农工会的重要性。土地革命后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无产阶级与苏维埃就要在广大的半无产阶级群众的积极拥护下，实行限制富农发展的政策，宣传土地国有，准备革命转变的一切条件。但这一路线与锹同志所主张的，是没有丝毫相同之点。

锹同志的文章发表后是有影响的。某同志在起草苏区工会组织纲领时，就采取了他许多观点。所以非清楚的将这些错误揭发不可。当然在我前一篇文章上，是有缺点的。因为我不是要说明小手工业者和小贩的问题，所以说的非常含糊，对于职员问题也没有说清楚。组织卖肉的屠夫当然是错的。在这些地方，当然容易引起同志的误会。这是我检查那篇文章之后的自我批评。

停止“强迫介绍”与 救济失业工人*

(一九三三年六月)

“五一”代表大会决议停止强迫介绍。有一些工友对于这一决议，还表示怀疑与反对，尤其是失业、半失业或将要失业的工友。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实在还有解释清楚的必要。

第一，“强迫介绍”这回事是怎样发生的？在劳动法上只说：雇主请工人要由劳动介绍所介绍，工人要寻找工作，要到介绍所去登记。在法律上并没有规定，雇主不要请工人的时候，也可以派工人去强迫雇主雇用。强迫介绍既没有法律上的根据，中央政府与全总执行局也没有实行强迫介绍的命令和决议，但是许多地方的下级劳动部与工会却不约而同的实行了强迫介绍，为什么？原因在哪里？很明显的，这是因为许多地方的工人失业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

* 本文原载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主办的《苏区工人》第三期，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政府与工会没有很好的来救济失业工人，失业工人看见了资本家赚钱，看见了苏维埃政权下面每个人都有饭吃，独只有他们饿肚子，他们自然要向劳动部、向工会急迫的要求工作，要求饭吃，下级的劳动部与工会对于失业工人这些“急如星火”的要求，没有办法解决，上级机关又没有指示下去，自然他们就走到用强迫的办法，硬要雇主来雇用这些失业工人了。但是这个例子一开，失业工人来得更多，他们便没有法子把强迫介绍停止下去，即令他们懂得这个办法是不好的。

第二，“强迫介绍”是不是能够解决工人的失业问题？用强迫介绍来解决工人的失业问题，这本是“挖肉医疮”的办法。几个工人失业了，强迫介绍他们到能够维持的工厂店铺去作工；如是使这个工厂或店铺也变成不能维持，而不得不倒闭下去。这样，工人的失业就更多了，再又强迫介绍到其他的工厂店铺去，再又使其他的工厂店铺不能维持而倒闭，辗转这样作下去，不独不能把工人的失业问题解决，而且会使失业工人愈来愈多，愈难解决。然而在经济上想实行怠工来反对苏维埃的资本家，就正合他的口味，他正想关门停业，只是没有借口，不敢关门。强迫介绍来了，他就正好借口强迫介绍来关门停业。不想怠工停业的资本家，看了强迫介绍，看了许多工厂店铺关门，也想关门停业了。所以强迫介绍不独不能解决失业问题，而且可以使失业更增加，给怠工的资本家以关门停业的借口。正是这个原因，所以“五一”大会决议停止强迫介绍，中央劳动部下令停止强迫介

绍。

第三，“强迫介绍”停止了，失业工人怎么办？为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为着失业、半失业的工人的利益，强迫介绍应该停止吗？根据上面的分析是应该停止的，这是每一个工人都懂得的道理。但是为什么还有一部分工人反对停止强迫介绍呢？对停止强迫介绍怀疑呢？且听汀州失业工人的话：“我现在失业了，停止强迫介绍我就无工作要饿肚子，政府与工会还是要我们饿肚子呢？还是要资本家饿肚子呢？”从这些话中，可以知道，工人并不是原则上反对停止强迫介绍，而是停止强迫介绍后，失业工人饿饭的问题，怀疑到政府与工会是“可怜资本家还是可怜失业工人”的问题。“停止强迫介绍，失业工人怎么办？”许多工人这样说。所以一部分工人反对停止强迫介绍，没有其他的道理，只是失业工人饿饭没办法的道理，这也就是最大的道理。所以停止强迫介绍，必须救济失业工人，解决失业工人饿饭的问题。失业工人饿饭的问题相当解决了，工会与政府用各种方法去解决失业问题，工人就不会反对停止强迫介绍。相反的，工会与政府不注意来解决工人的失业问题，失业工人还是饿饭，那强迫介绍就是很困难停止的，工人不会改变他们反对与怀疑的态度的。这里又一次证明，不肃清忽视失业工人切身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便不能纠正“左”的强迫介绍的错误。

第四，如何来救济失业工人？停止强迫介绍，必须同时很好的来救济失业工人，必须在每个人面前证明，工会与苏

维埃政府对于每个饿饭的失业工人是负责的。工会与苏维埃不会“可怜资本家”，当着失业工人饿饭的时候，工会与苏维埃是从资本家剥削者那里抽出钱来，给失业工人以救济，在乡村中强迫富农与剥削者，把粮食借给饿饭的雇农。这时候，工人对于苏维埃的认识，与参加革命斗争的积极性，可以提到更高的程度。根据我们巡视员的报告，因为汀州实行了对于失业工人的救济，工人不独放弃了反对停止强迫介绍的态度，而且一般工人很满意，当场就有五人自动报名当红军，并将加入工会的十多个老板、工头检查出来了。合作社也开办起来了。在瑞金城市的成绩是很好的，工人说：“照这样，扩大红军就容易了。”而且救济失业工人的基金，并不是无法筹措的，在瑞金已向老板抽了七百多元，汀州也有五百多元。这是中央劳动部训令下去一个星期后的成绩。对于失业工人，不只是这一次的紧急救济，而且要经常想办法来救济。对于从工厂、作坊、店铺被排挤出来的失业工人，应该每月能从保险机关领到救济，能够领到几个月（社会保险章程，中央劳动部即刻颁布）。对于苦力运输工人的半失业者，必须有临时的补助津贴，对于沿门卖工的半失业者，也应设法补助。乡村中的失业工人，必须在查田运动中来解决他们的粮食困难，同时工会应组织失业工人从所得的津贴中，划出资本来组织合作社等，为工人找工作。劳动介绍所也必须建立起来。严格的禁止资本家私请工人，将资本家违反劳动法私请工人的罚款，拿来救济失业工人。这些对于失业工人的救济工作，必须充分发挥工人的积极

性,动员失业工人参加革命战争、参加工人师以及参加政府的一切工作,这是每一次对失业工人的救济工作中,所必须联系起来作的。

在两条战线斗争中 来改订合同*

(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

现在正是各地工会改订集体合同的时候。我们现在是要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来改订合同。我们要纠正工人中某些过高的要求、狭隘的习惯和行会的偏见，同时我们要反对牺牲工人阶级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最大限度地来保护和增进工人群众的利益。我们的目的，是要在改订合同的运动中，更广大的发挥工人群众的积极性，提高工人群众的觉悟程度，来参加苏维埃国家与红军的建设，巩固与扩大苏维埃政权。

两次代表大会〔42〕的经济斗争决议和纲领是正确的，修改的劳动法一般的说也是正确的。但是，必须指出，这些纲领和新的劳动法，同样是不能机械的执行。规定许多“例外”以及许多带有伸缩性的条件，是这次修改劳动法和制定农业工人要求纲领的主要精神之一。当着我们在合同上实

* 本文原载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主办的《苏区工人》第二期，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出版。

现劳动法与要求纲领的某些条文时，如果我们不能坚决站在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立场上，分别许多企业各种不同的具体环境，那我们仍旧是要犯或“左”或右的错误。因为我们只有根据企业中工人的具体环境，我们才能确定这种伸缩性的程度。

我们听见同志说：零都的职工会预备在三天内根据新劳动法，将所有的合同订好。同志们！订立合同，我们要迅速的进行，这是对的。但是这次订立合同，是要执行一个“转变”，有新旧劳动法的根据不同，有过去的许多错误需要纠正。在这里要进行许多说服的工作，要细心考察每个工人的要求与企业担负要求的能力，同时还不可免的要经过许多交涉、谈判以至罢工等等方式的斗争。当然这些工作，不是在三天内一律都能作好的。机械的规定在三天内将所有合同订好，这除开照抄新的劳动法与武力对付不答应条件的资本家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准备、考虑与说服，以及发动群众的斗争等等，在这里都没有了。

过去照抄旧的劳动法，现在是照抄新的劳动法。虽然劳动法有新旧的不同，但一样可以是错的。应该知道，新的劳动法也是为了在工业中实行的，在农业及小手工业中，许多还是属于“例外”的。机械的执行，可以同样是错误的。其次新劳动法的许多条件，是比旧劳动法要低的，如开除工人、参加红军的津贴等等。这些条件，在改订的合同上是要减低的，但是，当着工人还不明白减低这些条件的意义时，我们是不能用命令去机械的减低的。我们要说服工人，使工

人了解为什么要减低这些条件，不是为着可怜资本家，而是为着巩固工农联合与苏维埃政权，为着工人阶级全体的长远的利益；使工人自愿的减低这些条件，而更加提高工人的积极性，提高工人的觉悟程度，更坚决的来参加战争，参加苏维埃的建设。

在某些个别的情形下，对于工人某些过高的要求，如果经过了我們许多说服的工作，还是不能取得群众的赞成，群众还是坚持了他们的要求，那我们就应该考虑暂时执行这些要求的影响。如果不是直接妨害红军的行动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对群众某些过高要求的暂时容许与让步，以便我們有更多的时间，用更多的力量去说服工人，这还是必要的。去年二月间，汀州的理发工人要“集中营业”，当时全总执行局是坚决反对这种办法，指出这种办法将来于工人是不利的。汀州理发工人反对全总执行局的指示，甚至对执行局的代表表示不满，认为执行局不是拥护他们的利益。但是执行局一方面继续向工人解释不同意他们的“集中”，另一方面在事实上还是容许了他们的“集中营业”，没有强迫他们立即分开。现在事实上证明执行局的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汀州的理发工人在“集中营业”失败之后，他们感觉到执行局先前的说话句句是对的，他们悔不该没有听执行局的指示，他们的积极性以及对执行局的信仰都提高了。因为他们在实际经验中了解自己的错误。这个事实的经验，是值得工会许多领导者来学习的。

提出使企业非倒闭不可的要求，蛮不讲理的要雇主雇

用工会强迫介绍去的工人，企图用强迫介绍来解决工人的失业，过早的消灭私人资本，以及在订立合同时没有必要的逮捕资本家等，这些“左”的错误，是必须纠正的。因为这些错误的继续发展，要直接影响到工农联合、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工人的部分失业。但是纠正这些“左”的错误，我们绝不能跑到右的“劳资妥协”的泥坑中去。虽然我们在某些个别的特殊的条件之下，也容许对资本家的“妥协”。但是，我们在改订合同的运动中，由于工人的自愿来停止强迫介绍，减低某些企业无能力担负的要求，绝不是我们要和资本家妥协，牺牲工人的利益。相反，我们是要从各方面来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从各方面来与资本家作斗争，对付资本家的阴谋。而这些“左”的错误，恰恰给了许多资本家阴谋怠工停业的口实。

苏区的许多资本家用各种方法，如用分红、合股，以及其他很小的利益来引诱工人，欺骗工人去和资本家“妥协”。条件是要工人不加入工会，不参加斗争，和资本家共同瞒税等。少数落后的工人、店员，现在还是在资本家这种欺骗影响之下。现在因为劳动法的修改与“左”倾错误的纠正，资本家和反革命分子企图利用这点来活动，企图向工人反攻，企图使工人离开苏维埃与工会。他们说：工会与苏维埃不拥护工人的利益了，现在是要实行劳资妥协了，工人不好的，可以无条件开除了，工作可以从早作到晚，没有什么八小时了等等（瑞金、会昌都发生这样的事实）。这种事实是值得我们严重的注意。对于进行这些活动的资本家与反革

命分子，应该给以严重的打击。工会在改订合同中应该从各方面尽可能的来实现工人的利益，实际的救济失业工人，立即建立劳动介绍所与社会保险局，号召群众起来对付那些顽固的阴谋破坏的资本家，在不断的斗争中进行充分的教育工作，证明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利益之不可调和，争取那些在资本家影响下面的还不觉悟的工人。这才能使我们在改订合同、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更加提高群众的积极性，来参加工人师等等。如果我们工会在这里略为放松保护工人切身利益的工作，劝工人向资本家妥协，可怜一下资本家，或者机械的用强迫的方法去降低工人的要求，这无疑的要降低工人的革命情绪，助长资本家的影响和火焰。这在武汉时代的痛苦的经验，是应该记住的。

实现工人的要求，在苏区采用总同盟罢工的方式，是错误的。在苏区内工人有更多的方法来对付资本家，达到自己的要求，但是罢工的武器，在苏区内还是不能放弃的。“对于苏区内的富农田庄，应该广泛的适用罢工”（国际雇农委员会决议）。就是对于那些顽固的进行阴谋活动的资本家，罢工也应该广泛的适用。但是（一）罢工必须是群众的行动，工会机关命令与强迫群众罢工是不对的；（二）对于中农及雇用辅助劳动的小雇主，只有在最后才采用罢工的方法。

会昌的工会在订立合同中，也是执行了某些强迫办法的，以至有几个工人直接向执行局来控告。兴国县工会在决议案上说：“一切要求，都要根据雇主的营业情形来提出”，自然，在这里以为工人的真实需要与社会生活程度的

提高，都不能作为工人提出要求的根据了，但这些恰恰是提出要求的第一个“根据”。还有许多负责同志以为工会现在是要反对“左”倾的错误，对于保护工人经济利益的工作，就似乎不得不放松些，这种观点是最坏最错误的观点。店员、手艺人、工人代表大会会昌的代表说得好：不明白的讲蛮道理的工人总是少数，服从真理的工人总是多数。工会有了正确的领导，蛮干的人就没办法。工会不管事，忽视工人利益，有些人就不讲道理，蛮干起来。会昌的代表在这里说出了，过“左”的错误是由于工会忽视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作而发生。所以纠正这些“左”的错误，不独不能减轻对这些工作的注意，而且工会必须加倍的来注意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作。必须研究集体合同上的每一个条文，研究劳动法，研究每个订立合同运动中的经验，并将这些经验在报上发表，工会委员会必须来讨论这个或那个合同、这个或那个斗争所应采取的方法。工会还必须向苏维埃提议许多办法，来救济失业工人，建立劳动介绍所，设立社会保险局，以及如何使工人购买到便宜的粮食及其他必需品。虽然工人师的动员工作十分紧张，但是这些工作是不能忽视的。只有使这些工作与工人师的动员工作联系起来，配合起来，才能在政治上收到更大的成绩。

农业工会十二县 查田大会^[43]总结*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

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前面，在中央苏区查田运动^[44]得到了初步的伟大胜利的前面，农业工会十二县的查田大会举行了。农业工人是土地革命的先锋队，无疑的，这次大会对于十二县查田运动更大更正确的开展，彻底肃清封建势力与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是有极大的推动。对于巩固苏维埃政权，更广大的动员群众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是有极重大的意义。

在查田运动大规模开始的阶段，各级工会组织对于这一残酷的阶级斗争，是没有抓紧去领导的，没有将农村工人在土地斗争中先锋的积极作用，最大限度的组织起来。许多地方的工会，只是形式的派了一个代表去参加查田委员会，没有在一切乡村中去动员工人雇农来调查阶级、团结贫农、通过阶级以及没收分配等。许多地方的工会与苏维埃没

* 本文原载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第三十四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版。

有能够取得一致——一方面工会没有动员会员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所领导的查田运动，另一方面许多苏维埃的工作人员，没有经过工会来发挥与组织工人群众的积极性，使他们成为查田运动的先锋。一切调查阶级、通过阶级以及没收分配等，完全没有经过工会，以至有个别区、乡，发生了工人对于苏维埃在查田运动中的不满。这些现象，在大会上开展了自我批评，指出了参加和领导查田运动是乡村中工会组织目前的中心工作，各级工会组织尤其是乡村中的工会支部，必须召集各种会议，采用一切方法，来动员工人、雇农。同时与苏维埃取得密切的联系，向地主、富农进攻，一个不留的完全清查出来。因此大会更具体的决定了，各县苏维埃的查田工作团，工会必须派二三个代表去参加，一切阶级成份调查表，必须经过工会支部书记及贫农团主任负责的审慎的检查后签字盖章证明。各县工会必须经常检查各区乡工会在查田运动中的工作，并给下面以具体的领导。在大会上对于到会的五百七十多个工会支部书记，是很大的鼓动和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

查田是查阶级，因此怎样分析阶级？是查田运动中最须彻底弄清楚的问题，大会是花了最多的时间最充分的讨论了这个问题，同时也是代表们最感兴趣发言最多的问题。结果，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是懂得如何分析阶级了。他们不只是一般的懂得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这一文件，而且他们提出了许多意见补充与修改了中央政府这个文件。如果大会教会了五六百个雇农积极分子分

析阶级，那末，将更有保证的使查田运动更正确的开展起来。因为在查田运动中发生错误最多的，就是分析阶级的错误（如将中农当作富农侵犯他们的利益，将富农当作地主消灭等）。

大会清楚的解释了过去分析阶级的错误方法，——有三种剥削（即所谓土地剥削，劳动剥削，经济剥削）的叫地主，有两种剥削的叫富农等……。使每一个代表都懂得，在分析阶级的时候，注意到剥削分量与时间。如果自己不劳动，专门靠剥削别人过活的，即是一种土地剥削也叫地主。如果大部分靠自己劳动过活，剥削别人的分量很少，即是所谓三种剥削都有，也是富农甚至有时可以是中农。

大会发觉了过去在查田中侵犯中农利益与消灭富农的错误，是严重的。差不多每个代表都带来几张写好了的阶级例子要求大会分析，而这些例子大多数，是把中农当作富农，把富农当作地主打了的，他们怀疑，所以他们带到大会来分析。

从这些例子中看到，有些是把仅仅放几百毫子债，请过年把长工，或收几担租谷，而极大部分是靠自己劳动过活的中农，当富农打了。有些甚至完全没有剥削别人，仅仅是多有几担田山，生活比较丰裕的中农，也当富农打了。这次中央政府提出剥削分量超过全家总收入百分之十五或百分之三十者为富农的标准，是得了大会一致的拥护。

从这例子中，还发现了有些地方把手工业主、商人、“流氓”，当地主富农打了。例如博生湛田区新全乡李年四，无田

屋，自织夏布，请了一二个工人帮织，革命后分了田，现在被打成地主全家没收。又瑞金下肖区胡令群，无田，做瓦钵为生，请了四五个工人，革命后分了田，现在被打成地主全家没收。西江县洛口区刘既福，无田屋，靠赌为生，放债五百毛，被打成“流氓兼地主”。这类的例子还很多。

还有不少的例子，把稍微放点债，收点租，而大部分靠出卖劳动力为一家生活来源的工人当地主打了。许多同志分析阶级的时候，把出卖劳动力，或帮人家作手艺不算作“劳动”。例如博生城王盛耀，在茶馆作工十余年，因为放了点债，家中收藏了一千多毛现金，被打成了高利贷者。又博生流南区陈视全，帮人作纸十八年，因为收了八担租谷，当作地主全家没收了。还有，把作了二三十年长工或手艺的工人雇农，因为放了几百毫子债，收了几担租谷，当作地主或高利贷者没收了。

过去我们仅仅告诉人家分析什么叫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因此，许多下面的同志遇着了乡村中的手工业主、自由职业者、宗教职业家、小贩、游民无产者及商人、绅士等，就不好叫他们作什么。如是也把他们叫作地主富农或者中农贫农，以至弄出了许多错误，因为在同志们的脑筋中是没有更多的东西来叫他，但是在这次大会上，告诉了许多同志来正确认识贫民、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宗教职业家及游民无产者等，以及对付这些社会成份的正确策略。

正确的分析阶级，无疑的这次大会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在查田运动中执行明确的阶级路线，这次大会也是有很大进步的。到会的代表差不多个个都懂得地主为什么要彻底消灭？消灭富农的倾向为什么在目前阶段上是错的？侵犯中农的利益为什么不能允许？以及用什么策略对付资本家、手工业主、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及游民无产者等。

动员群众继续开展查田运动，是大会的第一个任务，但是大会同样注意到了如何在中央政府新的决定之下来纠正过去查田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工会应用一切办法协助政府来重新审查以前所通过的阶级成份，工会支部书记与贫农团主任并须负责签字证明阶级成份调查表上所列各项的实在。同时工会要进行许多群众工作，在自己的会员大会上，在贫农团会议上，来解释中央政府对于阶级的新的决定，对于那些弄错了阶级的中农、贫农、工人，尤其要向他们解释清楚，鼓励他们来拥护中央政府，并按照正确的手续变更他们的阶级成份，但在这里要严格的防止真正的地主富农利用我们过去的错误来反攻。

有些地方进行查田运动，因为恐怕本村子的人对地主富农有包庇，如是实行了村与村交换查阶级的办法，即这个村子去查那个村子的阶级，那个村子来查这个村子的阶级。大会详细解释了这种办法的不正确，会引起地方与氏族的斗争，主要的首先要发动本村的群众来清查与反对本村的地主富农。

大会同样着重的讨论了工会支部工作与贫农团工作。很明显的，在查田运动中，贫农团是起着最主要的作用。而

贫农团又必须在工会支部的亲密领导下，才能正确的发挥他最大的作用。大会批评了过去工会组织不注意贫农团工作的错误，并决定了全体会员加入贫农团，吸引全乡的贫农加入贫农团。工会支部委员会必需有一个委员专门参加贫农团的工作，支部中并须分派十多个积极的会员来担负贫农团的各种工作。而贫农团每次大会之前，支部委员会必需预先开会讨论，吸引贫农的积极分子参加，准备具体意见到大会提出，取得大多数贫农的赞成通过。但在贫农团里面必须执行充分的民主，工会不应该去命令贫农团。

大会还讨论了扩大红军与经济建设的工作。在军事委员会的代表报告之后，即有博生十多个代表报名当红军。并决定动员四十岁以下的会员全体加入赤少队。动员每个会员都去担负扩大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在经济战线上特别着重的讨论了冬耕运动与发展手工业生产的计划。在各乡完全执行中央政府冬耕运动大纲，发展合作社，并每乡为中央国民经济部至少找一个店员或会写算的工人农民。

大会顺利的成功了。两次大会都经过了五天的时间，每个代表都热烈发表意见，倾听一切的报告与发言。精神特别好。大会之后，各级工会必须经常去检查与督促大会一切决议的执行，组织与发挥所有农村工人的积极性，使他们成为查田运动中的先锋，使查田运动迅速的得到彻底的胜利。

与忽视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倾向作斗争*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日)

工会是在工人群众共同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工会应经常为保护工人日常的经济利益而斗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组织所有的工钱劳动者进工会来,活跃工会的组织,教育工人,并提高工人的觉悟与积极性,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所以职工国际屡次在决议案上指示我们,苏区的职工会决不能把保护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工作,看为次要的或附属的任务。工会要利用工人群众为自己直接经济利益的斗争,引导工人群众来参加苏维埃和红军的建设,造成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与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联系。但是职工国际的这些指示,许多工会干部还没有能够彻底了解,忽视保护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倾向,在我们工会的组织中还是严重的存在着。

虽然,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央苏区的工会在保护工人利

* 本文原载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主办的《苏区工人》第四期,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益上是作了一些工作(如订立合同,开办一些合作社以及征收土地税等),但是这些工作还没有成为工会一切组织的经常工作。许多工会的委员会,并没有深入的细心的去了解自己组织内一切工人的生活状况,他们有些什么不安的问题?有些什么可能来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许多工会的委员会对于这些事情是茫然不知的。他们在很长的时期内没有讨论过工人切身的问题。工会社会经济部(这是工会最重要的一个部)的工作没有建立起来,甚至还没有人来负责这个部的工作。因此,他们对于上级委员会的报告,也就常常没有关于这类问题的材料。

倘若我们向许多工会工作的同志发问:哪些工作是工会重要的工作?同志们都可回答:“扩大红军、查田、经济建设等是工会的重要工作。”但是很少有同志回答,保护工人日常经济利益是工会重要工作的。许多同志对保护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意义和重要性是估计得不足的。所以他们没有亲密的去接触和了解工人生活的各方面,没有严重提出工人不安的问题,并想尽一切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甚至工人已经向工会严重的提出他们不安的问题的时候,工会的负责人还是随随便便的毫不负责的来处理这些问题。当然这就要使得一部分工人对于工会工作,不发生兴趣,从交工会的会费到工会的会议,以及工会所号召的各种运动,都没有兴趣来参加。但是工会工作,不独是要使先进的工人发生兴趣,而且要使落后的工人都发生兴趣。这就必须要工会慎重的来处理一切工人所提出的日常问题,获取工人对工

会的信仰。

胜利县有差不多两千工人（部分是铁匠）没分到田，同时又没有工作做，他们的生活很困难，他们经常要求离开本乡到外面作工，但是苏维埃不发路条给他们（为的是怕无人作义务劳动），或者只发十天半个月的路条给他们。对这个问题胜利县工会从来没有向我们作过报告，从来没有严重的讨论过这个问题，这难道不是严重的错误吗？象这样的问题不只是胜利县有，石城县的平安区、洋地区等也有几百工人未分田，甚至还有几十个雇农、苦力未分田，他们还是靠作些不定的劳动过活，石城县工会也是没有用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此外如博生的夏布问题，乐安的纸业问题等，都是差不多的。

有的同志会向我们说，这些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他们想不出办法。但是，同志们！并不是没办法，而是没有去想办法！现在我们是在苏维埃政权下生活着，我们有各种可能的条件来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我们根据当地的条件来想办法，发动群众大家来想办法，提到苏维埃，提到上级工会大家来想办法，我们可以解决许多问题。比如今年春天工人缺乏粮食，许多同志认为是没办法的问题，但有许多地方发动了群众的互助，向富农地主借谷，以及要求苏维埃的救济等，解决了粮食缺乏的问题；但是还有的地方不去想办法的，就使工人饿死了的也有（如汀东、武平、洋地等）。福建的农业工会向中央政府借了四千元，买粮食去救济会员。又如今春纸业工人的失业问题，纸业工会想了许多办法来

倒下了几万石竹麻，现在福建失业工人已经不失业了。但乐安的工会不去想办法，失业工人现在还是失业的。去年宁都的船工失业，工会组织工人到某处山上去斫木柴，用船装到宁都来卖，也解决了工人的失业问题。又如某处木匠失业，工会和苏维埃交涉，将山上的树斫来作木器卖，也解决了工人的失业。从这些事实完全可以证明，只要大家实际去想办法，取得苏维埃的帮助，工人的困难问题，都可以有办法来解决。即使真的想不出办法，就是要求苏维埃从剥削者那里抽出钱来，救济饿饭的工人，也是可以的。今年夏季就这样做了很多。

有的同志把保护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工作，看成仅仅是订立合同或实行劳动法。因此，他们忽视失业与半失业工人，忽视农村中大部分分了田的工人，没有去研究这些工人、雇农的困难，以及如何帮助他们，但实际上在苏区极大部分的工人、雇农是没有长期合同的。对于这些工人的问题如果忽视了，那苏区的工会就不能成为群众的工会。

现在我们工会工作在这一方面，还需要有更大的彻底的转变，需要与忽视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倾向作斗争，需要教育工会工作的干部，善于在工人日常问题上去接近工人、教育群众，获取群众的信仰。各级工会委员会尤其是支部委员会，应经常拿住工人的日常问题来讨论，并给以解决。上级的工会委员会应经常督促下级的委员会来注意和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应与苏维埃取得一致，取得苏维埃的帮助。对于个别苏维埃的负责同志不

管这些问题，不管工会的提议，也应该以同志的态度给予批评，或者要求上级机关来解决。

现在中央政府预备从经济建设公债中拿出二三十万来恢复与发展手工业的生产，创办东方贸易公司，大开鹤矿，及开办纸业、烟业、夏布、樟脑、石灰公司等。各级工会委员会必须发动工人来参加这些工作，召集各业会议，订出计划，征调干部，帮助政府搞这些建设。因为这对于战争，对于工人生活的改善，均有极大的帮助。

但是，工会在讨论和解决工人日常问题的时候，必须一刻不要忘记从这些日常问题上来教育工人，提高工人的觉悟，纠正工人中某些分子的行会的思想。必须在这些日常问题的周围来引导工人群众参加苏维埃、红军及战争动员中的一切工作，向工人说明只有革命战争的胜利，只有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扩大，才是工人阶级一切福利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纠正如赣东北工会工作中那样的倾向。埋头于讨论工人的日常问题，这当然是需要的，但是工会的缺点就是在解决工人的日常问题中忽视了提高工人的积极性与觉悟，忽视了加紧动员工人群众为巩固和扩大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工作。他们给全总执行局的报告，一切都说到了，但对于扩大红军的工作与参加苏维埃的工作等，甚至一字都没有提到。这不仅是极大的缺点，而且是一个错误。在保护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问题上，需要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我们要把工人为日常经济利益的斗争与工人阶级的总任务（在目前是巩固和扩大苏区）联系起来。

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日)

苏维埃革命，把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霸占的土地转给了农民。虽然革命在今天的阶段上还没有剥夺一切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但是我们已实行工人监督。苏维埃与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已经大规模地组织了苏维埃的工厂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农民们和苏维埃企业、合作社企业中的工人们，他们在以前是为地主资本家工作，现在是头一次为着自己工农劳苦大众而工作。

目前，在苏维埃革命的国内战争环境中，工人阶级一切福利的基础，是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是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扩大和在全中国取得胜利。“一切服从于战争”，即是一切服从于工人阶级全体的长久的利益。这就要求国有企业与合作社企业中的工人职员们，为着战争，为着苏维埃的胜利，为着工人阶级全体长久的利益，而自觉地努力地工作。因为苏维埃企业与合作社企业的发展、巩固与生产力的提

* 本文原载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第五十四期，一九三四年四月七日出版。

高,是直接关系于战争的胜利,关系于工农劳苦群众生活的改善,而且这是准备着将来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经济基础。

国有企业与合作社企业中的工人、职员们!你们该记着,你们现在再不是为地主资本家而劳动了,而是为工人阶级自己、为人类的最后解放而劳动着。这种劳动的性质的变换,是我国历史未曾有过的最大变换,你们应该用新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

在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政权的统治下,工厂、矿山及一切生产交通工具,是拿在资本家、地主或国民党政府的手里。资本家、地主为着他们少数寄生虫穷奢极欲的生活,强迫工人饿着肚子牛马似地为他们劳动,生产利润。在这种情形下,工人为着吃饱饭,为着工作与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反对工厂主,反对剥削者寄生虫,不惜采用罢工、怠工及各种带破坏性质的手段,是完全应该的,必要的。但是,在苏维埃政权下,苏维埃的工厂企业与合作社企业,是工农大众所共有的财产。它不是为着剥削工人、生产利润去供养一部分寄生虫,而是为着供给战争,为着供给工农大众的需要,为着创造人类最大的幸福而生产。因此,国家企业与合作社企业中的工人、职员,应该爱护自己的——民众的工厂企业,把自己所有的技能与天才贡献出来,为着发展和巩固苏维埃企业与合作社企业而斗争,而努力生产。

我们国有企业中的工人,大多数能够了解这一点。他们用了新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他们感觉到现在是为着

自己而工作了，很大地发挥了他们的劳动热忱，创造了劳动的新形式——生产竞赛、生产突击队、义务劳动，及为苏维埃与合作社工作而自动减低工资等。他们了解这不是为着哪个生产利润，而是为着战争，为着工人、农民自己，应该如此地去劳动。但是，在国有企业、合作社及其他为苏维埃、红军工作的工人中，还有一部分人没有了解这一点，他们还是用旧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用旧的观念来看待民众的工厂与财产。他们对待苏维埃的、合作社的工厂与财产，和对待资本家的工厂与财产一样：少做些工，做得坏些，偷点把子懒，拿些公家的东西自己用，随便损坏公家的东西，为着不满工厂个别负责人不当的处置而实行怠工，不守厂规。这样的人，在我们工厂中还是不少的。这些人还是用旧的习惯的观点来对待苏维埃的工厂与财产。甚至还有反革命的地主富农分子和他们的走狗，在工厂中进行各种破坏——故意损坏机器、工具，大批浪费材料，生产大批坏货，煽动工人罢工、怠工等。

“为自己的劳动取代强制的劳动，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更替。”〔45〕几千年以来的旧习惯，要在艰苦的长期的教育与斗争中才能消除。因此，国家企业、合作社企业中的工会与觉悟的先进的工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教育工人用新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提高工人群众的劳动热忱，发挥工人群众的创造性，同旧的习惯作斗争。

工会与觉悟的先进的工人，应在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即使是细小的问题）上，来实现这种教育与进行这种斗争，把

工人组织到自觉的生产竞赛的队伍中来。应该拿住一个工人无故迟到十分钟的问题，一个工人拿公家的木炭去烧私菜的问题，某几个工人偷懒不能完成生产数量的问题，以及其他各种坏现象，在工人大会上，在墙报与报纸上公开指出来，批评他们，教育群众。

在国有企业中，必须与破坏劳动纪律、违犯厂规、偷窃公共财物、浪费材料及怠工偷懒的现象进行坚持的不调和的斗争。把那些最坏的分子的名字，写到黑板上去，甚至把他们赶出工厂，放到监狱里去。因为他们有意破坏神圣的公共财产，他们是民众的敌人。

把那些真正的突击队员——劳动的英雄们，列在红板上！极大地在群众中奖励他们。因为他们是革命战争中生产战线上的先锋与模范。

打击最坏的分子，奖励模范的好的工人，是为着教育广大的群众用新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使得工人群众了解民众的公共的工厂与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解工人阶级全体的长远的最大的利益在哪里，了解共产主义的真实的意义在哪里。对广大的群众进行教育，才能更顺利地组织与提高群众的劳动热忱，为自己为苏维埃为革命战争而努力工作。

论国家工厂的管理*

(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经济浩劫是普遍了的,许多工厂矿山相继破产与关门停业,无数千万的工人被驱逐到街上挨冻受饿。但是在苏维埃区域,虽然这里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虽然有帝国主义国民党不断的“围剿”与经济封锁,但是苏维埃形式的新式的工业,已经开始发展出来。现在中央苏区的苏维埃工厂已有三十二个,包括工人两千多人,还包括有几千人的钨矿的生产,还有包括几十以至百多工人的许多生产合作社的工厂(如铸铁、刨烟、造船、农具等合作社)。因为现在我们是处在国内战争的环境中,所以我们苏维埃工业的建设,首先是军事工业。而这些工业的发展、巩固与生产的提高,对于目前的革命战争,是具有极重大的直接关系的。但是在我们的苏维埃国家工厂中许多不可忍耐的状况,不能不引起我们严重的注意与警惕!

* 本文原载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第五十三期,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出版。

许多工厂尤其是军事工厂每月的生产计划不能完成。兵工厂做的子弹，有三万多发是打不响的。枪修好了许多拿到前方不能打，或者一打就坏了。两百多把刺刀不能用。高射机枪的表尺本来做得很好的，后来做出许多要不得。兵工厂的炸弹曾经发生爆炸。被服厂做好的军衣不合尺寸，不好穿，扣子一穿就掉，有的针线大约半寸长钉一针，颜色杂乱配置。某被服厂做的棉衣每件平均要少一两棉花。卫生材料厂霉坏七十多缸酒。纺织厂的纱布稀密不均不好用，纱与布时常失窃。造币厂花了二千多元做了一副机器完全用不得。某粮秣厂做出来的米，有三分之一的糠。材料的浪费，达到完全不可容许的地步。中央印刷厂不独印一期《红色中华》⁽⁴⁶⁾浪费油墨超过实际需要一倍以上，而且铅片铅字的浪费与纸张的浪费也是很大的。甚至某被服厂在前一时期，将我们千辛万苦买来给红军做衣的布，拿去上厕所，送给老百姓，揩桌子等。材料处把很贵重的气钢（无线电用的），拿到兵工厂做炸弹。买来的电油有一百多筒是空的。某被服厂用几百匹价贵的绸缎去做军衣里子。但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工厂不在叫喊“材料缺乏”，时常因为材料缺乏而停工。各工厂的材料器具失窃的事件很多。一切这些现象，说明我们大多数的国家工厂是处在非常严重的状态中，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工厂是管理得很好的。对于工厂中发生的这些严重的现象，国家经济机关并没有严格去追究，去发现这些现象的真实原因和负责者，而给以必要的打击和纠正。

国家工厂发生这些不可忍耐的现象，原因在哪里？有同志认为主要的是由于“技术太不好”，或者是“对敌人五次‘围剿’的形势估计不足”。但是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在这种认识之下，任何具体实际问题也不能解决。很明显的，这里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我们的工厂中尤其军事工厂中，有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和捣乱，有流氓落后的分子和混蛋的怠工、偷懒与对我们工厂的故意损害。而我们经济机关、工厂管理机关的官僚主义的领导，对于这些反革命分子，对于这些流氓和混蛋，采取了不可容许的自由主义，没有规定与执行劳动纪律，没有科学地去组织生产与计划生产；工会工作的许多弱点和错误，我们同志在管理和计划生产方面的毫无经验等，都是构成这些严重现象的原因。

我们的经济机关的官僚主义，竟达到这样的程度：子弹做了几万发打不响，枪修好了几百枝不能打，刺刀做了几百把不能用，棉衣做了几万套不好穿，少了棉花……我们在工厂中负有绝对责任的厂长、管理员等，自己不能发觉，没有知道，而要把这些“坏货”再花上多少的人工送到前方。红军由前方打电报回来，他们才知道他们工厂里发出的货要不得。枪械厂不知道厂里存了多少枪，草鞋厂不知道工厂有多少工人，有多少劳役队，谁是劳役队。自然，在这种官僚主义的领导之下，就不会去追究这些现象的真实原因，发觉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流氓恶棍的捣鬼，以及改良生产组织与技术。

在国家工厂中，我们还没有建立真正的工厂制度，没有

科学地去组织生产。厂长的权限没有正式规定，一切工厂还没有负责的工头领班，生产品完全没有检验。甚至卫生材料厂由工会的小组长来管理各部分的生产。有些厂长这样宣布说：“工会要我怎样办我就怎样办。”这种情形是没有可能把工厂管理好的。因此，必须把工厂中的完全的个人负责制建立起来。厂长对于全厂的生产与行政，负有绝对的责任，因此他有权力来决定和支配全厂的一切问题。在不违犯劳动法的范围内，关于工资、工作时间、生产数量以及调动、处分和开除工人职员等，厂长是有完全的权力决定与执行的。但厂长在决定各种问题时，必须事先与党的支部书记和工会的主任商量，尽可能取得他们的同意，配合党与工会的系统来一致执行。但党的支书与工会主任不同意时，厂长有最后决定执行的权力（有政委时一定要得到政委同意），并同时提到上级机关来讨论。我们现在要用这种“三人团”的方式来管理我们的工厂。工厂的管理委员会应该是厂长之下的讨论与建议的机关。

对工厂中各科的科长与各生产部门的主任（即工头），也必须清楚规定他们的责任与权力。各部门必须设置负完全责任的工头副工头，有几班工作的必须有领班，工头负该部门全般的责任，领班负一班人的责任，他们对厂长或科长负责，对于该部门工作分配的问题、生产计划的问题以及生产品的检验、工人的请假和调动等等，在取得厂长科长同意之后，有完全的权力支配。在目前我们的工厂中，废除工头的制度，不要管理员，还是不可能的。就是对于每一个工人

在每天八小时工作内所应该完成的工作与责任，也必须给以明白的规定。

工厂中还必须设立检验生产品的机关（有工会代表参加），来负责检验每日的生产品，将“坏货”、不能用的货找出来。找出这些“坏货”是什么人负责生产的，给他登在黑板上，以至给以应有的处分。

在我们的国家工厂中，可以说还没有什么劳动纪律，没有稍微完备的厂规，以致有些工人自由旷工、迟到一二点钟上工、假装生病请假、不服调动、自由离开工厂等破坏厂规与纪律的行动，没有受到任何的处分，甚至工厂还照常付给工资。自然，少数人的这种行动，可以影响到大批人不遵守厂规。现在各工厂必须立即制订自己的完备的工厂规则，提高劳动纪律。在厂规内必须明白规定管理员、工头、领班及每个劳动者的责任与权力，及因违犯厂规所负责的范围与负责办法。对于旷工的、迟到的（迟到二十分钟即作旷工），不独不应该付给工资，而且须予相当的处分。浪费与损坏材料工具，没有充分原因生产“坏货”或不能完成计划，以及在工厂中吵闹，妨害别人工作等，均须明白规定发生这些事件所负的一定的责任，及规定处分与开除工人职员的一定的手续。工厂必须坚决执行这样的厂规，对任何破坏厂规者给以一定的打击，工厂内部的秩序才能建立起来。当然，厂规是不能与劳动法和集体合同抵触的，是要经过工会同意与劳动部批准的。

在国家工厂中，我们应该把组织与提高工人的劳动生

产热忱，作为最重要的任务。组织群众的生产竞赛，组织生产突击队，发明新的技术，增加工作的速度与效能，应该看作是提高国有工厂生产力的主要方法。在这方面我们过去是进行了，得到了相当的成效。工会与工厂中先进工人的党在这方面是要负更多的组织的责任。但我们过去在组织与提高工人劳动热忱的工作上，是有许多的错误和缺点的。突击队并不是最有纪律、最精干、能作全厂工人模范的队伍，某兵工厂全厂工人都加入了突击队。许多工厂以延长工作时间做义务劳动为提高生产的主要方法，但有时延长了工作时间并不能提高生产（如某兵工厂每日加做四小时义务劳动，后来取消，生产没有减少，反而增加）。甚至在《青年实话》印刷所，机器上已做三班，全厂工人也增加做两小时义务劳动，自然机器上不能加，而排字与装订工人加做两小时也是无用的。生产的比赛许多是为着想增加工资。我们必须从加快工作速度、改良技术、节省材料、改善产品质量等方面来努力，来提高国家工厂的生产。生产突击队必须改组，突击队的条件与特别待遇须明白规定，由党员团员及最积极的工人来自愿地组织，突击队必须完全遵守厂规，按时完成与超过生产计划，不断改进工作的技术，成为一般工人中最标本的提高生产的模范。不是这些条件的突击队员，必须洗刷。延长每日工作时间的义务劳动，应该完全在工人自愿的条件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为着完成一定的任务去实行。而且应该把这看作是最后的办法。

精密地科学地来制订生产计划是每一个工厂所必要

的。精确估计到机器的能力、每个工人每部分工人最大的生产数量、材料与工具的耗费等，才可能制订可实现的生产计划。但我们的经济机关在制订计划时，并不估计这些。写计划的人对于工厂中生产的详细情形是不知道的，许多是仅仅根据上一个月的生产，来定出下一个月的生产总数（只有一个总数）。某兵工厂甚至在二月二十日以后，才接到上级二月份的生产计划。至于三个月、半年、一年的生产计划，提高与扩大生产的计划，根本没有过。如是我们的生产计划常常成为空洞的东西。各部分的生产不能衔接，这一部分生产很多，而那一部分很少，机器上可能，而材料又没有准备。这种没有计划的紊乱的现象，充满了我们的工厂。这种情形必须立即转变。要进行精密的各方面的核算和估计，然后我们才能知道生产可以提高和扩大到何等程度。

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工厂去核算过生产品的成本费，所以减少成本的口号，没有提出来。草鞋厂的成本费是最简单了，但也没有算过，然而现在已折本几千元，我看还将继续折本下去，因此这个工厂是否要继续开办，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工厂不是机器生产，从几百里外请工人来生产，总不如将材料发给家庭女工去做的便宜）。我们的经济机关现在需要吸收许多工人来进行各方面的核算。算得愈清楚愈有把握，愈不吃亏。算盘打不好，到处都要吃亏的。

我们的工厂有许多没有很好地去进行分工。比如草鞋厂是一个女工自己织成一双草鞋，没有把搓绳、弄草与编织分开。使工作专门化，更容易熟练与增加产量。

在工资制度上还需要一些改变。尤其过去草鞋厂不管每天织十双的或织三双的都是五毛钱，是完全要不得的。煤炭工人也用月工与日工制。现在需要在工资制度上刺激工人来努力增加生产。件工制与包工的办法要采用。最好的办法是规定每天或每小时的工资数量，同时规定生产数量，超过生产数量的加给工资，不足生产数量的扣除工资。一月三月完全不旷工，不请假，不迟到，不犯厂规，生产数量完成与超过的应给以特别的奖励。工资以月为单位来计算，是不好的，应改作以日以小时为单位来计算（苏联许多工厂是以分钟来计算）。有一天一小时不做工，工厂应即不付工资（生病、例假、星期日等按合同与劳动法办理）。因此工厂应发给每个工人一本“工折”，来登记每日的生产数量与质量及请假、旷工等。预支工资必须有一定的限制，并规定在工资内扣除归还的办法。

在我们的国家工厂中，因为管理人的错误，阶级警觉性不够，招收了一些地主残余与富农分子在工厂工作。某机关甚至介绍十个AB团自首分子到弹药厂工作。同时工厂中还有原来剥削工人的工头、吃大烟的人、流氓等。这些家伙，这些工厂中的害虫，他们敌视苏维埃红军，敌视民众的工厂，“给‘它’少做些工，做得坏些，从‘它’那里多偷一些工钱”〔47〕。甚至他们故意地进行阴谋活动，破坏我们的工厂和机器与材料，偷窃公家的财物。我们必须发动群众，开展极大的斗争，来反对这些家伙，严格地管束、抑制和监督他们，战胜“可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残余，这些人类的渣滓，这些

毫无希望的腐朽的霉烂的分子，这种传染病、恶疮、瘟疫”〔48〕。没有技术的、工厂中不一定需要的地主富农分子，应尽量清出工厂去，或者把他们放在劳役队里面。破坏机器材料、偷窃公家财物的，应该受到法庭的审判，一直到枪决为止。怠工、浪费材料、经常生产“坏货”的，应在群众面前受到各种各式的处罚和公审，工厂中以后应禁止雇用地主富农分子，并要征调一批积极坚决的工人到国家工厂中去做工。

在国家工厂中的工会组织，应极大地注意协助工厂管理与组织的改善，发展与巩固国家工厂。同时要改善工人的生活，解决工人一切不安的问题，发动工人的劳动热忱，组织生产竞赛和突击队，为提高生产而斗争。工会应在群众中提高自觉的劳动纪律，拥护厂规的执行，反对阶级异己分子和流氓混蛋的捣鬼，教育工人为自己、为工农民众的工厂而努力工作，吸引工人参加生产计划的讨论和制订，参加经济的核算，研究技术的改良，学习生产的管理。很明显的，上面所说的各种任务，国家工厂各方面情况的改善，必须得到工会与大多数工人自愿的乐意的热情的参加与合作，才能够顺利地完成。我们的经济机关与工会必须亲密地实现这种合作。

在苏维埃政权下 工会的作用与任务*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一)

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的战斗的组织。

在革命胜利以后,在苏维埃政权下,工会的作用与任务是什么?

赤色职工国际五次大会⁽²³⁾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上这样说:“在苏维埃区域中,赤色工会是推动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基础和推动的力量。”“他们应成为无产阶级和下层农民群众联合的组织者。”

职工国际是这样确定苏区内工会的作用,它是苏维埃最重要的群众柱石,是党的路线在农村中最可靠的传达者和组织者。因此,要巩固苏维埃政权,要加强苏维埃政权的

* 本文原载中共中央西北执行局机关刊物《斗争》第七十五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版。

群众基础，以及要使党与苏维埃的各种政策在苏区内得到深入的彻底的执行，都必须把苏区内的工人、雇农广泛的组织到工会之内，建立苏区真正群众的阶级工会。这应该看作是党的最基本的工作。

但是在陕甘，在过去一个时期，同志们并没有这样来认识工会的作用，认为工会对于苏维埃政权，对于党，似乎是没有作用的，不要它也可以。或者以为苏区内的工人很少，不能组织工会，组织起来也没有什么作用。因此对于工会工作便完全放弃了。这些理论当然是很错误的，是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不了解，是城市资本家与富农所拥护的理论。我们要在苏区建立群众的工会，就非得彻底肃清这些理论不可。

应该使我们的同志了解苏维埃的系统，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工会来参加拥护与帮助，如果没有大批积极的工人干部到苏维埃的负责位置上来，苏维埃政权是很难巩固的，富农路线与官僚主义就更容易侵入我们的苏维埃机关。雇农与乡村中的手工业工人，是乡村中的无产阶级。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党在乡村中，首先的唯一的就是依靠雇农与乡村工人，雇农与乡村工人是党的路线在乡村中最可靠的最忠实的拥护者与执行者。不管他们的数量在乡村中是如何的少，但党唯一的还是要依靠他们，他们对于党的重要的可贵的作用并不减少。

党在乡村中进行工作，应该首先就是领导、组织与教育雇农与工人。这是党在乡村中的基础，是党的基本工作。

离开他们，党在乡村中就找不到自己的基础。共产党员在乡村中去进行工作（不论是分田、肃反与进行某种动员等），他应该首先依靠雇农和工人，首先取得他们的拥护与积极参加，经过他们去领导贫农，影响中农，与豪绅地主作不调和的斗争。因此必须组织他们的工会，在工会中团结、组织与教育他们，使他们具有一切的能力来担负领导乡村中的革命的任务，雇农是土地革命的先锋与领导者。

（二）

目前工会在陕甘苏区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应该是：

- 一、组织真正群众的阶级工会；
- 二、努力改善工人群众的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
- 三、在进行上述二项不断的群众工作中，发动与引导广大的工人群众来积极参加苏维埃与红军的建设。

组织工会，把城市与乡村中的工人、雇农的大多数吸收到工会的组织中来，应该是工会目前头一位重要的工作。因为现在苏区内大多数的工人、雇农都还在工会组织之外。要建立群众的工会，就要把工人、雇农的大多数以至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吸收到工会中来。征求工人入会，不一定要经过介绍，不要有年龄、性别、民族、宗教、信仰等限制。要实行民主制度，使工会机关与工人群众有密切的联系。

要使工会成为阶级的工会，要严格考查工会的会员成份。只有是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活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的人，才有资格加入工会。要将工会中的那些非工人成份或混入工会的地主富农分子清出工会去。要使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无产阶级化。要将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大批提拔出来，教育他们，将他们放在最负责的地位，并输送他们到苏维埃和红军中去担负领导的工作。

有计划的有系统的来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在过去工会与苏维埃都可以说还未开始这一工作。相反的，在某些地方工会与苏维埃是进行了减少工资的工作，苏维埃机关中还存在着某些阻止工人斗争的富农倾向。在这方面现在应立刻进行的是：（一）帮助雇农解决耕牛、耕具的困难，将没收地主的耕牛、农具首先分给他们，分田时应将最好的田地分给他们；（二）增加工资；（三）减少工作时间到适当的程度，尽可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四）在某些工人中与雇主进行订立合同，改善工人的伙食、宿舍等；（五）将没收土豪的好房屋分给工人、雇农住；（六）救济失业工人，为工人进行社会保险。

工会应该把上述改善工人生活的这些工作，看作是自己主要的工作之一。工会只有在不断的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作中，才能与工人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才能吸引工人更积极的去参加苏维埃和红军的各方面建设。

苏维埃的劳动部，是苏维埃为着保护工人利益而特设的一个工作部门。在解决雇农的耕牛、耕具困难，分配土豪

房屋给工人，监督资本家、雇主实行劳动法，救济失业工人与社会保险方面，劳动部应担负完全的责任。因此，劳动部的负责人员应该由群众信仰的工人来担负，由工会向苏维埃保荐。劳动部也应该在工会的帮助和监督之下来进行工作。现在由劳动部来领导工会的方式应即改变，工会领导科的人员，应即转到工会来工作。

工会应该利用工人群众为自身直接经济利益的斗争，引导工人群众来参加苏维埃和红军的建设。应号召工人去加入红军和游击队，完全参加苏维埃的选举，并提出自己的候选名单。参加赤少队，参加分田运动，并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工作。工会还要派遣自己的最好工人干部到苏维埃去做负责的工作。

(三)

工会在国有企业中有完全不同的任务，工会除保护工人经济利益之外，还应为巩固与发展苏维埃企业而斗争。工会应参加与协助国有工厂的管理，应教育工人用新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应为提高国有企业的生产而斗争。工会应教育工人，现在的苏维埃工厂，不是资本家剥削者的工厂，不是为剥削工人而设立而生产的。现在的苏维埃工厂，是全体劳动阶级所共有的工厂，是为着革命战争与全体劳动阶级的解放和利益而生产。国有企业中的工人从前都是

为剥削者为资本家、地主而生产的，现在是自有历史以来头一次的为自己为劳动阶级而作工了。因此工会要号召工人为国有企业增加生产，增加工作速度，改善工作技术，节省工厂的材料。因为这不是为着阶级敌人，而是为劳动者自己。

工会在国有企业中保护工人利益，应采用比在非国有企业中不同的策略。就是工会应该与工厂负责人经常用协商的办法来满足工人的要求，及解决工资、工时与各种待遇问题。

工会同样要提拔最好的工人去参加国有工厂的管理。但工会要与管理机关的官僚主义及工人中的坏蛋分子作斗争。

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

(一九三六年四月)

一、中心城市与大的产业中心，是反革命的支撑点，是反革命力量最强大的地方。反革命在这些地方对于革命的防护最为严密，同时，我党在这些地方的工作基础与组织基础，是十分薄弱的。所以，我党目前在中心城市与产业中心的工作任务，还是争取群众，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积蓄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以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斗争。目前还不是革命与反革命决定斗争胜负的时候，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情况下，应当避免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战斗。

二、为着要积蓄我们在工人阶级中的雄厚力量，必须首先注意保存与巩固我党和工会在工厂企业中现有的组织和工作，只有这些组织和工作能够大体保存和巩固起来的时候，才能从这些已有的基础上去扩大和发展我们的工作和组织。因此，必须彻底肃清实际工作中的关门主义与冒

* 本文是为了总结一九二七年以来白区职工运动的经验，提出白区职工运动应采取的正确方针而写的一份工作提纲。

险主义，更加改善我党的秘密工作。要使我们逐渐建立起来的组织和工作，不致有无谓的损失，并且能够防御敌人的袭击，然后我们才能积蓄工人阶级中的雄厚力量。

三、当着我们仅在某几个工厂企业中建立了强大的组织，并能实际指挥这些工厂的工人大多数时，那末，我们在这些工厂的工作任务应该是：（一）把组织更加巩固起来，培养与训练大批的工人干部和领袖；（二）派干部到其他工厂去，开辟工作和建立组织；（三）分派积极的工人到农村中去参加游击队、义勇军等；（四）参加一般的公开的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把我们在这些工厂中的堡垒保存与巩固起来，以便在此基础上开展我们的工作，避免单独地和敌人作战，被敌人各个击破。

四、为着争取群众，创立和积蓄工人阶级的力量，必须特别注意领导工人群众经济的政治的日常斗争。领导这些斗争必须从争取胜利（即使是最小的胜利）的观点出发。要使用一切方法争取这些斗争之具体要求的胜利。对于完全没有胜利把握的斗争，应该停止。在斗争延长对于工人不利时，应该在某种相当条件下，“适可而止”地暂时停止战斗。在原则上我们当然反对国民党的强迫仲裁，但是，为着争取群众斗争的胜利，对于国民党的“调解”与“仲裁”，在事实上我们不应该完全拒绝。在某种情形下，我们应该利用国民党的“调解”与“仲裁”，去取得工人某些具体要求之实现，并使我们更能公开地指导群众斗争。

五、国民党政府的工厂法、工会法，用了一切的条文来反对工人阶级与束缚工人群众的斗争。但是，这些法律主要的还是国民党用以欺骗工人阶级的，因此，它就不得不规定一些对于改善工人阶级现状有利的条文（如在某种条件下允许工人组织工会与罢工，规定了比现在较少的十小时工作时间，星期日纪念日休息，对于工人疾病年老死亡的抚恤救济等）。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利用工厂法、工会法上那些对于改善工人阶级现状有利的条文，来组织工人群众的斗争，要求实现那些条文上所规定的利益，并就此揭破国民党的欺骗，这样才实际有益于我们开展工人运动的工作。如果我们对于工厂法、工会法仅持“绝对反对”的态度，只在工人群众中去叫喊“反对工厂法，要求实现苏维埃劳动法”这样绝对的口号（这样的口号要在革命胜利后才能实现），那是等于一事不做，那是完全空洞的反列宁主义的关门主义（几年来反对工厂法、工会法的经验是如此）。

国民党政府的工会法、工厂法中某些条文对改善工人阶级现状有好处，我们要求马上实现。但这样的规定太少了，我们要求增加。那些压迫、束缚工人阶级的条文，我们反对！这就是我们对于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所应该采取的态度。苏维埃的劳动法，在白区城市中目前还不能实行，仅仅是宣传的文件。

六、不独是工厂法、工会法我们应该利用，就是国民党在工人中进行的其他许多运动，如卫生运动、文化娱乐运动、民族扫墓运动⁽⁴⁹⁾、纪念节的运动，以至儿童节运动、植

树运动、法西斯的新生活运动〔50〕等，我们都要利用来提出工人的要求，开展在工人群众中的斗争和工作。利用这些运动，一方面使国民党与资本家更难反对工人所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使我们更能取得公开的地位来领导工人的斗争，更易于使工人的要求和斗争得到胜利。唐山工人利用新生活运动要求开窗户、设澡堂、发新衣等得到胜利，就是很好的经验。因为他们不是采取关门主义的简单的“绝对反对”新生活运动的策略。

七、我们要利用一切方法、一切公开的可能来广泛地联系与组织工人群众。在有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工厂和企业中，我们同志和革命的工人均应加入黄色工会，并参加黄色工会中的各种工作和活动，利用黄色工会来组织工人群众和斗争。就是现在还没有群众的黄色工会，我们也要加入进去，就是仅仅利用黄色工会这一公开的招牌和地位，去公开团结与组织工人，也是必须的。在没有黄色工会组织的工厂和企业中，我们应该利用各种公开的与灰色的形式，来公开地广泛地组织工人群众。如同乡会、互助会、劝戒烟酒会（在理会）以及其他旧式的新式的团体，我们都要利用。在我们采取这样广泛的方式来组织工人群众的时候，我们应该暂时放弃独立组织赤色工会的任务，过去的那些秘密的赤色工会即行取消。要在各级党部内设立职工部来指导工人运动中的工作。

在没有组织的工人群众中，如果依照国民党工会法的程序（如立案等），我们能够在这些工人中公开地成立新的

工会，那末，这种公开组织工会之可能的机会，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放弃。虽然做这件事是极不痛快的，要受国民党各种严格的束缚（如呈请立案，国民党派指导员来，干涉工会的选举，圈定名单等），但即使是在这种严格束缚的条件下，只要我们还能够借此公开去组织工人群众，我们是必须去利用这种机会的。我们不应害怕或者拒绝去做这种不痛快的事。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依照国民党工会法的程序，在各厂各业无组织的工人群众中去公开组织工会。如果这样做，国民党也不允许我们成立工会，那我们就有事实宣布国民党工会法是骗人的。我们反对合法主义，但是又必须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去组织工人。有些工作能够在合法的范围之内去做的，我们为什么不去做，不去利用？

对这种公开组织工人群众与公开组织工会的策略，过去有人指责说“这是第三种工会”，是机会主义的路线。这种指责是错误的。黄色工会的领导位置，黄色工会的领导机关，我们都要用力去争取，为什么我们在某种条件下能够组织一个为我们领导的工会，而不去组织呢？只有十足的关门主义，才放弃这种可能不去利用。如果我们要在赤色工会的全部纲领被承认的条件之下，才去组织工会，那只有在革命胜利之后才有可能。那末，革命胜利之前，我们就只好甘心满足于那种狭小的秘密工会的组织。

八、在黄色工会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形成与巩固革命者的阵地。黄色工会每一个选举的位置，黄色工会的全部领导机关（上级和下级的），我们都要努力争取到手里来。如

果在黄色工会中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全部的胜利，群众与领导机关都转到了我们的领导之下，我们亦不应该立即将这个黄色工会转变为赤色工会（因为这在国民党统治下是不能存在的），仍应保持表面上的黄色工会的原状（如开会仍通知国民党，允许他们派人来参加，工人的要求亦可通知国民党，要他们实现工人的要求等等），应尽力巩固我们已得的阵地，实现工人更多的利益，培养大批的干部。只有到了革命爆发时，我们不需要黄色工会之外表的掩护了，这些工会才能公开转变成为赤色工会。

九、在反对资本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的口号之下，我们在黄色工会中要与各派的工人及其领袖建立统一战线，特别是行动的统一战线（如罢工、示威、抵制日货，参加抗日运动等）。我们要在一切工人中努力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鼓励与推动黄色工会去参加抗日救国的团体和运动，号召全国各党各派联合一致抗日救国，呼吁全国各军队的军官士兵立即停止进攻红军、苏区的内战，并联合一致去抗日，组织全国一致的抗日反卖国贼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⁵¹⁾。要在各城市中设法联合一切工人的团体与各厂工人，建立工人的抗日救国会，动员工人到农村中去领导与组织农民的抗日游击战争，动员工人到红军中参加抗日反卖国贼的战争，特别要动员工人利用各人的亲戚朋友关系向国民党的军队去进行活动，去组织和影响国民党的军队进行抗日战争，拒绝蒋介石等进攻红军的命令。尽可能派工人到军队中去服务，去宣传抗日，反对内战。

在罢工委员会、反日会等组织中，过去我们排挤和打击那些可能和我们合作的各派工人的领袖，是不对的。我们应在一定的纲领之下，诚意地和他们合作，团结他们，鼓励他们坚决站在工人阶级与抗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立场上去领导群众斗争。对于他们的错误，应采取善意的态度去批评。只有对于工人中的汉奸分子，我们才应该坚决驱逐。

十、要特别注意保存我们在群众中企业中的干部和领袖。党在工厂中的支部，不应该使全部同志都去公开领导斗争及进行公开活动。一个同志和一个同情者，在公开领导一次至两次斗争之后，第三次斗争必须换人来领导，不能再要这个同志来领导了。让这个同志仅以同情斗争的态度一般地参加斗争，就在群众中把这个领袖保存起来。这样我们可以在群众中保存许多领袖，同时，也可以培养出许多新的领袖来。

十一、我们的许多同志长期在狭隘的秘密条件下工作惯了，现在要他们到广大群众中去，公开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要在复杂的环境下去对付狡猾的国民党、黄色工会领袖及各种派别，那自然可能发生许多错误，甚至有些人受他们的影响、欺骗、愚弄、威吓以至收买，而发生动摇、投降以至叛变。但我们绝不应该害怕发生这些问题，而重复把我们自己关在秘密的房子中。只有让我们的同志到广大群众中去，到十分复杂的环境与斗争中去，才能锻炼出真正能干的布尔什维克^[39]的群众领袖。

十二、我们要加紧教育同志不论在如何复杂变化的环

境下，不论使用何种灵活的策略去与反动派斗争，一分钟也不要忘记我们在工人运动中的基本纲领。任何时候，我们在主观上是不放弃这些纲领的。虽然这些纲领在白色恐怖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只要一有机会与可能，我们就一分钟也不忘记要部分地实现这些纲领，尽可能使工人群众的要求，接近我们的基本纲领。我们与各派的工人合作，不是我们放弃自己的纲领，去接受其他党派的纲领；相反，是努力宣传我们的纲领，去影响同盟者。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保持我们行动的自由。对于同盟者的动摇、叛变与投降，要使用批评的武器。要不断地在下层群众中进行工作，在群众中不断加强我们的组织和影响。同时，党的政治纪律性与警觉性应更加提高起来。这样，我们就能够克服各种右倾的错误。

怎样进行群众工作*

——给群众工作的同志们一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

我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是只有先锋队，是不能战斗的。必需组织无数千万的革命群众，在党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才能战胜我们强有力的敌人。因此，在政治上争取群众，教育群众，尤其重要的是广大的组织群众，就成为我党准备革命唯一重要的任务。

组织无产阶级的群众，是党的基本任务。组织一切劳动群众，组织小资产阶级群众，组织一切抗日的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联合各党各派建立抗日反汉奸的广泛的统一战线——人民阵线，这是我党目前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的总方针。然而这一切，都依靠我党极能干的在极大范围之内的群众组织工作，才能达到。因此，我党必须把群众的组织工作，提到最重要的地位上来。

为要真正广大的组织群众，必须努力造成下列的条件：

* 本文署名K.V.，原载河北省委主办的《火线》第六十三期，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一、争取群众组织与群众运动的自由，尽可能的广泛的利用现有一切公开与半公开的可能。

二、创造群众运动的、获得群众极大信仰的无数的领袖。

三、采用完全民主的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

必须具备上列三个条件，群众运动与群众组织，才能大踏步的前进。用秘密的方式是不能组织广大群众的。没有领袖的群众运动，是不能坚持、没有方向的。不采用民主的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是不能发挥群众伟大创造力的。然而，我党过去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与官僚主义的错误，是无视上列三个条件，采取与上列三个条件相反的方针，所以使白区群众组织，到处受到失败，不能获得任何成绩，现在必须改正！

(一)

一切参加群众组织的同志，必须正确的了解党与群众组织的关系。群众组织是独立的。它在组织上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任何方面。党与任何一个自由的群众组织，是处在平等地位的。但是任何一个党派都可以要求群众组织接受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路线。我们要求群众团体接受我们的政治主张，但是我们反对群众团体在组织上隶属于党。因为群众团体隶属于党隶属于政府，那只能是御用的、官办的、

没有自由的团体。国民党、国民政府“指导民众运动”，命令民众团体，就是取消民众团体的独立。而我党与苏维埃政府的方针，则完全与此相反。我们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与自由，并且反对任何方面妨害它的独立与自由。我们在政治上要求群众团体接受我们的领导，但在组织上绝不妨害群众团体的独立，因为我们只用说服群众的方法使群众自愿的接受党的政治主张，而绝不采用强迫的手段压迫群众依照党的方向行动。当着我们说服了群众的时候，群众自动接受我们的政治领导，这正是群众的自由。

可是上面这种粗浅的原则，常为我们许多同志所不了解或误解。他们以为党应该领导群众，就是群众应该服从党。他们以为群众团体应该受党的领导，就是群众团体应该隶属于党，成为党的附属物。如是他们可以破坏群众团体的独立，劫持群众，命令与强迫群众，甚至玩弄与欺骗群众。他们站在群众外面直接去决定与干涉群众团体的一切行政，或者他们在群众团体里面又不服从、尊重群众团体领导机关的决定、委托和权利，他们破坏这些决定、纪律，而自由行动。他们屡次的公然的进行这些行为，而不知错。他们的观点和国民党一样，群众团体不隶属于国民党就得隶属于我。这样，他们就自然和群众对立起来，群众反对他们也会和反对国民党一样。

我们不尊重群众，不信仰群众，就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就不能取得群众对于我们的相信和尊重。我们不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自由和权利，就不能建立真正的群众团体。

因为不独立、不自由、无权利的团体，是无用的团体。我们党是最尊重群众意见的党，我们的党员将应该是最尊重群众权利的人员。我们的党员既加入群众团体，不论是作会员，作职员，作领袖，都应该首先尊重这个团体，尊重它的一切机关、决议、命令和权力，成为一切会员的模范。遇有损害这个团体尊严和权利的事件，不论是从内部发生或从外部来的，我们都应该反对，为拥护这个团体而斗争。只有这样，群众团体的权利和威信才能建立起来，我们的同志才能在这个团体中取得信仰和地位。

(二)

民主的工作方式，是群众工作的基本方式。我们拥护群众团体的组织章程完全合于民主主义，反对限制会员群众与代表机关的应有权利，反对任何派别任何方式的包办群众团体。少数服从多数，在群众团体中是必须拥护的制度。我们在群众团体中的提议，只有取得多数的赞成与通过之后，才能执行。倘若大多数不赞成我们的提议，而通过其他派别的提议，不管我们的提议是如何的正确，而大多数的决议是如何的错误，我们一方面在组织上要服从大多数，依照大多数的错误的决定行动；另一方面我们不放弃自己的提议，继续宣传我们提议的正确，指出大多数决定的错误。只有等到大多数明了，接受我们的提议，抛弃原来错误

的决定之时，才能执行我们的提议。

争取群众，说服群众的大多数，是一个长期艰苦的工作过程，往往不是一下能作到的。往往需要多少年的千百次的说服与斗争，才能获得大多数。

当着我们还是少数，我们的提议被大多数所否决的时候，如果我们不顾大多数的决议而根据自己的意见自由行动，那就是我们与大多数分裂。如果这种分裂对于革命对于群众是不利的，那我们这样作就犯了一个大罪。

可是上面这一个粗浅的原则，又常常为我们许多同志所不了解或误解。他们以为少数服从多数，只是要人家服从他们，他们不服从多数。罢课可以不经过多数赞成，“全体”的名义可以随便冒用，代表可以冒称，决议可以由少数人通过，委员会、代表会的决定，人家都要服从，可是他们可以不服从，可以随便修改取消。他们只管党的决定，依照党的决定直接执行，他们不管群众团体的决定，他们没有服从群众公意的义务。他们不知道党的决定仅是对群众的一种提议，必须经过群众的通过之后，才能以群众的名义去执行。他们把自己看作是超于群众之上的一种权力。他们常常是不自觉的破坏群众运动，使群众及各派感觉我们是在进行阴谋，利用他们。

我们同志在群众团体中，必须非常公开坦白的工作，必须采用完全民主的方式工作。群众团体的职员、代表，必须由群众选举，代表必须尊重与执行群众给予他的训令，并向群众作报告。一切的决议要经过多数的通过。要吸引各派的

人及多数活动分子到领导机关来。各种提议要分作许多人提出，不要总是一个人来提。领导机关的工作要经常向群众作报告，请求群众批准。要接受群众的意见，撤退一切不称职的人，而我们的同志必须完成群众或领导机关给予他的每一个任务和工作。必须如此，我们的同志才会取得群众的信仰与爱护及各派诚意的合作，而这个团体才会有生气有发展。

(三)

要广大的组织群众，就必须采用公开的方式，至少是半公开的方式。现在全国各地虽然是极端反动的环境，但是还有不少的公开与半公开的可能给我们利用。救国团体可以半公开的组织，一切文化、娱乐、研究等组织可以完全公开进行。社会上还有各种各色合法的团体给我们利用。而我们最近又主张停止内战、和平统一，与取消打倒国民党、反对各地方政府的口号，也更便利于我们活动。现在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一切公开与半公开的可能去组织广大的群众。但是现在我们的党还是处在极端秘密的环境下，因此，要取得群众团体与群众运动的公开，必须使群众团体与群众运动在表面上完全离开党。群众团体与群众运动，不要着上与我党有任何组织关系的痕迹。不要使敌人从群众团体与群众运动中找到任何我党的组织关系。因此，我党在群众团

体与群众运动中一切负责的同志和领袖，必须与党在组织上断绝一切关系，不要使任何人知道他们是同志，仅仅只与一个特定的同志发生关系，取得党对于他的指导和帮助。他们不应参加党的任何会议，不担负党的任何其他工作，他们完全以群众中之一员的资格来参加与领导群众运动（但同志加入群众团体作会员的还应参加支部）。他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应该完全群众化、社会化，避免用一切党化的名词、言论、文字和方式。他们的行动应该完全公开，不要鬼鬼祟祟、也不要怕侦探怕奸细，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组织关系。如此，才能使党的破坏不会影响到群众团体，同时也不至因为群众运动联系到党的破坏。同志才能放胆活动。

可是上面这一个粗浅的道理，又为许多同志所不了解。他们用党的工作方式去进行群众工作，同时又用群众工作的方式来进行党的工作，使二者混淆起来。如是弄到应该公开的不能公开，应该秘密的不能秘密。结果是党与群众工作都被破坏。有时候他们甚至在党内党外公开宣布某某团体为党所领导，某某领袖与党有关系。有些人住在党的秘密机关内去进行公开群众工作，担负公开群众工作的同志同时又担负党的秘密工作。他们冒称“群众”，冒称代表，冒称职业，用假姓名，在群众面前的态度方式，一切都是鬼鬼祟祟的。这种混乱的情形，过去是不知造成了多少罪恶，然而到现在还是没有改正。这都是因为不了解这个粗浅道理所致。

所谓争取公开的说法，是错误的。把不能公开的东西和人员强行要去公开，那是冒险，那是罪恶。

(四)

党应该派大批在环境上允许公开的干部去专门进行群众工作，已经在担负群众工作的干部绝不要调到秘密机关来（除非不得已），并要切实保护他们的公开地位。党要培养与创造大批群众工作的干部与领袖，而秘密机关的人员则应该减少。这是两批不同的人才。群众工作是要委托那些群众工作的干部全权去进行，完全依靠他们，并且信任他们。他们应该在党的方针之下独立的去进行活动。凭他们在群众中的地位和信仰，凭他们的聪明才智与英勇的工作能力，凭他们在政治上的觉悟与对于党的忠诚，他们应该独立的去领导群众运动。他们应该不是小孩子离开党就不能行动的。他们应该自己估计环境，自己提出主张，自己确定办法，向着党所指定的目标行进。党的秘密机关只应该在各时期在政治上给他们以原则的指示，并在各方面援助与帮助他们。党的秘密指导机关应该避免在工作方式和方法上以及在许多具体的技术问题上去干涉他们，不要代替他们在工作方法和方式及技术问题上去决定一切（当然一切都可以和他们讨论，并提出意见去帮助他们，但无论如何党不应该决定一切）。只有这样，他们才有伸缩的余地，在群

众中去执行党的决定，才可以提高他们的自动性与责任心，才能造成真正的群众工作人才。

然而这个粗浅道理又为许多同志所误解。他们以为群众团体的党团，应该绝对执行党的决定，如是他们就决定一切要党团拿到群众团体去“绝对执行”。不只是决定政治方针和政治口号（这方面他们反不注意），而且在各种具体问题、技术问题上代替群众决定一切。然而因为他们坐在秘密房间内，对于这些具体与技术问题是不了解的，一切决定又是不正确的。如是党团的同志不包办，不用强迫手段，是无法“绝对执行”这一切决定的。许多的错误也就由此产生。群众工作的干部也就变成机器人，党没有决定，他就不动，他怕动，不敢动，他的聪明智慧与自动性就被窒死，顽强的就被认为不执行党的决定而受到制裁。难道这种情形现在不是还继续着吗？有人不是为着三日刊、五日刊的问题闹到不能开交吗？九一八纪念不是有人决定要如何讲话吗？然而在这种情形下，群众工作是无法作好的，秘密工作也是不能允许的。

党的指导机关要和群众工作的同志讨论一切方法方式等具体问题甚至技术问题，党应告诉他们许多方法，和他们详细讨论，帮助他们。但党不应该决定所有这些问题，要同志去绝对执行。这些问题允许同志们根据群众中的实际情形去变通办理，党只不能允许群众工作的同志违背党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方针。党应该训练群众工作的同志，使他们了解党的主张与策略路线。他们了解了，就让他们大胆的

放手的到群众中去活动，党经常的在原则上给他们以指示，并时刻从政治上、方法上、经验上去帮助他们。这是以后应该采用的办法。

为秘密工作的关系，某些团体的党团最好不要，只由个别同志分别接头。群众的领袖应该注意保存，如果敌人注意他了，他应该减少或停止活动，以免被捕或被开除。运动即让给别人来领导。

(五)

群众团体是各种各样的，有各种不同的性质。我们的同志参加这些团体总不要忘记这些团体原来的目的。比如工会必须为工人的经济利益而斗争，学生会必须为学生谋利益，学术团体必须研究学术，文化教育团体必须办文化教育工作，同乡会必须实现同乡的互相帮助等，而且要使原来的这些目的实现，办得有成绩有信仰。但同时我们在另一方面必须接近与团结其中进步的分子，设法宣传我们的政治主张，并谨慎的设法吸引他们来参加政治活动与抗日运动等。必须这样，才能吸引更广大的群众来参加，才能保持它完全公开的地位。然而这也常为我们许多同志所不了解。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作政治运动，他们对于各种团体原来的任务根本没有兴趣，忘记它，抛开它，把一切学术团体、文化教育团体、同乡会等变成单纯的政治机关。结果，

这些团体不是自己塌台，就是受到敌人的打击。我们公开工作的地盘也就因而愈加缩小了。这是以后必须改正的。

我们要长期坚持进行公开的群众工作。千辛万苦建立起一个公开群众团体，不应该在一次政治运动中就根本把它弄塌台。同乡会来举行“八一”纪念，如果是不适合的，只好不举行。救国运动由救国会来领导，其他学术文化团体参加可以，如果这些团体在环境上不适合公开来领导救国运动，只好暂时不公开来领导。

(六)

日本帝国主义目前在我全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亡国灭种的大问题，我们要吸引一切团体、一切人民来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要建立各党各派的人民阵线，这就开展了我们群众工作的更好的条件。我们在各种群众团体中，应该向各党各派的领袖和群众提议合作。我们对蓝衣社⁽⁵²⁾、国民党、胡适之⁽⁵³⁾派以至杨立奎⁽⁵⁴⁾等都可以而且应该向他们提议合作，邀请他们来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如果他们拒绝参加，拒绝合作，那就明显的证明他们是分裂救国运动。如果他们来参加，那就应该和他们在群众运动中来比较谁是群众真正的领袖！

在目前人民阵线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对

于那些愿意参加救国运动的派别要有适当的让步，以便吸引他们和我们合作。我们应该用诚恳的同志的态度和他们讨论一切问题，并批评他们的错误。我们要使他们在群众中能够宣传他们自己的观点，并在群众运动中使他们占有相当的地位，我们要吸引他们来经常参加和援助群众的行动。我们不要有拒绝任何派别参加群众运动的态度。

但是，我们既在群众运动中和各党各派合作，而各党各派就各有自己的立场与利益，因此，在统一战线中，各党各派互相的批评与“斗争”，是经常不能免的。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避免这种批评与斗争，我们主张各派都有宣传自己观点与批评别人观点的自由，而一切取决于群众大多数的公意。在这里，我们的同志在群众中，就要坚持自己的观点与立场，并利用一切的机会宣传自己的观点，同时要批评各党各派错误的观点，使群众了解我们与其他各党各派有什么不同？不同在哪里？使群众自由选择。但我们目前对各党各派的批评，都应该避免采用敌对的、蔑视的、谩骂的态度，对法西斯派也应这样。而且对其他各派我们虽然应该与最进步的一派接近，但当着他们互相冲突时，我们在态度上要避免在群众面前袒护任何一方面。

我党目前在救国运动中的立场，就是：（一）武装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收复失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与解放；（二）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反对汉奸；（三）实现民主自由，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四）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权，提高与改善工农劳

苦民众的生活。我们的立场就是如此。只要我们在群众中工作的同志,在任何时候都不动摇这个立场,那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其他各派,取得群众最大多数对我们的拥护。只要我们善于宣传自己的观点与批评人家的观点,并不断加强我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和阵地,结果,我们与各派合作,不会是我们的失败,不会是我们去投降其他各派,而会是我们的胜利,使其他各派依据我们的立场行动。所以我们的同志应该抛弃畏惧其他各派的心理,大胆的与一切派别在救国运动中合作。

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人力、物力与注意力)来开展群众运动与群众组织,这是我们目前唯一重要的工作。全体同志要来讨论与研究群众工作中的一切重要问题。只要我们准备了千千万万的群众到民族革命的战场上去,就等于准备了我们在决战中的捷报。

让我们的党变成群众的党! 让我们每一个在群众中工作的同志变成广大群众的领袖!

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 中的一个问题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

洛甫⁽⁵⁵⁾同志：

西安少壮军人的“左”倾暴动⁽⁵⁶⁾，及西安群众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关于这种错误的根源，我愿意在他的历史根源上提起你的注意。

我们关于一九二七年前中国大革命的教训，我都是同意的。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认为在一九二七年前我们还犯了“左”倾的错误，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这一点我提出过很多次，也是很多次被当作机会主义来批评过我的。然而我的意见至今还是保留着。而且我认为与今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特再一次向你提出。

我现在只说过去的工人运动。无疑的，一九二七年前，工会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作，作得不够，不周到，尤其在工人立法方面，全无建设，是属于右倾的。但这并不能证明在工人运动中就无“左”倾。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

倘若人们看了汀州的工人运动是“左”倾得“岂有此理”，倘若某同志咒骂苏区国家企业中的工人要求过高、不努力工作，是“左”倾得糊涂，那我就愿意告诉你，这还算不了什么，一九二七年前武汉、长沙、广州工人的“左”倾错误，比这还严重到十倍。

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作时间至每日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搜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极平常而普遍的。工会是第二个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它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府。你总听说过吧，这些事在小城市如汀州干起来问题还小，在武汉那样的城市，那样多工人干起来，问题可真有点骇人。然而我要问：这些东西是什么？是“左”还是右？

这些事干起来，而且是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与逃跑，物价的高涨，货物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都随着这种“左”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在当时是共产党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使，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

在起初人们都恳求共产党想办法，改正这种情形，就是

政府都不直接去干涉工人，共产党在当时也责无旁贷，答应改正这些事。但共产党未能改正这些事，而且连阻止这些事的发展都未作到，这就使得人们走入另外的出路。反革命就从而大施阴谋，利用来组织反革命的暴动。

共产党要来阻止工人这些事，又因为说服得不够，与采用强迫的办法（如逮捕工人），就不能不引起工人的反感，大大的丧失了工会与党的信仰。如是一方面工人不满意工会与党，另一方面国民党人及其他的许多人又责备工会与党，反革命就更好活动与利用。工会与党更孤立，地位更困难，虽然如此，但还没有发生过如西安二月二日那样的暴动事件，我们最亲近的人离开我们，在反对党的口号与方针之下去进行暴动。当时群众的纪律还很好，他们等待党的命令——向反革命进攻的命令。

当时的错误就是在于总是不发向反革命进攻的命令，在各方面肃清反革命，而是一直命令群众退却，阻止群众斗争，解除群众武装，以致对反革命的暴动不抵抗，结果失败。

以上是我们与国民党合作中期及末期的事。现在我们似乎又重复处在与人家合作的初期，这是学习上述教训应该注意的一点，二月二日的暴动如在合作末期发生，我们的态度应有不同。

大革命的失败，无疑是由于右倾的错误，但在失败以前及以前很久，并不是没有“左”倾错误的。这种“左”倾错误，至少是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右倾，正如西安的“左”倾错误要帮助右派一样。

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从“八七”会议以来，即不承认过去有“左”倾错误，批准过去一切的“左”倾错误，认为这些“左”的行动，是最革命的行动，不独不应纠正，还应大大发扬，而且谁要说过去有“左”倾错误，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对中国无产阶级不相信。同志，十年来的这种教训，今天有人拿到西安的群众运动中来执行，你能说他不对吗？

我想在研究西安的“左”倾错误时，应提到十年来我们对于历史教训的问题。这个历史教训深入每个人的思想中，如果不正确解决的话，那以后的问题还正多哩！

我对于这个问题感觉最深，而我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我现在愿意将我的感觉及经验简单告诉你。

我曾在一个历史长久的规模大的产业——安源矿山工作三年，将这一矿山每一角落的情形都弄得很清楚。我们在一万多工人中，有绝对的无限制的信仰。工人罢工后，生活大加改善，地位大加提高，工会有最高的权力，有法庭，有武装，能指挥当地警察及监狱等。即使这样，工人还不满足，还要更前进。（一）要求再增加工资，但实际情形是不能加了。（二）工人自动将每日工作时间由十二小时减至四小时，很多工人自由旷工，这就使生产减低一半。（三）工人不听管理人、工头指挥，许多地方要危害产业的前途与工程。（四）工人要扩大工会的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会范围内的事。当时在“二七”以后，全国各地工会均遭解散，这一个工会很孤立的巍然存在如海中孤岛。整个形势要求工会的方针退却与防御，然而工人要求进攻，这种情形将我苦

闷欲死。

为了忠实于工人长期的利益，不能接受工人的要求进攻。然而工人要自动进攻，自然产生这种领导进攻的领袖。资本家因为生产减低，逼着工会，各方责难工会不应减低生产。在工人中进行解释，说不清，无法只得在会议通过后去阻止早下班，结果弄到工人与阻止的纠察队冲突。李立三⁽²⁰⁾亲自带领纠察队去阻止，工人要打他。我批评工人不要过分，工人要打我，说我被资本家收买。也正当我与工人发生裂痕时，敌人进攻，预备武力解散工会，我们立即与工人在一起，动员工人抵御，完全胜利。然而问题还是如此。

工人要前进，但除组织苏维埃外，无法再前进。结果还不能不阻止工人，这是最困难的问题。然而广泛的教育与解释，民主的决定问题，提高纪律，逐渐使工人一步一步的明白，忍痛开除几个冒进的领袖，使情形有部分的改善。团结工人的力量，特别注意利用敌人内部的各种矛盾，注意宣传，结果还是将这个工会维持了三年，直至全国革命高潮复起，我离开矿山，才被敌人武力解散。

这件事对我印象最深，我无数次请问人家，请问外国朋友，提出讨论，直到现在我没有得到过满意的回答。现在我还认为当时的处置并不错。当时不是我右倾，不是我不愿意前进，而是工人“左”倾，工人不了解当时的形势不能前进。其实我当时寻找每一个前进的路，我也认为前进最痛快，最容易，但无路可走。

后来我到广州，又遇着了同样的问题。不过大多是小

企业工人，“左”倾的要求和行动同样严重。因此，我就有点称老资格，将处置安源矿山的经验拿来运用。我在一个工人代表大会上系统地提出了一个报告，详细说明工人的要求与行动应如何才属正当。大体是提出整个国民革命的利益高过工人经济的利益，工人不能为部分的暂时的利益，妨害长久的整个阶级的利益。经济要求应有最高限度，使企业不致倒闭。工人的行动要顾及联合战线，不要与当时国民革命的利益矛盾。同时批评了当时的“左”倾错误。

自然在上述报告提出之后，工人中是要引起相当反感的。

一九二七年初，我到武汉，又遇着同样的问题，当然我没有别的方法来解决。然而以广州的“钉子”，我只好不说话了。但各方面讨论的结果，还是不能不出于纠正过左的一途。

罗佐夫斯基⁽²⁹⁾到了武汉，我详细报告并请教过。但他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说：工人不能使企业倒闭，请政府帮助那些不能维持的小企业，工会不能代替政府。我说许多小企业大企业已不能维持，而工人还要提要求，又怎样办呢？他不答。

白劳德⁽⁵⁷⁾在上海，我和他谈过整两天，要求他答复我。他给我二十元纸币说：你谈的这些材料，我可写篇文章寄给美国杂志，分给你一半稿费。你所要求答复的问题，在我美国工人运动中还未遇到过。我才知道这是中国工人运动中特有的问题。

后来我在苏联又问过许多人，均未得到我所理想的答复。现在我想是不能有特别的答复的。

最后在苏区汀州又遇到这个问题，在我已经见惯了。但历史上都说工人这样作是“对的”。所以我不打先锋来反对工人，后来看到你们比我以前还要反对得激烈一些，我暗中感觉奇怪。我故意不提出办法，想看看你们是否提出好的办法，但你们提出的办法，比我以前提的更激烈些，某某甚至坚持要同保卫局来对付印刷所的工人，如是我知道，我过去的一些办法还可用。

我现在要提出的，是中国工人运动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政治环境好，工人有集会罢工自由，这个问题到处发生。否认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吗？这有什么好处？这只能使这个问题将来发生时，使同志不知如何应付。如果承认过去工人中的“左”倾错误是对的，那只能使这个错误在将来更严重的重复。

中国工人中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发生？我觉得是由于中国工人阶级下列的特点：

(一)由于半殖民地的经济，中国工人生活过于恶劣，使得中国大多数工人除开工资之外，还要依靠一些不正当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如轮船铁路工人运私货作生意，工厂工人、码头工人偷东西、作弊，电车工人揩油等；(二)中国工人(中国人民同样)，没有法律神圣的观念，他们看惯了法律只是统治阶级压迫被压迫者的工具；(三)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还太短，工人文化程度很低；(四)平常资本家与反动政权

对于工人的压迫太严，存在封建式的压迫；（五）革命工会领导与教育工作不够；（六）中国资本家软弱。

很明白，上述的现象，是中国革命工人运动初期的表现，幼稚的表现。“流氓性”带得很重。流氓组织，在工人中的长期存在，也影响工人运动，在一旦工人得到解放以后，他们就随心所欲的无所顾忌的，不估计将来与前途的行动。工会干部没有估计到这些，常常不能控制工人，而为工人的这种潮流所屈服或者冲倒。

工人中的这种“左”倾错误，总是在工会完全能公开，工人运动大发展时产生。但一发生以后，就很难纠正。常常用尽一切方法还纠正不过来。我没有一次满意的纠正过这种错误。比如汀州很少的工人，有陈云同志及其他许多人去，长期工作，最后还是没有纠正过来的。国家企业工人经过多次审判、开除，长期教育，虽大体上纠正过来，然而遗毒还是留存很大。然而这个错误一发生，影响当然重大。所以预防这种错误，异常重要。

怎样预防这种错误？（一）必须承认有这个问题，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发生的原因；（二）工会要有系统的改善工人生活，为工人计划周到，多方面来改善工人生活，不要等到工人自发的起来斗争；（三）工会要善于去运用政府权力机关，不要代替政府；（四）加紧对于工人的政治教育，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提高工人的革命纪律。

至于这种错误发生以后，则主要采取教育说服的方法来纠正。如用强迫的办法去阻止，很多是必然的要失败，要

将工会弄到极困难地位。

以上我只说到过去工人运动，其他方面不说了。

“八七”会议以后，工人中的那些“左”倾错误，全被批准，盲动主义正就接受这些东西再加以发展。

本来在革命胜利时，容易犯“左”倾错误，在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容易犯右倾错误。然而在我们中国相反，胜利时犯右倾错误，失败时犯“左”倾错误。这中间有些不自然的故意做作，比如有些同志害怕犯右倾，故意要“左”一点。这不只是“下级同志”如此，“上级同志”也如此，我也常如此。反对“左”倾的话，故意不说，不敢说，对“左”倾故意不反对、不打击等。

在革命胜利时，要领导群众前进，那不是困难的事，那是最容易的事。最困难的是当时形势不容许工人部分的过于前进、而这部分工人硬要盲目前进、要工人服从整个策略。

中国革命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常常在那个部分、那个地方、那个工厂对于革命准备好了，而且非实行革命的进攻不能前进，不能保持高度的群众热情，而在这个部门、这个地方、这个工厂对于革命又完全未准备好，必须使革命推迟。如是就常常需要少数前进的等待多数落后的，这种暂时等待是必要的，但是最困难的需要工人高度的觉悟与高度的纪律。这种等待不是机会主义。要工人暂时等待，甚至阻止工人过于左倾的行动，都不是机会主义。然而“八七”会议以来，认为这是可耻的右倾机会主义。如是这种最困难而又必要的事情就自然无人去作了，人们都只作

那最容易的事,接受工人中的“左”倾情绪。

革命高涨又将到来,统一战线策略又正采取,所以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实有必要。我认为,只有反革命才希望我们重复过去的错误,托派等更希望。

你的意见如何? 请你讨论!

敬礼

胡 服

二月二十日

关于群众运动的政策*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

在抗日政府之下关于群众运动的政策，应该分作以下两方面来说：政府对群众团体及群众运动的政策；群众团体及群众运动对各种问题及各方面的政策。

政府对群众团体及群众运动的政策应该是：

- (一)除开汉奸外，保障一切群众团体及群众运动的自由；
- (二)确立群众团体及群众运动在法律上的权利与合法地位；
- (三)在物质上协助群众团体；
- (四)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不在组织上去直接干涉群众团体的内部生活。

以上是政府对群众团体及群众运动的正确态度。只有政府允许群众运动的自由，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才能取得

*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少奇根据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的需要，撰写了《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由解放出版社印成单行本公开发行，署名陶尚行。全书共六节，本文是第五节中的第八部分。

群众团体与群众运动对于政府的忠诚帮助。有些人因为恐怕群众运动反对政府，如是就禁止或限制群众运动的自由，妨害与干涉群众团体的独立，强行委派群众团体的负责人或指导员去监视群众，命令改组群众团体等，这样只有更增加群众对政府的不满与怨恨，也就更加不能取得群众对政府的帮助。

还有一些人因为要群众有组织的帮助政府，如是就下命令要群众组织起来，甚至强迫群众去加入某种官办的团体。这同样也是不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与自由，同样不能真正组织群众与取得群众的帮助。因为群众是有思想有要求而且能动的人类，群众只有自动的组织起来，而不能被动的组织起来。

至于群众团体对各种问题及各方面的政策应该怎样呢？这是只能由群众团体自己来决定，政府及群众团体以外的任何其他势力是没有权利来直接干涉的。在抗日根据地的各种群众，首先自己应该组织起来。在群众自己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各种要求纲领上，建立真正群众的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及青年、妇女、儿童等团体。要使最大多数的工人、雇农组织在工会之内，最大多数的农民组织在农会之内。

工会应该按产业与职业的界线，组织起来，成立独立的雇农工会及各种手工业工人联合会等。在农会中要包括一切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雇农、贫农、中农、富农都在内。但不从事农业劳动的地主、豪绅，不能加入。

这些群众团体的内部生活，应该有广泛的民主，一切领导机关由会员选举，经常召集会议报告工作及决定重要问题。这些团体的经费应该独立，征收会费。但在不妨害团体独立性的范围内可以接受会外的帮助与捐款。

这些地区的商会应该动员商民来改组，打破少数大商人的操纵。

救国会、抗敌后援会等组织，在这些地区是必须要组织的。但它只应该是各种群众团体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上联合起来的组织，而不应该由它来代替与统制一切其他的群众团体。当着基于完全民主制度的政府机构从下至上建立起来以后，这样的政府是比救国会、后援会等更高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这时候救国会等就不应该再有代替政府的行动。

这些群众团体应该提出自己明确的在当时可能实现的要求纲领，动员群众为实现这些要求（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而斗争，并进行广泛的订立契约的运动（工人与雇主打立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契约，农民与地主订立减租减息^{〔58〕}的契约等）。依靠群众团体的努力与群众的斗争，彻底实现政府改善群众生活待遇的政策。

为改善群众生活待遇的群众斗争，在这些区域不独不应该停止减弱，相反，应该广大的发展起来，只有这种斗争的发展，才能团结与组织群众，改善群众的生活，实现民主权利，并发动广大群众去参加民族革命战争的最高积极性。反对在抗战时期发展群众改善生活的斗争，认为在抗战时

期应该停止一切群众斗争的理论是最错误、对抗战最有害的理论。因为停止群众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就等于停止群众运动，就不会有群众生活的改善。

在抗战期间，为了对付顽强的资本家、地主及不可救药的官僚，群众斗争的方式，如罢工、示威等原则上均不应该拒绝采用。但是群众团体自己应该切实避免采用足以妨害抗日军事行动的斗争方式。应该采用更多的更复杂的方式去斗争。对于政府的调解与仲裁，不应该拒绝。但群众团体要推定自己认为适当的人去参加仲裁。

群众团体提出的政治、经济要求，应该是当时能够实现，对方能够担负的要求。不应提出过高的、当时没有实现可能的及为对方所不能担负的要求。因为过高的要求与过左的斗争方式，对群众自己的长远利益和抗战都没有好处。

工会、农会是抗日政府最重要的群众基础和群众柱石。没有强大而有力的工会、农会作为抗日政府的基础与柱石，抗日政府是沙洲上建立起来的房屋。工会、农会及一切群众团体的中心任务，是在广泛发展群众为改善生活待遇斗争的基础上，引导广大的群众去参加抗日政府与抗日武装部队的建设，派遣自己最好的干部到政府与军队中去负责工作，动员群众去加入抗日军队和游击队，发动群众去参加抗日战争中各方面的工作。

群众团体参加到政府中应该起积极推动政府的作用。应该在政府中提出各种建议及法律、命令的草案，应该动员群众帮助政府一切进步的对抗战有利的法律、命令之实行，

应该与政府中各种错误的主张及消极怠工的官僚和动摇分子进行斗争，要求撤销这些分子，但群众团体不应该代替政府的职权。群众团体直接逮捕与审讯人民，都是不对的。群众团体更不应该与政府整个对立。

在政府公有企业中的工会，除开为改善工人生活而努力外，应发动工人为提高生产而努力工作，提高劳动热忱、劳动纪律，工会并应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这些公有企业的管理。

由工会及政府来监督与管理一切私人企业的办法是不对的。只对于个别有汉奸嫌疑及怠工的企业，才可由政府去监督。在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如果政府已经实行了民主的改造，群众团体的任务就是：（一）使自己变为真正有广大群众的团体；（二）普遍的彻底的改善群众的经济生活，提高群众在社会上政治上的地位，提高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三）发动广大的群众参加抗日政府及抗日军队的一切建设。

工会工作大纲*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八日)

一、中国工人是中国人民中抗日最坚决最彻底的一部分

中国现在正处在残酷的民族自卫战争中。要战胜强大的凶恶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必须要有全民族的团结与长期艰苦的奋斗。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中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最坚决最彻底的一部分，因为：

第一，中国工人是中国人民中最受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一部分；

第二，中国工人的彻底解放，只有在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以后才有可能；

第三，中国的产业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受过严格的组织和锻炼；

第四，中国的工人有过长期的反帝革命斗争的历史与经验。

* 这是刘少奇抗战初期在华北工作时，为开展职工运动而写的一份提纲。

所以中国的工人阶级，应该是中华民族解放战争中最英勇最先进的战士。在抗日战争中要动员、组织与武装全体人民来参战，尤其要动员、组织与武装中国的工人来参战。在长期的艰苦战争中需要发动工人最高的积极性与牺牲奋斗的精神，来提高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与运输能力，来参加一切抗日的武装部队，来组织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群众，并成为组织纪律和艰苦奋斗的模范。

二、中国工人阶级目前主要的任务是积极参加抗战，争取抗战的胜利

中国工人阶级应该最积极的来参加目前的民族解放战争，并给这个战争以最高限度的组织性、坚持性和彻底性，以便求得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与独立自由。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虽然还不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最后的解放，但对于中国工人阶级是很有利益的，因为中国民族自卫战争的胜利是中国民族的最高利益，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最高利益，所以为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斗争，也就是为自己阶级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第一，中国民族正处在危急存亡之秋，中国工人是中国民族的一部分，是黄帝的子孙，中国工人必须为中国民族的生存而坚决奋斗；

第二，如果不幸亡国，中国工人在亡国后所受的痛苦和压迫将比现在更大，将比其他阶级更为惨痛；

第三，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解放，必须在中国民族完全独立以后，才能实现，中国民族解放的胜利，对于中国各阶

级都有利益，对于工人阶级自己的解放也同样有利；

第四，帝国主义者压迫剥削中国的整个民族，同时也就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大的剥削者和压迫者。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就是推翻中国工人阶级最大的和最强有力的剥削者和压迫者；

第五，中国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将使世界上一个极大的极反动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堡垒与支柱——日本帝国主义倒台，这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条件下，将大大的加深这种危机，削弱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力量，大大的帮助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尤其是日本的工人阶级和朝鲜等被压迫民族；同时，世界尤其是日本工人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胜利，反过来又要帮助中国民族与中国工人阶级的胜利与解放。

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在目前抗战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积极的参加抗日战争，并用一切力量使目前的抗日战争坚持以至取得彻底的胜利。只有这个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解放才有可能。

有人认为中国工人阶级目前的主要任务，不是积极参加抗日战争，不是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是“准备工人自己的武装暴动，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忘记目前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进攻，去幻想所谓“社会主义共和国”。

三、中国工人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作用

中国的机器工业发展得很迟很慢，因为帝国主义、封建

势力的阻碍使得中国的民族工业很难发展，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很软弱。因此，就使得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虽然是参加的，但是不够顽强与彻底，常常幻想妥协与苟安。然而中国的工人阶级就不同，中国的工人阶级不论在力量上与政治上都比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要强大得多，因为外国资本在中国开设的企业很多，但它不属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权力范围，在这些企业中的工人，则是中国无产阶级中重要的部分。中国工人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中，有丰富的经验。所以中国工人在今后反日战争中，同样要显示他们在各方面的伟大的作用。

中国产业工人约有四百万人，连同工人的家属约占中国人口的二千万；中国的手工业工人及农村工人、雇农，将近二千万，连同他们的家属，约有六七千万人。那么中国的工人约占中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强，这当然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大的力量。

中国工人很早就参加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及国内的压迫者。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很早就出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角色。例如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员反对帝国主义的大罢工，一九二三年“二七”铁路工人反对北洋军阀的罢工，一九二五年“五卅”上海及香港工人反对帝国主义的罢工，一九二六年上海工人反对孙传芳^[12]的武装暴动以及一九二七年武汉、长沙、九江工人的工人运动，收回租界并在工会中组织过广大的工人，接受过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中国工人已有很光荣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传统。在今天中

国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工人应该继续过去光荣的传统，在神圣的抗日战争中站到最前线去，成为中国长期抗战的民族英雄！

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将因中国广大工人群众有组织的积极的参加更加坚强有力，克服各种困难，提高国防生产以及增进各种组织中的坚强性与纪律性，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四、中国工人阶级现在的弱点及产生这些弱点的原因

今天，中国工人中还存在着许多弱点。存在这些弱点的原因，虽然主要不是由于中国工人阶级自身所产生出来的，然而这些弱点的存在，确是动员广大工人群众参加抗战的一些困难和阻碍。这些弱点是：

(一)中国工人的最大多数还没有组织；

(二)全国还没有一个动员工人参战的机关，甚至还没有一个象样的由工人组织起来的在工人中有比较广大影响的报纸；

(三)中国工人的生活过于困苦，工资太少，工时太长，待遇太坏，许多工人处在饥饿、失业、疲劳和半死不活的状态中。

上述这些弱点的存在，自然就阻碍着动员广大的工人参战，甚至使得许多人想参战，想提高生产、肃清汉奸和武装自己与进行游击、破坏敌人交通等而不可能。这些现象，应该立即消灭，立即设法克服。

在今天更为奇怪的是，至今还有人反对工人组织起来，

还采用一些办法去压制工人的组织与参战行动，还反对工人生活有适当的改善与可能范围之内改善，甚至还采用许多强迫的办法，去加紧对于工人的剥削和压迫。对这些人，不能说他们是汉奸，也还不能说他们是有意破坏抗战，然而他们的思想与行动，在客观上确实是阻碍工人的参战，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他们自私自利，把自己的部分利益看得比民族国家的整个利益还要高。

记得山西新绛某纱厂的厂主，当着接到山西绥靖公署的命令，要他开工的时候，他向绥靖公署提出下列四个条件：

(一)对于参加过任何救国团体和救亡运动的工人，一律开除；

(二)工厂中的牺牲救国同盟会⁽⁵⁹⁾须立即解散；

(三)过去工人每日两小时的军训取消；

(四)保障工厂开工后，工人不得有任何组织，并不许任何人去组织工人。

如果绥靖公署不保障上列四个条件的施行，工厂就不开工。然而这个工厂中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工人与厂主有过什么冲突。

当着凶恶的日军已经打进了堂屋，不到多少时候厂主与工人以及工厂的生命财产都要被日军毁灭或被日军没收利用以进攻全国的时候，厂主对于工人参加救国运动，还不能有任何的原谅和让步，甚至不能对于抗战的官府有任何的原谅和让步，这难道不奇怪吗？在这种事实面前，我们应

该说：无知识的、没有民族观念的、自私自利的、只顾自己赚钱不顾国家危亡的是这样的厂主，而不是工人。这一类的事实，在抗战中，把它肃清是必要的。

五、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工人目前最大的敌人

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是很苦的，厂主及包工头是无限制的剥削工人，工人的工钱极少，工作时间很长，待遇条件极坏，工人没有任何的法律保障。虽然国民政府在七八年前就颁布了工厂法，但许多厂主无视政府的法令，不在工厂中实行。而且这个法律是只限于雇请三十个工人以上的工厂才有效，因此小工厂的工人，就连任何法律条文的保障都没有，任凭厂主与包工头剥削。工人很少的工资还常常受到克扣与拖欠，高利贷者与商人又从中剥削，而有些包工头同时就是高利贷者、商人及毒品贩卖者和赌头。企业中的黑幕常是很多的。

失业工人当然是更加痛苦，他们简直没有任何的救济。最近因为战争的破坏，使得许多工厂不能开工，工人又大批的失业了。他们流散在各地，没有人来管他们。

政府在过去既没有法律与一定的机关去保护工人，而工人又没有工会的保护，极少极少的工人虽然有工会，这些工会中有一些虽然也多少防卫了一些资本的进攻，但是这些工会常常不能很好的保护工人的利益。

中国工人的生活处在如此困苦和不能忍受的情形之下，自然就障碍着工人参战热潮的发展。工人为资本及厂主耗费了他们全部的精力，自然就难有更多的精力来贡献

给国家民族了。

为了动员广大的工人来参战，适当的改良工人生活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国难期间，还有些不顾大局的资本家竟藉着国难的日子来加紧对于工人的剥削和压迫。他们说：在国难期间，工人要替资本家更多做一些工，更少要一些工钱，更不要去参加什么组织、会议和运动。只有资本家更多赚一些钱，才是爱国，如果工人爱国而使资本家有任何一点牺牲，都是要不得的。资本家就趁着这样国难的机会来发财，来反对工人参加抗战。这是在抗战期间必须纠正的“理论”。

然而中国的工人不论他们的生活是如何的困苦，在目前竭尽他们一切的精神，来参加抗日战争的各方面的工作，仍然是必要的。中国的资本家、厂主、管理人，不论这些人是如何的剥削、轻视与压制工人，但中国工人今天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如果不幸中国的土地和工厂被日军占领，中国的工人被逼不能不以亡国奴的资格在日本帝国主义管理之下工作的时候，那中国工人所受的剥削、压迫、屠杀和限制将要更甚于今日。所以中国的工人：

第一，必须竭尽一切方法来参加目前的抗日战争，不能因为生活的痛苦就放弃工人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所应该担负的责任，更不能等待工人生活改善了之后再来参加抗战；

第二，必须把日本帝国主义当作中国工人今天的主要敌人，不能把中国的资本家、厂主、管理人当作主要的敌人；

第三，在积极参加抗战的一切工作中，要设尽一切方法

在可能范围内对工人的生活、工资、工作时间以及对于工人的待遇与管理，有合理的改善，也只有当工人的生活、待遇与管理已经有了改善的时候，才能把工人参加民族解放战争的积极性、热忱与对于民族国家的忠诚提到最高限度。

六、怎样来组织中国工人？

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在平时，工会的基本任务是团结与教育工人阶级拥护工人的切身利益，并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但是在目前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时期，工会除开忠于这样的基本任务以外，还必须以动员广大群众来参加抗战，参加民族解放战争中各方面的工作与建设，为自己的最高任务。因此，在目前以工人救国会或工人抗敌会的名称去组织工人，代行工会的任务也是可以的。

为了经常的系统的广大的动员工人群众来参加战争，组织工人，建立工会（或工人救国会），是迫切的必要，但是怎样去组织工人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根据各个地方各种不同的环境与条件来决定。我们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情况：（一）在大产业及大城市的工人中；（二）在乡村及小城市的手工业工人与雇农中；（三）在已有工会组织的地区及产业中；（四）在没有工会组织的地区及产业中；（五）在战区及敌人后方的游击区域中；（六）在敌人统治的城市或乡村及产业中。

在上述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去组织工人与动员工人参战，都要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与方法，但是一般的原则，除开在敌人统治的区域以外，是要组织公开合法的工会，组织统

一的工会。如果在已有工会组织的地方及产业中，就应在原有工会的基础上来组织包括大多数工人的统一的工会。一方面，吸收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加入工会；另一方面，使各种分裂的不统一的工人团体合并与统一起来。要做到在产业工人中以产业为界限来组织工会（如海员工会、铁路工会、矿工工会、纺织工会、五金工会、印刷工会等），在手工业工人及店员中以职业为界限来组织工会（如裁缝工会、木匠工会、店员工会及雇农工会等）。

现在我们不来研究全国各地的工会工作怎样做，仅根据华北目前的情形来讨论一下华北目前的工会工作应该怎样做？

七、华北的目前情况和特点

华北大部分的土地是被敌人占领了，然而在目前除开主要的城市与交通要道及大的工业区域外，敌人的统治还没有建立起来。在华北广大的地区中正在抗日游击战争的保护下，保持了或在建立着中国的地方政权。华北许多有名的工业中心和铁路，受了战争的破坏或受了战争的影响而停工，工人失业，逃到了乡村或外省。一部分的工厂、矿山及铁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开工，中国的工人在日军强迫与监视之下，从事工作。在我军占领的地区，也因为日军的破坏与封锁及战争的关系，使得工厂不能开工，百业零落，工人失业，货物缺少，物价数倍的提高，少数商业的利润超过了平常水准数倍以外，这种情形又刺激了一些工商业者企图在某些比较安定的地区，组织小规模的生产与

恢复营业。

华北极大多数的工人是没有组织起来的，只有极少数的几条铁路和工厂有工会。然而这些工会都不能争得工人的信仰，在日军进攻的情势下，这些工会的负责人大多数跑到了乡下或外省，离开了工会的职务。但另有一部分工人在抗战中组织了自己的工会，并组织了工人自卫队（如山西）、游击队，还有一些工人加入军队和游击队。

以上就是华北目前情况的特点。因此在华北进行工会工作，主要是组织与动员乡村及小城市中的工人、雇农、失业工人，而且主要是在游击战争的环境中来组织与动员工人。此外在敌人统治下的大城市与产业中还要进行组织工人的工作。

虽然如此，华北的工会工作仍不应该脱离全国的工人运动而独立，正如华北的抗战不能脱离全国的抗战而独立一样。华北的工人组织应该接受全国工人运动的帮助、指导与影响，同样也应该积极参加全国的工人运动，给全国的工人运动以帮助、推动和影响。

八、华北工会的组织系统

在华北应该怎样组织工会呢？

在华北应该主要的按照地域的区分来组织工会，在各个地域中的工会的组织大约可以区分为下列四种：

（一）比较大的产业工人的工会（如同蒲铁路工会及比较大的工厂、矿山的工会）；

（二）某些手工业工人工会（如某些挑夫、船夫、纸工、席

工等特别多的区域,即组织该项工人的工会);

(三)小的城市工人工会(如各个县城及大市镇中的手工业工人与店员等);

(四)农村工人工会(即乡村的雇农、手艺工人的工会)。

除开上述四种以外,还有各地的中心学校的教职员联合会,以及机关公务员的团体,也应该属于工会范围之内。至于在敌人统治区域的又当别论。

在华北每一个中心区域(这种区域是按照敌情及行政与军事来区分的),应该成立一个总工会。在这个总工会之下,直属各县的县工会,及某些大的产业工人工会与大的手工业工人工会。在每一个县成立一个县工会,在县工会之下直属各区、村的工会及城市工人工会与某些比较小的产业工人工会(如二三百人以下的矿山工会等)。在每一个村成立一个工会支部(小村可联合数村成立一个支部),在支部下可分为雇农组、裁缝组、木匠组。在支部之上则成立区工会,直属于县工会。

在城市工会下,则按职业的界限来组织工会支部(如店员支部、理发支部、裁缝支部等)。

在各个区域的总工会之上,还应该成立全华北的工会联合总会,来统一领导全华北的工会,正如全华北的政治军事也应该成立总的统一领导机关一样,而华北的工会联合总会则应加入全国总工会。

九、工会的各级组织

工会的基本组织,是各工厂、矿山、企业、机关的工会支

部与各个乡村的工会支部，每个工会支部由全体会员大会选举一个支部委员会，人数由三人至六七人。并在支部委员会中互推主任、劳动保护及宣传（或称文化教育）、组织、武装动员等委员若干人。在支部之下为了工作与开会及征收会费的便利，可分成若干小组，每组人数不定（由五、六、七至二三十人均可），设组长一人，工会有事时可召集组长联席会议。

在工会支部之上组织区工会委员会，县工会，中心区总工会委员会，或组织某一产业的及某一职业的工会委员会，均由代表大会选出，委员会人数依其会员之多少来决定。

工会的各级委员会应分成下列各部来办事：

（一）组织部。管理发展、登记会员，分配训练干部，建立与指挥工会组织等事；

（二）宣传部（或称文化教育部）。管理对外宣传、对内教育、工人学校以及各种文化娱乐体育等事；

（三）秘书处。管理文书、会计、会费征收以及会内各种事务等事；

（四）劳动保护部（或称生活改进部）。管理工人生活与劳动条件之改善及订立劳资合同与创立工人合作社等；

（五）战争动员部（或称工人武装部）。管理工人自卫队及动员工人参加各种战时服务等事。

在青工、女工多的工会，可加设青工部、女工部，管理青年工人及女工的一切事务。各部设部长一人或二人，事务多时可设干事若干人。

工会各级代表会应经常召集。区工会每三个月，县工会、中心区总工会每半年或一年须召集代表会一次。代表以会员人数比例选出。

工会的组织原则，应该是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一切主要问题要经过会议决定，一切问题在没有经过多数人决定以前，均可自由提出意见和讨论，但一经多数决定以后，必须全体一律执行。

十、工会的会员

工会的会员应该是一切工钱劳动者，只要他承认工会的会章，不做汉奸，缴纳会费，不分年龄、性别、籍贯和信仰，均可加入工会为会员。工厂、机关、矿山、学校中没有取消工人权限的职员及教员，不剥削工人的工头，均可加入工会为会员。

农村中的雇农及手工艺工人加入工会的资格，应该是凡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活资料的全部来源或主要来源的雇农和手工艺工人均可加入工会。但是那些只以出卖劳动力为附带收入的贫农及小商人等，则不应该加入工会作为会员。

在华北，有许多这样的“佃农”，即由地主供给佃农种子、肥料、牲畜、耕具等，佃农全家只有劳动力，在地主的土地上劳动，收成的时候由地主分一部分收成（约百分之二三十），给佃农作为劳动力的报酬。这种佃农实际是雇农，只是以一部分收成的形式代替工资罢了。因此这种佃农是可以加入工会的。

在乡村中，工人、雇农所得工资的形式常常不是货币，而是物品或其他的形式，不管工资的形式如何，只要是靠出卖劳动力而生活的人，即可加入工会。

在乡村中的手工艺工人与运输工人（铁匠、搬夫、船夫、车夫等），常是有自己的工具或运输器具（如船、车、牲口等），然而他们的生活是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的，他们可以加入工会。

乡村与城市中有自做自卖的手工业者，因为他们不是出卖劳动力而是出卖自己的产品，他们对于工资、工作时间、劳动条件等的改善并无兴趣。他们不是工钱劳动者，不能加入工会，但工会帮助他们组织合作社联合会等是可以的。

在农村中依靠宣传宗教迷信而生活的人（如和尚、道士、看相、阴阳师等人），因为他们不参加社会的生产，不从事有益社会的劳动，他们不能加入工会。但是被雇在宗教机关中劳动的人，可以加入工会。

在城市以及大产业中工作的工人，因为日军的进攻而逃到乡村去的失业工人，即使他们暂时从事其他的事业以谋生（如做小生意等），他们还应该被吸收来加入工会。

原则是工会应该吸收所有工钱劳动者来加入，但是不应该使工会变成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的组织，而应该保持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组织。

在农村中的工人、雇农，一切工会的会员，应该加入农会或农民救国会，但是仍应保持工会的独立组织。在农会

中有工人、雇农的特别小组，即工会的支部。

十一、工会的经费

工会的经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工会要有充分的经费才能主办对工人有益的许多事情，同时经费的收集、集中和开销，又必须有慎重的适当的方法。

一般会员的入会金可以不收，但在入会时应该缴纳工会一次的经常费。每个会员应向工会缴纳经常费，数目大约相等于工资的百分之一二。工厂、矿山的会员可以月缴一次，农村雇农、手工业工人可以每年缴纳二次至四次。会费的缴纳在农村中不一定要货币，物品也可以代替。失业工人的会费可以经支部通过之后，减收或免收。

工会的经费主要应靠会费来维持，政府的津贴及会外的捐助是可以接收的，但是不要因此而失去与妨害工会的独立性。

工会的经费应以集中分配为原则，即下级工会收入的会费应交给上级工会或向上级工会报告预算与账目，上级工会应该批准、审查与补助（在下级工会经费不足时）下级工会的经费。

对工会的办事人员应该规定一种最低的生活或津贴，一切开支应该节省。应该建立工会的会计制度，养成廉洁与节省的作风。

工会的账目应经常公布，应经常由工人组织经费审查委员会来审查，对于贪污的办事人员应该给以严格的处罚。

十二、工会的战时动员工作

在抗战时期，工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动员广大工人群众与会员来参加战争中各方面的工作与建设，主要的有如下一些：

(一)动员工人加入抗日的军队，派遣工人到战场上去服务(如铁路破坏队、交通队、电信队、救护队、运输队等)；

(二)积极帮助政府建立国防工业，发动工人的劳动热忱，提高国家工业中的生产，提高工作的技能；

(三)帮助政府武装工人，组织工人自卫队，或动员工人加入人民自卫队或工人游击队；

(四)帮助政府肃清汉奸，巩固后方，帮助政府一切抗战法令的执行；

(五)派遣积极的工人干部参加一切抗战的领导机关和组织，帮助这些机关的整顿，提高他们在抗战中的效能，反对贪污、浪费、腐化及官僚主义等；

(六)动员工人群众帮助与慰劳抗日的部队，帮助部队的给养运输与政府财政经济政策的执行，帮助政府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及救济难民等。

工会要发扬工人群众的积极性，最高限度的来达成上述各项任务。要以事实上的模范的积极的行动参加工作来提高工人与工会的地位，影响一切群众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努力；同时还要帮助政府监督那些自私自利的在抗战中怠工与逃避战时服务的资本家及坏人，在群众与舆论面前暴露他们。

工会的这些动员工作，是在整个的战时动员计划下来

进行,因此工会应与政府及动员机关有经常的接触,或加入政府动员机关。

十三、工会的文化教育工作

为了要动员广大的工人群众来积极参加战争中各方面的工作,在政治上教育工人,提高工人的文化政治水平是非常必要的。教育工人群众,是工会的主要任务之一。

工会应该以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来教育工人,将目前中国的危机、民族的出路、抗战的形势等向工人解释,并与工人痛苦的根源、工人的出路以及各地工人运动的情况联系起来,尤其要以工人运动中的实际事实作为材料来教育工人。

为了培养大批工会自己的工作干部,工会开办各种训练班是必要的,工会应选择最好的工人去参加各种军政学校训练班。

工会要在工人多的地方及城市中创办工人学校、补习班、夜校、俱乐部及体育会等,在农村中成立工人、雇农的识字组、训练班,或附属在民众学校中,一般的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及开展娱乐活动。

应该出版工人的报纸、书籍、小册子和印传单等来教育工人,鼓励工人。

工人子弟学校在工人多的地方是应该创办的。

这一切宣传教育工作的目的,在于提高工人参战的积极性,以及使工人了解自己的地位、责任与出路。

十四、工会要改善工人的生活

为了要动员广大的工人群众积极参加抗战，减少工人的痛苦，改善工人的生活与待遇，是十分必要的。

工人的工资过少，应当有适当的增加，应当按期发给工人工资，不应当拖欠，应当铲除克扣及处罚工人工资与工头从中剥削工人工资等一切积弊。

工人的工作时间过长，应当适当的减少，使工人有必要的休假以及受教育与从事社会活动的必要时间，如星期日、重要纪念日休息，工资照给，以及每年的例假等。

对于工人的待遇与劳动条件，应该有适当的改善，如工人疾病、死亡的抚恤，伙食、住宿的改良，管理方面的改善，取消打骂与开除工人等。

对于学徒及童工、女工，应有适当的保护，按照他们的工作成绩，付给他们的工资，实行同工同酬，不使他们做危险、有害卫生及过度的工作，增加对于他们的教育，以及保护母亲等。

对于工人的人格，工人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工人社会政治地位的提高，都应有合法的保障。要使工会享有代表所有工人签订团体合同及参加一切社会政治活动的权利。

对于失业工人应该设法救济，为他们找工作及谋生的办法，帮他们组织合作社等，并动员他们加入军队及自卫军等。

工会应该经常不断的不怕麻烦的来改善工人的生活，以及解决每一个工人及其家属所提出的问题，只有这样才

能建立工会在工人中的信仰，才能发动工人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来参战，为民族、国家牺牲他们的一切。

改善工人的生活，应当向资本家、雇主提出要求，并与资本家、雇主订立合同。但是还有许多事情是要向政府要求的，如要求政府主办各项工程，帮助工人组织合作社等。

在乡村中要求雇农生活的改善，除开工资外，要特别注意改善雇农的伙食、住室及衣服等；对于手工艺工人、店员、学徒的生活要特别给以注意，对打骂、虐待与无限制的驱使学徒劳动及从事杂务等，必须予以制止，但同时必须鼓励学徒努力学习，尊重师傅。

在动员工人参战与改善工人生活上，工会对于没有加入工会的非会员工人，应该和会员平等看待，工会不应该拒绝保护非会员工人的利益。

当着工人向雇主提出要求时，必须同时是动员工人来参战，在动员工人参加抗战的大前提下，来提出工人合理的要求。过高的要求以及当时不能实现的要求，工会不应该提出来，就是工人提出时，也应向工人解释。应该纠正工人中行会的倾向，如只兢兢于工人自己目前一时的经济要求，而不顾工人长远的利益，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等。

为了达到工人的要求，工会应该尽可能的采取与雇主协商的方式，避免罢工、怠工等方式。如协商还不能达到工人合理的要求时，就应该设法请人调解、请政府仲裁等来解决之。在敌人的后方，在游击战争中，要避免一些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激烈斗争，以免被日寇利用，虽然这种斗争是不能

完全消灭与避免的，工人与资本家的利益是不能调和的。

如果资本家勾结日寇来压迫工人并破坏抗日战争时，那当然应经过政府以处罚汉奸的法律来处理，但只要资本家不做汉奸，工会不要故意的去加紧反对资本家，甚至随便用汉奸的帽子戴在资本家的头上，不要逼使资本家往汉奸路上走。

对于顽固的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的资本家、地主，工会是不能不反对的，但是工会一般的要求号召大家（一切中国人）联合起来去反对共同的民族死敌——日本帝国主义。应该不拒绝与愿意抗日的资本家、地主联合去共同抗敌。

动员工人群众参战，教育工人，在工人中进行文化娱乐工作，改善工人的生活，是工会的经常工作，应该使这些工作在实际上联系起来，并与工会的组织工作联系起来，使工会真正成为广大工人群众的工会，抗战的工会，拥护工人利益的工会和工人群众的学校。

十五、工会与其他救国团体及政府的关系

工会只是救国的主要群众团体之一，因此工会与其他一切救国团体在共同的救国目标与共同纲领之下联合起来，动员一切群众来参战。

这种联合的组织，应该是群众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应该是广泛的群众组织，应该包括一切愿意抗日的团体，最主要的应该是农会、工会、青年救国团体及妇女、商人的救国团体。这种联合的组织，在全国有抗敌后援总会，在山西有牺牲救国同盟会，所以工会应该加入抗援会与牺盟会。不

过工会还应该保持他自己组织上的独立。

不论是省的、县的、区的、乡村的工会，都应该参加当地的统一的救亡团体，与农民、学生、妇女及其他一切抗日人民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并且支持统一战线，服从统一战线。

在同一地域工人群众中，如有两个以上同性质的工会出现时，应该在抗日与保护工人利益的目标下联合与合并，建立统一的工会。

工会对于政府与军队，应该站在群众团体的地位，积极动员群众帮助政府与军队抗战，参加政府所提出的一切战时工作，在可能时参加政府所组织的动员机关。工会还应该选择自己最好的干部给政府与军队分配到各个战线上去，工会应该成为抗日政府最重要的群众柱石之一。

但是工会不应该代替政府职权，不应该随便的逮捕人及向人民强派勤务等。

政府公有的企业特别是国防工业中的工会，除开保护工人的切身利益外，应该为巩固与发展国防工业而努力，提高国防工业的生产，提高劳动纪律与热忱，肃清破坏分子，纠正管理机关的官僚主义与积弊，为了这些，工人在原则上是可以派代表参加国家企业的管理的，但在私人企业中的工会，监督生产或参加企业管理都是不对的。

十六、在接近敌人地区的工会工作

上述各种工会工作方式，在华北目前情况下，在我军的后方及游击根据地中是能够如此做的，也应该如此做，以便

迅速的动员、组织与武装广大的工人群众来坚持华北的抗战。但是如果情况变动，如果某地政府及当局不能允许工会公开存在与工作，那就要采用在当时最适当的方式来动员与组织工人，采用当时能够公开进行组织工人的方式，去达到动员工人来积极参与与改善本身生活的目的。

在一些接近敌人的地区，因为那里经常有受敌人破坏的可能，因此在那些地方要尽可能的采取不公开的方式去组织工会，以及建立各种群众的救亡组织，要准备在敌人侵入时，工会还能秘密的保存自己的组织与进行工作。

当着敌人侵入时，公开的工会机关与负责人是不能存在的，一部分的工人，也是不能继续工作而需要逃避的，这时工会机关应该迁移，一切不能在敌人统治下存在的工作人员应该离开，并要负责的为避难工人解决各种困难，但是工会还必须设法准备各种秘密的组织及交通侦探等，在敌人统治下活动，同时动员工人武装起来，参加游击队与抗日军队。

十七、在敌人统治的城市中与地区中的工会工作

在我军后方的工会，要克服一切困难去帮助在敌人统治下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区域的工人，设法与他们发生联系，在政治上、物质上和组织上去帮助他们，建立他们的组织，帮助他们训练干部，并派干部到这些地方去工作。

在敌人统治下建立公开的工会当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利用完全灰色的组织（如在理会〔60〕、佛教会、同乡会等）去团结工人，为保护工人的切身利益并帮助抗日军队与游

击队而斗争，动员工人去加入游击队、侦察队，去侦察敌人的消息，报告给游击队，并破坏敌人后方的交通、军事设施及军需粮秣等。同时还要使敌人不能好好利用工厂、铁路和矿山去进攻中国人民，设法在工人中组织怠工或必要的破坏等。

在敌人统治下的中国工厂中的资本家和管理人，如果他们不是完全的勾结日寇来压迫工人并将工厂奉送给日寇，那么工人应与资本家及管理人联合起来去反对日寇所加于工厂的压迫，反对没收及改组工厂，并须设法使资本家与管理人不反对工人进行反日工作及建立反日组织。

日寇、汉奸所组织的群众团体与武装部队，工人中的抗日积极分子应当加入进去，在里面团结一切有民族意识的分子，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的斗争。

十八、结论

在华北各地，应该紧急的将广大的工人组织起来。他们有爱国的情，有牺牲奋斗的精神，有专门的技术，有纪律，有革命斗争的经验。一切救亡运动的领导者，不应该忽视工人或对工人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重大作用估计不足，应该迅速组织工人，动员他们到民族解放革命的战场上去。

目前应该立即在各县、各城市、各重要企业中，在各中心区域，成立工会筹备会，正式发起工会的组织，筹备经费，训练工会工作的干部，起草工会章程，召集工人的会议，来成立各个地方的、城市与乡村的工会组织，特别那些已经组

织起来的工会，应该积极的工作起来，发展起来。

在组织工会的过程中，同时要动员工人起来参战，并且向政府、工厂解释工人组织工会的动机，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要使华北各个游击中心区域的工人的最大多数，组织到工会中来，并发动这些工人来积极帮助政府和军队坚持华北抗战到最后，使工会成为华北最重要的抗日团体之一，成为政府与军队抗战中最重要的群众支柱之一。到那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抗日政府与军队到处得到工人与工会在各方面自愿的积极的帮助。抗日战争在华北的胜利，要解放华北的人民，因此也要解放华北的工人。

民众运动讲话大纲*

(一九三八年)

民众力量在组织。

第一节 怎样才能使民众组织起来

一、民众是有思想有要求与能动的人类，而不是别的。所以民众只能自动的组织起来，而不能被动的组织起来。

强迫民众组织起来的不可能，及强迫组织的民众团体之无力。

企图以组织民众的办法来统制民运与消灭民众运动的结果，常是这种企图的反面。愈压迫民众，民众愈反抗。

某些人对于民运的观点是：需要的时候拿起来，不需要的时候能放下去。但结果常不能如这种人的愿望。

因此，有人又要民众运动的帮助，又怕民众组织后不能收拾。因此，又要民运，又统制民运，民运超过他们需要与不能统制时就摧残压迫民运。

* 这是一份手稿。

某些人命令民众组织的失败。

二、要公开合法的去组织民众，要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

当着民众自己要组织时，他们就组织起来。组织民众对于政治民主与内部民主的必要。因民众是自动的人。要在民众自己的要求上去组织民众。离开民众自己的要求，就不能组织民众。

民众要求可以启发提高，所以宣传工作重要。由低级切身经济要求，到高级政治要求。

民众要求分为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种不同的性质。所以，各种民众组织有各种不同的纲领，有各种不同性质的组织。

甲、政治组织（同一政治要求）——是主要在政治要求上建立起来的团体——如政党、党派、救国会、三青团、外交协会等。

乙、经济组织（同一经济要求）——是主要在经济要求上建立起来的团体——如工会、农会、合作社、互助会等。

丙、文化组织（同一文化要求）——是主要在民众文化要求上建立起来的组织——如研究会、学会、俱乐部、剧团等。

此外，还有宗教的、军事的、自卫的等组织。总之，没有一定要求与目的，是不能组织民众的。

一个团体以某种要求为主，同时附带着其他的要求。若将附带要求变为主要要求，则这个团体的性质就要变

更。

在长期日常工作中，离开这个团体原来的任务（要求），这个团体就要变质或者瓦解（过去及现在许多错误例子）。

一个团体的主要要求达到任务完成，则这个团体消灭或转变为别的东西。

民众的要求确定民众团体的性质。

需要斗争才能达到的要求，规定团体的战斗性，组织的集体制或联合制的程度。

民众组织的主要形式——是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及政治性的统一战线组织。

经济组织——不分信仰、年龄、性别、籍贯等区别，凡有同一经济要求者组织起来。所以最广泛。这是民众的主要组织形式。

在中国今天抗日救国已成为广大民众迫切要求，抗日救国组织就成为民众组织的广泛形式。然而没有民众经济组织的雄厚基础，抗日救国组织常不免空洞。

抗敌后援会为何无雄厚群众基础。因只有对国民党抗敌后援有兴趣而又能甘心忍受国民党那一套对民众运动办法的人才去。

政治组织是民众组织之高级的形式，所以政治组织常只能组织民众中一部分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先进分子。在说民运时，政党组织不属于民众范围之内。

在一个具体政治要求上能团结广大的民众时，则这种政治组织常是采取联合的形式，采取政治上统一战线的内

容(共同纲领)或者只是临时的如救国会、世界和平大会等,一方面有共同的政治要求,另一方面还有各分子间不同的政治要求与政治信仰。

民众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联合的形式最适宜。依其组织性的强弱又有集体的与联合的团体及其各种不同的程度。

用单一的方式不能组织各种各色不同的民众。

职业产业组织是民众组织的主要形式。

在民众组织发展中,各种组织互相错综,常有一人加入许多组织的事,常有许多同志分不清各种组织的特殊任务与特殊工作方式而混淆不清的事。这恰是客观复杂性在同志主观上的反映。简单化的要求。

要组织广大的群众,必须在民众各种的经济要求上,文化的及政治的要求上去组织。在单一的政治要求上不能组织广大民众。

三、民众是各种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性别和地域的人类。所以组织民众必须有各种不同的组织方式。

甲、职业产业组织——工会、农会、学生会等。

乙、年龄的——青年团体。

丙、性别的——妇女团体。

丁、地域的——地方团体、全国团体。

戊、总合的——救国会、联合会等。

第二节 几种主要群众组织

一、工会。

甲、工会是工人阶级群众的战斗的组织。是主要在工人阶级共同的经济要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组织。但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只有在政治上得到解放之后才有可能，故工会并不拒绝为政治解放而斗争。工会与工人政党的关系。工人运动中的经济主义〔61〕、工团主义〔62〕与无政府主义〔63〕之错误。“工会独立”的口号。

乙、工会的组织。

(1) 产业工会——同一产业工人(分类)。

(2) 职业工会——同一职业工人——在手工工人中。

(3) 地方工会——同一地域的工会联合会(横的)，在敌后大城市大产业失去后之工会组织形式。主要是乡村工人，小城市工人，小产业工人，失业工人，以地方工会为主。

村工会支部，区工会委员会，县、市、区、省工会委员会。
产业工会委员会。

全国性工会。

会员——工钱劳动者，凡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活资料的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者。工人、雇农、职员、教员、工头、手工业工人、自作自卖者、车马夫等。

丙、工会的要求。

工资——工时，待遇——星期、休假、疾病、死亡、文化等。

政治的——工会合法权，契约权，出版、集会自由，工会立法。

丁、今天如何去组织工人——合法工会在没有自由条件下，利用合法，经济要求与抗日配合。

工会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参战、生产，改善地位与生活，以工人救国会出现。

二、农会。

甲、农会是保护农民利益，争取农民解放的组织。在农民经济政治要求上建立起来。

农民中各种阶层，农会在今天是全体农民的组织。农民本身的统一战线。

乙、会员——雇农、贫农、中农、富农，一切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地主不要加入。

村乡工人、知识分子加入农会。

丙、农会组织。

村、乡、区、县、省委员会。

丁、农会的要求——土地、租、息、水利、地方公产、诉讼、救济、教育、民主权利。

三、青年。

它和工会、农会等团体的关系。

四、妇女。

甲、建立保护妇女利益的团体。

乙、会员。

丙、组织。

丁、要求——争求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上的平等，特别的工作方式，反对旧社会对妇女的束缚。抗日。

第三节 今天的民众运动

一、目前民众运动一般的条件和概况。

甲、是抗战时期，民众运动不能离开抗战。争取抗战胜利，也是民众运动的最高任务和最高利益。

乙、国民党在目前对民众运动的政策。

(1) 在抗战中希望民众的帮助。

(2) 但怕民众起来后不可收拾，更怕共产党参加民运。

(3) 包办、统制、限制民众运动。不让民众自己起来。

(4) 国民党对民众的限制不平衡。

丙、民众运动概况。

(1) 发展不平衡。

(2) 群众运动发展与统一战线发展联系着。

(3) 大多数群众无组织。

(4) 党在群众中有高度的政治影响。

(5) 没有大城市，主要在乡村。

(6)民众组织以地方性的为主,全国统一的无。

二、我们任务:

组织真正有广大群众的公开的统一战线的群众团体,并在保护民众切身利益的工作中引导广大群众去积极参加抗战中一切工作。

三、在敌后方与我后方不同。

甲、在敌后方——那里限制已少,土匪肃清,大量组织公开团体——各救国会,特别是自卫队。

乙、民众团体的系统与任务。

丙、采用各种过渡办法的必要。

丁、党员面目的隐蔽。

四、在我后方。

甲、经过统一战线去组织群众。

乙、参加各种合法团体——诚意帮助他们成为真正群众团体。

丙、统一战线的团体——地方的局部的联合。

丁、我们始终主张统一。

戊、准备干部。

己、不与政府对立而拥护政府,军队领袖。

五、争取民主改善民生。

甲、始终站在抗日救国上,在参战动员中去获得。

乙、公开、合法的斗争形式。

丙、争取社会大多数同情。

丁、协商、调解、仲裁的采用。

戊、求得可能改良为主。

己、不要为汉奸、托派⁽⁶⁴⁾所利用,不要与抗战军事发生磨擦。

六、要点。

论组织民众的几个基本原则*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中国抗日的民族自卫战争,已经进行了将近两年,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然而我们要取得这个战争最后的、彻底的胜利,我们还有很远的路程要走,还要经过各种的努力和牺牲奋斗。在这里,动员中国全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力量成为统一的力量,是战胜强大日本帝国主义最基本的条件。因此,从抗战发生以后,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的呼声,已经遍于全中国。许多的人们,因此即去从事民众运动,许多地方的动员委员会也组织了起来,并且发布了不少动员民众、组织民众的法律、命令。但是大多数民众是否已经充分的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了呢?这,在全中国除开少数地方(如华北)以外,几乎是没有什么大的成绩的。这,在抗战中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严重的问题如果不能彻底解决,要取得抗战的彻底胜利,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同样对于这个问题的拖延

* 本文原载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七十期,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出版。

迟缓，不去解决，也就要给抗战以极大的损害，延长与增加全国人民在抗战中所受的痛苦与牺牲。

为什么在抗战中民众运动不能广泛开展？为什么动员民众、组织民众的成绩如此薄弱？这里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没有民众运动的自由，某些人还来统制与限制民众运动，甚至摧残压迫民众运动，所以民众的抗日救国运动不能广泛的开展起来。为了动员千百万民众去参加抗战，争取抗战的彻底胜利，纠正这种情况，是十分迫切与必要的。因为没有民主自由，不扩大中国现有的民主自由，要动员与组织真正广大的群众去参加抗战，是不可能的。同样，要推动中国在各方面走向进步，争取抗战的彻底胜利，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争取民主、争取民众运动的自由与争取抗战的胜利，应该不可分离的结合在一起。

在这里我们暂时抛开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与民众运动的关系不谈，首先专来讨论一下民众运动本身的几个基本原则问题。即是假设在一般的情况下（不问当时的政治环境如何），怎样使大多数民众组织起来的问题。

在民众运动中有三个基本问题，即组织问题、行动问题（或斗争问题）、宣传教育问题。而这三件事情又是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要使民众的行动成为自觉的、有组织的行动，要在民众的行动中、斗争中去组织民众、教育民众。我在这里主要的来说组织民众的问题。

一 要在民众的自动性上去组织民众

要去组织民众，首先就要认识民众，并认识民众运动的规律，然后才有可能引导民众组织起来。

开始，就要认识民众是什么？民众是人群，是有思想、有要求、能动的人群。民众不是木头或机器。因此，组织民众必须采用和组织木头与机器不同的方法，即是不能把民众当作纯被动的东西任意去组织，而必须根据民众的自动性使民众自动的组织起来。

在开始，我们要组织民众与民众是否要组织，两者之间是不完全一致的，是矛盾的。必须解决这个矛盾，使我们要民众组织与民众自己要组织完全一致起来，然后才能组织民众。

因此，我们去组织民众，必须首先去启发民众的自动性，使民众了解他们有互相组织的必要，然后根据民众的这种自动性，给以推动、协助和引导，才能真正的组织民众。如果民众还不了解有组织起来的必要的时候，那你就即使去强迫命令，他们也不会组织起来，而且他们更加会走到和你对立。但是民众如果认为他们自己有组织起来的必要，即使你不让他们组织，他们也会多少组织起来，不能公开组织，他们也要秘密组织起来。这一种特点，就是因为民众是能动的人群而来的。

强迫民众组织起来的团体，不是真正的民众团体。在这种团体中民众自己的意志虽然暂时表现不出来，但与强迫者之间蕴藏着极大的矛盾，要么是强迫者暂时的优势，民众被压服着，使这个团体弄得毫无生气；要么是民众自己的优势，抛开强迫者，照着民众自己的意志前进了。

为什么说在民众运动中要发扬民众的自动性与创造性呢？因为民众是人群，没有民众的自动性与积极性，就不能使民众组织起来，也不能有民众运动。

为什么要在民众团体中实行民主生活、尊重民众的意志呢？因为民众是人群，没有团体内部的民主生活，不尊重民众的意志，就不能使民众真正组织起来，不能使这个团体活跃，也不能有真正的民众运动。

为什么民众团体的内部生活不能受外力的干涉，要保持民众团体的独立性呢？因为民众团体是人组织起来的团体，不保持组织生活上的独立性，就要窒息它的自动性与积极性。

某些人不了解发扬民众自动性与积极性的重要，不了解在民众团体中实行民主生活、尊重民众意志的重要，不了解尊重与保持民众团体独立性的重要，在基本上是由于他们不懂得民众团体是人组织起来的团体。他们以为民众也和其他的东西一样，可以由他们任意支配。因此，他们就去统制民众、劫持民众、命令与强迫民众。他们不知道民众是不可以统制、劫持与强迫的。历史上任何强迫民众的人，最后他还是要被民众所强迫，在民众面前屈服，或者为民众的

压力所粉碎。

某些人幻想：他们需要的时候，民众能够起来，他们不需要的时候，民众能够安静下去。他们不知道民众是有思想的能动的人群，不能由他们叫起来就起来，叫安静就安静。

某些地方政府曾经下令限民众在若干时期以内组织什么团体、什么服务队等，但是民众并不听这些命令。这些地方政府不懂得民众是人群，要组织民众必须根据于民众的自觉与自动。

某些民众机关的工作者，他们要去组织民众，但他们以民众上司的态度去对待民众，他们独断专行，任意的去指挥与役使民众，结果他们必然为民众所拒绝与摒弃。他们不懂得民众是人群，不能由你要组织就组织。

民众是人群，这是一个浅显的认识，然而这是一个基本的认识。有不少的人们在实际行动中在工作中常常暴露他们没有这种浅显的基本的认识，或者忘记这种基本东西，所以他们就发生各种错误。

我们虽然不能把民众当作机械一样去组织，但是我们能够引导与推动民众组织起来，赞助民众组织起来。

因为民众是人群，虽然民众今天还由于政治、文化水平的不够，还没有觉悟到他们有组织起来救国与自救的必要，但我们可以去提高民众的政治、文化水准，启发民众的觉悟，使民众了解有组织起来救国、自救的必要，这是一切民众先觉者的责任，所以我们应该去推动和协助民众组织起

来，不应该让民众自流的发展，作民众的尾巴，而应该领导民众。

应该教育民众、说服民众、启发民众的要求与自动性，并协助民众组织起来。但是真正民众的领导者，他不以领导者自居，不板着面孔去教训民众，不站在民众的头上去命令民众，而是以兄弟的、同志的态度去对待民众、说服民众；他不把民众属于他所有，而把他自己认为是属于民众所有；他不要求民众服从他，而认为他自己经常要服从民众的多数；他认为他没有任意支配民众的权力，认为他这样做就是在民众面前犯罪，相反，他认为他经常要受民众的支配。只有这样的人，才是民众真正的领袖，才能够真正从民众内部去教育民众、领导民众、提高民众的觉悟与自动性。只有不自封、不自称领袖的人，而且又在各方面能协助民众解决问题的人，民众才心悦诚服的推尊他为自己的领袖。又只有在民众中产生出领袖，才能真正的、最后的把民众组织起来。

我们说不要强迫民众，也不是说在民众运动中不要民众自己的严格的纪律，只有有纪律的民众运动，才是真正坚强的民众运动。而纪律总是多少带有强迫性的。但是这种民众运动自己的纪律的强迫性：（一）它是建筑在民众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即是民众自己了解、自己承认、自己愿意遵守的在民众运动中不可少的那种纪律；（二）它是依靠民众的大多数对于极少数人的某种程度上的强迫。少数服从多数，这是民众运动中保持行动统一的最重要的纪律。我们

经常教育民众在行动上少数有服从多数的必要，民众也了解这种必要。那么在行动中民众的少数常常能自动的、自愿的、暂时牺牲自己的主张去服从多数人的主张，与多数人在行动上、组织上保持一致。那么，这种纪律就成为民众自觉的纪律。这种自觉纪律的执行，也是依靠民众的自动性，自觉的、自动的遵守纪律，而不依靠强迫，虽然纪律是带有强迫性的。

总之，民众是有思想、有要求、能动的人群，要组织民众必须依靠民众的自动性，一切民运工作者与领导者的责任，就在于启发与提高民众的这种自动性，并在民众的自动性发扬以后，加以适当的配合、组织与指导。在这里一切的主观主义，都要受到惨酷的失败。

二 要在民众的要求上去组织民众

民众是有要求的人群。民众的要求，是民众组织的目标与目的。离开民众自己的要求，就不能组织民众。民众是为了达到他们一定的共同要求，他们才组织起来。

民众团体的要求，规定民众团体的性质。由于要求的不同，民众团体也就有各种不同的性质。我们根据民众要求一般可以分作下列各种不同性质的组织：

第一，政治组织：主要是在一定的共同政治要求上建立起来的组织，如政党、政派及其他政治性质的组织等。

第二,经济组织:主要是在一定的共同经济要求上建立起来的组织,如工会、农会、合作社等。

第三,文化组织:主要是在一定的共同文化要求上建立起来的组织,如研究会、俱乐部、剧团及其他学术团体等。

各种民众组织的性质,由各个组织的主要要求纲领来规定。除开主要要求外,各个组织还有它的次要要求,但这并不变更这个组织的性质。比如政党常有经济的、文化的附带要求,工会、农会也常有政治的、文化的要求,俱乐部、学术团体等也常有政治的、经济的要求。但是,你如果把这种次要的附带的要求,变成为主要的经常的要求,那就要变更这个团体的性质。比如一个政党如果长期放弃它的政治任务,仅仅为某些经济要求而斗争(如经济主义),那在实质上这个政党就不成为一个政党。一个工会或俱乐部如果长期放弃它原来的经济的、文化的要求,主要去进行政治斗争、政治活动,那这个工会组织或俱乐部就要变为第二党,即使它的名称与组织形式不变更,但原来团结在这些组织中间的人,必然会变更,即那些对政治斗争、政治活动不感受高度兴趣的人,逐渐的会要脱离这些组织,直到只剩下少数几个政治活动家保存在这些组织中。那么,这些组织在实质上已经不是什么经济的、文化的组织,而成为政治组织了。所以在民众运动中,你如果不准备变更某些团体的原来的性质,那你就不要放弃这些团体的原来的任务与主要要求。

在民众运动中许多人是不懂得这一点的。他们不懂

得各种团体的性质，是由各个团体的主要任务与主要要求来规定的，团体的任务与要求变更，团体的性质就要跟着变更。他们不懂这些，他们常常不顾民众的要求与情绪，主观的随便抛弃某些团体原来的任务与要求，而为另外的要求斗争，结果变更了这些团体的性质与内容，他们还不知道，这种情形常常要损害民众运动。

在另外的情形下，自然也可以利用这个原则去发展民众运动。比如有某些团体原来的任务与要求是不很好的，不很合乎民众要求的，虽然它们的名称叫工会等等，但实质并不是工会，而是别的东西。因此，民众对这些团体冷淡，不积极参加。但是你如果去变更这些团体的任务、要求与实质，那就可以吸引很多的民众来参加，使民众组织起来。又如使某些同乡会、佛教会变为经济组织或抗日组织等，也许对于民众运动是有利的，但在这里必须要求人们作具体的分析与估计。

在各种民众组织中，经济组织是最主要的民众组织。所以要组织真正广大的民众，必须注意在民众各种经济要求上去组织他们。因为民众不论是工人、农民、学生、妇女以至商人都有各种不同的经济要求，因为经济要求是民众自己最直接、最容易感觉得到的要求。如果我们不问年龄、性别、籍贯及政治信仰的不同，凡是有共同经济要求者联合起来，组织起来，那就可以组织最广大的民众。

政治组织是各种组织中的高级形式。政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因为它须要有高度政

治觉悟的人才能加入,才对政治斗争经常保持兴趣,所以政治组织不是民众组织的主要形式,政党还不属于民众组织的范围以内。但在某种时期,某些单纯的政治口号与政治要求,也常常能够动员与联合最广大的民众,如抗日救国、保卫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等。在这些口号与要求下常常能够发动各种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程度的民众到一个联合的组织中,如目前的救国会、抗敌后援会等,就是这类组织。这类组织在某些一瞬间也常能成为民众的主要组织形式。但是这类组织有它的弱点:(一)它的主要要求比较单纯,因此就影响到它的内部生活的不充实、空洞、单调等;(二)它的主要要求是暂时性的,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才发生这种不同阶层、职业、地区的民众的共同要求;(三)联合在这种要求上的各种不同的民众,还有各自不同的信仰与要求,因此,他们内部是有许多矛盾的。而在这种要求上建立起来的组织,大多数只能采取联合的形式。因此,它的内部不巩固。

所以,如果不在民众的经济上去广泛的建立民众的经济组织,而只单纯的用政治口号去组织民众,那就不能真正组织民众的大多数。比如你单纯的用抗日救国或牺牲救国的口号去组织民众,而抛弃民众自己的经济要求,那就只有那些对你的抗日救国或牺牲救国感受兴趣的人,才会跟你走,才会到你的组织中来。其余大多数不大感受兴趣的人,或不可能来的人,就不会到你的组织中来。所以除用政治口号与政治要求去组织民众外,还必须用民众的经济要求与

经济口号去组织民众。否则，真正组织民众的大多数，并长期保持这种组织，是不可能的。

必须在民众各种要求上组织各种不同性质的民众团体，才能组织民众的多数。这一点并不是许多人都彻底了解的。我们看见许多人，他们要求民众组织起来，要求民众起来抗日救国，协助军队，组织担架队、运输队、侦察队等，或者要求民众起来革命，反对某某，拥护某某，……然而他们不管民众的要求，不管当时当地的民众要求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他们只要求民众，而不管民众的要求，他们就要民众照他们的要求组织起来，那自然是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在民众的要求上去组织民众，而只在他们自己的主观要求上去组织民众。民众的要求没有满足，民众自然不会去满足这些人的要求。

另外有些人要求民众不要起来救国，不要参加救国会，不要罢工、增加工资等，然而这些又恰恰是民众的要求，民众为达到这些要求常常自动的组织起来，行动起来，而不管这些人的要求。这些人也不懂得民众的要求是必须满足的。

我们说要在民众的要求上去组织民众，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去启发与提高民众的要求，而要把民众的要求永远限制在落后的狭小的范围以内，或者甚至把我们的要求也降低到落后的狭小的范围以内，这是错的。我们要积极去启发与提高民众的要求，民众的要求是可以启发与提高的，比如一个农民本来没有感觉到减租的要求，但当你向他说明

他穷困的原因以及减轻痛苦的方法之后，他就会有减租的要求了。这个农民本来没有感觉到有武装抗日的要求，但当你帮助他减了租以后，并且向他说明日寇来了亡国之后对于他的种种不利，以及保证他已得的减租利益，而必须大家武装上前线之时，这个农民也许会有武装抗日上前线的要求了。一切民运工作者与领导者，必须经常的、积极的去启发与提高民众的要求，从低级的提到高级的，从经济的提到政治的，从部分的、暂时的提到全体的、永久的，从地方的提到国家的、民族的。只有这样，然后才能在被启发与提高了的民众要求之上，去组织广大的民众。然后才能最后组织广大民众到抗日的战线上来。

民众要求的这种提高，当然也不是不顾客观情况与客观联结的纯主观的瞎提一顿。如工人本来只要求增加一毛钱工资，而我们硬要提高到增加一块钱，工人本来只要增加工资，而我们硬要提高到消灭托派〔64〕等，这种提高是要根据客观情况、客观联结与民众的觉悟程度，而且是要有步骤的去实行的。应该了解民众从他感觉到有某种要求，到他决心为某种要求而起来组织、斗争与行动的时候，还有很远一段过程。如从民众感觉到有抗日的要求，到他决心起来拿起枪去抗日，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因此，要提高民众的要求，不只是须要宣传解释工作，而尤其须要民众自己的实践，民众的实际斗争。在民众的斗争实践中，民众才能亲身体会到经济要求与政治要求、个人的要求与国家民族的要求，原来是不可分离的整体。这样才能引导民众到高级

的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来。

民众的政治要求、经济要求与文化要求，是有区别的。但这些要求又不可分离的联结在一起。民众的每一个经济斗争，同时就是政治斗争；每一个政治要求与文化要求，都有经济原因作为基础。因此，民众的经济要求应该与政治要求、文化要求联系起来。当民众起来为一个简单的要求而行动的时候，我们应该从这个简单要求的行动所牵涉的一切方面，引导民众去了解其他一系列的问题，并且引导这个行动走到更高的阶段上去。这是每一个民运工作者与领导者的责任。

从民众要求的启发、提高与联系的问题上，使我们可能解决另一个问题，即我们的要求与民众要求的矛盾问题。开始，我们要求民众组织起来抗日救国，而民众要求减租减税，这，我们与民众是矛盾的；然后，我们在民众减租减税的要求上引导民众，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再从民众减租减税的行动中，提高民众的要求与觉悟，使民众也起来要求抗日救国，如是我们与民众又取得了一致。在开始，我们要去暂时将就民众，在最后是民众接受我们的要求。要把我们的要求、我们的口号，变为民众自己的要求、自己的口号，这里需要艰苦的教育工作与民众充分的实践斗争。这是每一个民运工作者与领导者所应该了解的。那些要求民众在他们领导之下组织起来抗战的党派和人们，应该了解这一点。如果一方面要求民众在他们领导下起来抗战，同时又不为民众的切身要求而斗争，甚至反对民众的要求，那即使你再加

强你们的统制，民众永远也不会是你们领导之下抗战的。相反，你们将会变为民众的敌人。

三 要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去组织民众

民众并不是一样的人，而是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要求，有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年龄、性别、地域、阶层和文化觉悟程度等。因此，要组织民众，就必须采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去组织，才能真正组织民众的多数。民众内部的复杂性（再加上外部政治环境的复杂性），规定民众组织方式的复杂性。如果企图采用单一的方式去组织各种各样的民众，那必然不能组织民众的多数。企图把各种各样的民众纳在单一的组织方式之内，也是必然不能成功的。因为我们如果把医生、大学教授和码头工人与农村中的老太婆纳入一个组织之内，过共同的组织生活，那是很难想象的。

我们如果从组织方式上来区别民众组织，那我们可以分为以下的类别：

第一，以产业为界线的组织。即是凡在同一产业部门中工作的工人、职员，组织在一个团体之内，如工人团体中的产业工会——铁路工会、纺织工会、矿工工会、海员工会、印刷工会等。

第二，以职业为界线的组织。即是凡从事同一职业的人员，组织在一个团体之内，如裁缝工会、木匠工会、医生的团体、新闻记者的团体等。

第三，以地域为界线的组织。即在同一地域的某种人员组织起来的团体，如某某地方的工会、学生会等。又如同乡会等也是另一种以地域为原则的组织。

第四，以年龄为界线的组织。即青年、儿童组织以及某些地方的老人会等。

第五，以性别为界线的组织。即妇女团体等。

第六，以阶级为界线的组织。即是在经济上站在同一地位的人组织起来的团体，如工会、商会等。

第七，以信仰为界线的组织。如各种宗教团体、红枪会、白枪会等。

此外，以各种组织的内部机构来分，又有所谓集体的组织与联合的组织。集体的组织，即是它的组织机构是整个的，它的各部分与下级组织没有独立性的，这种组织机构适用于战斗性较强的团体。联合的组织，即是许多独立的团体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共同组织，仍旧保存各个团体的独立性，这种组织机构适用于内部情况较复杂的团体。

在各种组织中，产业组织与职业组织，是组织民众最主要的方式。因此，主要的民众团体，应该是工会（其中又有各种产业工会与职业工会）、农会、妇女会、青年团体及其他自由职业者的团体等。如果在全国各地到处建立这些组织，那就可能真正的组织民众的大多数。

要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组织民众，并不是主张民众组织的分散而不要统一。我们是坚决主张民众运动统一的。但是这种统一，必须：（一）首先要依照民众内部各种复杂的情形，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组织民众的大多数；（二）在民众组织的各部门中，在共同的要求与纲领上求得各部门的统一，如求得工会的统一，农会的、青年的、妇女的各种组织的统一；（三）最后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上，联合一切的民众团体，组织统一的救国总联合会，在各地同样建立这种联合会的系统。这样就能把一切的民众组织统一在一个总领导机关之下。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统一全国民众运动的领导。

在目前统一民众运动固然要紧，但组织民众的多数尤其要紧。如果不采用似乎是分散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组织民众，那就不能组织民众的多数，不能把民众广泛的组织起来，民众运动的统一就不能有更大的意义。要能够广泛的组织民众，又能够真正统一民众运动，那只有采用上面提议的方式，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有许多人不懂得这一点，他们不愿意看见民众内部这种复杂的情况。他们把民众看作一样的没有分别的东西，他们采用一样的方式、一样的态度与言语去对待各种各样的民众。他们更不会去分别研究各部分民众中的情形，以及这些民众中的生活、习惯、情绪、要求、文化程度等。因此，他们不能深入民众，不能与民众结合在一起，不能提出组织这

些民众的适当的办法。

另有许多人也不懂得这一点，他们不允许民众去建立各种各样的组织，尤其不允许民众按产业和职业的原则组织起来。他们只建立一种组织，要各种各样的民众去参加他这个单一组织，他们企图用一种单一方式，把各种各样的民众都组织起来，而且他们为了要统制民众运动，不允许各种民众团体的独立存在，不愿意采用联合的方式，用他们纯粹从主观上想出来的那个单一的团体，去并吞其他一切民众组织，而美其名曰：这是统一民众运动。自然，这种人是不会达到他们的目的的。他们的办法对于民众运动不独没有丝毫的好处，恰恰相反，只有摧残民众运动、分裂民众运动，并且要引导民众起来直接和他们对抗。

在今天我们看到有某种人口里讲着要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但是他们：（一）不在民众的自动性上去组织民众，并且反对民众自动组织起来；（二）他们不在民众的要求上去组织民众，并且反对民众的要求；（三）他们不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组织民众，并且反对民众各种各样的组织。这种人不能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是必然的。因为他们违反民众运动的上述三个基本原则。

在这里我仅仅说到组织民众的三个基本原则，其他的问题都没有说到。至于在今天的政治环境下，全国各地的民众运动应该如何进行？如何组织？并且如何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动，来改变民众运动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那只有留待下次再讲。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一九三九年五月)

第一节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及 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近百年来的事,是由于以下三方面发展起来的:

第一,欧美列强侵入中国,输入商品,运走原料,引起中国水陆交通的发展,同时输入资本,直接在华开办工厂,促进中国工业的发展。

第二,中国政府与外国作战失败,为了富国强兵,首先开办了军事工业,促进了中国国家资本的发展。

第三,列强在华开办工厂,刺激了中国的一些大官僚、军阀、买办商人兴办一些轻工业,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 本文是刘少奇在延安工人学校的讲演稿。

欧战后，中国有了许多铁路，几百个纱厂、丝厂；还有矿山、面粉公司、印刷工业、水电工业、重工业等。这时中国的资本主义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同时中国的产业无产者也在大量产生，那时据统计大约有二百万之多。产业中心是上海、天津、青岛、汉口等地。这些是无产阶级的大本营。

中国的工人有一特点，那便是中国工人一产生，即比资产阶级的力量强大，这是各国所没有的。记得中共刚创立时，我们曾讨论过这个问题，结论还是这样。中国的工人阶级是强大的，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前的 中国工人运动

第一，我们先来看一看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

(一)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情况下发展的。虽然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的反对方面去了，但他还带着官僚主义的习气；虽然它同时也发展到封建势力的反对方面去了，但他本身仍带有封建的意味。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又是依赖封建与帝国主义而发展的，它倘若对帝国主义无利，则帝国主义不会让他发展。所以中国的民族工业，是在适合于帝国主义的利益下发展起来的。

(二)洋货输入,破坏了中国的手工业。农村破产,手工业者与农民就跑到城市的工厂而变为近代的工人。这与外国不同。外国是本国工业的发展。外国资本家因为封建主义的农奴制束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准农奴自由地到城市里去做工,而资本家的工厂离开了大批的工人就不行,所以他们便必须反对它,他们要闹资产阶级的革命。而中国呢?工业是外国进来的,破产了的手工业者及农民太多了,到城市里去反而找不到工作,因此走投无路的手工业者及农民,便成为中国特有的无业流民,流民的头子拿起了枪杆就成了军阀。同时造成了劳动市场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工资降低了,生活更加痛苦。

(三)帝国主义勾结了中国的封建势力。开头是破坏,如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的闭关自守,接着是传教,学外国语等。但破坏到一定程度,则不仅不破坏,而且勾结,其目的在镇压中国的革命势力。

(四)由于中国许多军阀、官僚、政客的存在,使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这样便造成了它对革命的不彻底性。

以上这些特点,完全是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结果得来的。

第二,中国工人阶级的贫穷化。全世界工资最低要算中国,就是技术很高的工人,每月也不过三四十元。工作时间很长,普通总在九小时以上,甚或有二十小时以上者,工人的生命与生活根本没有保障。中国工人生活这样苦的原

因,也在于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工人受着三重压迫。中国工人已受了近百年的压迫,工人组织很少,工人的社会地位很低,政治上更没有自由,完全是一种所谓“下层人”。

第三,中国工人在上述痛苦的受压迫的环境下,便产生了自发的斗争,我们叫做工人原始的斗争。我记得安源、唐山、汉阳等这些地方的工业,在几十年以前便有过很大的罢工斗争了。

第四,那时不但有原始的斗争,而且有原始的组织,如帮口、行会等。另外基督教在工人中也有组织,如俱乐部等。后来也有许多挂空头招牌的工会。无政府党在中国也有工人的组织,如湖南的劳工会,广州的理发工会、茶居工会等。

由此可见,在中共未产生前,中国工人就有许多斗争和组织。中共产生后,才有中国革命的职工运动。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 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中共的产生对于中国工人运动有极大的关系。中共开始成立时,工人党员还很少,大部分是学生、知识分子与大学教授。因为那时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很好的文化程度,是不行的。所以中共一成立便开始领导中国工人

运动，为中国工人阶级解放事业而斗争。中共成立时，就建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2〕，用这样一个机关来组织与教育中国工人，这个书记部也就是后来的“工会”，因为当时不知道用工会这个名词。“劳动组合”是从日语中学来的，“书记部”即是秘书处的意思，“劳动组合书记部”也便是工会的秘书处，用以指导全国工人运动。书记部有全国总部（在上海），各地如广州、长沙、汉口、北平等地有它的分部，那时的总负责人是张国焘〔65〕。开始在各地设立工人学校、工人俱乐部，平汉路的长辛店、郑州、汉口的江岸，粤汉路的徐家棚，上海、安源、广州等地都有。另外还出版有工人的报刊，在上海、北平出版的《劳动周刊》、《工人周刊》。还开办了一些工人子弟学校。那时我们多半当教员，后来因为我们与工人接近日多，进一步办工人俱乐部。这俱乐部多半是由工头参加办的，并在官所立了案，这样，就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便是中共开始到工人中去的情形。

一九二二年正式的中国工人运动开始，一月间香港海员大罢工。中国的海员，老早便有带着行会性质的工会组织，因为海员是跑外国的，常与外国工人接近，所以他们首先懂得工会组织，首先在香港组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一九二二年初他们便提出要求增加工资，遭到英国资本家的拒绝。于是他们一齐上岸实行罢工，使得许多船只停泊在香港，开不出去，当时参加罢工的有一万多人。后来码头工人受了影响，也参加了，增加了罢工的力量。当地的英帝国主义遂行镇压，香港工人便毅然离港到省，而帝国主义在

沙田地方阻止工人到广州去，开枪打死工人。于是工人情绪更高，同时引起商人罢市，一致反英帝国主义，一共罢工五十多天，结果完全胜利。工人回港，在英人给工会重新挂起牌子后才复工。罢工时，全国工人一致援助香港海员大罢工，京汉路的工人把旗子插在火车头上从汉口开到北平。

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到会者近二百人。除香港代表占多数外，全国各地代表有三十多人，这三十多人代表着很多地方的工人。会议通过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发表了一篇宣言，并指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人团体的通讯处，第一次劳动大会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开展。

同年八月间，平汉路长辛店的工人也罢工，提出了二十二个条件。但路局不接受。结果平汉路北段停了三天车，终于完全得到了胜利——工人每人增加工资三元，每年年底发一个月饷等（这是以后工人年饷规章的来源）。

平汉路罢工胜利以后，接着又有许多铁路工人的罢工得到了胜利。另如汉阳铁厂、安源煤矿、大冶铁矿也都接连罢工，而且也都有胜利。只有唐山的五矿罢工，碰到英资本家，结果虽然也胜利地加了工资，但工会却被取消，这真是碰了钉子。后来全国各城市也罢起工来了，在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下广泛的开展了全国的工人运动，半年之内（一九二二年秋到一九二三年春）各地大小罢工据统计有九十六次之多，参加人数有二十七万多人。不仅罢工，而且各地的工

会也纷纷成立了，所有工人都加入了工会。那时中国的主要铁路、矿山以及城市工厂都有了工会的组织，还有许多工会的联合会（如湖北的工团联合会、湖南的工团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等）。平汉路在北平召开了所属铁路工会的代表大会，并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会。那时，有一个不好的特点，就是不准职员加入工会，这是错误的。工会的会长多半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同志，但后来反对学生当会长，我们就当秘书长。

中国职工运动的大浪潮，从香港海员大罢工起，一直到一九二三年的“二七”才止。这时还有一个中国工人劳动立法的运动。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了订立劳动法律草案，以保障工人在法律上的地位，起草后在全国各报纸杂志上发表。书记部为了这事，请了国会六十多个议员的客，内中有三十多个议员是同情我们的，后来因“二七”的失败，这问题也就没有结果了。

第四节 二七惨案及其以后的 工人运动

第一，当时的政治情况：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所以有了那样全国广泛的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虽然还幼稚，但多少还有一点从外国得来的经验（从苏联、法国回来的同志）。而那时的资产阶级则是软弱的。那时中国的政府是曹

魏^[66]、吴佩孚^[67]，广东有孙中山^[8]的革命政府，东北有张作霖^[13]的政府，三个政府，根本不统一。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则有许多阻碍工人运动的经验。当时的资本家对工人运动开始时是同情的，一般的舆论，对工人运动都有相当的帮助。就是吴佩孚起初也赞成。当全国工运已经发展起来时，全国的局势便大不相同了，其结果是：

（一）直接损害了北洋军阀^[68]的统治，经济上政治上使得吴佩孚不得不转变为压迫工人。

（二）帝国主义在西欧就知道工人的厉害，所以它便逼迫中国政府、军阀镇压工人运动。

（三）原来中国的资本家是同情工人的，但这时他也与军阀勾结起来反对工人运动了。

（四）工人自己的幼稚、骄傲、轻敌，工人的领袖也要坐花车，由于这些原因，到“二七”以前形势变了，那便是要和帝国主义与资本家决斗了。我们当时没有看到这种情况，所以惨案发生了。

第二，二七惨案以前的情况：平汉路的工会要开成立大会。这个工会本来就成立了，但因总工会未成立，筹备了半年，在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二月一日准备开一个扩大的成立大会，并要热闹一时。这事先是告诉过吴佩孚的。临时，吴佩孚却来一个命令不准开会，要开的话你们须改期。这时工会向全国的请柬已发出了，不能改期，于是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决定按原订日期开会。

第三，二月一日的情形：张国焘等几十个代表到了郑

州，各工会的工人代表排队去会场，吴佩孚的警察出面阻止。工人与之交涉有二小时，不成，工人遂入会场开会。会开了不到十五分钟，门外军警包围会场，禁止开会，于是冲突发生了，会场大乱。这时吴佩孚要工人代表立即离开郑州，于是各代表回汉口，以后一切事情，听总工会的命令。总工会在汉口的江岸车站，即下了一道命令给各工会，二月四日平汉路全路总罢工，反对吴佩孚压迫工人，提出五条要求。劳动组合书记部同时发动全国总罢工，用以援助平汉路，用以抗议吴佩孚，要求工人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

罢工以后，政府下令各地封闭工会，派军队占领工会，压迫工人上工，于是各地工人便与各地政府冲突起来，长辛店、郑州等地统统发生了逮捕工人和流血事件。中国有名的二七惨案，接而发生。他们召集各国领事，共同来压迫工会。林祥谦^[69]同志是汉口江岸分会的会长，他们强迫林祥谦下复工命令，但他至死不下。工人与警察互相冲突，死三十二人，伤二百余人，这是江岸的情形。到了晚上，军警到各工人的家里去强迫工人上工，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70]律师被捕，后被杀害。这时汉口的车仍坚持着未开出，但郑州的车却向南开到了江岸——罢工失败了！

二月九日，总工会发表宣言下令复工，认为罢工已没有坚持的必要，留余力为将来报仇之用。而全国各地罢工，仍在继续，但也各遭打击，遂使中国工运大衰。

第四，“二七”的影响：

(一)工运不能公开了,领袖被捕了;工人学校与俱乐部也都不能开办了,于是困难更多了,这是吴佩孚等军阀政府造成的结果。

(二)孙中山的广东政府反对二七惨案,同情工人运动。

(三)张作霖因反对吴佩孚而援助“二七”受难工人。

(四)影响到世界工人对中国工运的视听,各国都说中国的工人站起来了,共产国际^[71]特为此事发表宣言,说中国工人已走上世界的政治舞台了。

第五,“二七”后的工运:安源工会仍然存在,并且还有小莫斯科之称,在安源继续举行了罢工;湖南的工团联合会,仍然是保持的;广东的工运仍然在发展,并且这时(一九二四年初)全国铁路总工会也成立了,秘密地开了全国代表大会。

第六,一九二五年工运又开始复兴:有汉口烟厂的罢工,安源路矿的罢工等。冯玉祥^[30]占领了平、津,因他同情南方革命运动,允许工人运动自由,于是在北平、天津成立工会,有五万人。可是张作霖到了平、津便又垮台了。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到全国各地代表二百多人,这是中国工人更重大的一个会议。这次会议的结果:①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②通过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当时赤色职工国际派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③恰巧当时广东召集全省性的农民代表会议,于是

通过了工农联合案；④通过总工会的章程，以及执委名单等。这个会准备了工运新浪潮的到来，对于大革命起了推动的作用（当时加入工会的会员有五十多万人）。

第七，总结“二七”经验教训：

（一）“二七”以前到“二七”，是中国工人阶级从自在的阶级走到自为的阶级，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

（二）使工人运动与共产主义密切地结合起来，共产主义离开了工人运动是空洞的共产主义，工人运动脱离了共产主义则工人得不到解放。

（三）从此时起，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组织成为独立的力量，走上了政治舞台，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站在最前线。

（四）工人运动在“二七”以前形成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基础，倘若国民党看不见共产党的力量，是不会与我们合作的。

（五）这个运动深刻地教育了中国工人，提高了中国工人的政治觉悟，组织了全国工人的总的机关。

但有它的缺点：

（一）当时的会员多，但共产党员却很少（工人共产党员）。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党员不过九百多人，周围的群众却有几十万人。

（二）当时拒绝了小职员加入工会。

（三）那时的工会工作缺乏经验，工人领袖轻敌骄傲。

第五节 五卅运动与省港大罢工

第一，五卅运动开始了中国的大革命。五卅运动的产生是由于：

(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加紧了，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这样同时也增加了中国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反对。

(二)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倒台，张作霖入关，段琪瑞^[72]执政，使得当时的中国政治上更加分裂。孙中山北上死于北平，于是掀起全国民众对于国民革命的高潮，乃有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三)第一次国共合作成功，这对于中国大革命是一个极大的原因。

(四)全国工运的复兴，所以有五卅运动。

第二，五卅惨案。惨案以前，上海日本纱厂在一九二五年春有过一次罢工运动的胜利。胜利后，还组织了工会。但帝国主义经过数月的准备，挑拨第二次工人罢工，以便于他的镇压。工人中计，在第二次罢工中完全失败，于是进行抵制。工人顾正红^[73]因顽强抵制而遭枪杀，罢工因此便更加坚持下去了，并且还动员各种力量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但日本帝国主义当时已与其他帝国主义商量好，一致反对工人，于是工人便处在一种最困难的环境下。那时，我们用一切方法去动员群众，拿被打伤者的血衣及被打

死的工人照片，到各学校去做鼓动工作，结果各学校、工厂都决定，五月卅日这一天动员群众上街，召集群众开会，号召上海市各界起来援助工人。学生的一支宣传队走到南京路，英国巡捕施行逮捕，结果大家包围巡捕房，巡捕房下令开枪，打死了许多中国人。当时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要求工人罢工自由，要为顾正红伸冤，反对交易所等，这便是南京路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是与二七惨案不同的。五卅是工运复兴、大革命开展的信号。象“二七”那样的惨案应避免，而五卅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在五卅有许多中国人牺牲了，但运动不但未被压下去，反而掀起了中国的大革命。当时帝国主义不准中国的报纸披露关于五卅的消息，但中国的报界开了一次会议，第二天关于五卅惨案的消息便传布全国了。同时在青岛的纱厂，亦有反对张宗昌^[74]罢工运动，所以五卅既是反日亦是反英的。

第三，五卅以后的情形。五卅以后，上海所有工厂，英国的、日本的，统统都起来罢工了，一共罢下了二十五万人。不但是工人，连工程师、洋行银行的职员、领事馆内的雇工，也都罢工了。这便是所谓五卅后的上海总罢工。后来不但商人罢市，学生也罢了课，商人和学生一致跑到各商会和总商会去请愿，要求总罢市。于是召集各店家、学校的代表齐集总商会，向当时的总商会长虞洽卿^[75]提要求，结果上海统统罢工、罢市、罢课。同时，封锁租界，不许粮食及小菜运到里边去。继续不断地与英国巡捕发生冲突。工商学组织

了一个联合会，由此会提出十七条要求，主要的是政治上的要求，如收回租界等，也包括有工商学各界的要求。此外，学生组织了学生联合总会，工人组织了上海总工会。运动自上海发生后，全国都响应，跟着起来罢工，如平津、广州、武汉等地工厂也罢了工，大中小学校也都罢了课，各地都发生工人、学生的游行示威。各处举行了援助上海工人罢工的大募捐，工人得到了一笔数目很大的钱，差不多有几千万。那时已是冯玉祥在北平把宣统皇帝〔76〕赶出故宫之后，开放皇宫参观的票价收入，也拿出来捐给工人，皇宫门口还大书这样的标语，“英国人、日本人和狗不准进此皇宫”。各地汇款集于上海总商会，后来总商会想吞没这笔钱。

罢工、罢市、罢课坚持了很久，后来总商会想妥协。它单独提出了十三条，而且把各地捐给工人的钱组织了一个济安会，不肯把钱完全拿出来交给总工会去发放。后来它竟要求工人开工，但英、日工厂的工人不开工。罢工坚持了二个来月，中国的资本家到后来简直要破坏这次罢工，他们与英帝国主义勾结起来了。英国使馆组织了调查团，说巡捕开枪打人属实，彼方深觉遗憾，愿以七万余元作为赔偿。同时帝国主义勾结了中国的军阀张作霖，开兵到上海，上海工人走入更困难的地步。后来英人宣布戒严令，封闭了上海总工会。

第四，省港大罢工。香港、广州原来便有很多工会组织，但不统一。在上海五卅惨案的影响下，各工会派代表开会要求大家联合起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罢工。罢工

之后，广东所有的空房子，统统分给罢工的工人住宿，就叫做罢工寄宿舍。在广州一个租界叫做沙面的地方，首先罢起工来，以致影响广州、香港两地的工人罢起工来，这样就叫做省港大罢工。罢工时选举了一个代表大会，由代表大会产生罢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规模很大，单工作人员就有几百人，另外还有几千个有武装的工人纠察队。由于封锁香港，便使香港成了死港、臭港了。此外，罢委会内还设立了一个裁判所，如有违犯罢工纪律的，要受罢委会的审判和制裁。省港大罢工几乎坚持一年之久，幸有当时的国民政府及孙中山的帮助，有宋子文⁽⁷⁷⁾可以借钱。由省港罢工而准备了后来的北伐。为使问题解决，曾由国民政府去信香港总督，叫他们派代表来谈，但也未成。后来只得罢工解散，但罢委会仍然存在，一直到国共分家以后，由于国民党的反动，才把罢工委员会解散。

我们在省港大罢工中，可以看出如下的优点：

(一)有代表大会，这是一个集中的指挥机关。

(二)发动了全国反帝运动，并且使中国人了解了在未反对帝国主义之前，首先应反对军阀，这是北伐胜利的一个主要前提。

(三)锻炼了中国的工人，同时全国各地的工人也组织起来了。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到会代表四、五百人，代表工人一百二十多万人。大会通过了职工运动总策略等决议案。在北伐前夕，全体代表

到国民政府要求誓师北伐，同时大会确实地准备了北伐，并组织了全国职工运动来响应北伐。

第六节 北伐与工人运动

广州的国民政府在一九二六年七月开始北伐。北伐是胜利的，一直打到了长沙、九江、南京、武汉、郑州。军事的进行是一帆风顺，无所不克。在北伐中，全中国的工人或参加了，或援助了，比如到处都有工人的铁道队。上海主要是工人起来占领的。铁路工人见北伐军来则不给军阀开车，电信工人也不给他们发电报，全国工人给了北伐很多的帮助，所以说北伐的胜利并不完全靠军事。

工人在北伐中组织了自己的工会，改良了自己的待遇。后来计算，湖南总工会会有四十多万人，湖北总工会会有六十多万人，江西也有，这时的工人运动是大大地发展了，到处订条件加工资，生活改善了。工会除了广大的工人参加外，还有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儿童有劳动儿童团的组织。汉口、九江的工人收回了英租界（庐山也收回了），把英国军警从陆上赶到船上，后来虽组织有共同董事会，但租界是收回了。动员新兵，慰劳军队，自己的武装纠察来维持秩序，这时工人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当时工人太“左”了，太幼稚了，要求提得过高了，拿剪刀上街剪行人的长衣，总工会高于一切，后来被那些反动者故意借此挑拨，连总工会的命令

也不听了。

上海工人三次暴动。国民革命军打到上海，工人起来响应，发动了几十万人的大罢工，进行暴动，第一次、第二次都没有胜利，到第三次才算得到胜利。后来选举了上海人民的市政府。当时蒋介石来电要上海市政府的人员暂缓就职，而他们不听命令，照常就职。上海工人的暴动取得了胜利。

国共在上海、南京等地很快分裂了，而汉口却没有分裂。武汉的政府还有劳工部，苏兆征〔78〕同志为劳工部长，工作很少罢了。一九二七年，在汉口开了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当时在总工会领导下的会员有二百八九十万人，会开得很久，赤色职工国际的罗佐夫斯基〔29〕、法国工会的代表、今天美国共产党的书记白劳德〔57〕等也来参加我们的会。接着在汉口举行太平洋劳动大会。中国工人运动发展到这时，不但有了全国的总组织，而且与国际上联起来了，并且占着领导的地位。当时在农会组织下的农民有一千万。工农联合在有些具体问题上并未得到适当的解决，有的地方甚至农民进城把工会打了。

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时，发生了沙基惨案。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广州罢工工人举行游行示威，商人及黄埔军校学生等都参加了，这个示威的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时，英、法帝国主义的军队向示威队伍开枪，打死和重伤的有二百多人。但罢工仍旧继续下去。北伐胜利以后，大大发展了全国的职工运动。

第七节 大革命的失败及其教训

首先说一下大革命经过的情形。那时革命是一直胜利的，首先表现在军事上。在广州出发的一共有六个军，后来有很多的军队加入了革命军，北至郑州，东至江西、上海，同时群众运动亦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工人和农民的运动大为发达。

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革命内部发生了分裂。资产阶级由于工农运动的发展而反对工农，于是帝国主义乘此时机进行挑拨离间，使得国共分裂，大革命因此失败。

大革命的失败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他的必然失败原因存在。一方面是强大的帝国主义联合一致地来反对中国的革命；另一方面是封建军阀勾结帝国主义来反对革命。当革命未发展时，资产阶级也反帝反封建，但当工农起来危及资产阶级本身利益的存在时，他们便开始反动了。

具体的事实表现在：封闭职工会、限制职工运动的发展。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在广州有一部分军队包围了俄国顾问的房子，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于是有许多同志退出国民党的中央党部，但革命队伍内部尚未完全破裂。北伐至武汉之后，在迁移广州政府的问题上，有人主张政府迁到汉口，另外一部分人主张迁到南昌，结果主张迁到南昌的人很少，但后边这部分人便没有去汉口，而去了南昌。武汉

政府成立之后,革命的內部发生分裂,汉口与南昌的行动不一致,国民政府命令行不通。以后便发生上海的“四一二”事变,大批逮捕与屠杀工人领袖,解散上海市政府。四月十五日,广东也发生了事变,李济深^[79]在广州也实行了清党,将罢工委员会包围,缴纠察队的械,屠杀和逮捕了许多工人的领袖,共产党人被杀的近千人之多。在武汉政府统治下,长沙发生马日事变(五月二十一日),团长许克祥^[80]用兵包围了湖南农民协会、总工会,逮捕和屠杀工人纠察队。他虽只有一团人,但因当时我们对群众组织得不够,共产党内又有机会主义,使湖南工农运动遭受损失。马日事变后,武汉政府发生了很大的动摇,尤其是负责人汪精卫^[38]接连不断地反对工农和共产党。另一部分人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但不能阻止反革命的力量,结果反革命的力量没有得到工农革命的阻止而更加扩大。一部分革命的力量遂离开了武汉,去南昌发动起义,冀挽救革命。当时孙夫人宋庆龄^[81]女士发表宣言,坚持三大政策。后来南昌起义军去广东汕头地区,继续作战,失败了。

这便是大革命失败的经过情形。大革命失败是当时共产党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的结果。

南昌起义是对的,坚持革命的方针是对的,但挽救已来不及,同时也犯了去广东汕头地区的错误,不然留在南昌附近也是很好的。

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表现在理论上,让步是不能维持统一战线的。

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第一，当时的反革命力量很强大。反革命特别是表现在帝国主义的力量上，帝国主义各国——英、美、法、德、日等，联合一致反对中国的革命。当时是欧战以后，世界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时候，这就给了中国革命以极大的困难。那时国际情形比今天坏得多，今天中国的民族革命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而那时的帝国主义则一致帮助反革命，那时反革命用一切方法，特别是利用英、日帝国主义来破坏中国的统一战线，挑拨国共分裂，再用武力来威胁中国的革命，英、法、日等国开了许多兵到中国来。英帝国主义的兵舰向四川万县开炮，美、英帝国主义的兵舰向南京开炮，这即所谓万县惨案和南京惨案。

第二，中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工农运动发展了，再加帝国主义的威迫利诱，致使当时的资产阶级由革命到叛变。

第三，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⁸²⁾领导的错误。虽然有上述二个原因存在，但共产党若领导正确亦不至于失败到那样的程度。

当时对那些猖狂的反革命势力，我们抱不抵抗主义，没有组织工农力量，只顾让步，结果把最后的根据地让出去也不行。右倾机会主义不主张工人有枪，说什么如果有了，国民党要对我们不满意的。

第四，忽视武装群众的重要性，当时的工农运动虽然很广泛，但没有广泛地武装群众。在国民革命军中的许多共产党员，也没有争取武装力量到革命方面来。那时若有

几十万群众武装起来的话，不至于失败到那样田地。

当时的工人运动有很大的成绩，不但组织了广大工人，而且在实践斗争中教育了工人，改善了工人的生活，提高了工人的社会地位，发动了广大工人参加国民革命，这是成绩。但在工人运动中也有缺点，没有充分武装群众，忽略对工人的教育工作，工人中的行会思想还相当浓厚。另一方面，工会还有不少行动代替了政府，可是当时的工会又忽视参加国民政府及以下的各级政府机关，没有把握住群众的意志。再就是当时工人提出的经济要求过高，而且过左，工会本身还有许多缺点，如民主不够，组织不严密，一般不要职员参加工会等。当时职工运动的这些缺点，也是造成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

主要的还是共产党政治上的缺点和错误。

南昌暴动之后，还有一个广州暴动，结束了大革命的高潮。广州暴动后，苏维埃的旗帜即飘扬在中国。

第八节 反动时期的职工运动—— 中国第五次劳动大会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是广州工人暴动纪念日。这个暴动是秘密准备起来的，那时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团长叶剑英^[83]，领导他所属的一团人，配合广东的工人暴动。起义胜利了三天，组织了工农苏维埃政府。反革

命向广州进攻，结果起义失败。于是全国便进入了反动时期，革命的高潮结束，低潮来了。革命的职工运动，也叫赤色职工运动。与赤色职工运动对立的有一种黄色工会，这便是职工运动的分裂，两派经过了多年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全国许多工人的组织并未瓦解，仍然存在，而且有许多干部在活动，全国工人群众对赤色职工组织的信仰仍然很高。国民党为了要消灭工人运动，建立了他们的黄色工会。于是赤色工会转入秘密状态，国民党则大肆整理工会。当时的赤色工会应该利用黄色工会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可是却错误地与黄色工会对立起来，拒绝加入黄色工会，这是根本不对的。同时，工人学校、俱乐部也应公开组织，不应用秘密的组织形式，但当时却有这样错误的方针。

一九二九年在上海开了第五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案，有项英^[84]同志的报告。在此时国民党颁布了工厂法和工会法，有许多条文是反对工人运动的，但也有一些是对工人有利的。当时国民党颁布这些法令，也是工人斗争的结果。国民党当时虽然反动，但多少还顾及到工人的利益，所以后来凭此条文而发生了许多公开的罢工。当时我们应该利用工厂法，但我们那时的领导却是不正确的。反对国民党的工厂法，要实行苏维埃的劳动法，这是不正确的。

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工人进行了许多罢工、包围工厂等斗争，这些斗争都是在赤色工会领导之下的，然而那时有很多错误，主要的是组织上的错误。

那时国民党组织的工会（所谓黄色工会），也有几十万会员，它的特点是：

（一）为了压迫工人运动。

（二）方针是劳资合作，反对阶级斗争。

（三）工会直接受国民党领导。国民党可以直接干涉工会的内部生活，取消工会的独立性，使之成为官办的附属组织。

（四）不许工人有全国性的组织。

（五）不许工厂学徒、职员、不熟练的工人加入工会，其目的是在分裂工人运动。

反动统治时期的托派，也是用一切方法来破坏工人运动。

反动统治时期还有两次罢工，一次是一九三一年上海纱厂工人的大罢工。这是上海所有日本纱厂工人的大罢工，组织了工人的武装，鼓动兵士，结果推动了“一·二八”的抗战，并且还坚持了这个抗战。另一次是一九三四年唐山工人大罢工，结果也是胜利的。

第九节 苏维埃区域的职工运动

在江西、四川、湘鄂赣、鄂豫皖等苏区，工人都有工会的组织，主要的是农村雇农工会。在苏区里，被组织起来的工人，大约有四十多万人。组织种类有雇农工会、手工业工

会、苦力工会、国家企业工会等，并且有它的组织系统——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省工会、乡工会、农村支部等。关于农村工会的会员问题，很难确定，我们正确的解决办法是：全部或主要的以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人，可以加入工会；一年做工六七月以上者，可以加入工会，但那种自制自卖的人不能加入工会。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工会法。

关于抗战后的工运，张浩⁽⁸⁵⁾同志以后可以报告，比我详细，这里只说一点：

今天最重要的问题，是用各种方法组织工人；其次是工人运动的统一问题。今天工人运动的方针，是参加抗战，援助抗战。只有参加抗战各部门的工作，工人的地位才能提高。在参加抗战中要保护工人自己的利益，在可能、适当的范围内，要改善工人的生活。现在全国已经没有什么工会的组织，职工应有一个工人的团体，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虽然召开全国第六次劳动代表大会还嫌太早，但我们至少要召集一次全国性的会议。

第十节 结 论

从中国工人阶级历年的斗争，我们可以证明如下的一些事：

(一)证明工人能够与共产党共同奋斗，只有与共产党

共同奋斗，才能得到工人阶级自己的解放。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共产党与工人阶级，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的。

(二)证明中国工人阶级自从形成自为阶级以后，在走上政治舞台以后，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总是站在最前线，而且还站在领导地位。

(三)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参加了国民革命以后，使得中国的革命更加有力，更加彻底，而且特别带着群众性，能够使革命得着胜利。相反，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革命，或某一政党离开了工人阶级后，则革命不能胜利，该政党也必无生气。

(四)中国工人阶级在革命最困难时，仍然能够坚持不屈。

(五)中国工人阶级在反帝反封建中有它自己广大的同盟者，——农民与小资产阶级，而这些同盟者，今天亦正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是中国革命的最大保证。

(六)证明中国的工人运动如若发展，则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对于工人阶级的解放是特别重要的。有些落后的工人常常忽略了这一点，只知道加工钱，我们的工人阶级必须继续努力争取与利用这些民主自由。

(七)证明工厂、机关里的小职员，以及学校里的教职员，也是工钱劳动者，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允许他们加入工会，我们应与他们联合起来，对于职员的反对是不应该的。

(八)在中国工人阶级中，有比较浓厚的行会性与流氓性，在职工运动中，应该教育他们，要号召他们以暂时的利益服从于长远的利益。这个纠正，主要的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针。

(九)证明中国的工人阶级必须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然后才能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才能够战胜敌人，完成自己的阶级任务。

现在中国的工人阶级，是有了自己的独立的政党了，但是还不够，我们还要组织独立的工会。

工人不但要加工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世界！要看深远！要做切实的工作！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

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 代表会议^[86]上的讲话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日)

我们陕甘宁边区最近几年搞起来一件新的东西，这就是工业。我们今天的工业规模虽然还很小，但这几年的发展是惊人的。一九三五年时，这里只有几十个工人的一个修理厂，而现在则已经有一万多工人了。这次会议以后，相信会有更快更大的发展。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政府，是保障工业的发展的，老百姓也需要发展工业，以便于达到工业品的完全自给。现在世界上凡是强大的国家，都是工业国。苏联经过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大大发展了工业，就把苏联从农业国家变成工业国家，因此他们就能进行如此伟大的消灭德国法西斯的战争。我们中国之所以弱，也就是因为我们还只有很少的工业，我们还不是一个工业国。要中国强盛起来，也必须使中国变成工业国。我们将来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我们就要建造很多的工厂、铁路和轮船，搞很多的机器，需要很多的厂长、工程师、技师、工人和很多的劳动英雄。所以工业这

个新的东西，有它极远大的前途。使中国变成工业国是我们奋斗的远大目标。

我们有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一点，因此要他做经济工作、做工厂工作就不高兴，他们说干这一行没有前途。依我看，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没有象做经济工作、工厂工作这样有前途。比如有很多同志，特别是长征过来的，他们总喜欢带兵打仗，他们可以当团长、当旅长。当然，在今天仍进行战争的时候，我们每个同志都应该学习打仗，应该奖励与拥护那些战争中的英雄。但是，不久的将来，战争打完了之后，那些团长、旅长又干什么呢？那时有许多同志就要放下枪杆来搞你们这一行——搞工业、搞经济或者搞文化。那时你们就是“老资格”，就是先生，他们就要向你们学习，你们就要当领导人。

将来有没有这样一个时候，象战争一样，工业也可以不要了呢？我看就是在长远的将来，工业不仅不能被取消，而且必然要大大发展的。现在边区的一百五十万人当中，大多数是农民，工人只有一万多，可是这一万多人却最有前途。几千年以来的农民，发展到今天还是农民，几乎没有大的变化。以后怎样呢？以后农民一天天就会减少的，因为以后开荒、耕种、收割大都用机器，工业技术要普遍运用到农业中去，那时农民就会变成驾驶农业机器的工人了。今天边区农民的作用与农民的力量很大，可是就发展前途来说，今天这样的农民，在将来是要起变化的，只有无产阶级和工业是最有前途的。

但是要达到那样远的前途，一定要从今天的实际情况出发，一步步地向前发展。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学习、研究，把办工厂当做一门学问，用严肃的态度对待它。例如，怎样组织劳动力，怎样管理工厂，怎样改良技术，怎样规定工资等等，都要用心去研究。我们要熟悉这门知识，要使学习在工厂中成为一种风气。厂长、工程师要学，工人、职员也要学，学徒更要学，大家互相学习，这是促进我们事业发展的一种动力。须知我们现在还有好多事情没有搞，很多事情搞得不好，或是搞错了，这在开始当然是免不了的。但是我们必须从这些搞不好或搞错了的经验中去学到本事，使我们以后能够搞得更好，能够少错一点，我们才可以前进。

在学习中，无论什么人，一定要放下“包袱”，去掉骄傲，才能够学好。不要以为我是从城市里来的，我已经学好了，看不起这里山沟中的东西。对眼前的事情不好好学，不加以研究，你就不能把眼前的事情搞好。至于从农村中出来的同志，那更要好好学习，否则，不独现在的事情办不好，将来更无法应付。抗战要胜利，这是没有疑问的。可是在抗战胜利之后，甚至在胜利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情况是会发生变化的。现在我们是在山沟里、在窑洞中搞，将来我们就会到城市中去。那时不仅有大工厂要办，而且有铁路、有火车、有轮船，要我们去管理。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把这比较简单的本事学习好，那末将来遇到那样复杂的大的场面又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开这个代表会，固然是为了推进边区工业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提高我们。只要我们

认真学习，我们就可以把边区的工业搞好，不久的将来，也就可以搞更大的工业。

我们既然认识工业的前途是最远大的，我们从事这个工作的同志，就应该有决心把这件事情当做自己的终身事业，一定要把它搞好。一年不行，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是一定能搞好的。我们必须把这样的事业精神和我们固有的革命精神结合，那一切的事情都是能够办好的。

大家知道，我们的工厂是公家办的，不是资本家办的。资本家是为了追逐私人的利润而办工厂，我们办工厂不是为了哪一个人发财，而是为了大家好，为了国家好，在今天是为了打败日本。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发展工业，我们同时采用私营与公营这两个办法。我们应该帮助私人多办一些工厂，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多了，对于我们的经济是有好处的。但有些事情私人办或办不了的，便只好公家来办，即国家办。我们的国家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众，工农兵在这个国家中占主要的成分，公营工业也就是劳动者自己的。在我们的公营工厂中没有资本家，因而工人与工厂就没有不可调和的冲突。所以，在我们工厂管理方法上，就不是采取资本家的那一套办法。我们管理工厂的方针应该是：用一切方法与工人合作，依靠工人的积极性；工人也应该以一切方法和工厂合作。要办好工厂就要依靠大家，依靠大家都发挥出高度的积极性。

邓发⁽⁸⁷⁾同志讲过，工厂管理人应该有群众观点，这很对。但工人同志也应该有群众观点。你织的布，做的衣服

和鞋子，都是给八路军〔88〕穿、给人民穿的，你做的东西，都是给八路军和人民用的（资本家开工厂所制造的物品就不管哪个穿、哪个用，只知道赚钱，这叫做发财观点或利润观点）。如果你织的布不好，一穿就破了，鞋子做得不结实，给八路军穿，一个冲锋就烂了，那就是没有群众观点。因为我们产品的消费者是工农兵大众，开工厂就是为了替大家做事，就应该对大家尽责，不可因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工厂管理者在可能条件之下，应该把工人的文化生活、物质生活都搞好，使他们安心工作。大家都应该有群众观点，大家负责。有困难，大家讨论、大家研究来求得解决。领导是要集中的，每个人办事的职责应该分明。谁的工作没有做好，谁就应该负责，就应受到适当的指责。这样，我们的工厂便一定可以办得好。

总之，我们不仅能组织政治斗争、军事斗争，而且要会组织经济、组织工厂、组织劳动力、组织市场等。这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我们从今天开始，一定要把它学会，使我们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也变成一个经济繁荣的工业国家。

关于城市群众工作问题*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我们城市中的工人运动、贫民运动要从整个经济政策、城市的经济政策出发，就是要从城市经济发展、工商业发展的前提出发。在目前工人最大的利益，就是发展工商业。工商业发展了，城市贫民的生活也就获得保障。城市的工人、贫民运动，是以恢复和发展经济为准，是为了发展城市经济，而不是把城市经济破坏。这里所指的不仅是公营企业，私人工商业也需要发展。为发展私人企业，就得保证它有相当的利润，这是工人、贫民最大的利益；否则，不仅害了资本家，害了公家，而且也害了工人、贫民，使大家同归于尽（失业无工作）。

工人运动中的改善待遇和提高工资，不论采取何种形式（如算过去的或定将来的），都不能影响工商业的发展。如果在算过去的账和订新的契约中，发现影响工商业的发展，那就要主动的减低，并在必要时降低一些工资。总之，

* 这是刘少奇对石家庄工作的讲话。整个讲话共六部分，这是其中的第二部分，原题为“关于工商业政策”。

一切要服从公私企业发展的前提，要实行劳资合作，赶快把工厂开起来，在不影响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的条件下，当然可以适当的改善工人待遇（如取消虐待，改善待遇、卫生及民主生活等），但对任何工厂商店不能采取清算办法，假如要算以前克扣的工资，是可以的，不过要看看是否算垮了，如果算的支持不了，不能复工了，我们就主动的加以控制，使少算点，或者不算，因为工人最大的利益是复工而不是其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些同志，是存在着错误的思想的，做工会工作的同志，特别要慎重考虑。如果动不动就把铺子算光，或者扣厂主，或者扣老板，这样发展下去，是会把城市毁灭掉的，我们错误中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现在石家庄搞的清算斗争是从乡下带来的，清算斗争在乡下是合法的，应该的，我们都支持它。农民会算账，一算就把地主算垮了，这很好，因为我们目的就是要使地主垮台。在乡村，清算是一种手段，耕者有其田，消灭封建是目的。算的结果，把最黑暗的封建势力算垮了，农民解放了，社会生产也大发展了，结果是农村经济繁荣，农民大翻身。但如果也在城市里搞清算，一定会把工商业都算垮。这样发展下去，的确是很危险的。

在城市中对保甲长，对封建恶霸，对汉奸特务的斗争，也不该采取斗争大会的形式，用直接斗争方式处理。对这些人的斗争要通过政权的形式。斗争大会又是农村搬来的，斗争大会这个名称本身就不妥当，斗争会实际上是第二政权。我们从《新石门日报》⁽⁸⁹⁾上只看到斗争大会，看不到

政府。现在斗争会决定一切，可以打人，可以捆人，我们报纸也说“打得好”，鼓励群众去打。群众可以没收财产，可以处理财产，但是从始到终不经过政府，还有个别的同志不经过市委和政府批准，就领群众把人拖死了，这是错误的、违犯纪律的，这都是无政府思想的表现。我们领导用报纸鼓励斗争、鼓励清算大会是不对的，其结果使清算合法。在乡村搞清算斗争，把地主的东​​西拿出来大家分，使穷人翻身，这很对，但搬到城市来就弄错了对象。这与保存工商业的方针，和工人、贫民最大的利益都是相违背的。

我们对工人、贫民是要适当的改善其生活的，如救济、复工、就业、贷款等办法都是可用的。但应当认识一点，城市的贫民的要求是不能完全满足的。满足农民及城市工人的要求是比较容易的，但城市贫民的要求是不能满足的。在乡村中压迫农民的是封建地主，找出这个穷根来一挖就挖掉了，在城市要挖穷根去找谁呢？向哪里挖呢？挖到后来必然会挖到工商业资本家头上来，但是挖光了工商业，也不能够解决贫民的问题，因为毁灭了城市，贫民就更没有办法。在城市里提出挖穷根是不对的，这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表现。

今天领导贫民运动中，存在盲目的崇拜群众自发性，做群众尾巴的倾向。同时在政府和各种机关中又没有充分的吸收工人参加，这又是关门主义的倾向。

对工商业的另外几个具体问题是：

第一，不许资本家破坏他们自己的工厂和店铺，可以

开工开张的一定要开工开张。假如他们因为赚不了钱而不能开张，要关厂歇业，我们就调查一下看是真不能赚钱，还是假的。如果能够赚钱，就一定得开。如真不能赚钱，就要和工人及资本家好好商量一下，研究不赚的原因，如因工资高不能赚钱应重新讨论工资问题，使工人和资本家双方让步或者提出分红的办法，实行劳资合作。总之要达到开工复业的目的，使经济活跃起来。

如果工人见了土地法大纲，要回家分地，在临走前想把工厂分一分，自带回家，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站在工厂方面禁止工人这样干。如果工人和资本家都不想干了，政府可以接收，不让他们拆垮，他们什么时候想再开工，再交还他们。工人的待遇也不能过高，现在要使工厂复工，有钱可赚，工人维持一家生活，领导上要经常和过高要求作斗争，否则就会破坏政策。听说现在有的工资订得过高，工资过高是自杀政策，因为工资过高，成本就要高，成本高了，工商业主就会赔钱，结果大家都不雇，工人就失业了。

第二，石家庄的商业，根据过去情形和今天的条件看来，今后是会暂时缩小一点的，因为过去几万个地主带来了他们的浮财和收的地租，到石家庄来消耗，还有国民党军队和职员也在这里消费，这都是支持石家庄市面的重要因素。现在国民党的军队被消灭了，我们常住军队数目小，消费力不大，而几万个逃亡地主主要送他们返乡，所以今后这两个因素都不存在了。同时交通不能恢复的那样快，城市经济和乡村经济也不会一下子就联系得那样好，所以石家庄的商

业可能要缩小一些。我们不要提出繁荣市面的口号。今后支持石家庄建设的是精干的生产事业，等把铁路修通了，和农村经济结合好了，和各解放区联系好了，市面就能够恢复。但今后有些商业一定要萧条（如奢侈品市场是没有了），有些可能发展（如推销土产品及与恢复交通有关的和各解放区经济有关的），所以商业要改组，要和商人好好研究，说明解放区是要商人的，研究如何在新的情况下办新的商业。

第三，工商业中常常牵连到敌伪物资，及汉奸、战犯、特务、保甲长等的财产处理问题。现在有些同志总觉得贫民应斗一斗，分一点东西，但又要服从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于是都找到汉奸、官僚、特务、保甲长的头上作文章，从工厂里找汉奸、特务，沾到一点边，就把工厂、铺子封了。

属于敌伪的物资及汉奸、战犯、特务、贪污官吏的财产是可以清理没收的，但并不是说凡是这些人员不分轻重，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的要加以没收，这样做就错了。一般国民党党员及敌伪小职员财产不应没收；保甲长的财产看他鱼肉人民的轻重、贪污的轻重而定；轻的可以不动，重的动一部分，但不要弄光。不要把范围搞的太大，不要弄错了。现在有些把汉奸、战犯、官僚、特务扩大化了。什么叫汉奸、战犯、官僚、特务？什么人的应该没收？一定要弄清楚。敌伪军一般官僚不能算战犯，他们只是奉命作战的，是正常的战斗行为。战犯是指决定战争及宣传煽动内战的主要分子。在正常的作战行为之外杀人的敌军军官（如虐杀俘虏及染

上无辜人民鲜血的)，也可以战犯看待。所谓汉奸，是指帮助民族敌人出谋献计，或在敌人掩护下屠杀抗日人员、屠杀人民及坚决反对抗战的分子。在敌伪机关做事的小职员及受敌雇用的工人不是汉奸，不能把凡在敌伪方面做过事的都看成汉奸。对于特务，也要把敌特务组织中的人员加以区别，看他积极反对过解放军没有，杀过人没有，不能把在敌机关中做过事的人，都看成特务。关于贪污官吏，国民党的官员中没贪污的很少，所以也应把压榨人民、鱼肉人民较严重的和一般的官吏区别开来。对于逃亡地主，他们早就嚷着要“返乡”，现在就把他们送回原县，越快越好。其中在石家庄有职业的（如当教员、职工、开铺子等），同时又不是恶霸地主，如果不愿回去，可以让他留下。一般逃亡地主送回去分田地，恶霸地主交其原籍农民惩办。他们带来的浮财要没收，没收的东西城市和乡村各分一份，不要让他们空手回家分地，但也不用把原物送去，只由市政府给他农村转一笔账就行了。

第四，房租问题。一般的不能分房子，至于完全靠出租的大房东，是否分他的房子，可以考虑，但应在调查清楚后有组织的处理。公家房子可抽一部分赁给群众住，要收一些房租，因为修理房子要花钱，同时还要考虑到政府的财政收入问题。此外市政府还要建一些市场，盖一些小棚子，以便商人营业。

第五，没收财产问题。一般群众团体都没有没收财产的权利，没收的决定和处理要通过政府。至于对克扣工资

及贪污中饱，工人、贫民可提出赔偿，但群众不能直接去扣人打人搬东西，应向政府去控告，由政府仲裁或判决。对敌伪财产，群众团体可进行调查，向政府报告，查出后可给报告者以奖励，但群众不能直接去没收，要有秩序的去搞，不能代替政府。工人与工厂主有纠纷，工会可代表工人向资本家提出要求，解决不了的也要向政府提出，由政府仲裁解决。工会和农村的贫农团及农会不同，今天农会就是第二政权，他可以直接同地主斗争。今天对城市资本家，不能由群众直接动手，因资本家不是消灭的对象。今天工会是完全代表工人的，但政府则不完全是工人的政府或工人、农民政府，而是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在内的联合政府，所以工人和厂方的问题不能由工会直接来处理。如果把资本家的问题交工会直接来处理，那是无产阶级专政，结果会破坏工商业。今天的政权是在各个阶级的斗争中通过政权形式来保持大家的正常秩序，否则就会形成工人、贫民专政。今天工人、贫民提出的要求，一定要双方自愿，保证契约的自由，只要资本家不勾结蒋介石，只要他遵守我们的法律，就同样的给以自由。譬如工人要开会清算他，他可以去也可以不去。今天和资本家发生纠纷，如果要算账，只能算超经济剥削的账。要是资本家履行契约上的义务而又发生了纠纷，则这是不能清算的；并且即使在算扣工资账时，也得注意不要算垮了资本家，甚至考虑算还是不算。

关于召开第六次全国 劳动大会问题的谈话*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大会可称为劳动代表大会。本来最科学的名称应该是职工代表大会，但是，劳动大会在历史上有过作用，工人们熟悉这个名称，我们称为劳动代表大会还是可以的。

劳动大会，设一总会叫做执行委员会，委员人数不要过多，也不好过少，以五六十人为宜。其下可考虑分设各种产业的总工会，如煤业总工会、军火总工会等。

大会要搞劳动法大纲、宣言、章程，劳动法大纲由中央准备，宣言与章程由东北准备。由李立三〔20〕同志致开幕词。

大会要向世界工会联合会〔30〕提出一般意见，抨击分裂的黄色工会，号召革命工人，解放区工人和蒋管区工人都在内，起来反对分裂职工运动。宣言的主要内容亦如此。

交流各地经验要在大会前举行，大会后分蒋管区、解放

* 这是刘少奇对赴哈尔滨出席职工代表大会的部分地区的主要负责人谈话要点。现标题是编者加的。

区两部分讨论,以保守秘密,这些讨论不要公开发表。

总工会会址暂设在哈尔滨。等打开北平后,再搬到北平。

会员要缴纳会费(每月的一天或半天工资),作为经费,不足时政府也可帮助一些。

有些干部怕当工业干部,这是完全错误的。其实,工业干部是最有前途的,军事干部在战争结束后绝大多数是要改行的,农民干部的前途也没有工业干部的前途那么远大,因为农民要慢慢变成工人。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其他的各种干部都没有工业干部的前途远大。讨论职工运动时,应讨论这个工业干部的问题,并须有一、二条对工业干部的条文。

手工业工会的方针要讨论。我们还没有好的经验,没有干部,可先搞一些典型,总结经验,并训练一批手工业工作干部,然后再成立手工业的各级工会组织。

关于职工运动的方针。由于有产业工人与手工业工人的不同,不能把产业工人运动的方针,用在手工业工人运动中去。过去我们手工业工人工作搞不好,这是一个原因。又由于有解放区与蒋管区的不同,不能把对解放区工运的方针用在蒋管区,亦不能把对蒋管区工运的方针用在解放区,所以应分别订出不同的方针。

在解放区的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只顾工人不顾资本家,或只顾资本家不顾工人;只顾公家不顾私人,或只顾私人不顾公家,都是不行的。过去

的偏向就发生在这里。不分产业工人与手工业工人，不分蒋管区与解放区，劳资、公私照顾得不适当，以致公营工厂受损失，私营工厂一斗就垮。过去的工商政策，毛主席说，是自杀政策。这是无政府无组织的思想。在蒋管区，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都没有保障。这是与解放区不同的，不能与解放区工运方针混为一谈。在解放区，如果工厂开不起来，工人就会失业，我们工人不能只强调私人的暂时的片面的利益，应该看到并服从长期的最大最根本的利益。现在主要的危险是工商业办不起来。所以主要的应该发展生产，但不照顾工人也不对。

从许多提出来的问题中，大家对工业觉得不知怎么办，这可以看出带着很大的盲目性。这是由于以前我们的工厂在乡村在山区里，又是在战时，没有正式的机器工业；现在我们要管理在大城市中的历史悠久的大机器工厂，这是一个新的问题，新的工作，我们还缺乏经验。有些工厂的历史是很老的，经过了几个朝代，资产阶级管理这些工厂是很有经验的。过去我们产生盲目性，一个是缺乏经验，一个是主观主义，不肯向有经验的人学习。不肯向人学习，强不知以为知，结果，工作搞不好。将来我们还会碰到更大更复杂的问题，只有好好向资产阶级有经验的人问一问、学一学，做他们的小学生，才能避免盲目性。

我们的工业干部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少，一个是低。要管理大城市、大机器工业是很困难的，除了好好学习之外，还要大量任用国民党的老的工厂干部，可以任用他们做厂

长，比我们派去的厂长还要好一些，因为他们有管理经验，又有工业知识与技术，可以争取改造他们为人民服务。只要他们能答应搞好工厂工作，工资高一些都可以，我们则可派政委或副职去，向他们学习。但是一定要他们保证办好，不捣鬼，如果办得不好，或捣鬼，我们可以依法处理，没有什么可怕。如他们办得好，我们要奖励。只要我们肯向他们学，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关于个别农民破坏、偷盗工厂机件及其他建筑物资问题。我们要下令禁止破坏、偷盗，已被破坏、偷盗的则应限期送还，否则依法处罚。

关于工会、工厂、党的组织三者的关系问题。工人运动与生产运动实质上是一个东西。工会是代表工人的，厂长是代表政府的，都是要把生产搞好。厂长虽然是上级派的，但上级也是人民（包括工人）派的。不能认为厂长才是替国家做事，工人不是替国家做事。工人进行生产，厂长管理生产工作，都是替国家做事。有人说：“现在是干部当家，不是工人当家”。我问他：“什么叫工人当家，工人怎样当家？”他那个说法是不对的，几千几万人怎样实现他们的当家呢？不组织起来是没有办法的，要组织起来就要有干部，但是“干部当家”的话是说不通的。干部做得不好，是会被撤职的，所以问题不是谁当家的问题。干部是要的，有个做得好不好的问题，干部如果官僚主义，工作就做不好。这个问题说明对组织的作用与意义认识不足。厂长与工人不过是一个分工的关系，这一点，我们应该如此认识。

主要的问题是如何管理工厂。这次大会主要讨论机器工厂的管理，把眼光放在较大的城市工作中去。工厂可召开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会，向厂长提意见，过一定的民主生活，但工厂还是厂长制，所以向厂长提意见，仍不应取消厂长的最后决定权。在开会前应通知厂长，应该有准备。厂长应参加职工运动，执行工会与支部的决定。在厂长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厂长有最后决定权，而在工会会务与党务范围内的工作，则应执行工会与支部的决定。

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厂长保证生产发展，不是干涉厂长。有人以为党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支部不能干涉厂长不是违反了党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这条吗？这是不对的。你的支部只是几十个党员，中央是代表全体党员的，最高的党的组织是中央，不是一个支部。如果让一个支部作一切决定，倒违反了党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这一条了。当然，支部对厂长有监督权批评权，但没有撤职权。

厂长要做工人运动的工作，过去是做了，但做得有好有坏。大的工厂，我主张有工人代表会，工人代表会的决议，厂长要执行。

关于北平工作问题*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

我来北平时间很短,了解的问题不多,前几天找一些同志谈了一下,知道了一点。根据所知道的,提出一些今后工作的意见,讲一讲我们当前先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哪些工作可以慢一点做。

北平解放到现在,已经两个月了,接管工作大体上已经结束。接得很好,我们很满意。接管工作的同志们很努力,表现了艰苦的廉洁的作风,给了人民以好印象。

北平的秩序大体已经恢复,或者说初步地恢复了,应进行的一些工作,已经可以开始进行。已经有了初步的必需的社会秩序,当然还不能说已经很好了,为了便利于我们进行工作,还需要继续进一步地做恢复工作。

第一,目前有哪几件事情需要迅速解决呢?

(一)学校问题。公立学校:原有的尽可能办下去,不能办的就合并。能办与不能办决定于有无经费。华北政府

* 这是刘少奇在北平刚解放时,对北平市工作干部的一次讲话。标题是编者加的。

应作具体计划，以节省并办好学校为原则，考虑一下能够办多少？并计划办农业学校。私立学校：凡私人能出钱办学校者，只要不违犯我们的教育方针，我们一概欢迎。有的学校，政府少贴一部分也可以；还有的学校，学费很高，但学生愿意出，我们也不反对，这样使大家都有书读，有学校住，问题就少一些。应该很快地组织大学委员会，召来各学校代表，宣布我们的这一方针。至于学制问题、课程问题，目前完全实行改革不可能，大体上可照过去办法办。

(二)对资本家的问题。有些资本家不安心，应想法使之安心生产。我们可以宣布既定方针，保障资本家的合法利润，禁止非法盈利。我们还应考虑哪些生产不妥当，要加以节制；哪些生产需要发展，加以帮助。在劳资问题上，应向资本家和工人宣布，在可能范围内适当改善工人待遇，但我们要反对过高的要求，反对把工厂分散，我们可说服资本家满足工人的正当要求。

(三)房子问题。大家感到房子不够住，基本原因是房子少，不是不均的问题。可以再找一些空房子，有些破房子，只要有一大半或者一半还好，就可加以修理，还可以住，这样比之重新盖房子要节省。私人房屋，我们明确宣布除官僚的房产外，私人的不加没收，不准侵犯，私人房权政府保障。至于房租是否要减，我想我们也可宣布，不开展减房租运动。根据许多城市工作经验，凡是搞减房租运动，就闹不好。今后怎么办？采取房主与房客自由商议的办法解决。如果遇有争执，可请政府调解。保障私人房产不是暂时的，

而是长期的，如果不这样办，会使人们不出租房子，不修建房子，这对人民是不利的。

地产问题，目前不做决定，待联合政府成立后再说。这个问题应与房产问题分开来，不能混同。

(四)金融物价问题。目前物价还有小小波动，应告诉人民这种波动是很难免的，待一时期会进一步平稳。物价问题关系一切工作，我们要很好去做。我们应该恢复进出口贸易，规定一些出口入口的办法，安定人心。我们还要把城乡关系搞好，使城乡货物交流，力求畅通。我们可以动员区、村干部搜集出口的东西，城市过多的东西可流向农村去，使物资迅速地周转起来。此外还有些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再想一想，以求解决，便于今后工作。

以上这些问题是过去遗留下的问题，应当快些解决。下边谈一谈今后的方针问题。就是以后做什么？怎样做的问题。

我们的一般方针是改造北平，建设新北平。过去我们接好了，但还要管好，管的问题尚未解决，如管不好就会失败。目前已经可以开始第一步工作，去掉旧的东西，建设可能建设与必须建设的東西。

为了完成改造北平建设新北平的任务，领导关系与职权要确定。比如北平市与上级领导机关以及与下面的关系，应确定。我想应根据这样的原则决定：凡北平市范围内所有党的工作、群众工作、经济工作、治安工作，统由市委、市政府去管。华北人民政府在北平市范围内的工作要经过市

委和市政府。

城市工作的特点是集中，应由市级解决的问题，要集中到市委、市政府、市工会、市学生会，不要分散到各区去。市级领导机关要加强，不然解决不了问题。现在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很严重，我们必须迅速使各机关各单位的职权明确起来，谁要破坏秩序就向他提出警告。为了管好北平，首先就得把管理机关的关系搞好。

北平工作千头万绪，我们必须抓住中心工作。二中全会指出，城市工作必须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北平要执行这一路线，把城市管理好。今天我们主要的斗争对象还不是一般的资本家，而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许多地方把劳资关系搞得很紧张，这实际上帮助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发展生产，是北平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同时，没有北平千万的工人和群众与我们团结一致，则北平工作不易办好。目前北平的群众工作，首先应是工人工作，工会工作。

第二，工会工作，到底有哪些内容？大体可分为三项：

一是要适当地解决工人的要求。凡是工人所提出的正当的、可能解决的、当前的切身要求，工会应该负责地和工

厂商量加以解决。

二是工会的组织工作。

三是工人的教育工作。

只有把上述三项工作办好，工会才有可能有效地动员工人，组织劳动竞赛，提高劳动效率，减少成本，才能使工人对工厂真正负起责任，才会积极起来参加工厂管理，才会感到自己是主人，否则的话就不好办事。

(一)最近听到工人有很多要求。这些要求，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应该迅速给以解决，不要拖，拖了会妨碍工作。工人生活，我们要特别注意加以保障。我们保障人民生活的次序：第一是军队，第二就是工人，第三才是机关、学校，第四是其他。如果说市政府工商局有饭吃，而工人没有饭吃，则应当把粮食给工人，因为只顾机关而不顾工人生活，则工作就不会办好。

我们应该向工人宣传，我们赞成改善工人生活，而且将来一定可以改善，但必须提高生产，生产提高了，生活就可以提高。今天不能马上改善。一般提高也不可能。因为还在打仗，一个炮弹打出去等于一个中农全年的生产。因此，我们要号召工人暂时吃苦，待一二年后，战争结束军队即可减员，全国动员大生产，我们长远利益就能得到保障。这些问题应该向工人讲清。但力求不降低工人生活，这应当作为我们的努力方向。万一降低工人生活，也应该先降低机关的，我们应该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但无必要则不要降低。这就要靠我们的努力。

工人原有的福利没有理由就不应取消。如果取消了，工人反对，我们就应该承认错误，并应迅速恢复。过去有些问题拖了很久不去解决是不应该的。

工厂里很多制度是要改革的，改革的决定条件是看群众赞成不赞成。如果赞成，我们就快点搞。如果不赞成，我们就慢点搞。生产制度，原则上也可以改革，问题是要改好，改得合理，改得科学，而不是改坏。如果改坏了，还不如不改。如果目前不能改好，则准备将来改，现在你们要做好准备工作。

对于工人的要求，怎样解决？要采取适当手续。工会应在工人中组织讨论，把工人的要求弄得清清楚楚。现在许多地方提出许多要求，都是零零碎碎，看不出问题的所在。工会要学会区别工人各种要求。哪些是正当的，哪些是不正当的，哪些是可能做到的，哪些是不可能做到的，必须弄清楚。这是一种细腻的工作。弄清楚后，归纳成若干条，由总工会同有关部门——企业、机关交涉，开会，互相同意后，最后由企业、机关负责同志向工人解释说明。如果工人代表与企业、机关或工厂发生矛盾，则应该迅速请示上级机关解决。切勿拖延。

私营工厂，也采取同样办法。工会把工人要求弄清楚后，与资本家交涉；如果解决不了，提交政府仲裁；再解决不了，则交司法机关用法律手续解决。

工会对工人正当的与可能解决的要求，应负责帮助工人解决。如果工人的要求不正当或者不可能解决，应负责

地向工人解释,进行教育。

工人的要求一定要经过工会审查,以免发生错误。倘遇发生工人罢工如何办?在我们政权下,不组织工人罢工。对资本家开办的工厂也是如此。但我们政府不禁止罢工,如果发生了罢工,经过迅速审查,确定是正当要求者就要迅速解决。本来在我们领导下,工人可以不用罢工的办法,而用协商的办法,满足工人的要求。所以倘若发生罢工的问题,我们必须迅速审查自己内部有无官僚主义,工会的工作有无错误?

在北平,我发现解决工人要求上发生严重的无政府状态,第一是擅自取消工人福利;第二是不按系统去解决工人要求。以后我们要搞一定的纪律,要有一定的政策,大体可定出几条:(1)发给工人工资一定按米价计算,而米价的讨论一定组织议价委员会吸收各方面的人参加民主讨论,不能由哪一个单方面决定。(2)以后工厂及企业、机关倘要取消工人的任何待遇,延长工作时间,裁减工人,一定事先与工会商量取得同意,否则不能单独处理。(3)下边工人的要求一定送总工会审查批准,然后再由总工会派人同该厂工人代表去与有关机关、资本家交涉。随便提出要求,随便解决,是不好的。

提高工会在群众中的信仰,很有必要。你们怎么去依靠工人阶级呢?依靠工人阶级就是依靠总工会、分工会和各级工会在群众中的信仰。工会要团结全体工人在我们党的周围。工会联系广大群众,就是我们党、我们政府联系广

大群众。工会是党与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这是一个基本问题，不要看作是可有可无的事。

(二) 工会组织问题：

工会要联系工人，要系统地有条理地把北平全市工人组织起来。为适应将来全国的工运，大致可组织六种工会：(1) 产业工人工会，下边再按工厂性质组织分会；(2) 手工业工人工会，按职业分木匠、理发、地毯等；(3) 苦力工人工会，如清道夫、三轮车夫等；(4) 店员工会，商业机关中的工钱劳动者，也分各行业；(5) 文化教育工作者联合会；(6) 机关工作人员联合会，或叫公务员工会。

如果北平成立这六大工会，把全市所有工钱劳动者都组织在工会内，工会就有三十万会员。再加上这些人的家属，就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字。所以城市人民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工会。工会不应该小，而应该大，这样才有力量。

各种工会要开办训练班，要重新配备干部组织筹备会。

工会的经费问题原则上必须独立，目前没有钱，政府可以给一点帮助。

工会的组织原则：凡属出卖劳动力靠工资或薪水为生活主要来源的体力与脑力劳动者，都可加入工会，因为工会是工人阶级群众性的组织，与党不一样。不分性别、信仰，只要是工钱劳动者，都可加入。只有这样，工会才有可能团结广大工人群众。入工会当然要服从工会章程、决议。暂时限制那些剥削者、反动者少数人不能参加工会，也是必要的。

(三)工人教育工作：

我们要进行一个普遍的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至少要计划半年。

工人运动必须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采取一切可能方法与机会，进行教育，动员很多懂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去当教员。培养大批教员，搞广播，办夜校，做演讲，在报纸上写文章，经过这样广泛深入的教育，然后才能谈到发展党，否则发展党就是空的。

教育内容可以分为四种：

(1)唯物史观——劳动创造世界、阶级社会制度、阶级斗争等；(2)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3)当前的政策——中国革命目前阶段的各种政策；(4)组织问题，讲工会、共产党以及其他群众组织。

大家放手去讲课，不要怕错，错了自己再修正，总是错的少，对的多。第一种和第二种讲错点，问题还不大；第三、第四种就要注意，特别是政策部分，讲错了就会出问题。

以上，解决工人要求、组织工人、教育工人就是当前的三大工作。进行了这些工作就会好办事，工人可以帮助我们清查反革命，可以增加生产，可以实行民主。他们不仅可以派代表讨论工厂本身的生产问题、管理问题，最后还可以讨论政府的问题，政府出的布告也可在工人代表会议上讨论。在半年一年后，工人熟悉了代表会议的办法，然后再开人民代表会议。人民代表会议与资产阶级议会制不同，同时又区别于苏联式的代表会议，因为我们的人民代表会议，

资产阶级分子可以参加。

要加强工会工作,把一等的好干部放到工会中去,最强的干部放到工厂中去,区委干部弱一点可不急,各单位要计划一下如何分配干部,帮助解决干部问题。

今天讲的是北平第一步的工作。第一步做好了,第二步就好办了。

对天津国营企业职工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各位职员同志们：我来到这里时间很短，情况不大清楚，不过听到一些同志讲，国营工厂里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必须解决，也可能解决。因为不可能和各位同志个别谈，所以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谈谈。有些问题还是要大家研究的。

为什么今天要特别召集各厂职员同志讲话？我觉得许多问题必须和大家谈，使大家清楚了，然后才可以团结起来一起搞生产。

现在的工厂是国家的工厂，人民的工厂，你们是国家在工厂中的组织者。职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无产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是整个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国家依靠工人，同时也依靠职员，特别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现在国家需要发展工业，交给我们一个生产任务，这是光荣的。这个任务要依靠厂长、职员、工人的共同努力，而且还要依靠农民，因为他们可以供给原料、粮食等。

怎样才能把工厂办好？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中

国现在已经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了，工厂也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了，要把工厂办好，就首先要你们和我们把关系搞好才行。解放前，你们和共产党不大接近，你们和我们的干部互相不了解，因此互相间的信任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如果在不了解不信任的情形下，要把工厂办好是很困难的，所以今后工厂的军事代表和工会工作干部有义务去了解你们、信任你们。而你们也有权利了解我们，有些什么好处，什么能力，哪些是我们能干的，哪些是你们能干的，哪些是彼此间的弱点。了解了这些，你们就可以有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和我们的干部。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才能把厂办好。

共产党认为你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共产党是工人的党，也就是你们的党，党是代表你们的。你们是和我们共产党一家人，你们与军事代表的区别，只是年代上的不同，再过四、五年，你们也要成为我们的老干部。以我来说，我入党也不过二十余年，以前我也做过工人，打过铁，翻过砂⁽⁹¹⁾，想从工业入手改造中国。再过三、五年，我相信你们中可能有很大一部分变成共产党员。因此今天在我心目中，把你们看成一家人，自己人谈话要老实，不怕得罪人，不怕说错，同样你们对我们也一样。现在我们和你们的关系搞好，互相信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今天就专来谈这个问题。

今天你们已经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办国营工厂。今天已经如此，将来亦如此，是不是还能不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呢？

那就要看共产党是不是会垮台，这是不可想象的，除非共产党犯了系统的原则的错误，将来共产党是不会垮台的。也有人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国民党幻想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翻身。据我看，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很难爆发的，因为世界人民已很觉悟，已经有前两次大战的教训，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必须取得群众的拥护，这是很不容易的。爆发的危险是有的，但也只是一种危险而已，人民的反抗可能将它压下去。退一步说，即使发生了大战，那时中国就要抗战，就要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抗战。在抗战中，工厂还需要开工的，因此你们和共产党的合作是长期的，你们和我们的关系就必须搞好，否则就会长期痛苦。

怎样跟共产党搞好关系呢？

首先，要采取老实的态度，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承认真理，服从真理，拥护真理，就是实事求是，老实态度。我们的最高标准，是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一切要服从这个标准，小原则要服从大原则，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这就是原则性。不是讲亲戚、朋友、面子、派系，而是讲真理，如果不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那就是违背真理，违背原则，人人痛恨。不管你是干部、党员、群众都必须遵守。如果共产党员不服从真理，那就是对人民不负责，也就是不对共产党负责，不配作党员，因为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利益。共产党员要服从真理，你们也要服从真理，如果关系只是一时搞好长期不能搞好，是不对的。

这里我可以举我们党里面的事和大家讲讲。抗战以前

我们全国党员只三、四万人，抗战以后，很多人都跑到延安，特别是男女学生，于是即发展了几十万党员，因此许多干部都是新党员。起初也是学习劳动创造世界……参加了党，但有一些人态度不大老实，填表时假造姓名、年龄、籍贯、社会关系、能力、履历，本来没进过大学，他说是大学生，本来没搞过革命，说搞过，本来与共产党没有关系，说与某某团体有关系；本来已加入国民党、三青团或特务组织等，说没有。总之，把和共产党有不好的关系隐瞒了，把对共产党有利的吹点牛，于是很多人没问，自己也没改，也暂时取得了一点信任。中国是个不安定的社会，不吹、不造假是吃不开的，所以不老实的态度，是有它的社会原因的。他们到共产党内来，也把旧社会的一套带来，以为也要如此才能吃得开，直到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后，发现了很多党员不老实，大家很惊奇，就一追，确实发现了一些特务，但也因追的太苛，很多人不是特务的也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是特务，结果有些单位承认特务的几乎有百分之五十，这引起我们的怀疑，便定出一个人也不要杀，大部不要逮捕，继续审查，半年一年之后，查明绝大部分不是特务。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觉得受了冤枉，有些人甚至自杀，后来我们就提出要老实坦白，不是特务的就取消了他的帽子。这件事主要原因就是态度不老实，吹牛皮，这在旧社会里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共产党里确是吃不开的。应当是怎样的就说怎样，做过什么就说什么，把情形谈清楚，把过去说明白，今后不做，在共产党中还是吃得开的。有人要加入共产

党,我问他为什么要参加,打算今后怎么样,他说还没有考虑,我说那么你还是想一想。在加入党时即使能隐瞒,但三年四年二十年之后,怎么能长期隐瞒呢?有些人跑到党里来钻空子,不该得的得了,不该作的作了,任务逃避了,好处得到了。我们党里也有贪污的现象,我曾到五台山,有一个共产党员对我说,他在共产党里犯了错误,因为没有贪污。他的话是反话,就是说有些人贪污了,没有挨整,而老老实实的党员却受苦,后来我们就整了一下贪污分子。所以态度老实的人,会吃点小的苦头,但最后是得大便宜的,不老实的人,起初会得点小便宜,最后会吃大亏的。今天我想告诉大家,各厂的干部、厂长、工人都要老实,才能合作下去。今天我对大家和新党员谈清楚这些,只要以老实的态度把过去的谈了出来或写了出来,都是好的,因为日子长了,反正是会有人知道的。旧中国的社会是一个污秽的社会,必须把污点洗刷干净,只要说清楚了,就既往不咎,共产党改造社会就是改造人。

其次,要跟共产党搞好关系,必须跟工人的关系搞好,不然就是和共产党的关系搞不好,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怎样才能和工人搞好关系呢?是不是给工人点便宜,给某些工人加点工资,感情拉拢就可以搞好呢?这叫做无原则。因为只讨好少数工人就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就不对。即便一时搞好,也终于会使他明白受了你的骗。那么,怎样才能和工人搞好关系呢?今天我主要是想讲一讲这个。

职员和工人统统是工薪劳动者，雇佣劳动者，虽然一个是脑力劳动，一个是体力劳动，但基本上都是劳动者，因此职员和工人的关系必须搞好。听说有的工厂，工人和职员的关系搞得不好，有些工人要反对职员，清算职员。这些问题，想来是存在的，不过过去没有提出，今天提出来了，必须要解决。

过去工厂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他们要压迫工人，剥削工人，必须要依靠一些人。他们就从工人阶级中找出一部分，就是职员和一部分工头，对他们生活待遇好些，以便依靠他们压迫工人剥削工人，于是职员就作了些对不起工人的事，象打骂工人、克扣工资等。这些工人过去只能恨在肚里，没法申诉，今天工人有说话的权利，就想报复，于是就存在着不团结的现象。另一个原因，职员虽是劳动者，却是脑力劳动者，穿长袍，工人把你们叫先生。中国知识分子很少，有文化程度的人只占百分之十，大中学生在人民中占的比重极小，人民宝贵知识分子，因此养成知识分子自大的弱点。我也是知识分子，过去也有过这思想，因为知识分子有文化，地位高，便轻视体力劳动者，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世界上知识只有两门，一门是生产斗争中的知识，一门是阶级斗争中的知识，也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除此以外，再没有什么知识。不少知识分子其实只有书本知识，因为他既不从事实生产，也不参加阶级斗争，而工人农民就不同了。工人农民是从事生产的，又要从事阶级斗争。他们反对土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68]，反对国民

党，所以他们有很多实际知识，看不起劳动人民是不对的。当然工人农民也有缺点，他们没有文化知识，没有文化修养。很早以前社会上不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者，今天世界上划分体力与脑力劳动两大部分，体力劳动者的知识从经验中得来，脑力劳动者把这些知识加以系统化，反过来指导体力劳动，因此体力劳动是基础，脑力劳动是依靠体力劳动而存在的。将来社会改变了，人们都可以读大学，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别便会消灭，但今天却还是存在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宝贵的，而在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看不起劳动人民的观点，今天工人翻身了，便免不了要报复一下。由于这两个原因，一个是历史上资本家利用职员压迫工人，一个是职员过去存在着看不起工人的现象，因此便发生矛盾，有了矛盾如果不很好解决就会发生斗争。因此今天我就特别谈到这个问题。职员和工人必须互相团结，否则就不能很好地办工厂，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办事。毛主席、朱总司令所办的事都是为人民服务，只是职责有大小，影响有大小，但是大家在人格上政治上都是平等的。我们军队里，长官和士兵，高级官与下级官，很难分别，这是很好的。听说美国工厂里，厂长、工程师和工人很难分别，这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在苏联我看到就更难分别。所以我们工厂里也应该如此。我劝大家放下架子，进工厂时穿工人服装，让工人看和他们一样，就能去掉隔阂。我想这个问题是能够解决的，解决并不是很困难的，办法有两个：

(1)改正观点。过去如果有轻视体力劳动的观点，应

该改正，要正确地看到自己，看到他们，过去看不起体力劳动者，自以为了不起，今天把这种观点改正，就可以改善关系。

(2)自我批评。就是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我想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工头因为技术比工人较高，或有一些门路，当上了工头，直接和工人冲突，引起工人的反对。职员也有一小部分有这种事(大部分可说是没有的)，如果有这种情形，那就应向工人承认错误，以后改正过来。人是不能没有错误的，有了错误便应承认改正。孔夫子很奖励人改过，象子路闻过则喜，孔夫子称为“美德”，这倒是中国的好传统。你们即使过去有错误，如果用这两种方法，就会取得工人的谅解，解除对立现象，达到团结。我想这样一定有效。我们共产党里有很多次的经验，许多错误都用这办法解决。共产党从来不隐瞒自己的错误，过去犯过很多错误，象陈独秀^[82]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因此大革命遭受失败，给蒋介石钻了空子。以后又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认为除了工农没有人是革命的，连民族资产阶级、第三党^[92]都要打倒，对小资产阶级也不喜欢，因此在政策上便有了许多错误，招致了革命的失败。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策是正确的，但也有犯右倾错误的。土改中，有几个月犯了“左”的错误，乱打乱杀了许多人，当然其中有许多人是有罪的，但有不少是错杀的。所以我们共产党，大错误犯了一些，小错误也常犯，但一发现就检讨、批评、改正。我们的自我批评、改正错误是为了搞好关系。我们军队里也有一个时期发生过骂

人、贪污等现象，有些长官被士兵指出之后，就在火线上找机会报复，这叫军阀主义，搞得关系很恶劣，我们的办法是批评，是搞民主运动。本来军队是没有民主可言的，但我们几百万军队里都这样搞了，而且搞得很好，在军队里叫官兵关系，在国家工厂就叫职工关系。在职工关系上也有类似的情形，职员欺侮过工人，就象军队里欺侮士兵一样。在我们军队里，军长、师长当众承认错误，起初有些军事干部是不同意的，怕失面子，失威信，甚至有人不相信军队可以搞民主，他们以为对士兵只有打骂强制，没有什么别的可讲，认为如果不打不骂，军队是带不走，不能打仗的，他们不赞成取消打骂。后来我们在这些干部中讲清楚，有了错误任何人都会知道的，用不着顾面子，同时保证不因此而受上级处罚，他们勉强接受了，但还是不相信民主的办法能实行。于是我们从最高级长官开始，向下级自我批评，承认错误，下面一看你这个高级司令官承认错误都不要紧，大概我们承认错误也不会要紧，这样就造成了自我批评的风气。士兵本来就呕了一肚子气，一看长官承认了错误，气就丢了一半。有些自我批评不彻底的，下级提出意见，勇敢地批评，并且分别是非、轻重，然后长官或接受或解释，有的考虑了几天，承认了错误，大体上凡是经过承认错误的干部，思想作风进步了，官兵关系改善了，兵好带了，守纪律，互相监督，打仗勇敢，战斗力提高了，逃跑开小差的也就没有了，于是有了爱兵拥干运动。军队里能如此，工厂里我想也能如此。要改善职工关系，可以先由职员开始进行自我批评，承

认错误，并且声明以后要改正，如果不改，大家可以监督，当然不能过多的滥承认，有什么承认什么，没有就没有。那么承认错误之后，上级和工人是不是还要追究呢？我今天可以负责向大家保证，一般的既往不咎，只有少数犯了明显的、严重错误的，为了团结工人，解除他的积恨，需要追究一下，但就是追究也是宽大处理。我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为了治病而不是为了治死人。实行自我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团结职工，取消对立现象，以便以后更好地工作。除这以外，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办法呢？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不用自我批评而把工人压下去，问题能不能解决呢？工人是压不下去的。有的工人，也许要既往必咎，他们要打，要开除，如果我们照他们这样办，问题是不是能解决呢？不能的。我可以代表共产党说，共产党是不赞同这一部分工人的意见的。有的工人这样说：没有职员我们还不是照样生产。我们不赞同这意见，我们必须依靠你们，没有你们工厂是不能搞好的。当然今天职员中坏分子是存在的，但大多数是好的，所以如果要在工厂里搞一个反对职员运动，我们不赞成。那么用什么办法搞好职工关系呢？我想就是用自我批评的办法，你们精神上要有准备，因为工人可能有很多意见，如果有准备就是提一百条也不要紧，只要承认错误就可以解决问题。你们如果还有更好的办法，我愿意赞同你们的意见，如果没有，那我们就请你们照我们的办法去做。过去我们在党内、在军队里都实行过，证明是有效的。我们队伍里，进行自我批评时，有的连长光说或者

多说好处，下级便不满意。而相反的，有的连长、排长自己光说错误，不说好处，结果士兵就说，我们的排长、连长，还有一些什么什么好处，很公正地指出来，提高了他的威信。所以我提议大家最好是自己不说好处光说错误，而且说得彻底一点，这样工人便会把你的一切好处都说出来的。如果工人不讲，军事代表与工会干部还可以发动一下，引起工人讲，但不能勉强。军队里长官自我批评之后，士兵也说出自己错误，承认自己不对。在工厂里也一样，你们自我批评之后，工人也会有自我批评的。两方面都自我批评，就能够团结起来了。

工厂里进行这件事，要有军事代表、工作人员有领导地进行，不要没有领导，上级将要派人来帮助进行这工作。大家回去后可先充分酝酿一下，使职员、工头放心。在工人中要宣传，宣传必须和职员合作，职员是自己的阶级弟兄，只要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便既往不咎，要象孔夫子那样讲恕道，准备成熟以后，就可以进行，进行几个星期就行了，无限期进行下去，没底也不好。

自我批评要恰如其分，过多和过少承认错误都不对，夸大或减少，便是没有原则。工人中也要注意不能报复，我们不能准许搞派别斗争，要以民主精神、光明正大的精神来批评别人和自己，对军事代表，对我们的负责人都可以批评。军队里有士兵提议升或降哪个干部，交给上级考虑，当然士兵提出不能个个适当，但大多数是适当的，领导上应当善于采纳意见。今天在工厂里还不能这样作，但将来是要

实行的。今天可能还有些职员想不通，不愿意自我批评，那么应当等待一下。在军队里，不但可以推荐干部，而且可以推荐党员，党员在军队里是公开的，我想工厂里党员也应该是公开的。给群众看清楚，谁好谁坏，不要怕被群众看见，如果真的不好，那就由群众来检查。我以为党员公开越早越好，不要过迟。

再次，工厂组织听说还要改变，因为我们的工厂是国民党建立起来的，下层组织过于庞大，有名无实。没能力的人，因为亲友关系进来，随便开支，工人作私人的事情，好的人员待遇很低，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叫官僚主义化，就是把官僚主义侵蚀到工厂里去，这很影响工人的生产情绪，应该使工厂组织精干，同时提高效率。过高过低的工资应该适当调整，冗员和特务、坏分子应该裁汰，不把工厂整顿一番，职工精神就不能振作，就不能在经济上进行战斗，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自然，这样一来，有些职员就会失业，我们政府应该想出办法来，给他们适当的安置，另外介绍工作或学习，如果一时没有工作，政府便应该解决他的生活问题，包括家属在内。另外找工作可能比较差一些，但就得忍耐一下。不过共产党有饭吃，你们也就有饭吃，国家不应该抛弃任何一个有用的人。工厂是必须要整顿的，不然工人生产情绪不高，便对国家人民不利。你们职员同志们，也不妨自动研究一下，哪些人薪水过高过低，职位过高过低，哪些需要调整、裁汰，都可以提出意见。大家要爱护工厂，爱惜公共财物，努力为

国家人民的工厂服务，象对自己的一样，要爱惜人民的事业、国家的事业，这种精神就是共产主义精神，一直下去到共产主义时期，也是好的。

在天津职工代表 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各位职工代表同志们：今天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天津的职工代表会致热烈的敬礼。感谢同志们在天津解放时，协助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党进行接收工作，并在解放后努力建设。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职工同志们致谢。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你们的党。我们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打算，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奋斗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至今二十八年中从没有动摇过的。但我们曾经是犯过程度上不同的错误的，有过陈独秀⁽⁸²⁾、李立三⁽²⁰⁾的右的和“左”的错误。但是当我们一旦发觉，就改正过来。虽然我们牺牲了许多同志，但无论犯错误与否，我们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的基本出发点是不动的。今天，我敢在这里向中国工人们及代表们保证这一点，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但大家知道，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全中国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中国共产党除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外，还代表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因为不只是工人，还有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但其中谁最受压迫呢？那就是中国工人阶级，他是在层层压迫之下。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来讲，中国的工人阶级也是受压迫最厉害的，所以他是最革命的阶级。在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上，工人阶级是第一位，农民是第二位，小资产阶级是第三位，民族资产阶级是第四位。

工人要求得自己的解放，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是要长期的奋斗和努力才能做到的。因为他必须解放全中国其他阶级，不然，工人阶级就不能解放自己。工人阶级被压在最下层，工人不允许革命半途而废，如果半途而废，则他自己还不能得到解放，所以工人阶级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因为以上原因，工人阶级从历史上是天生大公无私的阶级，如果工人自私，首先就违背了他本阶级的利益。

共产党是要依靠工人阶级的，在城市要依靠你们，在乡村也是依靠工人和半无产阶级（雇、贫农）。共产党只有依靠你们，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且唯一的只有依靠你们，没有工人阶级，共产党就没有了依靠，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如果工人阶级只依靠自己，而不找朋友，不找同盟军，能不能战胜敌人使革命胜利？那是不能够的。因为革命就要有队伍，象解放军打仗一样，队伍要组织起来，

要齐心，要听指挥，要有纪律，否则就是没有战斗力的队伍。打政治仗也是一样要有队伍，队伍要大，要齐心，有纪律，这样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及各方面才能把自己解放出来。

现在，我们要检查一下，我们工人阶级的队伍有多大呢？在全国人民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只有不到三百万的产业工人，一百个人当中还没有一个工人，这个数目是很小的。至于其他赚薪水、领工钱的，还有手工业工人、苦力、乡村的雇农、广大的职教员都算在内，也还只有一千多万人，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全体。这个数目在全中国人民中，也还是少数，所以工人阶级的队伍是不大的。哪个队伍最大呢？农民是中国最大的阶级，有三万万多人，一百个人中有八十个是农民，所以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不是工人。中国工人阶级要革命，要解放自己，工人阶级就要组织农民，和农民联合在一起，如果脱离了农民，那么工人的事业一定要失败，所以农民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个朋友，第一个同盟军。但是只有一个朋友吗？还有的，小资产阶级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二个朋友。而民族资产阶级是敌人还是朋友呢？他们也是我们的朋友，是第三个朋友。这四个阶级联合起来进行革命，这队伍就大了。这个队伍的指挥官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在这个队伍中当班长、当连长……当司令官，把这个队伍组织起来，领导起来，打仗就可以打胜了。

我们的敌人是谁呢？有三个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代表是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而国民党是集中

的代表者。帝国主义在世界上横行霸道，封建主义在农村横行，而官僚资产阶级也还有很大势力，全国的经济命脉都在他们手里。而这三个阶级联合在一起压迫工人，也压迫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样形成三个敌人和四个革命阶级。

中共在成立后的二十八年当中，做了些什么事呢？首先就是把革命阶级的队伍组织起来，组织了政治上的队伍又产生了军事上的队伍，这队伍不是一下子组织起来的，而是在几十年中不断的斗争，从斗争中组织起来的。你们看谁说帝国主义好？谁还反对打倒地主？谁说国民党好？全国人民都说毛主席好，这就是认清了自己的司令官。我们代表你们在农村里斗争，将农民团结、组织起来，然后和农民到城里和你们见面了。我们要互相讨论整个的工作应当如何做，天津的、农村的，又如何做。在二十几年中敌人不使我们联合，将我们割断，我们和工人阶级很少见面，有些生疏了，但是我们都互相关切着，我们知道工人阶级很关心乡下的共产党怎么样，我们也同样在山上关心你们在国民党的压迫之下怎么样。过去中国共产党是接受了工人阶级的命令上山打游击，今天完成了任务是奉命下山交令，回到自己的队伍里来了。所以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不怕死的，能打游击、能打仗的，最勇敢、最觉悟的一部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伍，就是中国共产党。

所以，我们必须分清敌友。分清什么人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什么人是工人阶级的朋友。我们认为共产党是你

们的最好、最忠实的朋友，忠实的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代表全国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全心全意服务到老到死，我们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请求，你们自己承认不承认，决定在你们，如果不代表你们，你们可以不承认的。其次，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你们的朋友，而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我们不能敌友混淆，马克思在一百年前就讲过“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无论是苏联的、美国的、日本的，工人阶级都要联合起来。不管日本的工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曾经打人、抢人、强奸，那都是因为他们不觉悟，一时糊涂，可是他一旦觉悟，他们就要和我们联合起来。在希特勒强权下的德国工人也打过苏联，在今天苏联也要联合他们，因为这是自己的阵营。在旧中国，工人也有许多帮派，上海的工人帮派和广东的工人帮派互相反对，不联合，这个工厂工人和那个工厂的工人也有不联合的，和职员也不联合，这样好不好呢？不好的。不但工人阶级内部要联合，还要联合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听说有的工厂工人把工资加得很高，这样工业品的价格还要贵，而农民到城里来买东西，买手巾、袜子、鞋等很贵，就会不高兴。农民说：“我们跟共产党打游击，打仗，出公粮，出伕子，负担最重，而你们工人又不当兵，又不出伕，又不纳公粮，为什么东西还要贵呢？”农民也会提出“合理负担”的问题。所以增加工资和农民也是有关系的。我们要照顾到我们朋友的意见，听一听他们的话，不然朋友的关系就要搞不好。联合农民，原则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除农

民外，还联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有点问题。工人认为知识分子不会做工，只是说话说的漂亮……。知识分子是有他们的缺点，但是我们仍然要和他们合作。而最容易搞乱的是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題。为什么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到我们朋友中间来呢？因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也压迫民族资产阶级，所以他们也要反对，那么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他们可做我们的朋友，不要把他們看做敌人。如果把他們看成敌人，要打倒资本家，是违背工人阶级的利益的，如果共产党同意你们这样做，共产党就要犯错误。以往我们犯过这样的错误。虽然没有提出打倒资产阶级的口号，但在实际上分过他們的工厂、商店，引起很恶劣的后果。如果他们和我们一致打倒了一切反动势力及阶级，他们也可以发展了，也可以帮助建设新中国的工作，他们可以开工厂，开矿山，制造出日用品，对于工人阶级是有利的，同时他们自己也赚钱了。这件事好不好呢？这是好的。如果不懂这个，有“先打倒他们再说”的思想，这将犯错误，这就是不懂政治，政治觉悟还不够，希望大家好好讨论这个问题。

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矛盾呢？有的。所以工人和资本家间是有斗争的，而且是不能避免的。这斗争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天生的，不能不斗的问题。所以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斗争的一面，有联合的一面。在政治上要联合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作斗争。在经济上要联合他们发展生产，但在联合当中不能缺少斗

争。因此只斗争不联合是错误的，只联合不斗争也是错误的。但以哪个为主呢？今天来讲，重点是联合不是斗争。因此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但不能破坏联合。如果斗争到把资产阶级消灭，这样工厂减少了，生产下降，工人失业，对工人，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今天中国不是资本家太多，太发展了，而是太少，太不发展。因为资本主义不发展，工人才痛苦。如果要打倒民族资产阶级就少了一个朋友，而多了一个敌人。所以要和他们联合，同时要有适当的、恰如其分的斗争。

但是你们有的人会说了：“好啦！你们共产党中央的人今天来了，叫我们不要斗争资本家，斗争多了你们不赞成，是不是让资本家剥削我们，不让我们讲话……。”同志们！中国共产党永远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的，不会受资本家的收买，工人阶级一定要解放，但问题在于怎样解放？是不是你们还要受剥削，如果客观上不允许，还是有剥削的。但是不是就不能说话？不是的。现在工人解放才是第一步。而他只能走第一步。不是不做，而是做不到。以后还要走第二步、第三步……直到最后的彻底解放。就好象女同志生育，本需九个月，但六七个月就要求生下来，这就叫早产，生下来也不会长大。今天的解放，还只是政治上解放，还不能不受剥削。你们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也有罢工的自由，但目前不需要罢工就能解决问题的。你们有了政治上的解放和自由就可以保护自己所得的利益。今天的解放是不是还可以进一步，不准许剥削，现在还办不到。

现在还必须允许资本家存在，因此就要使他们有利可图，实行“劳资两利”的政策，不是一利。国民党时是一利，只利资本家不利工人。而现在，只利工人不利资本家也是不对的。对的政策是两利，就是也允许资本家对我们剥削，剥削不能完全消除。剥削是不好的，但在现在来说，也有一点好处的。今天有很多失业工人想找到职业。我到东亚毛呢工厂，工人和我谈话。我问：“你们有什么问题”。工人们说：“我们没有工作，东亚不要我们，你说怎么办？”所以东亚工人的痛苦就是失业，就是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而我们不让资本家剥削是很容易的事。关于剥削也要分清有几种：奴隶的剥削制度已经废除，封建剥削制度我们也废除，但资本主义的剥削在今天还不能够废除，在英、美、法等国资本主义已经很发达的国家，在无产阶级的队伍领导下是可以废除的，但因为这些国家中的队伍还没有组织好，所以他们还没有把资本主义的剥削废除掉。而中国共产党有这力量，可以随时随地将资本家的剥削废除掉，但是却不能这样做，因为其它国家的资本主义都发达了几百年了，而我们才只几十年，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因此他在历史上还有一定的进步性。即是他比小农经济、小手工业经济都进步。中国经济有百分之九十是落后的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经济，只有百分之十是进步的工业。其中一部分是国营的，一部分是资本家的。因为有了这百分之十的工业才产生了无

产阶级。所以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有其进步性。将来国营的和私营的都要发展，将百分之十增加到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直到百分之六十，才能把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这本来要经过百多年的，而现在我们只要几十年就能做到，而且做得很好。也就是说把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资本家是有其作用的。而工人阶级的最后解放，只有把中国变为工业国，从而过渡到社会主义之后，才能办到（我们可以不经过流血的和平的渡入）。因此今天在私营工厂要严格注意到劳资两利的原则，斗争不要过分。听说现在有些私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从一倍、两倍到五倍，要求资本家过多的分红，退職的工人强迫资本家准许上工，临时工变为长工，或不遵守厂规，这样就使资本家无利可图，资本家不敢管理工人，有些恐慌，这样就妨碍了生产。今天我负责地肯定地向你们说：工人们一定要改正这些过左的、不合理的错误，如不这样，一定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就是工厂关门、倒闭、生产降低、工人失业，或者是工人孤立，农民和职员都说你们不对。到那个时期，你们很痛苦，到那时候要政府救济，政府是没有力量的，你把资本家捉起来，枪毙了，他更不能办工厂。有些人说：“资本家不开，我们开，组织起来办合作工厂。”开了合作工厂没有呢？开了很多，但是没有一个是搞好的。这是过去的事实，这种错误过去犯的很多。如果我不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不真实和不负责。到后来后悔也没办法。

我切切实实的负责的向你们说，希望你们考虑考虑这

个意见,自动的把过高的工资减下来,把过高的要求改正过来,考虑考虑资本家能否维持下去,能否长期维持下去。有些不遵守厂规,不好好生产的,自动改正过来,使资本家、工头能够管理工厂。为了生产的需要,使资本家有雇用工人和辞退工人的权力,但资本家无故找借口开除工人则应当反对,临时工变成长工的,可改长工,条件不够时,仍可是临时工。总之要使资本家有利可图,不要怕资本家得利,不要限制资本家赚钱太多。就是说资本家有利可图了,他们发财了,工厂开多了,临时工就可变长工。今天,吃稀饭固然没有吃干饭好,但吃稀饭总比没饭吃好。今天要吃得很好,穿得很好不可能,还是要苦的。共产党如果够的上朋友,就不怕你们反对,要将真实的话说出来,无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必须把真理告诉你们。听说军管会、政府准备颁布一个劳资两利的办法,发到工会请你们讨论,我想添一条“如果资本家工厂、商店不办了,不允许工人、店员接收工厂、商店自己办合作社,应交给人民政府接收”。工人办合作社是办不好的,所以不允许工人办合作社。

那么,工人和工会同资本家的斗争,是不是没有了呢?必要的适当的斗争,还是需要的。要实行劳资两利,那就要有斗争,不然资本家就要一利,希望私厂工人能讨论这个问题。

总工会对这事也要注意,私人工厂搞得不好,国营工厂也要受影响的。注意目前的利益要服从长远的利益,部分的利益要服从全体的利益,如果目前的利益破坏了全体长远的利益,是列宁说的经济主义。打倒了不应打倒的资

本家是犯政治上的错误，资本家不是斗争对象，是联合对象。资本家听了这些话，是不是要神气十足呢？所以我们自己不犯政治错误，则不允许资本家报复，所以还要有必要的适当的斗争。

但你们应当注意，现在你们有重复错误的危险。

其次关于国营工厂的问题：过去是官僚制度的管理，组织庞大，压迫工人，这些要加以改良，要有步骤地加以整顿。请国营工厂的工人、职员加以援助，但对错误的也不能一下子改好，改革步骤可分几步，改的太仓促怕会出毛病，所以改革的条件是必须改革好，不能改革坏。改革坏了就对不起国家和人民，因此要非常小心和谨慎。我想现在可以作两件事：（1）工厂组织要精简，过去有些人是多余的，没有技术，是亲戚朋友拉进来的，应当裁撤。（2）劣迹昭著的（如压迫过人的反动分子）应当去掉。不要把工厂看成救济机关，它应当是生产机关，而救济机关可以另设。但这件工作怎么作呢？必须工人、职员团结起来，意见一致，提出意见，由军事代表、政府领导，把旧的改好，组织起来，以便于生产。过去国营工厂里，职工之间不团结，过去在国民党的统治利用之下，一部分的职员对工人作了不好的事，打过工人，克扣工人工资，开除工人，甚至强奸，这种情形，我相信是有的。今天，工厂变成了人民的了，工人要提出说一说，我想是应当的，但是不是过去你打了我，今天我也同样要打你呢！工人同志们应当有思想，脑子应当会想问题，要分析一下这些事，过去职员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是不是应当

负完全的责任呢？仔细想一想，是要蒋介石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负责的，是他们要职员们这样做的。官僚资产阶级、战犯是不能饶恕的，他下面的人至少还有一半的责任，但应当原谅。今天打他也好，骂他也好，判罪也好，但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我已见过一部分职员，告诉他们“以前你们做过坏事的，要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要向工人道歉”，要他们反省他们自己的错误。如果已做过这些，工人们应当采取“既往不咎，以观后效”的态度原谅他们，看他以后是不是改正了，如果不改，那时工人还可采取办法，一定要他改正错误，但我们不要着急，今天反省不好，就再等他一个月两个月反省好。

但对那些劣迹昭著的分子应当追究一下，找出证据交法院处理。但这必须是少数，如果处罚的太多，要犯错误，影响会很大。那些不甚严重的，不要处分，可以宽一些，下次不准再犯。

职员是什么人呢？也是工薪劳动者，是出卖劳动力的，这一点职员和工人是相同的，也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是血统的体力劳动者，是基本队伍。此外还有许多职员是脑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是附属于体力劳动的。职员们过去是受的资产阶级的教育，有很多是资产阶级的观点，他们看不见群众的力量，例如他们说“不打不骂就管理不好”，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观点。但是我们把事实给他们看，不用打骂也会很好，那么他们的观点也可以改变。所以要团结他们，要他们反省，但他们面子上可能觉得难看，工

人们可以帮助他们，实行自我批评，他若不讲，我们工人可以说：“你讲得不够，我就讲”。承认了错误的就可以原谅，而且应当鼓掌欢迎，这样做可以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我们也好。所以对职员的问题应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治病就要把人治好，而不是治死。

工人阶级是要作大事的，胸怀要大。将来工厂、国家都要归你们管理。如果胸怀狭窄，就不能成大事。而工人作大事，领导整个国家的改造，作事情就要有本领。只要有本领，工人可作市长、部长、省长……。职员、工人中哪个人行，我们共产党会负责把他提拔起来。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本事还不大，做出事来不一定好，还可能做的坏一些，可是不要紧，没本事可以加紧学习，学马列主义，学政治，学文化，学技术，哪天学习好，哪天把工厂给你们办，作领导工作。所以，今天首先要组织起学习来，首先学政治，然后学文化。

其次，就是组织起来，有条不紊的组织起若干工会：

1. 产业工会(下面还可有纺织工会、铁路工会、邮政电讯工会、矿山工会……)；
2. 手工业工会(下面也可以按职业来分，如木工、理发工人……)；
3. 店员工会(从事商业的店员、旅馆茶役等)；
4. 苦力运输工会(码头工人，脚行……)；
5. 文化教育工作人员的联合会(教员、记者、戏剧、大学教授等人)；

6. 机关职员工会。

将来全国组织起这样几个工会，工会组织要大，少了没有力量，加入工会的人必须是出卖劳动的人。手工业主、农民，甚至贫农都不能参加工会。

工会须有经费，现在政府津贴，将来要自己拿会费，政府可津贴一部分。不纳会费的，不要他做会员。工会是给会员办事、解决问题的。

工人代表会很好，可以讨论任何问题，如对市政工作的意见，都可以讨论和提出。你们代表会是市政府的上级机关，不是下级机关。你们通过的决议可交市政府去作，目前法律上还没有这样订，但事实上是这样的。如果市政府认为不对时，可以再拿回来请求讨论。如果犯了错误，就是工人代表会的错误，错了要改。不改行不行呢？同样不行。毛主席是这样做的，我也是这样做的。你们通过的决议一定是要负责任、行得通的，例如决议要市政府给工人盖宿舍，而又没有钱，那就行不通。如决议制止用电的浪费，制止偷电，那就是行的通的。如决议没收一切房屋交你们分，那就是违反政策。如决议保障房产权那就是对的。

工人代表会要组织好，有事多开会，把这种工作熟悉了，将来把各行各业组织起来，再合拢到一起，就是人民代表会，是政府的上级机关。人民代表会成立以后，其他各工会仍然存在。

今天讲得很多，也许有些是你们不愿听的，但无论如何，我把意见提出来，请你们大家讨论。

关于工会工作问题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

华北职工代表会议开幕,我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贺。

目前整个形势很迅速地胜利前进,全国的军事时期将会很快结束。结束以后,中国就要进入建设时期,特别是经济建设。现在华北基本上已经没有战争了,战争是在华东华南进行,华北已成为后方。因此华北可以开始进行工业农业生产的建设工作。以前组织起来的军事时期的战时工业、战时经济,以及经济的军事化,现在要转变为平时工业、平时经济。华北应该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这种转变。希望工厂企业管理部门的同志们,要切实注意这个转变,对这个非常复杂的转变问题,上级领导机关和生产部门,应该很好地计划。如何转法,有什么困难,如何解决,都必须事前充分考虑到。听说有些生产炮弹和军需品的部门,已经不生产炮弹和军需品了。现在要决定生产什么?还办不办?如何办?因为没有很好的计划,只是关了门,所以发生很多问

* 这是刘少奇在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日至十一日在天津召开。

题，这是不好的、错误的，这种错误不要再重复。现在军工后勤部的生产部门，要计划准备在半年或一年二年后的转变。把战时工业、战时经济，转变为平时工业、平时经济。政府应有一个专门机关来研究计划这个问题，特别是军工后勤部门。以前有些停了的也应该想办法补救。

特别是老解放区的军工工厂，在山里边，虽然不多，华北约有一至二万人，这些工人在战时他们功劳很大，给战争胜利很大的帮助，其功劳不下于前线指战员。今天要转变为平时工业，我们应该很好安顿他们，不能不管。有些工人要学习，有些工人要转业，也有的愿意回家，真正愿意回家并且可以回家的，可以让他们回家。可以学习的应该让他们学习。要转业的，应该切实帮助他们转业，假如有困难，应该替他们想办法解决。军工后勤部等应该负责任。就整个问题说，中国工人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战争结束，由战时工业转到平时工业，有暂时的困难，但一般都是光明的。因为战争结束后工业要大大发展，大量需要工人，尤其是技术工人、熟练工人，及普通工人。眼前暂时的困难，不好解决，或者解决得不满意的，应该告诉工人，大家来想办法。半年一年后，应该如何办。工人想，政府也想，负责机关也想。如何利用机器生产人民所需要的东西。至于技术问题，难度大的工作可以慢慢作得熟悉的，至于容易的工作那就无所谓了。只要中国工业发展，工人就决不会如过去受苦。技术低的工人待遇当然不应该超过技术高的工人。老解放区工人也许政治上高些，技术上也许低些，和新

区工人不应该互相轻视，要团结起来。不然工人看不起工人，还有谁看得起工人呢？老区工人比新区工人技术上低的，应向他们学习，政治上高的，应该帮助他们。

提案上提到很多关于今后工业生产的计划问题，代表们提出来很好。因为今后任务正是要发展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在全国要有全国的计划，在华北要有华北的计划，你们讨论恐怕也讨论不出个究竟来。目前的情况是需要一个计划，可是订不出来，但是将来一定要订出一个整个的工业计划与经济计划。现在不能等整个计划，因为各国营国营企业生产部门，很散漫没头绪，所以有的代表提议各企业系统应该统一。如何统一呢？例如天津官僚资本的工厂接收了一百多个，如何统一呢？很困难。使他们能有系统有条理的加以统一，这是要大家来想办法的。要以不同的生产类别组织不同的企业公司，纺织业的可以组织纺织公司；煤炭业的可以组织煤炭生产公司；五金业的可以组织五金业的生产公司；粮食业的可以组织粮食业的公司等等。全华北成立十几个部门的大公司，就可以统一了。不能成立公司的零散的工厂，可以成立联合企业公司。这些公司中，也可以让私人工厂加入进去。私人的面粉厂加入粮食生产公司。私人的纺纱厂加入纺织公司。公司中有国家的也有私人的，可以减少相互间的竞争，因为竞争有坏处，有时竞争垮了，损失很大。竞争是资本主义工业进步的原动力，但是损失很大。我们要避免竞争，提倡竞赛。促进工业发展，就需要竞赛，在竞赛中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督促。

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军事工业转入平时工业的问题，企业部门的同志，要注意在半年、一年或二年后大多数要转变，现在就要计划，已经停了的，要想办法补救。第二个问题就是工业生产计划问题。

目前，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快要胜利。以前我们只有乡村，只有农业，没有城市和工业。现在基本情况改变了，我们不仅有乡村和农业，并且有了城市和工业。因此发生了工农业交换问题，也就是城市和农村的交换问题，也就是商业贸易问题。城市问题，工业问题，是现在党和人民政府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一定要搞好城市，搞好工业商业经济，否则胜利是不能巩固的。最近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应该以城市工作为重心。城市是工商业集中的地方，因此，城市是领导乡村的，不但在今天城市领导乡村，历来都是领导乡村的，过去如此，将来社会主义时还是如此。一直到将来把乡村变成城市一样，城乡隔阂消灭，全是电气化，机械化了。那个时候，城乡才差不多。目前城市集中的经济、工商业经济应该领导乡村分散的经济。工人应该领导农民。必须要搞好城市，不然就不能领导乡村。城市工作、工会工作、工业工作、商业工作、文化工作搞不好，就领导不好乡村，不但使城市人民痛苦，乡村人民也痛苦。因此必须注意城乡关系，原料是乡村来的，生产品又是卖给农民，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最近毛主席提出要照顾“四面八方”，就是说要搞好城乡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内外关系。这“四面八方”统

一观点，哪一面或者哪一方照顾不到，就要犯严重的错误。比如说如果把资本家搞垮了，如果工资提得过高，资方恐慌，不纠正就要发生错误。只照顾资本家，不照顾工人和公家，也是错误。所以现在问题复杂，就是因为要照顾“四面八方”。只利于工人或者只利于资本家，都是不对的。上次我在天津讲劳资两利，必须实行劳资两利，不然资本家关了门，问题就难办了。所以必须使他们的生产能够维持，要求不应该太高，应该让资本家的生产能提高，工人的生活也能适当的提高，否则资本家工厂关门，国家现在又不能接收过来，因为现在我们接收的官僚资本工厂还办不好，假如接收私人资本那就是实行社会主义了。这是要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的。中国今天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否则将违背人民利益，也违背了工人利益。接收私人资本的事在太行山五台山过去有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时期也曾做过。工人接收后办合作社，大体上说是办不好，办不好不如不接收。过去工人接收了自己办，垮台了，失了业，找工会和政府没有办法，因此今天私营企业中，只顾工人利益，使生产不能继续和发展，是对工人根本不利的。这不是发展生产而是降低生产。我们要把问题的真谛和前途告诉工人，不管现在工人喜欢不喜欢。最近天津有这种情形发生已经被纠正了。工资太高了应该降低，使资本家能够维持赚些钱，使工厂可以发展，对工人对国家社会都有利。不要怕说闲话，怕有人说投降了资本家，该说的话不说，结果是害了工人，工人失业后骂你，我们要早讲才对。“左”的东西常常是有一股劲

的，反“左”的劲头一定要比它原来的劲头更大才行。反右的时候，他一听右倾机会主义就会改。反“左”，他往往会反过来说你右。最近我到天津，资本家很高兴，工人有的可能不高兴，但是不要紧，我是诚心诚意为工人打算，工人将来会知道。最近天津东亚毛织厂的资本家宋斐卿写信给我，说要扩大生产，再开一个工厂，我回了他一信，好象我是替资本家打算的，但是假如另开了一个新工厂，使原有一千多工人增加到二千多工人，岂不解决很多工人失业问题？所以只好和资本家搞好一点，不要怕骂投降了资本家。真正替资本家着想，投降了资本家，那是失掉了立场。如果不失立场，鼓励了资本家，而是替工人打算，那就是好的。关系搞好了，弄的立场失了，那就是右倾。关系搞好，发展生产，又不是失掉立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有人说和资本家搞好关系，就是失掉立场，这是错误的说法。这种人大概立场不稳，一接头就投降了资本家。共产党员不是放在箱子里不见人的，而是经风霜的，这才能考验一个人的立场。

最近天津制定了一个劳资关系处理办法草案，经过有关机关商讨后，要在报纸上公布。再由工人、资本家等有关方面大家进行讨论，提意见修正，然后决定执行。凡是有关大多数人民的事都应该用这种办法。前些时政府已颁布的一个工资所得税法，事先并没有征求工会、工人各方面的意见，听说由一个什么局提出来就执行了这个办法，这叫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方法。不论政府机关或企业部门等，都不应该这样办事。工资所得税可以收，但是办法应由大家

商量，听说现在停收了，不知确否？我想应由政府修改，作为草案公布，征集各方意见后再修正，然后正式实行。用这个办法决定的问题才能比较行得通。

关于发展生产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发展生产，是全体人民的要求，是国家的要求，也是我们工人的要求。中国的生产要发展，特别是要发展工业。我们办工厂的人，如厂长、经理、资本家，统统都应有一个发展生产的观点，不能说只是厂长、经理的责任，我们工人，我们工会便不负责，这是不可想象的。工会和工人对发展生产要负责，要采取负责的态度，站在负责的地位。有些工会同志觉得发展生产不是我们的事，或只是帮助一下，这是不对的。对私人的工厂以为发展生产只是资本家的事情，而不是工人和工会的事，这样的态度也是不对的。所以不论国营或私营工厂的工会同志，都须注意，使生产发展，因为只有生产发展了，工人的生活才能提高和改善，不然生活是不能提高和改善的。工会要保护工人利益，但生产不发展生活是不能改善的，利益也无法保证。这是个整个社会的问题。

进行工业生产必须有原料。原料必须有保障，必须继续不断的保障，要经常有半年或一年的原料，这样生产才不致间断。所以发展生产，要注意原料，原料要便宜要好。工业生产有三个过程：一个是原料，一个是制造，一个是推销。制造的过程主要的要求是质量好，数量多，人用的少，生产的東西多，又节省原材料等。但制造的东西必须要能推销，要能卖掉，所以还须有很好的生意，不致生产了东西销不掉。

总之，讲工业生产，不论国营或私营，都要有这三个过程，三者缺一不可。缺一工厂就会关门停工。此外生产还要机器、生产工具及其他材料；要人力，要工程师，要工人、厂长、经理或资本家。对这个三个过程都要有计划。工会要注意生产，也就是要注意这三个问题。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只注意制造，不问原料，不问销售，这是不对的。凡是国营公营工厂，我们的经理、厂长要把全部的生产过程，告诉工人告诉工会，要使工人、工会全部了解生产情况。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不是故意夸大，也不是故意隐瞒。使他们了解困难在什么地方，有利条件是什么，能赚多少钱，缺什么。大家都了解了以后，工人、工会才能帮助厂长，才能大家出主意，大家负责互相帮忙。厂长与工人共同努力，共同争取工厂发展的前途。要把工人看作是自己人，看作和战斗员一样。不能看你是供给制是厂长，他是工资制是工人，这是没有原则区别的。将来都改薪金制，都是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样，性质一样，只是职务不同，所以工人有权利向厂长问原料销售等情形。是否可以多生产一点或少生产一点，价钱多少，赚多少，赔多少，厂长、经理也有责任把全部情况告诉工人。不要保守秘密，工厂没有什么秘密可以保守。尤其是现在，就连军火工业也是一样。就说我们制造多少炮弹，敌人知道了也没有办法，不告诉工人是不对的。有人说我们的工厂，比如纱厂，很赚钱，如告诉工人，工人就要闹提高工资，因而不敢告诉工人，这个理由是不对的。应该相信工人，工厂赚了钱，或赚的很多，都要告诉工人。大家

是一家人，赚了钱是大家的光荣。工人光荣，厂长也光荣。告诉他们比较好，不告诉他们是不对的。你不说工厂赚多少钱，工人也是知道的，他们知道出了多少纱，价钱是多少，你如保守秘密，他反而怀疑你。同时今天纱厂赚钱多，也不完全都是工人努力的原因，还有战争的原因，因为现在乡村需要纱。这是个特别时期，这一点也应该告诉工人。工厂赚钱，这是正当的，同时我们还有许多工厂是不赚钱的，这个赚了钱，那个赔了钱，还得要贴。这样才能整个的维持发展下去。在目前来说，我们整个的国家工业，平均利润是低的，赶不上私人办的工厂，还不如私人办得好。这有甚么可骄傲呢？因此，大家要共同努力，把工厂办好。恐怕在今后一定时期内，我们还赶不上私营工厂办得好。大家努力，我们应该做到至少不比资本家办得坏才行。所以有些工厂，虽是赚钱的，也应告诉工人。厂长、经理如不把全部情况即包括制造以外的情况都告诉工人，是错误的。而如果工人不过问这些情况，也是错误的。至于私营工厂，资本家恐怕还不愿意这样做，不愿把全部情况告诉工人，这也不好。当然今天也很难强迫资本家这样做，但今天如果有的资本家这样做了，便是好的，我们赞成这样，我们主张这样。现在工人、工会怕资本家赚多了钱，怕什么呢？相反，应该让他赚钱，他赚了钱，或赚的多些，他才开工厂。不能怕人家赚钱，人家一赚钱，你就想搞掉了他，那谁还想办工厂？这样资本家就再不告诉你了。工会同志要沉住气，他告诉我们是好的，钱赚的多，生产扩大，开新工厂，越多越好。你替他

打这个主意，他才高兴。前几天资本家宋斐卿说他对工人是剥削，我说“你现在剥削一千多人，若剥削二千人更好了，我们愿请你多剥削些工人”！象这样他为什么不高兴呢？如果要使他少赚钱，他是不愿干的。

今后的工厂，尤其是老区的工厂，厂长、经理拟出计划后必须在工厂管理委员会上讨论，共同制订计划。

工厂应有工厂管理委员会，但有一些工厂刚刚接收，马上组织工厂管理委员会有困难，可以慢一点。然而我这儿只是讲的新工厂，老的工厂必须很快组织起工厂管理委员会，大家制定生产计划，并请上级批准。生产计划还要经职工代表会议通过，而且要召集全体工人大会。太大的工厂可分别召开车间的工人会议，向工人作报告，征求工人的意见，必须这样作。只有这样订出的计划，向工人报告，他们都同意了，方能大家负责一致实行。因为生产计划不光是厂长、经理、工程师几个人的事情，而是大家的事。所以全体工人，尤其是职工代表会议，应表示态度，大家同意后再实行好，不能轻视工人，不征求工人的意见。工厂管理委员会拟出的计划经代表会议讨论后，就应吸收那些好的意见，进行修改。我认为各个工厂都要这样，经过这样手续，经过这一过程订的计划，工人讨论提了意见而后修改，大家同意了，就可团结一致为实现这一计划而斗争。工人讨论不是白讨论的，他讨论就要提意见，并计划今后怎样实行，这就是民主化了。

此外，工厂的厂长、经理，对工人的待遇如有什么改变，

比如工资改变要发小米，或要什么；又如要裁减工人，或取消什么免票等等，有些工厂只是厂长自己便改了，也不和工会商量，也不问问大家，这样做是不对的。工会接到通知后，还要问为什么这样改。以后厂长、经理如要改变工人的待遇，必须同工会商量，不准不商量。工会接到通知后，他要问为什么这样改，并告诉工人，同工人讨论，使工人了解，大家同意后再做。这样做大家不反对，就可行得通；愈不讨论愈容易惹起工人的不满与反对。今后工厂要主动的这样做，主动的同工人商量，不要等工人有了要求再办。如工人不同意，争执不能解决，工会和工厂，双方都可向上请示，一直可请示到中央。有些人就是既不和工人商量，也不和工会讨论，又不向上请示，结果工人闹起来了。我们听到许多这样消息，是从工会听的，从厂长那里是听不到的。这就是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既不问工人和工会，又不问上级，只是独断横行，这一定做不好。今后要既问工人又和工会商量，大家帮助，都有责任。莫非谁还故意捣蛋不成？你如不问，我生气了；你若问了，我反而不生气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工人、工会也必须照顾厂长或经理的困难，他们是什么人？名字叫厂长，叫经理，实际还不和你们一样？有些也许还不如你们！他们刚从农村中来，文化水平也许不如你们高，办起事来很多困难，因此要照顾他们的困难，他们不听你们的意见是错误的。但有些问题解决不好是有原因的，有些问题他们解决也有困难，因为这些同志基本上是好的，一般的是艰苦努力的，有的常常晚上睡不着觉，这些不过是能力

小罢了。如不帮他的忙,还抽一下腿,不是更难办了吗?比如你说某某厂长当得不好,你有能力可以主动地出来帮助,可以毛遂自荐,也可以互相推荐。你说你可以当,我一定叫你当,你如果当得好,呱呱叫,就叫你当下去。你如果也当不好,他也当不好,那是没有办法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许多问题,不积极想办法,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要想问题,提出问题,并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提出解决问题的人来,这样问题就可解决了。解决问题没有人不行,因此我们规定,今后厂长、经理订计划,必须和工会和工人商量;但工会和工人也必须照顾到厂长、经理的困难。这就是大家负责的态度。

工厂管理委员会,除少数刚接收的工厂,因工人还没组织好,觉悟不高,一下子组织起来有困难的,可以慢一点,其余都必须早些组织起来。怎样组织呢?照劳大决议的原则,由经理或厂长、工程师,及生产中其他负责人和工会在工人职员大会上所选出的代表(相当于其他委员的数量),组成工厂或企业管理委员会。军工部门是否应该组织呢?同样应该,有什么理由不组织工厂管理委员会呢?没有什么理由。后勤部门的工厂也应该组织,也没有什么理由不组织。此外是建立职工代表会议。职工代表会议,也就是工会的组织,哪个厂的职工代表会,就是那个厂的工会的代表会。平、津有些工厂很好,有了积极分子,工人情绪也很好,就可以开始着手组织,不要等。组织有什么害处呢?没有!铁路也可以组织管理委员会。工厂管理委员会是否与

厂长负责制有矛盾呢？不矛盾。我们的工厂是厂长负责制，但怎样负责呢？就是组织工厂管理委员会，大家帮助厂长来负责。多几个人负责还不好吗？搞坏了的事，也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搞好了，有了功劳，是大家的功劳，大家都好，不要自己霸功劳，你应说：“有了功劳是大家的，不是我自己的。”这样大家都高兴。毛主席也说，中国革命胜利，是大家的功劳，不是我一个毛泽东的功劳。也的确是大家的功劳，如没有大家，一个人能搞得好吗？你说厂长负主要责任，但别人也负了次要的责任吧！厂长有最后的决定权，但重要的问题，必须经过工厂管理委员会讨论通过，通不过时，厂长有最后决定权。但我想大多数是可以通过的，只要你搞得好的话。因此厂长负责制，与工厂管理委员会是没有矛盾的。有人说，要厂长负责制，就不要工厂管理委员会了，那是不对的。

总之，所有工厂，所有铁路，都需要组织管理委员会，都需把所有情况告诉工人。如哪个厂，不需要组织管理委员会，或厂长可以不告诉工人情况，必须经过中央的批准，中央允许这样做，你才可以这样做，否则，必须一律这样做。一般的都要做，不必再要批准，因为这是已经一般的批准了的，而不这样做的，才必须要经中央批准。

工厂经营的企业化，不是一个工厂的企业化，而是整个的企业化，要组织几十个大企业公司，实行整个的企业化。

工厂管理的民主化，听说有人对民主化还有怀疑，那是不对的。军火工业是否要民主化呢？我以为更应民主化，

因为过去是太不民主了，管制得太厉害了。怎样实行民主化呢？有些地方，许多事情引起工人不满甚至有不少对不起工人的地方，尤其在老区，和那些不马上转变的工厂，应该进行一个管理民主化运动。不搞这个运动，恐怕民主化不了，故须运动一番，平、津暂可一般的不提，我指的是老区。怎样搞法呢？大体上如同军队中实行民主化一样。就是进行一个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工厂中有官僚主义的倾向，如要批评这些官僚主义倾向，应召集这些厂长、经理开会，由当地党委来召集，先使其自我检讨，检讨哪些事情对不起工人，然后召开工人代表会，当工人的面，实行自我批评，而后叫工人提意见，哪一点检讨的对，哪一点不够，不要怕人家提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嘉勉。批评以后，你再检讨一番，对不起工人的地方，再请工人原谅；误会了的地方，也可以解释一下。最后工人也会讲讲你的长处，你的好处。不过，好处长处由别人来讲好，缺点是自己讲好。这样批评以后，工人也应该实行一下自我批评，工人不是有缺点错误吗？如哪一天偷了懒，哪一点没有听厂长的话。军队搞民主运动也是这样搞的。起初，连长们不肯向士兵承认错误，以为这样一搞，就没法带兵了，所以他们只可以向上级承认错误，而不能向下边承认错误。后来我们那些首长，召开了一个连长的会议，说明我们也有缺点，并首先检讨了，再请大家批评，这样连长们才感到了这样做的好处。所以要搞民主运动，首先要高级干部起模范作用，他们首先要自我批评，还请大家听取批评意见。毛主席说，每人都要准备别人

批评一百条。不要怕别人提多了，人家一提了十几条，你就受不了了，这是不好的。如果你准备别人批评一百条，结果人家只提了五十条，这不是很好吗？反之，你只准备了五十条，别人批评五十条，你也会感到受不了的。所以自我批评要主动些。工会的干部也要实行自我批评，开展这样一个运动，让工人批评我们的缺点错误，并从高级干部做起，哪怕批评得不对，也不怕。误会了的，可以解释一下。采取这个态度，是不是会垮台呢？不会的，不要怕面子不好看，你如不让人家提，你的面子不是更不好看吗？因为人家原来就知道你的缺点错误，他们批评了你，他还知道你的好处和长处，我们的工人和士兵是很公道的。军队中实行了这种民主运动，更好带队伍了，更好指挥了，也没有开小差的了。工厂也会如此。这就是发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厂长与工人相互批评之后，下来就是职员与工人，搞一个职工团结。现在的职工是不够团结的。军队中搞民主运动，官兵关系团结了，改善了；工厂里搞民主，也就使职工关系改善了。

这样搞是不是危险呢？如果搞得不好，是无政府状态，没有领导，这是不行的，就会搞乱。所以党必须事先好好准备，工人也不要性急，让厂长们好好准备一下，这就是有领导的有准备的民主。否则就会搞坏了，反而会使生产降低。工人可以推荐职员，哪个工人可以干，哪个人可以当厂长等，你们都可提，但要真实可靠。军队里也实行过推荐干部，群众推荐，上级委派，不是你提出来就可以。哪些人不好，也可以提议把他撤换一下。工人应该有这权力，哪些人

能力弱、不能当厂长等，可以提议改换他。但你还应该提出谁可以干，如提不出来，没有更好的，当然还只好由他干了。

这样一个民主运动，我以为在老区是有条件实行的，那里工人中的党员已不少，有的占了百分之十，有的百分之二十，还有的百分之三十。

我们的工会要使厂长感觉到有这个工会就好办事情。现在有些厂长，总是感到有了工会就更不好办事了；不但不能帮助办事，反而更麻烦了。如果有这种感觉的地方，就值得工会同志也反省一下。我们的工会应对厂长有很大的帮助，使得有了工会就好办事，没有工会就不好办事，你们应用事实说服厂长，如果你们过去帮助不大，就是你们工作中有缺点，就应反省一下。

我们不应怕麻烦，但这只是个小麻烦，它可以去掉大麻烦。如政府颁布的工人所得税，你讨论一下，是小麻烦，但如果不讨论，工人反对那不是大麻烦了吗？所以无论厂长、工会都不应怕麻烦。毛主席在七大时说：“不要怕麻烦。要革命就要麻烦，‘革命亦名麻烦’，而且非常麻烦。”你怕麻烦，你就不要当厂长，不要办工会。怕麻烦就不要提高生产。董必武^[93]同志说，革命有时就是在找麻烦！我们现在要发展和提高生产，就是找麻烦。怕麻烦的情绪是不对的。但要办一件事情，是不要给人家增加麻烦，而是为了减少麻烦，这样人家就愿和你合作。如工会搞起来，增加不了厂长的麻烦，反而替他减少了麻烦，这就是工会工作做到了家。

现在工厂与工会关系搞不好，要双方检查，一般说行政方面要负主要责任，但工会也应负个次要责任。总是有责任。总之，把关系搞好。今天我讲了许多，好象是替你们找麻烦，但是这是为了替你们减少麻烦的。你问我是麻烦，但你问了我，我就会替你减少麻烦。

看到你们很多的提案，提案中还讲到工资问题、待遇问题，也就是工人的要求问题，这些问题很多，而且很复杂。有人提议：现在要规定一个统一的工资标准。但全华北规定这样一个标准，还很困难。劳大决议中已规定：连本人在内养活两口人的生活，这是个大概的标准。现在各地方订一个统一的标准很困难，相同的部门能订一个统一的标准那就很好了，也许一个部门也不能订。因此现在的工资是很乱的，有的高有的低，但这也不是我们故意搞的，国民党时期就是如此，这个乱的情形，恐怕还需要忍耐一下。

现在工人的生活一般很苦，但是一般又不能增加，再增加，财政无法开支；太低的，在可能条件下可稍调整一下，但一般增加是困难的。好在我们华北，军事时期已过去，将来生产发展了，我们的生活也会提高一些。关于合作社及保障工人的实际工资，现在各部门都在这里，应和各部门商量一下，哪些可以调整，就可适当解决一下，在公私兼顾的原则下，尽可能解决，如不能解决的，就暂时忍耐一下。这一问题，我只能是这样的答复。工人有些意见还是很好的；如工厂筹设医院、宿舍、澡塘、俱乐部等等，但这一些不是一下子可以办起来的，而是多少年后才能办起来。然而我们是

一定要办的。山里的工厂有些可以搬出来了，搬到铁路附近；有些还不能搬出来，还要建设。这些问题就更难解决了。但今天可以计划起，并可以初步的建设些对工人有利的事情，首先是工人的医院，其次是工人宿舍、澡塘等。关于工人子弟学校问题，是归政府办，还是归工厂办，还要考虑一下。但有条件的，有钱、也有工人子弟，也可以办好，你就可以办。工厂办得好，就由工厂办；政府办得好，就由政府办。没条件的就等一下，不要机械的规定。如归工会办不好，而归政府就可以办好，那为什么不请政府办呢。总之谁有条件，哪一方面办得好，就归谁办，以后归谁再说。今天还不能改善工人生活，但将来一定要改善，能改善你不改善，那你就不是共产党了。共产党要改善整个人民的生活，而首先是改善工人的生活。今天是保证工人的生活，维持其生活水平。现在农民的负担仍然是很重的。将来整个工业水平提高了，工人的生活水平才能提高。如同苏联，现在还一直在改善工人的生活，能提高就尽量提高。

关于实物供给问题，可以和政府商量一下，首先保证工人的粮食、煤炭、布匹、油盐等几种必需品，这几种东西，现在政府手中还是有的。另一方面，工人也要这几样东西。价钱便宜些，不赚工人的钱，使你们能拿到应得到的东西。可以研究实行配给制，每年配给多少粮、煤等等，价钱便宜一些，可以比市价便宜一倍，甚至两倍，看情况规定。为了办这件事情，政府可专门组织一个工人供给部，现在我们组织这样一种供给部的能力还是有的。或由企业部门，后

勤部门组织，再和政府商量。

工人的所得税问题，政府应定个办法。过去定的办法再审查一下，你们提出意见，请政府修改，然后颁布。

战勤费问题。许多工人提出了意见，但这个问题也是农民的要求。我想这一问题有两方面的理由：一方面，在战争中农民的确出了很大力量，当兵的是农民，出粮、出勤、优抗等差不多都是农民。工人虽在努力的生产，工资低一些，但工人当兵的是很少的。这样农民就不满意了，而要求工人也出战勤，这个要求是有道理的。工人是领导阶级，你不出力量自然是不对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农民的这种反映，也应解释：这个革命，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是得到利益的，现在公粮虽占他们的总收入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但也还是有利的。过去你交租子要缴百分之五十，这样比起来，要比过去好一点，现在不交租子了。所以这个革命中，农民得到了好处，同时军事时期一过去，兵不当了，粮也可以少出一点了，那么，农民即可得到更多的好处。工人得到了什么呢？今天基本讲，工人没有得到什么。政治上讲工人是解放了，但经济上讲，工资还不能提高，工时也不能缩短，部分地还需要由八小时延长到九小时到十小时，所以目前的工人政治地位虽然最高，但经济利益还没有得到很多好处。而农民是得到了好处的，并将得到更多好处，这一点应给农民讲清楚。至于工人比农民生活水平高，这是他过去就高。农民有一块地，生活是有保障的，工人今天生了病，没有工作，明天就不能吃饭了，所以工人还要“保险”。

金”。农民有一块地，既可保生又可保病、保死。总之，一般说，农民生活是有保障的，工人生活是没有保障的，这些情况也应告诉农民。所以农民也就不能和工人一样看齐，要求一样是不对的，是不合理的。战勤问题是否应该这样解决，我提出个意见，请大家考虑一下。凡家在乡村并已分了土地的工人，出战勤费应和农民差不多；没有分土地，如外省工人，不当做一个乡村人口分地的工人，就可不出战勤费。看这个办法行通行不通？我以为这样办是有道理的。

关于保障工人生活问题，由政府供给部供给工人主要实物。最近大连来了一人，说大连就实行这个办法，配给实物，价钱便宜几倍，有的便宜到五倍，这样工资就可以不增加了。据说石家庄市，曾实行过配粮的办法，而工人不愿要，说我们的小米不能熬黏汤。我以为这是因为你的小米只是便宜百分之十至二十，如果你能便宜一倍到几倍，你看他要不要？工人不愿要我们的布，说我们没有条条布，如果你的布也便宜几倍，看他还要不要条条布？我想工人目前主要的要求是吃得饱穿得暖，大家也须将就一下。实物供给问题是个大问题，你们把它与合作社问题分开专门讨论一下。以后的合作社就只办些配给不到的东西，如办些鞋子、毛巾、小菜、肉类等等。以上意见，只是我的意见，是否可以办，能不能办，还得要和政府商量商量，这是个大问题，不是一下可以办好的。

关于工会组织问题。现在工人要组织工会，工人是领导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它要办的事情很多，要办合作社，

要选拔厂长，要参加政府，……总之，有许多事要工人办，但怎样办呢？就要把工人组织好。列宁说，无产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如不组织起来，就没有力量。现在是全国范围的事情了。组织工人就要想到这一点。华北就要把全华北的工人组织起来。工人的种类很多，有工厂工人、手工业工人、店员工人、码头运输工人……，所以组织工会要有条例，要有计划，全中国近代化工厂的工人，大约两三百万，与全国人口比，数目是很小的。但如再把其他工人算起来，全国就有一千多万到二千万人，问题是与全国人口比仍然不算多，但就全部数字看却也还是很大的。要全部组织起来，还是个大问题，所以如何组织呢？我想是否可这样组织：也按各种产业、各种公司，凡有全国性公司的，就组织全国性的工会。如全国的铁路总工会，纺织总工会等。没有全国性公司之前，就组织全国工人联合会。以上指的是产业工人的组织。此外还有上千万的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等等，不能把他们放在大门以外。工人阶级的基本队伍仅是近两三百万的产业工人，但其他工人是产业工人的外围，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所以也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加入工会。其次便是手工业工人工会，它应有全国的和地方的组织，下面又可将各种行业的手工业工人如木工、理发工人、瓦工……分别的组织起来，大市镇可以这样分别，小市镇当然就不必分开了。第三是组织店员工会，或叫商业雇员工会，下面也可分许多业，如绸缎业等等。第四可组织码头运输工会，如码头工人、三轮车夫、脚行、苦力……。第五还可以组织

一个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工会，如学校的教职员，报社人员，戏院人员等，做文化教育事业的，全国也有上几百万的人。第六组织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会，包括各级政府的、党务的以及工会的干部等等。我们将来都应该是工会会员。全国算起来恐怕也有好几百万。大概有以上几种工会就可以把全国一二千万工人全可包括进去。这几种各有自己全国性的总工会。每人家里如有三至四人，这样就可以团结六千万到八千万人了。天津共有二百万人，工人及其家属就占了一百五十万。如首先把工人组织起来了，那等于就组织了人民的大多数。所以工会工作是很重要的。工会干部也就不是什么三等四等干部，而是头等干部，把最强的干部去搞工会去。因为你不把工会组织好，天津就将有一百五十万人叫起来了。组织起来就好说服他，不组织没法去说服他，也不好去进行宣传教育。比如今天你们如无组织，不来这里开会，我是无法说服你们的。所以我以为组织工会是很重要的。要有条例、有计划、有步骤，首先组织产业工人，其次组织码头运输工人，再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等等。文化教育和机关工作人员，比较容易组织，也可以慢一些组织。如果无计划无准备，组织了这部分人，忘了那部分人，那是不好的。有人问：工会应分几个部门？我以为有组织部，宣传部（或叫文化教育部），有管工人福利的部门，也可叫劳保福利部，有管生产的部门（如开展生产竞赛），另外还需要有管财政的财务部。工会一定要有独立的经费，否则办事是很困难的。加入工会必须缴会费，一年一次、两次、

几次,或每月一次,但一定要缴。工会会员,如不交会费,就不算会员了。这一点不能让步。有人说应该减少些,交工资的百分之一,我看是适当的,如不交,就应退出工会,必须有这一条。如果说百分之一还是多了,少一点还可以,也不要所有工人都一样,有的高些,有的低些,但尽可能一样,我想一般的百分之一是不太多的。只要你给工人办了事情,他是乐意交纳的。会费如果不够,政府可以津贴,但要统一的津贴,由华北总工会统一的做出预算,绝不能再叫工厂去津贴。无论私营的或公营的,工会干部的生活水平,不能高过别人,但也不能低于别人。今后无论青年、妇女团体,经费都要独立。工人提拔为干部的工资要照原来的发,不少于原来的数目,多也不可能,也不应该。工会有了经费,钱多了,还可以办一些事业。

关于工人教育问题。要广泛普遍的进行政治教育。大学里可以办工人训练班,我们自己也可以办训练班。同时,还可办技术训练班,工会如不能办,可与北平、天津的大学商量,要他们替我们办。将来在工人中要产生大批厂长、工程师,这应该工会和企业部门协同解决,并由他们办更好些,他们掌握技术,同时训练出来的人才,他们还要使用。训练出来的工人,还可到政府中去,工人可以当区长,当县长,当省主席,当政府中的部长,在工厂中可以当厂长等等。总之,他既是领导阶级,就必须有个领导的地位。但你光说领导,而不能领导,空口说空话是不行的,你不能说当不了也要当,就凭你是个工人,这是不行的,阎王老子也没有这

个命令。所以工人要努力学习，工人是要办大事哩！看你们谁有本事，我们共产党就可向政府提议提拔你们。你们不要只看到现在的厂长不好，你们有多少人当得好，告诉我。总之，你们要负重大的任务，就要识大体，顾大局。不顾大局的人，小里小气的人，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和气魄，也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其中有些人是顾大局，识大体，能代表工人阶级的，但也有一些人是不好的。军队中有犯军阀主义错误的，政府中有犯官僚主义错误的，这些人不能代表工人阶级。因此我们要培养大批顾大局识大体有能力的工人，到政府中去，负起更大的任务！

在中国劳动协会⁽⁹⁴⁾ 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日)

同志们：

这次中国劳动协会代表会议讨论劳动协会的结束工作，将过去工作作一总结，并移交给全总，以后在全总的统一组织里面，共同为组织工人、教育工人以及为它的前进而努力。劳协的这一态度很好，符合于工人阶级的利益，符合于目前国家经济建设的任务。因为现在还用劳协的名义去组织，去活动，去号召，就会发生问题。劳协在中国工人运动中有它积极的作用。你们利用合法可能，在工人中进行活动，组织工人，保护工人利益。但你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活动，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这一限度，即不可能。你们在合法的范围内，尽了力，做了一些事。可是中国革命如果仅在国民党的合法范围内进行，不可能有今天的解放。所以必须有一种团体，即共产党，并有根据地、解放区的工会来做“非法”的工作，这方面是主要的。在劳协只是允许的就做，能这样也算不错。过去劳协有它的积极作用，这作用

有多大，应该放在什么地位上才适当？应该说它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在革命斗争中，有些团体着重作“非法”斗争，这些团体有的是公开的，象陕甘宁边区、人民解放军，有的是秘密的。非法与合法配合起来，联系起来，联合起来，才能打击敌人，才能发生作用。

现在情形已完全改变，国民党的统治垮了，中国已成为解放区，成为自由的地方，工人阶级由国家定为领导阶级。今天的任务是公开组织工人，教育工人，来从事生产建设。劳协不能担负这一任务，必须有另一种组织形式，因此必须结束，不然就会犯错误，会起消极作用。

今后工人阶级的工作，仅由全国总工会一个组织去做还是不行的，还需要有分工，还需要有产业性的分门别类的、根据具体目标具体对象分别组织工人教育工人的产业工会，来配合国家的经济建设。最近全总发出通知要成立十个产业工会，是完全必要的。这样，充分照顾到地方的特殊性，对于工人阶级的全国性的问题，则由全总作统一全面的解决。如果没有产业工会的工作，全总的工作就不切实，不实际。全总是全国工人的领导机关，它决定全国性的工作，解决全国性的问题，它是担负了这一共同统一的工作。但统一工作的基础是在下层的工会，全总的负责同志最好都去领导一个产业工会。为要担负工会今后的任务，并完成这一任务，就要建立起从上到下、分门别类的全国工会的组织系统。因此，这个任务，不是劳协的组织形式所能担负的。

以后,全总的干部,有从劳协、解放区、学校、工厂各方面来的,这些干部见面时间少,不很熟悉,可能会不了解,因此今后大家要团结起来。解放区工会同志应该很好的团结各方面干部在一起共同工作。劳协同志有一些经验,应该向他们学习。全总的干部首先团结起来,作全国工人阶级团结的模范。我们要团结全国人民,除了官僚资本家、封建地主以外,首先必须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组织起来,否则我们就不能团结农民、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团结了,全中国人民的团结,才有个基础与核心。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在共同纲领^[95]上都这样写着,但是问题还是有。因为还有很多人不服气,不相信,在资本家中这种人相当多,所以我们必须把事情做好。工人阶级是劳动的阶级,他们创造了世界,提高他们的组织性、纪律性、坚定性、创造性,以便在国家建设中作出成绩来。这样才能使人们心服。但作好这一点,必须数十年的时间。

工会工作做好了,不仅对工人有利,对生产有利,而且对全国政治有很大的影响,它可以使全国其他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这是工人阶级的最大利益。工人阶级的团结和统一,全国人民的团结和统一,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部分的利益必须服从全体的利益,暂时的利益必须服从长远的利益。以部分破坏全体,小道理破坏大道理,是绝对不允许的。劳协的行动表示了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统一,表示了工人阶级的觉悟性。

劳协同志大多数不是共产党员,但在工作中根据事实,

是则是，非则非，不管是党员或非党员，工人阶级是毫无顾虑的拥护真理，实事求是的。党与非党的干部一起团结起来，对于做好工作的要奖励；对于做得不好的要批评，要承认错误。如果过分重视党员与非党员的区别，做起事来就会束手束脚。相互的关系虽然不熟悉，不深，但不要太重视这一问题。在工作中批评是必要的，过去多少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爱面子是不好的，承认错误，接受批评，反而是有面子。做错事不承认错误，会使人以后不相信。所以劳协同志尽管放手工作，不要顾虑到熟人不多，关系不深，你们要研究问题，提出办法。

重要的问题在于今后全总的工作，即全国工人的工作应该怎样进行，它的步骤、办法如何，怎样把全国工人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觉悟、劳动热忱，增强组织性、纪律性，统一整个阶级，内部不分裂，团结全国人民来把国家建设好。对于有一种人，他坚持错误，不老实，欺骗，对工作起阻碍与破坏作用，我们必须打击，必须扫除。老老实实，为搞好工作，结果没有搞好的人，不要紧，这是因为觉悟不够，能力不够，只要研究一番，批评一番，再去做就会做好。全总目前的任务是在一年之内把全国工人组织起来，全总的工作要加强，要做得切实一些。劳协与解放区工会的同志，要共同分配工作，不分彼此。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应明确划清*

(一九五〇年八月十八日)

全总可规定资方代理人(或代表人)不得加入工会,工会会员不得在任何地方代表资方(不只是劳资协商会议)。如有代表资方者,即自动地停止其会籍。这应是一个永远的规定,不是一个暂时的规定。雷炳林^[96]既作了资方代理人(厂长),他的工会会员资格及其在工会中的职务即自动取消。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应该明确划清,不应模糊。划分这种界限后,工人阶级才能自觉地去与资产阶级作必要的联合,否则,这种联合就要模糊工人的阶级觉悟。

* 这是刘少奇对资方代理人可否加入工会问题的批注。

在全总扩大的 常委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一年二月三日)

同志们：会已开得很久了，我没有经常参加。工会工作中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需要从思想上解决，从组织上解决，有的还要从经济上解决，不解决这些问题，工作就不好做。同志们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提得很好，需要解决。

毛主席说，三年准备，十年建设，这是我们的计划。有人问，你们中央人民政府的计划是什么？共产党的计划是什么？现在详细的计划还没有，大概的计划就是一句话：三年准备，十年建设。

中国是需要建设的，建设工业，发展农业。中国农业的发展，除大规模地搞一下水利外，建设大规模的国家农场还不可能，少数的集体农场可能而且需要，但在经济建设当中，不起多大作用。目前只能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加以提高和发展，十年建设就是提高和发展，农业上有很多建设事业，如大规模的实验场，大规模地制造肥料，但主要的农业生产还是以个体的分散的小农经济为主。

十年建设当中主要的是建设工业、建设工厂。中国革命前途是很光明的。百年前,就有机器到中国来,但百年来却没有多大发展,产业无产阶级还不到三百万人,还是个小孩子,体力不大。但在今后三年准备、十年建设当中,可能增加到六百万至八百万,以至一千万产业工人,十年所走的路要超过一百年。做到这一点,没有准备是不行的。三年准备,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那一天开始,到一九五二年底止,还有一年十个月零二十五天。到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就要拿出详细的计划来。三年准备之后,要有第一个五年计划。因此需要从各方面加以准备。

工会要配合各方面加以准备,把毛主席所说的三年准备,十年建设告诉工人,三年准备后,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用以发动工人的热情。

准备什么?要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组织上加以准备,准备得差一点都不行,就会耽搁时间。军事上要准备好,搞好抗美援朝⁽⁹⁷⁾运动,如果朝鲜战争打不好,还能建设什么呢?外交上,三年内要搞出一个和平来,使我们能在和平环境内进行建设。告诉工人,如果我们不抗美援朝,把敌人赶走,要建设要改善生活是不可能的。因此,目前最重要的是抗美援朝,搞好搞不好,就决定于我们的努力,决定于全体人民的努力,当然也还决定于敌人。西藏问题两年内可以解决,朝鲜问题恐怕用不了两年,台湾问题不知能否解决,因为有海,海对我们是困难的。工人阶级力量大,但中

国目前制造兵舰还不可能,工人阶级力量还有限度,台湾问题是力求解决。争取世界上不打仗,或不大仗打小仗,骂骂娘,不做生意。美国人说不与我们做生意,但我们的东西他还要,他们的东西不给我们。因此,美国人不和我们做生意还不是绝对的;这样,一面骂娘,一面做生意,一面还可以建设。

最近看,世界大战是不会打的,朝鲜战争暴露了敌人的弱点,他们没有准备,军队没有准备好就不能打仗。美国、英国、法国都没有准备。当然他们现在正在准备,美国准备今年增加军队五十万,但五十万也没有用。讲到打仗,中国人是有经验的,我们知道打仗要有军队。在欧洲,德国能否组织大的军队是战争能不能打起来的关键,在东方就是日本。武装德、日很困难,今天德国与日本的人民不同了,他们反对,他们不愿打仗,因此,一两年内组织起强大的军队很困难。帝国主义的特点便是如此,他们自己不能打,要别人替他打,而别人又不愿替他打。因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帝国主义要战争,我们保障和平,力求在和平环境内进行建设。不管他组织军队,骂娘,只要不妨碍我们,就要进行建设。

军事方面,两年内解决西藏问题,土匪要肃清。肃清土匪现在已做得差不多了,再有三四个月即可以解决。

建设工作一定要算帐,这是很难算的。稳定物价,改革货币,搞好国营贸易,私营企业也应放在一定位置。要做到有计划地生产,商业方面需要多少货品,工厂方面就出多

少,事先订好合同,这样工厂出来的货物就不会卖不掉。十年经济建设计划很难做,中国几十年来都没有计划,特别是中国这样大,统计不清楚,没有三年准备便计划不出来。就拿全总机关来说,十年后用多少纸,多少笔,多少墨?你们都计划不出来。工业、农业方面做计划,要有确实的统计,了解情况。实行计划经济是很机械死板的,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也不行,不能机动。计划经济是反对自由主义的,计划决定之后,就不能变,变一下很困难,要费很多手续。工会经费独立后有些人反对,说不如政府管好,要多少就多少。实际上,工会经费独立后还可以在自己范围内有些机动。

我们要做好各种准备,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准备。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文化低不行,工人要提高文化,但更重要的是提高技术,目前技术工人太少,在两年内还要培养一些。

工会工作也要准备。准备什么?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工会工作中存在很多问题,如党、政、工、团的关系,这个问题要好好解决。

同志们提出了一些问题,我看了一下,现在来谈谈工会的立场问题,这个说法有点不大科学。邓子恢^[98]同志在报告中提到有一般立场和具体立场,党的立场,行政立场,团的立场,厂长立场等等,当然也可以这样讲,但政治立场都是一致的,不应有所区别。我们都是无产阶级立场。具体立场上,的确是有些不同。工会和党、政、团的关系要搞好。工厂里厂长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厂长工作搞得好,党、工会、

青年团的工作都好办，厂长工作搞不好，党和工会工作就都不好办，这个问题将来要在召集厂长会议时跟他们讲清楚。

工厂里，厂长、党、工会、青年团的关系应分清，厂长做什么，有什么权利；工会做哪些工作，有什么权利。工会不能干涉厂长，厂长有最后决定权，这个最后决定权仅就工厂的生产、计划、管理等问题而言，在党内是没有什么最后决定权的。党内只有少数服从多数，而没有个人决定权。工厂里的生产因厂长代表国家负全责，因此有最后决定权。党支部吸收新党员，厂长没有最后决定权，支书也不能最后决定，相反支部有权讨论厂长的党籍问题，支部大会可以做决定开除厂长的党籍。当然还要经上级批准。厂长只有服从党的决议，而没有决定权。工会内部的问题，工会自己有决定权，并有权向厂长提出建议、要求，甚至抗议，但答应与否，厂长有决定权。对生产计划，厂长有最后决定权，但事先须与党、工会商量，支部可以讨论生产计划和工会工作，但对外的是厂长和工会。党的直接工作就是党务工作，工厂行政与群众工作，党一律不许直接办，可以找党员谈话，通过党员进行工作，告诉党员执行厂长的命令。支部在工厂起调整一切关系的作用，要帮助厂长、工会、青年团进行工作，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法律上虽然没有规定支部可以领导厂长，但如果支部工作做得好是可以领导厂长的。如厂长以为支部的意见不对，可以不听，因为一方面现在有些工厂支部工作还很弱，另一方面厂长是上面派来的，和军队的政委一样，有他自己的一套工作计划，是根据中央人民政

府工业部的计划工作，支部不能改变他的计划。很多共产党员厂长比支部书记强，但厂长有事情一定要和支部商量，不商量不对，要加以批评、反对。你们可以讨论，提议，哪些事情厂长要和党、工会、群众商量，哪些事情厂长可以决定，明确一下责任，也正象演戏一样，哪个人站到哪个位置，讲什么，乱搞一套就演不好。现在工厂中党、政、工、团四方面没有配合好，今后要有规定。

所谓工会立场问题，工会是工人群众性的组织，是工人的代表，工会机关就是会员的机关，是由会员选出来的。工人群众批评你们是行政的工会，是资本家的尾巴，这是致命的，应立刻加以改变。群众完全有权利不要你们工作，现在还没有这样，只是批评一下，但有这样的批评是很严重的。现在的批评大体可分两种，一种是说你们不解决问题，听行政的话，不听群众的话；另外一种经济主义，片面的福利观点，代表工人福利太多了，不搞生产，这种批评过去是很多的，不管有什么困难，不管生产，片面搞福利。这是两种偏向，今后要纠正过来，搞正确。要使党说好，行政说好，群众也说好，这样是正确的。做好这件事情很困难，但也可以做到，研究一下，想一想办法，就可以做好。实际上有些工厂已经做好了。应该是厂长讲的，工会不要讲。资本家要讲的话，工会也不要讲。如行政要开除工人，应该由行政讲，工会不能讲。讲了工人就骂你，恨你。支部也不能讲，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讲了工人就要骂共产党。特别是不能为资本家讲话，讲了的确就是丧

失工会的立场，丧失无产阶级的立场。厂长的话如工人不赞成，工会还要代表工人讲话，讲的时候要考虑讲什么，怎样讲，如何能说服他。一般来说，政府是不裁减工人或降低工资的。如一个一千人以上的工厂要停工，这个停工的命令由工业部长来下，这个命令工会不能反对，但可以代表工人提出要求，如解决工人回家的路费或遣散费等。这样，群众就会说工会是我们自己的了。厂长解雇工人让工会说，怕工人骂他，这是不对的。工会如果说了就是代替行政，越权，干涉行政。工会不要侵犯别人权利，但自己权利也不能让别人侵犯。有的工厂正会主任、团委书记、厂长都是共产党员，但具体任务不同，各有专职。这些问题可以讨论一下，工会应做些什么事情，有什么权利，可以规定一下。工会在工余时间开会、通过决议，这是工会的权利，但也要事先和厂长商量一下，使他明白工会在做什么，不然工会提出要做的事情别人都不知道，应使支部、厂长知道工会在做什么工作。如前年电信局下命令减低工资，没有和工会商量，这是不对的。行政上减低工资一定要和工会商量，工会可以提出意见。不经工会同意下命令就犯了错误。如果行政上赚了钱要给工人办福利事业，那可以不和工会商量，厂长有决定权，但商量一下会更好一些。互相多商量，关系就容易搞好，不商量关系就要搞坏。

工会是代表工人利益的，将工人的意见、要求、情绪向上面反映。凡是工人提出来需要并且能够解决的问题，就应解决。要求合理但不能马上解决的，就需要向工人解释

说明。要求不合理也不能办的，也要向工人解释，向他说明这个要求从个人方面来讲是对的，但从整个来说是不合理的。不管是合理、不合理的都应反映上来，上面要知道工人的这些要求。很多地方要文化宫、戏院、宿舍，其中有些是办不到的。基层工会要一个房子或者要求设一个工会办公桌，这些可以办到，但也可能有个别地方办不到，确有实际困难，也应当向工人解释。工会不应当互相比高低，要了解在城市里房子少，和农村不同。目前工人的房子是个很大的问题，一时不能解决，要慢慢想办法解决。苏联过去也是这样，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候，工人的房子又少又坏，当时政府也无力照顾，他们自己组织了房屋合作社，每个月从工资里拿出一部分钱来，集积到三年五载之后，逐渐盖起了房子。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可以办房屋合作社。

关于产业工会与地方工会的关系问题，大家应考虑一下，如何解决？如何才能搞好？大产业有共同性，如纺织、邮政、电讯很需要组织产业工会。教员就不同，上海小学校教员每月工资一千斤米，各地乡村的小学教员只有八十斤至九十斤，要一样待遇，是不可能的，他们也没有要求与上海一样。这种事业，就有很多地方性。但将他们组织起来，联合起来，有很大的作用。如去年开的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过去从来没开过，说他们是无产阶级，他们很高兴，他们团结起来了，派别也减少了。小手工业如木匠、裁缝有很大的地方性。还有店员、农业工人也有很大的地方性，就要委托地方工会来管，归地方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纺织、铁路、

煤矿,这些大产业工会的问题,那怕是一件小事,地方工会也无权决定。比如有一个市铁路工会规定家属可以免票坐火车,那全国的铁路工会都会要求这样,因为很多问题都是全国性的。所以,一些大产业的事,应更多地集中到中央处理。小工厂、手工业归地方处理。具体办法,还可以讨论一下。

在工会中应强调集中,因为工人阶级是集中的,是统一的,应强调全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地方工会的同志应多注意集中,不要强调分裂,否则就害了自己。将来越工业化就会越集中。中国有很大的地方性,各产业工会中央委员会应给地方一些机动。不要规定太死是对的。必须规定的要规定,规定得太死就不好,应注意这个问题。地方应拥护集中,中央应照顾地方,这样,就结合起来了。按照产业组织工会是必要的。中国工人阶级过去向从来没有一个统一集中的领导,今天能统一集中起来,是一个进步,我们不要反对这种进步。教育工会开了一个全国性的大会,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全总应多开一些全国性的代表大会,使全国工人阶级互相见见面,眼光就宽广了,就会觉得祖国可爱,了解了祖国,慢慢地他们就会具有整体观念。很多工人不了解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这很难怪,因为他们没有到过很多地方,不知道自己国家到底是怎样?如果有了全国性的组织,开了全国会议,就会引导工人有整体观念。这是一个长期的教育工作,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在一个工厂中,地方那么狭小,怎能使工人有全国观点?如果把工人只关在狭小

的圈子里，那与工会——共产主义学校的精神是不相符的。但必须注意，不照顾地方工会的特点那是错误的，据我所知道的，全总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不许地方工会办某一工作。当然，有些事情，是不能允许地方办的。

产业工会的地方委员会也要加入地方联合会，同时，也在地方工会领导下工作。有些小纱厂要加入纺织工会，是会有困难的，公、私、大、小合起来，也是有困难。但大厂是工人集中的地方，如果不领导小厂，那就不好。“麻烦”二字就不能提，革命本来就是麻烦。可以组织一个委员会专门来领导小厂子的工作。木船工人要加入海员工会，可以成立小委员会专门搞木船工人的工作，也可以成立私营企业委员会来专门领导私营工厂的工作，有些产业工会可以组织手工业部。

中国工会历来是搞地方工会，地方性很大，注意集中统一不够。同志们应从思想上注意这点，现在不是集中得太多，而是各产业工会中央委员会抓不住问题，都是地方办，不告诉中央，现在要加强集中。恐怕现在问题要这样提才好，要照顾全体，要照顾全局。有些小厂子不愿与大厂子搞在一起，恐怕是他们怕大厂工会揩油，不照顾他们，又欺侮他们，那可以分开。小厂子可以自己选出人来管，工会有责任帮助他们，暂时独立一下，以后再集中。

有很多地方，没有实行工会法，这是因为宣传不够。没有实行，这很不对，工会法应该实行，可以由共产党中央写一个通知，通知各地党委检查执行情况。全总可以写一个

报告,通报全国,哪些地方实行了?哪些地方没有实行?从哪一天实行?那就是从颁布之日起实行。工会可以从政府批准自己成立的那天起就实行。有的工会是在颁布之前就成立了,如六月二十九日成立的,那会费怎么算?这个问题是可以妥协的,这是一个小问题,回去和厂里商量解决。以后各地方可以要求从去年八月份起实行工会法。

工会应善于提出要求。很少看见工会有什么要求,只看见教育工会写来一个,说农村教员薪水太低,要求加薪。还有几个地方工会提的要求,但这些要求,大多是属于福利的,或者发牢骚,那无法解决问题。你们应倾听别人的意见,要分析哪些要求是合理的而又可能办得到的,哪些虽合理但今天办不到,哪些是不合理的,然后提出来,能在工厂里解决就送到工厂,有的可以提到市委,有的就可以向党中央请示应如何办。我们是勤务员,你们是主人,我们考虑之后,认为可以办的就办,如果我们认为不好办,就要向主人讲清楚,不要将意见丢在海中,或者投入仓库。工人骂你们,说你们办不了事,提出的问题入了库,这是不好的。凡工人提出的要求,都应该答复,能办的就办,不能办的应该解释;这样才可以增加你们在工人中的威信。

你们提出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和企业行政人员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不明确,这个批评是对的。但你们自己也应该检查一下,你们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明确不明确,工会干部也应该作自我批评。如果你们依靠工人阶级依靠得很好,那人家就会靠你,你也没有搞好,那人家就不想靠你了。在

工厂中是有矛盾的，可以有适当的斗争，但应强调团结，经过批评，经过斗争，达到团结。地方党委应加强对工会的领导，党中央准备讨论这个问题，要规定地方党委特别是城市党委一年要讨论几次工会工作。要有专人管工会工作，四中全会要讨论工会工作，全总要准备一下。

工会干部要善于取得党的领导，你们中多半是党员，你们代表党在工会中工作，要取得党对于你们的领导。每个党委应有一个负责同志来管工会工作，你们应向党委作报告。

各级工会均应有党组，基层组织也应有党组，产业工会地方委员会也应成立党组。区是否要建立工会办事处？这要根据需要来决定，不一定每一个区都要建立，有的区是要建立的，两个区建立一个也是可以的，看怎样方便就怎样建立，不方便就取消。

资本家是另外一个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敌对阶级。从整个政治上说，工人阶级与资本家是合作的，我们应了解这点。今天总的任务是力争国际和平局面，我们要反对帝国主义、地主阶级与官僚资本主义，还要剿匪，有这样多事，有这样大的敌人，我们要与资本家——工商业家交朋友，才有力量打敌人，才能实现总任务；这要与工人说清楚。总的讲，要联合资本家，要从团结出发，经过斗争，达到团结。资本家对工人不好，要做必要的适当的斗争，这可以有各种方式，但不提倡罢工，因为不用罢工是可以解决问题的。现在还有工人要罢工，据我们了解，大多数罢工是有理由的，除

少数个别情况是由特务分子搞起来以外。大华纱厂的罢工，提醒了我们，工人教育了我们，不能批评他们错，如大多数工人坚持罢工，工会也不能反对，就让他罢两天。我们罢工两天，就怕罢垮了？我们不主张罢工，但也不能禁止罢工。工会干部应尽量想办法，奔走呼号，说服工人。解决不了，就打电话请示，再解决不了，坐火车上北京全总来解决。

生产竞赛问题，有成绩，值得奖励，缺点也应指出。据立三⁽²⁰⁾同志谈：过去是突击性，加班加点，生产超过，突击完了，生产也就下降了，那就不好。生产竞赛不能光建立在加班加点的热情上，应加上高度的组织领导，提高技术，突击不能经常。此次马恒昌小组^[99]发动竞赛，这个经验是好的，这是正规竞赛，工会应领导这个竞赛。过去生产竞赛是自上而下布置的，而马恒昌小组则是自下而上发动起来的，它是与技术相结合的，能够保持经常性，不是单纯依靠增加劳动力的强度。马恒昌小组的生产竞赛方法比以前任何生产竞赛方法都搞得更好，大大提高了一步，我们应该提倡这种产业工人的竞赛方法，应加以组织。各地可以组织马恒昌小组委员会，召集马恒昌小组代表会议，全总也可以召集一个马恒昌小组的代表会议，各地马恒昌小组派代表来开一两天会，大家讲讲话，研究一些问题，通过一下文件，有些问题不好解决，就由全总与工业部去商量。

过去，工人有两个思想问题：一个是不愿将技术教给别人；一个是不愿别人批评自己的缺点。马恒昌小组打破了这两点。他将全部技术教给别人，打破了技术工人的保守

观点，我们要学习苏联专家的态度，无保留地将技术教给我们。中国行会思想很厉害，教徒弟要慢慢教，怕别人学会，自己就失业了。把技术工人的行会思想彻底消除，是一个大革命。

最后说一下军需工厂问题。回去与中央局及各地党委商量一下，军需部现在没有必要管很多工厂。在战时，大家早上喊上操：一、二、三、四，很有用，现在却可以考虑，工厂归军需部管是管不好的，以后可以由其他部门来管。另一个办法是仍归他管，但要管好，工会派几个人帮助。过去他们管得不好，但他们保证了军需供给，所以也不能只说他们不好，不要老批评、抱怨，有意见可以通过中央局、党中央来解决。

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 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

(一九五一年)

所有的工厂和矿山,都是人类向自然界进行斗争,即进行生产的机关或工具。所以工厂和矿山的唯一作用与任务,就是人们使用它们来进行生产。这就构成了人类以及工厂和矿山与自然界的矛盾和对立。

当着工厂及其生产品被资本家所占有,资本家从而剥削并压迫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的时候,在工厂内部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上又存在着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这是一种在根本上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由于在工厂内部存在着这种矛盾,就压制着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使工厂的生产力不能充分发挥,有的时候,还要废置或破坏生产力。

当着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已经建立,并把工厂收归国有,又进行了民主改革以后,即在目前,我们的国营工厂内

* 这是刘少奇读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太会上的报告》和高岗《论国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两篇文章的笔记,写作时间约在五六月间,收入本书时删去了引述邓、高两文的一些段落。

部就再没有阶级对抗和剥削关系存在了，工厂管理机关与工人们的关系就从根本上变为一种同志的关系了。因而他们就能够而且应该团结一致，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去向自然界进行斗争，发展生产。随着这种生产的不断发展，就能够不断地改善与提高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国营工厂优于资本主义工厂的基本原因。

在国营工厂内部是没有阶级矛盾了，但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矛盾呢？一切事物的构成都是矛盾的构成，国营工厂的内部结构当然也是矛盾的结构。什么是构成国营工厂的内部基本矛盾呢？这就是国营工厂管理机关与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就是国营工厂内部的公私矛盾。这种矛盾与资本家工厂中的阶级对抗完全不同，它是一种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也应该调和的矛盾。但它是一种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的、真正的矛盾，是在长时期内要我们来认真地加以调整和处理的矛盾。由这种矛盾所构成的国营工厂内部的各种关系，就是国营工厂中完全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将一步一步地形成我们国家和社会一切新的上层建筑。

因此，现在国营工厂中所要处理的，已经不是阶级矛盾和剥削关系以及由这种矛盾和关系所发生的问题，因为这种矛盾和这种关系已经被消灭了，不再存在了。现在，我们在国营工厂中必须来处理另外一种新的矛盾和新的关系，这就是国营工厂管理机关与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和关系，以及由这种矛盾和关系所发生出来的各种问题，因为这种

关系已经在中国开始建立起来，在今后还会长期大量地发展。目前在国营工厂中所发生的一切问题，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基本问题上发生出来的，或与这个基本问题有关系的。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就不能正确地处理国营工厂中的一切问题。但是，这种矛盾和关系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关系，因此，应该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这种矛盾和关系。

由此可见，矛盾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根本上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另一类是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我们在观察问题的时候，必须分清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性质，既不可以把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看作是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也不可以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看作是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例如，国营工厂管理机关与工人群众个别部分之间的矛盾，就是属于后一类矛盾。如果把这种矛盾看成是一种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因而采取一种敌对的不妥协的态度去对待，那就在根本上犯了错误。

应该采用怎样的方针和政策来处理国营工厂中管理机关与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呢？有两种不同的人，站在两种相反的立场上，采取两种根本相反的处理方针和政策。

一种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敌人，反革命分子，他们站在反对工人阶级和人民的立场上，利用矛盾的斗争性及双方的一切弱点，进行挑拨，来推动与促进这个矛盾的斗争和破裂，以达到他们反革命的破坏的目的。另一种是工人阶级

和人民中的觉悟分子，共产党人，他们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的立场上，利用矛盾的统一性及双方的一切优点，来推动和促进这个矛盾的和解和妥协（经过适当的斗争），以达到双方团结一致，共同努力进行生产的目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在国营工厂中实行公私兼顾的方针，正是这种方针。

国营工厂中的管理人员、工会工作者和工人群众，当着他们的觉悟程度还不够高，还没有认识清楚这个问题的一切方面，那里的先进分子也还没有能够说服工厂中的多数人员，因而他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上发生错误的时候，在他们之间是可能发生磨擦、冲突的，甚至可能发生工人罢工、怠工等事件。如果其中还有人接受了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挑拨，这种情形就可能发展到严重的程度。因为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如果任何一方面处理不当，也可以发生一时的敌对现象。如果发生了这些冲突，工会与管理机关的任务就是要最迅速地去加以解决，一方面满足群众合理的可以满足的要求，另一方面在政治上说服工人群众，而最重要的，就是要在根源上预防这些事件的发生。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在国营工厂中由工人群众组织工会，并由工会代表工人群众和工厂管理机关协议并调处各种有关双方的问题，以至签订集体合同及其他协定等，就是必要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矛盾才能最后解决。在那时，工厂厂长的职务也就如工厂中其他工人的职务一样，只是一种简单的分工，而不需要担负其他特殊的任务

了。在那时，工会的特殊作用也就消失了，不必要工会了。

因此，在目前的国营工厂中以及在将来社会主义的长时期内，工会还是必要的。工会工作者与国营工厂管理人员，在保护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整个利益的问题上，他们的出发点，他们所站立的位置与立场，是或者应该是相同的，一致的。在这些关涉工人阶级基本利益的问题上，他们有共同的、一致的立场和出发点。但是，在处理有关双方的各种个别的日常的问题时，他们又各自有自己的出发点，各自站在自己的同对方相矛盾的位置与立场上来协议和调处这些问题，以至各自代表自己的一方面来签订合同等。这就是说，在关涉工人阶级整个利益的问题上，他们的利益和立场是共同的、一致的；但是在关涉双方的各种个别问题上，他们彼此之间又有某些利害矛盾，需要认真地来加以调整。这就是说，在整个的或基本的利益相同的前提之下，又有个别的或部分的利益矛盾，而后一种利益是要服从前一种利益的。

人们对于任何一个问题的立场，是由人们在牵涉到这个问题的矛盾中所站立的位置来决定的。他们或者站在矛盾之外、矛盾之上，或者站在矛盾之中的某一个方面，各自从自己站立的位置即立场出发来决定对这个问题所应采取的方针、态度和办法，或者利用矛盾的统一性促进矛盾的和解，或者利用矛盾的斗争性促进矛盾的冲突和破裂。人们在矛盾中所站立的位置相同，他们也就会有共同的立场；在矛盾中所站立的位置如果不同，他们也就会有不同的立场。

他们虽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但是如果双方都采取使矛盾和解的方针，那对于促进矛盾的和解是更有利的，可以得到相反相成的效果。因为任何矛盾的合作和解都是相互的、有条件的，而促进矛盾的斗争则是只要一方面就可以的，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宇宙间的各种矛盾又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其中有主要的和起决定作用的矛盾，又有次要的和从属的矛盾。所以人们在处理任何一个问题时，不只是孤立地考虑他们在这个问题的矛盾中所站立的位置，必须同时并首先考虑他们在主要的和起决定作用的矛盾中所站立的位置，并由这后一个位置去决定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的基本方针，又由前一个位置去决定他们处理的方式和态度等。因此，人们在处理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都必须同时考虑许多有关的其他问题，以及他们在这许多问题中所站立的位置，并确定它们中间的主从关系。

此外，在工会工作中还有一个基本问题是应该说清楚的，这就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与工人群众之间对于工会的看法上的差别。

我们常常说，工会是党与工人群众之间联系的桥梁，是工人群众的共产主义的学校，是人民政权的主要的社会支柱之一；工会在经济建设中，在加强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领导中，有着重大作用。对于工会作用的这些看法，是正确的。这也是我们重视工会工作、积极地去帮助工人群众组织工会的出发点和力求达到的目的。一切在工会中工作的共产党员，一时也不要离开这些目的和出发点。否则，就是

错误的。

但是，应该了解，这些是先锋队的出发点，是先锋队对于工会的要求和所要实现的目的。这些要求和目的是只有共产党人和群众中的觉悟分子才能具有的，普通的工人，特别是工人中的落后部分，是还没有这些要求和目的的，我们也不能这样去要求普通的工人。工会不是工人先锋队的组织，它必须使自己成为先进的、普通的以至落后的工人都能加入的组织，然后工会才能具有自己应有的群众性，并具有上述各种重要的政治作用。没有群众参加的工会，或群众对工会表示冷淡，没有热情和积极性，那也就要失去工会应有的基本的作用。

普通的特别是政治上落后的工人，他们来加入工会，并积极参加工会中的各种工作，出发点和目的是什么呢？他们既不是要来建立共产党与工人群众之间的桥梁，也不是来参加共产主义的学校和建立人民政权的社会支柱，他们通常的出发点和目的很简单，就是要使工会成为保护他们日常切身利益的组织。他们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和一般劳动者的利益而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如果工会不能实现他们这个目的，如果工会脱离了保护工人利益这个基本任务，那末，他们就会脱离工会，甚至还会另找办法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工会就会脱离工人群众。

由此可见，由于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与工人群众之间的觉悟水平不同，他们对于工会的看法，对于工会的要求和组织工会的目的也是有差别的。我们应该了解这种差别。但

是这并不要紧，我们可以使这两种要求和目的结合起来，统一起来。结合这两种要求和目的，就是一切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人在工会工作中最基本的和经常的任务。

保护与增进工人群众和一切劳动群众的利益，包括日常切身的与根本的，个别的、部分的、暂时的与整个的、长远的利益在内，不独是一切共产党员的责任，而且是共产党一切斗争、一切工作的最终目的。因此，共产党赞成工人们团结在工会之内，保护自己一切正当的不容侵犯的利益。而在工会中工作的一切共产党员，务必最周密地关心工人群众一切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福利，即使是最微小的事情，也必须予以关心。只要工人群众的这些要求无损于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及其经济发展，无损于劳动人民的其他部分，亦即无损于工人阶级根本的、整个的和长远的利益，就应该力求满足工人群众的这些要求。共产党员和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只有这样坚持不懈地周密地关心和保护工人群众一切正当的不容侵犯的利益，才能把最广大的工人包括政治上落后的工人都团结在工会之内和自己的周围，并取得工人们对手会对自己的信仰。只有使工会和工会中的共产党员与先进分子取得了工人群众的日益高涨的信仰，并团结了日益广大的工人自己的周围和领导之下，工会才能成为共产党先锋队与工人群众之间联系的桥梁，才能吸引广大的工人群众来热情地参加国家政权的与经济的建设，使工会成为人民政权的主要的社会支柱之一，并使先锋队能够用共产主义的原则和精神，利用工人中一切实际斗

争的经验，去教育工人群众，使工会成为共产主义的学校。这样，就使工人群众的要求和目的与共产党的要求和目的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这就是说，工会工作必须从普通工人的要求出发，力求实现他们一切合理的能够实现的要求，然后逐步地提高工人们的觉悟，来实现我们党的要求和目的。实现我们党的这些先进的要求和目的，是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人在工会中长期正确工作的结果。而所谓正确的工作，就是他们一时也不能离开普通工人对于工会的要求，即经常保护工人们正当的不容侵犯的各方面利益；同时，又不能将就落后工人的不正当的有损于工人阶级整个利益与长远利益的要求，而要不断地说服工人，教育工人，提高工人的觉悟，以至达到共产党所要求的那种水平。这样说来，共产党员在工会中的工作，是一种很重要也很艰苦的工作。

在中国工会第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100〕}上的祝词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日）

同志们！来宾们！

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致以热烈的敬礼和祝贺！

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长期的英勇的斗争，并且在革命斗争中经过中国共产党同广大的农民群众建立了最密切的联盟，从农民方面取得了极大的助力，同时，又同其他的民主阶级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因此，组成了强大的革命力量，战胜了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赢得了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在革命胜利之后，又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支持了抗美援朝^{〔97〕}的胜利斗争，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这些都是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在这些伟大的斗争中，中国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表现了无限的勇敢和勤劳，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尽了自己在历史上所应该担当的责任。中国共产党中央谨向中国工人阶级的同志们表示感谢。

同志们！我们祖国现正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并向我们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这就是实现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毛泽东同志说过：“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101〕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国家的发展，首先要求我国的工业必须有迅速的发展，特别是要发展和建立我国的重工业。我国现有的工业生产水平，不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必须逐年提高，许多工厂将要加以改建和扩建，同时，还要建设许多新的工厂和新的工业生产部门，其他经济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也必须适应工业的发展而迅速地发展起来。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国家逐步地成为具有高度技术水平的工业国。这个事业现已开始，几百个建设工程已经或即将进行，并将以不断扩大的规模继续进行。这个历史任务的胜利完成，将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大大富强起来，但这是特别有赖于中国工人阶级作更有组织和更高觉悟的斗争的。

为了完成这个新的历史任务的目的，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充分地发挥广大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完成与超额完成国家的经济计划而奋斗！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严格节约和降低产品成本而奋斗！而这就需要很好地实事求是地去组织工人群众的劳动竞赛，及时地发现和认真地研究一切新的先进的经验与合理化建议，特别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并且实事求是地去推广先进经验，不断地提高工人群众的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加紧

训练日益增多的新工人，并使老工人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新工人，帮助新工人。

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对工人群众加强共产主义的教育，提高工人群众的觉悟程度，使他们认识到全体人民的利益、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同时，必须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克服企业中的各种缺点和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反对破坏劳动纪律的各种现象，大大地巩固劳动纪律。

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还必须经常地、密切地关心工人群众的生活状况，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按照必要与可能逐步改善工人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和工人的工作条件。提高工人阶级以及全体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福利，并使我们国家不致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就是我们国家发展工业以及其他一切措施的最后目的。

我想，在这次大会上，你们是会而且应该很好地讨论这些问题的，这些问题的很好的解决，将使我们今后的工会工作进一步地改变自己的面貌。

中国共产党中央认为中国工会的工作在过去是有成绩的，但还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希望大家认真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和错误，使今后工会的工作在党的领导下能够得到更多的改进，使我们的工会能够如列宁所说的那样，真正成为“新生活的建设者”，成为“新的千百万人的教育者”。

同志们！中国工人阶级除开应该担负以上所说的国内

的责任而外,还必须担负严重的国际责任,这就是说,中国工人阶级必须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团结而奋斗,必须在世界工联〔90〕的领导下为国际工人运动的统一而奋斗,必须同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和进步人类一道为保卫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奋斗。胜利了的中国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各国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诚心诚意地给以各种援助。这是一种光荣的不可推脱的责任,中国工会必须在今后增强这方面工作,使这方面的工作能做得更好。

同志们!作为我们国家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它在国内和国际上的责任都是极其重大的,为着逐步地实现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为着很好地担负我们在国际上的责任,我们必须加强工人阶级本身的团结,必须更进一步地巩固同农民的联盟,巩固同知识分子的联盟,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阵线。同志们必须看到:全国人民都在注视着我国工人阶级的工作,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也在注视着我国工人阶级的工作,我们工作的好坏,其影响是很大的。因此,我们工会必须教育全体工人群众,记住毛泽东同志的教诲,不能以过去的工作成就为满足,永远不要骄傲,要时时刻刻地保持着谦逊的学习态度,抛弃不良的习惯和偏见,力求进步,使我们工人阶级的一切工作能够做得更好,这样,才不辜负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希望。

我们相信:有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

有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一致努力，有了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及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大力援助，我们是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幸福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强国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学说的旗帜下前进！

在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前进！

全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万岁！

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团结万岁！

工会应帮助党和政府 向不良现象作斗争*

(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

在一些工厂企业中,发生虚报成绩、假劳模以及贪污浪费、干部不团结等严重现象,工会系统没有或者很少向党和政府反映这些现象,并帮助党和政府向这些现象斗争。以后应提起注意,号召群众对这些现象加强监督,并经工会系统向全总反映,同时向相当的党委反映。全总和省市工会组织应有专人处理这类反映的材料,并进行初步的调查,重要的事件应向党中央及国务院反映。望对这个问题加以讨论,看是否能提出些适当办法。

* 这是刘少奇在《全国总工会一九五四年工作报告和一九五五年工作要点(第二次修正稿)》上的批注。

给范明庆^[102]并转 安源镇工会诸同志的信

(一九五五年七月八日)

范明庆同志并转安源镇工会诸同志们!

你们四月八日给我的信，收到了。谢谢你们！你们所请增加工会两个脱产干部及修轻便铁道事，已转江西省总工会及铁道部酌情办理。我曾在安源工作过三年，安源的许多事，至今我还记忆得很清楚，俱乐部的大会场还是我经手修建的。过去的许多革命同志，如黄静源^[103]、周怀德^[104]、谢怀德^[105]、刘昌炎^[106]同志等烈士，我记得他们很清楚。应该在安源建立一个纪念碑，并举行追悼会，以纪念安源一切死难的烈士们。此事望你们商同萍乡县政府酌情办理。

敬礼!

刘 少 奇

一九五五年七月八日

先进帮后进和职工业余教育*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目前有些先进的企业和落后的企业，它们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原材料的消耗、成本、产品质量等等悬殊很大，如果这些企业的规模及其他条件是大体相同的话，对落后的企业加以帮助，改善工作之后，这种悬殊是可以缩小或消灭的。因此，如何组织先进的企业去帮助落后的企业，找出落后的原因，改进工作，使落后的赶上先进的，消灭落后的现象，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望你们同财经各部商量，提出这项重要任务，采取具体措施，先经典型试验，然后加以推广，以便逐步地但是尽可能迅速地消灭落后。先进企业帮助落后企业消灭了落后，应受到郑重的奖励。

职工业余教育应分为两部分，一是普遍的群众性的文化技术学习；二是高级的和比较高级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学习，这只能是少数人的或一部分人的，但这种学习很重要，

* 这是刘少奇在《赖若愚同志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第三次执委会上的报告》上的批注。

必须为这一部分人或少数人创造学习的条件，不能因他们人少而不予重视。

纠正强迫工人、职员 进行业余活动的现象*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我们的国家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我国工人、职员的工作时间，并以企业内部劳动规则，企业同工人、职员所签订的集体合同、劳动合同等规定了工人、职员在一定的工作时间内完成一定的工作定额，遵守劳动纪律，不出废品，不损坏工具和机器等，这些是一切工人和职员都必须遵守的。如不遵守，如有无故旷工、迟到早退、破坏企业内部劳动规则和合同的行为，就要给以处分，就要扣罚工资，屡犯不改的还要受到开除工作的处分。但是在规定的工作时间以外，工人、职员的业余时间是完全属于工人、职员自己的，工人、职员完全有权利来支配自己的业余时间，任何机关团体如要占用工人、职员的业余时间，都必须取得工人、职员的同意，工人、职员如不同意，任何机关团体都没有权利去强制占用他们的业余时间。

* 这是刘少奇就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北京某些厂矿企业强迫群众参加业余活动情况的报告》，代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稿。

在一切厂矿企业和机关学校中差不多都有共产党、青年团、工会及其他组织，这些组织如果要召集有很多工人、职员参加的会议或者进行其他群众性的集体活动，一般都是在工人、职员的业余时间内进行的，而不能占用他们的工作时间或者生产时间。但是，这些组织在业余时间内召集工人、职员来参加会议或者进行其他活动，都必须取得工人、职员的同意，都必须建立在他们的自觉和自愿的基础上，如果他们不愿意参加这些会议和活动，他们完全有权利不来参加，任何机关和团体都不能采取强制的办法硬要他们参加这些会议和活动。

自然，共产党、青年团、工会及其他组织，都对自己的成员规定了一种组织生活纪律，这种组织生活纪律在共产党内是较为严格的，在工会和青年团内则较为宽些。违犯了这种纪律的成员，在必要的时候，在各个组织内部也可以给以处分。但是，第一，这种党与群众团体内部的组织处分，必须同国家和机关企业的法律处分和行政处分严格地分开，党与群众团体内部的最高组织处分也只能是开除党籍、团籍、会籍，而不能有其他的行政处分和法律处分。第二，党与群众团体内部的组织处分，只能施之于这些组织中极少数的进行破坏性活动或有极坏影响的成员，而不能施于这些组织中较为消极和落后部分的相当多数的成员（例如共产党内长期消极、不能改正的党员，也只是劝其退党，而不是当做一种处分简单地开除）。如果有人企图采用组织处分的办法去强制消极和落后部分的成员参加某些活动，那

就是一种错误的强迫命令的工作方法或惩办主义。犯了这种错误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坚决纠正。第三，党与群众团体既不能采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强制工人、职员，又不能依靠自己的组织处分的办法去强制工人和职员，那又用一些什么办法来使工人、职员在业余时间内参加一些必要的会议和进行一些有益的活动呢？答复是我们必须采取列宁所说的说服的办法和吸引的办法，来使工人、职员参加这些会议和活动。为此，各地应当很好地研究和总结那些说服和吸引工人、职员参加会议和活动的好的经验，加以推广。

很显然，企业行政或者党与工会采取提前上班（迟到以旷工论处）、下班的时候锁住厂门、锁住工牌箱、不开交通车、不按时开饭以及其他类似的行政办法，去强制工人、职员在业余时间内参加会议或者进行其他活动，是对待工人群众的一种十分恶劣的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有这种行为的地方，必须立即纠正，否则，应当给那些对这种行为负责的人以处分。

采用强制的办法要群众同意领导上所提名的劳动模范或任何其他候选人，也是一种十分恶劣的强迫命令的行为，也必须坚决地加以纠正。

企业行政为了布置生产任务或者进行某种工作的安排，而要召开工人、职员都必须参加的某些会议，是可以的。但这种会议应当在生产时间或者工作时间内由行政上下令召集，而不要硬占工人、职员的业余时间。行政上如果要在业余时间召集工人、职员开会，必须由党、青年团或工会通

知,并且不得采取行政上的强制办法。

在废除强制办法以后,党、团、工会和行政上要在业余时间召集工人、职员开会或者进行其他活动,在某些地方可能没有人或者只有很少的人参加,某些组织的工作可能停顿,甚至可能引起某些组织的瓦解。如果发生这种情形,就可以证明这些地方工作是毫无群众基础的,从而就可以引起我们的警惕,必须采取新的办法去进行工作。在另外一些地方,也可能发现一部分工人、职员长期不参加会议和业余活动,那我们也可以发现群众中的落后部分,从而研究他们落后的原因,并采取适当的办法去向他们进行工作,如果他们还有实际困难的话,那就采取适当的办法去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向工人、职员中的落后部分进行艰苦的教育工作,恰恰是党与群众团体不能推辞的责任。

当前情况的主要方面,是工人、职员参加建设、参加业余学习和业余活动的热情很高,而不是消极落后。正因为这样,领导方面就必须十分爱惜群众的热情,爱惜群众的业余时间,而不要在自己的工作中浪费群众的热情和业余时间。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第一,在召集群众会议或者进行其他工作布置之前,领导方面必须集中少数人进行充分的准备,必须在准备好了之后,才以不长的时间向群众报告。凡是要群众讨论的问题,必须在群众中进行酝酿,使群众也有了准备之后,再召集会议讨论,而不要在领导和群众都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召开冗长的会议去进行讨论。第二,党、青年团、工会和行政方面要组织工人、职员群众进行活动,

必须在党委领导下统一地加以安排，而不要使工人、职员重复地参加几方面召集的会议，听同样的报告，讨论同样的问题。第三，凡是认真参加业余学习的工人、职员，各方面都必须保证他们的学习时间，并且改善教学方法。第四，要改善厂矿企业中对群众的宣传方法，使群众在生活中和工作中能够很方便地听到和看到他们所要知道的事情。必须实行上述一些办法以及其他类似的办法，十分爱惜而不浪费群众的热情和业余时间，才能经常保持群众参加业余活动的高度积极性，否则，群众的积极性是不能经常保持的。

在全国先进生产者 代表会议上的祝词*

(一九五六年四月三十日)

同志们：

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向出席和没有出席这次会议的全国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致以热烈的祝贺！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在我国农村中兴起了巨大的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接着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进入了高潮，这就是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着的极为广阔极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现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和文化事业的高涨。大家知道，全国的农民在农业生产战线上正在进行着空前未有的努力，为逐步地实现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的伟大计划⁽¹⁰⁷⁾而奋斗。在他们

* 本文原载一九五六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

中间,出现了大批的农业劳动模范,他们团结着广大的农民群众,成为农业战线上的中坚。同样,在工人阶级中间,在工业战线以及其他经济战线和文化战线上,在各个工作部门的工作岗位上,也出现了空前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出现了大批的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他们发起了先进生产者运动,领导着广大的工人群众和知识分子群众,为又多又好又快又省地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而斗争。你们就是工人阶级中间这些优秀分子的代表。

我国人民的共同目的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有强大的工业和农业、有高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和科学、文化、技术状况还是很落后的。因此,我们必须动员各方面一切可能动员的积极因素,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才能逐步地改变我们的落后状况,实现我们的伟大的历史任务。目前我国各个生产战线上的先进生产者,各个工作部门中的先进工作者,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一种最积极的因素。这种因素应当受到我们最大的重视。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结底,是生产的历史,是生产者的历史。生产是永远处在发展变动的状态中的,新的生产技术不断地代替着旧的生产技术。因此,在任何时代,在任何生产部门中,总是有少数比较先进的生产者,他们采用着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创造着比较先进的生产定额。随后,就有愈来愈多的生产者学会了他们的技术,达到了他们的定额,直至最后,原来是少数

先进分子的生产水平就成为全社会的生产水平，社会生产就提高了。如果有重大的生产技术的发明，就要引起生产技术的重大改革，带来生产的巨大高涨。因此，先进生产者是人类经济生活向前发展的先驱，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先驱。

但是先进生产者在旧的时代并不是经常受到社会重视的。恰恰相反，剥削阶级一般地是贱视生产者的。当先进生产者的创造有利于剥削者的时候，剥削者才利用这种创造，但是仍然常常为着“专利”而限制别人学习和利用这种创造。而当先进生产者的创造不利于剥削者，或者剥削者由于愚昧，而不能了解这种创造的价值的时候，这种创造和创造者就常常受到打击，受到压制。因此，在旧社会中，先进生产者的先进经验和各种发明创造的利用和发展，总是受到各种限制的。社会主义社会跟过去的旧社会相反，它的主人不是剥削者，而是生产的劳动者自己。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人禁止学习和利用先进生产者的先进经验，相反，它要求先进生产者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要求其他的生产者认真地学习和利用他们的先进经验，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是同先进生产者的利益一致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解决这种矛盾的基本方法，就是通过劳动群众的自觉的努力，通过教育和批评的方式，不断地把落后提高到先进的水平。千百万劳动者在先进生产者率领下为消除落后而斗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前进的一种

动力。正因为这样，先进生产者在我们的时代里才能发展成为如此强大的群众性的运动，才能在社会生活中居于如此光荣的地位。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劳动模范有三种作用，即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这就是说，在人民民主制度的条件下，先进生产者不但是人民群众的先驱，而且成了人民群众的核心，成了国家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重要纽带。先进生产者是社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没有先进生产者，也就不可能有完全正确的领导。

同志们！你们聚集在这里举行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你们的会议受到党和政府的极大的重视，这个事实就是表示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在各个生产战线上的创造，支持全国的先进生产者运动；就是表示我们坚决同你们站在一起，要求全体工人阶级象你们一样地劳动；就是表示我们决心克服一切障碍，为把你们所已经达到的先进的生产水平迅速地变为全社会的生产水平，并且为继续前进到更高的生产水平而斗争。

为了发展先进生产者运动，为了使先进生产者运动达到这样的目的，需要先进生产者、普通生产者和生产的领导者三方面的共同努力。

每一个先进生产者应当坚持自己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生产定额，应当为普及自己的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定额而斗争。先进生产者不只是一要保持自己的先进，而且要努力促进别人由落后达到先进。因此，先进生产者必须

用一切方法帮助和教会别人，并且不断地争取更加先进。仅仅依靠一时的先进不能保持永远的光荣，而骄傲自满只能促成自己的退步。唯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努力，才有可能不断地前进。

每一个普通生产者应当向先进生产者学习，向先进生产者看齐，迅速地把一般的生产水平提高到先进分子的水平。这是完全可以做到而且是必须做到的。试问，既然是先进生产者已经做到的事，具有同样条件的别的生产者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既然是先进的单位已经做到的事，具有同样条件的别的单位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很明显，拒绝向先进生产者看齐的人们没有什么理由可讲，有的只是一种得过且过的惰性，这种惰性的实质不是别的，就是要保持生产的落后状态，保持我们国家的落后状态。因此，我们必须批评那种不积极赶上先进者、用种种借口替自己的落后辩护的人们，我们必须要求他们切实地改变这种态度。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尽快地把先进生产者的水平变为全社会的一般水平，从而尽快地把全社会的生产推向前进。

每一个生产的领导者应当坚决地支持先进生产者的运动，支持每一个有实际意义的先进经验和创造。这就是说，第一，他必须详细地鉴定、研究和总结先进生产者的先进经验，以便确定它是可以推广和应当推广的，并且找出推广的有效的方法。第二，他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技术措施和组织措施，例如组织先进操作的表演、传授和训练，改进原有的设备、劳动组织和操作规程，研究人们不愿意学习先进经验

的经济上、技术上和思想上的原因，并且加以消除，等等，以便实际地而不是空谈地推广这种先进生产者的经验。谁做的这些实际工作愈多、愈好，他在推广先进生产者运动方面所得的成绩也就愈大。诚然，这是一个艰苦的、细致的工作，但是一个害怕做艰苦细致工作的人，是不能够成为一个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的。

可惜在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中，这样的一种领导者还是有的，这些人具有我们所说的官僚主义的倾向。为了发展先进生产者运动，必须跟这种官僚主义倾向作斗争。

妨碍先进生产者运动的官僚主义倾向有几种形式。有一种人是实际上不满意或者反对先进生产者运动的。他们安于落后，把落后的技术和落后的定额当作先进的东西，或者是当作不能更改，至少是目前不能更改的东西。我们的不少的先进生产者已经跟这种人进行了斗争，用事实批判了他们的错误的观点，使他们受到了教育。我们今后还需要继续反对这种倾向。还有另一种形式的官僚主义倾向。有这种倾向的人，口头上甚至主观上不但不反对先进生产者运动，而且是热烈支持的，但是他们满足于空喊，满足于一般号召，满足于给先进生产者发奖旗，写访问记，满足于让先进生产者当这种或者那种代表，他们很少认真地为先进生产者创造条件，使之不断前进，很少认真地研究先进生产者的经验，认真地推广这些经验，他们不努力使先进生产者运动由个别的先进生产者前进到整个的先进的车间，由个别的先进的车间前进到整个的先进的工厂，由

个别的先进的工厂前进到整个的先进的行业，反而使先进生产者有忙于应酬、脱离群众、不能继续提高、渐渐变为落后生产者的危险。我们必须纠正这种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

官僚主义倾向还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表现，就是不关心职工群众的切身生活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和劳动者个人的利益应当是一致的，其中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合作社营企业的工人，国家机关中和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机关中的工作人员，合作社的农民，他们的劳动是为着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同时是直接为着他们个人的利益。而国家的利益则是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是每个劳动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当然，把个人的利益跟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对立起来，离开生产的发展而追求生活的改善，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但是只注意增加生产，增加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而不注意增加劳动者个人的利益，也是不正确的。要求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个人的收入，改善个人的生活，这是完全正当的和必要的。只有这样，劳动者的积极性才会不断提高，先进生产者运动才能获得巩固的基础。但是现在有些企业和机关的领导者只是片面地注意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生产，却不注意按照可能和必要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改善劳动者个人的生活，对于在生产上、工作上有卓越成就的人们，也不注意给予充分的奖励。这种倾向，无疑是必须坚决纠正的。

只有坚决依靠先进生产者、普通生产者和生产领导者的共同努力，只有坚决克服领导工作中的各种官僚主义倾向，并且正确地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把它们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才能使先进生产者运动得到普遍的持久的发展，才能使我国的生产水平和科学、文化、技术水平在这一基础上不断地提高。

同志们！我们的国家是人民民主制度的国家，在我们的国家里，一切工作都必须贯彻执行依靠群众的路线，都必须依靠由上而下的方法和由下而上的方法相结合。离开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离开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任何少数人的领导都不会是正确的、有效的和巩固的。反过来说，只要我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中密切地依靠群众，我们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在我们的前面摆着一个最困难的任务，这就是要把一个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落后的六亿人口的大国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完成这个任务，就会使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极大地加强起来，就会使世界和平极大地巩固起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们全体先进生产者代表和我们同样担负着巨大的、光荣的责任。我们希望你们每一位代表，你们所代表的每一位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以及农民、手工业者、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和其他爱国人民中的每一位先进分子，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都能够密切地联系群众，带领群众不断地向先进的水平看齐，不断地前进再前进，那末，我们大家就一定能够完成我们共同的历史任务。

我们祖国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胜利万岁！
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中国工人阶级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关于研究工人阶级 问题的谈话*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工人阶级问题、工会问题，在全党讨论一下很有必要。我们是从山上下来的，对工人阶级问题不够熟悉，要有一次集中的讨论。不仅要有几个文件，一定要使全党了解，全党动员，全党准备，全党解决这个问题。还要定个日子，中央全会或代表大会什么时候讨论，要让各地准备，这也是个动力。

中央要全面讨论，就要作全面的准备，全面提出问题，全面看问题。工人阶级的各种问题都可提出来，要有轮廓，要全面看，全面规划。提出来后，能解决的应作出决定加以解决。当然解决当前问题，只能是一些，而不能是所有问题。不能解决的要有交待，有着落。你们的文件中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有些问题未提到，要鼓励各方面提问题，有问

* 刘少奇在看了中共中央工人阶级问题十人小组及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的关于研究工人阶级的计划向中央的报告草稿后，召集了十人小组和工业交通部负责同志进行了一次座谈。这是刘少奇在座谈会上的谈话记录。

题要提出来。搞了这么久，总是有许多问题的。把问题提出来，展开讨论，才能解决。

还有许多要提出的问题，比如罢工、请愿问题如何办？比如党、团、工会到底做什么？如何做？如何统一？闹了好多年，还没有定论，应提出来研究。应当有定论了。

(一)关于劳动调配问题。劳动调配问题很多，人家并不高兴，劳动调配工作对生产力的要求常常不适应。人家要这样，你们给那样。调上海已婚的女工到西安，而男方没有调去；调男工时，又不调女方。煤矿要吸收附近的农民，你们硬要从外地调，这就不适应生产力的要求。

至于招收新工人和学徒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要增加六七百万工人。招什么人？各方面有多少？是个大问题。要搞好，使工人高兴，工厂方面也满意。难道这些工作不可能搞好吗？我看可以搞好，这是工人要进来的问题。还有工人要出去，工人不断地老，退休，养老问题如何搞好？还有失业工人问题。现在是只要一进厂，就不走了，就包下来（当然应当包，包了有好处）。但总要使工厂有个机动性，要的时候有地方来，不要的时候有地方送。不然，就只有来，出不去。要有进来的路，也要有出去的路，路要通。现在有些临时失业人员。这种事情以后恐怕不能免，可能长期存在。以后要在这个问题上作准备，现在一点机动性也没有。私人请保姆，有肺病，不能带孩子，但是不走，每天给你闹。同时，凡是被开除的谁也不管。这些人劳动部要接下来，加以安顿。社会上势必有一部分调皮的人，要吃饭，又不好好

干，劳动部要养起来，给饭吃（只是吃多少的问题）。一面教育，一面解决。送劳改队回来的也要接收，他们不能回农村，只能在城市。私人雇临时工、辅助劳动，今后还有人要签合同，按合同办，到期可以不要，苏联就有这样的条例。

你们研究过劳动合同没有？恐怕这些东西我们执行了就好了。合同签了六个月，到期如果双方愿意，再签，不要就是辞退。当然，要有地方去。现在，我们招待所里，有些人住了好几年，还要照发工资。有些调皮人，分配到哪里也不愿意去，住在招待所照发工资，这是不合理的。这事情要研究一下。

还有临时工问题，临时工待遇问题。做多少年的最好当正式工人，这句话我们不能说。现在是周转不灵，只能进来，不能出去，这会把人胀死的。

退休养老问题。今后，可利用些半劳动力多做些事情。退休的人领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工资。如果他还可以守门、看仓库、卖票、扫地，就让他做，保证他收入不降低。也可以规定某些工作只有半劳动力才可以做，规定一些职业不准用青年人。比如中山公园看门的、卖票的让老年人来，青年人让出这些位置去吃点苦，以后老了再来。

关于脱产人员回生产中的问题。机关精简，根本的是要提出回生产中去的问题。现在是一脱产当干部，就不愿再回生产。农民当干部不愿回生产。工人抽到机关，因工作不熟，工资少，愿意回生产；但到工作熟悉了，工资多了，也不愿意回生产。要想个办法，使之能够提上来，又能够放

下去。农村工人和基层干部工资要研究一下，使之与农民接近，便于回去。要从生产中来，到生产中去。周转环节要周转得好。特别是将来基层干部要选举，选不上要好好回去生产。干部光荣，这是好的，但不一定要钱多。根据地时，厂长没有工钱，大家还是愿意当厂长。我们有一千万党员，我看是不会有几个人因为少几块钱，就不愿当厂长。只要当厂长，生活就不会坏。总之要研究这个问题。

还有工人工资问题。按城市生活水平与乡村生活水平，也要接近才好，要与农民密切联系。必须慎重研究这个衔接点。当然已做了好多年工的工人，不能给最低工资。但才来的工人在几年之内，至少要和农民接近。现在把最低工资提高很多，恐怕不利。还有家属在城市还是在农村的问题，也要研究。

(二)关于工业基地建设问题。新工业基地建厂、建矿要提出来研究。今后要长期建设，现在还无经验。轻重工业配合问题，有轻无重，或则有重无轻，都是营养失调。又比如建一个厂基地，服务业投资占多少？这是个紧急问题，不解决，要出问题的。现在，存在有那样多的问题，没有房子，没有小菜，没有交通；有男没女，或有女没男；小孩子没有书读等等。这些基地，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许多问题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爆发的。吃苦只能一两年，长期吃苦就会闹乱子。另一些要长期吃苦的，如地质勘探、林区，要另有安排。

基地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主要是服务业。

(三)关于私营企业问题。各地地下工厂不少。天津有二百多。有些资本主义或小生产者，有什么不好呢？这对人民有利，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这些问题在另外地方研究。将来地下工厂变成合法工厂，工人要参加工会，但这个问题可慢点解决。国营厂工人到私营厂做工，可以合法，但要向他提出问题，你到底去哪里干？如果到私营，国营就可以不干了。

(四)关于企业民主管理的问题。工厂是个统一的机构，不能分割。可否这样，成立职工代表大会和管理委员会，它又是领导，又是监督。主要是监督，但不只是监督，是权力和监督机关。可以作决议，权力很大。厂长提出的东西经它批准，不批准就不合法，就不能做。厂长没有提的，可以督促和帮助厂长提出来，厂长再不提，它自己也可以提出来，让厂长做。可以批准厂长提出的，也可以不批准。职工代表大会有很大的权力，厂长要不要当，干部的任免，要经代表大会决定或选举。其他如计划、升级、增加工资、厂长基金支付等，要经代表大会通过。再加一条，就是代表大会认为自己要决定的问题，就可以作决定。当然，不能违反上级决定。管委会主要是修改、批准厂长的东西。许多事情要厂长提出。同时，可限制厂长一定要走群众路线，非商量一下不可。不批准就不合法。除此之外，如厂长不提出来，代表大会、管委会也可以提出自己要做的事情，但这样的事不多。代表大会、管委会的决议厂长要执行，不执行要讲理由，没有正当理由不执行可以不要

你这个厂长。代表大会、管委会和厂长的关系，就象过去股东大会、董事会和厂长的关系一样；象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的关系一样。厂长不听董事会的话，它可以撤掉你。股东大会可以选举董事会。工厂有个权力机关好，虽然代表大会、管委会权力大，但不要代替厂长的职权，不要干涉厂长，要帮助他，限制他。代表大会、管委会不参与执行，不妨碍厂长的日常事务。厂长是管理机构，是执行机关、办事机关，是内阁，这三个东西，并不重复。

如果厂长不同意代表大会、管委会的决议，可以提出复议，党委也可以讨论一下。既然代表大会通过了，如果事情搞坏了、搞错了，大家负责。可减少厂长责任，这样厂长好当，这要向厂长讲清楚。有了这样权力机关，党和工会也好做了。代表大会、管委会关于行政管理工作的决议，交厂长执行；关于生活福利的决议，交工会执行，因它没有自己的机构和人员，不是执行机关，不能执行。

这样做，你们看怎样？有几条原则是可以肯定的。第一，要走群众路线。与群众商量就要有一种形式，不管叫什么，而且不商量不行，不商量是非法的。当然，紧急问题除外。这是一条。第二，这些组织不直接执行，不直接下命令，调动工人，批条子，领钱等，而且它的决议不能与国家计划和上级法令相抵触。抵触要经上级批准。这一条也是肯定的。第三，一定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这也是肯定的。

这样做有无危险？会不会搞乱？我看不会。反正是厂长提，如果厂长不提，或提不出来，可以帮助他，督促他提。

有些自己提，但是不多。厂长不同意怎么办？时间来得及可以不做，提出复议，也可以交党委研究。留下这些缓冲余地，就没有任何危险，就可以放手去做。

只有制度还不行，还有个工作方法问题。党委、厂长、代表大会、管委会如何工作？它们的工作方法怎样？如许多问题只开大会还不行，还要开小会。厂长如何提出问题？这些组织如何写决定？如何帮助厂长？都要研究解决，不然，只有组织形式还不起作用。

(五)各方面的关系和工会工作问题。党、政、工、团的关系如何？要研究，可以做一个时期再看。以后代表大会、管委会要党领导，比工会管好。党经过代表大会、管委会实现领导。代表大会可以自己选主席，成立三几个人的主席团，党委书记可做代表、委员。工会主席能选为管委会领导，统一起来也可以，这样党委放在后面，还有个缓冲地带。但是否这样容易使工会工作搞在上面，而别的工作不搞了呢？

可以肯定，厂长、副厂长、车间主任都不能做管委会主席，这样可以唱对台戏，有好处，就是执行归你，决定归我，让它有点矛盾，但不对抗，除非到了撤销厂长职务的时候。把管委会叫工会委员会不大好。关于职工代表大会，扩大它的权力，工人会满意，而会员代表大会不能作决议，厂长不大重视它，工人就不满意。或者一而二，或者二而一，也可以算工会的，也可以不算。会员代表大会也可与职工代表大会合而为一。总之不要重复。

工会问题。许多事情代表大会、管委会做了，工会还有什么事可做？是否这样搞会侵犯了工会的职权？侵犯就侵犯点吧，厂长的都侵犯了，工会为何不可侵犯一点儿呢？工作减少点有什么不好呢？有些需要经代表大会、管委会的，工会可以主动提出来，这是指企业里面的问题。还有些问题，企业中的代表大会、管委会都解决不了，要上面解决的，工会就可以把那里各厂工人召集起来，开联合大会，提出办法，综合向上级提出来。

有了代表大会、管委会，工会可以参加掌握这个形式。工会的工作搞得不好，你的本事好，你就可以选上，就可以掌握，看你的本事。只要代表大会、管委会有了权，工会工作就好办，有活动余地。给了你舞台是否工会能上台演戏，要看你的本事。总之，工会与职工代表大会、管委会的关系做一个时期再看。

为全总第一个会所 遗址问题致信赖若愚^{〔108〕}

（一九五八年二月四日）

赖若愚同志：

广州越秀南路惠州会馆这栋房子，是一九二五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的第一个会所。在中华全国总工会迁入这座会所以前，这栋房子是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后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第一个办公处所。廖仲恺^{〔109〕}先生当时在这里办公，并在这所房子的门前被反革命分子所刺死。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中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开会，曾在这所房子（当时全总办公处）的门前廖先生遇难处，为廖先生建立了一个纪念碑，另在右边为中国工人运动死难烈士建立了另一个纪念碑。这两个纪念碑现仍完好，毫无损坏，我在去年春天去看过。这是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名义建立的，当时全体代表到这里举行了奠基典礼。碑文是谭延闿^{〔110〕}和邓中夏^{〔111〕}写的，在碑上刻有那时以前革命死难烈士的名单。去年我去看时，这所房子作为复员军人的临时招待所。那里的纪念物，如果你们愿意保存的

话，望加以注意。全总在一九二六年秋季迁至汉口友益街，广州这所房子就作为全总广州办事处，由全总委员戴卓民同志主持。至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广州反革命暴动，这所房子被反革命占领，戴卓民同志遇难。以上简单情况，特此奉告。

敬礼！

刘 少 奇

一九五八年二月四日

在四川省劳动工资 座谈会上的报告*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今天讲劳动工资制度问题。现在我国人民和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生产力,尽可能高速度地发展工农业生产。过渡时期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社会经济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经济性质。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已完成,已经是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经济了。目前社会主义内部的基本矛盾,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这两个矛盾既表现为社会阶级矛盾,也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更多地反映在生产关系上,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也就是上层建筑与基础的矛盾。厂长与工人的关系,可以说是生产关系。劳动工资福利问题也是属于

* 本文根据记录整理。

生产关系的问题。劳动工资福利制度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它反映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情况，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会束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矛盾的统一，究竟哪一个适应哪一个，那要生产关系让步，生产力是不让步的。要叫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不能叫生产力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不适应就要改，否则就会冲破。

现在工业企业的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应该说是适应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确立了，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但生产关系不仅是所有制，还有生产过程中生产者与生产者的互相的关系，生产组织、劳动组织的关系，如计划协作、平衡、厂长负责制等等，都是生产关系，还有分配和交换。工资、奖励、福利属于分配。还有积累中的利润、税收、价格也属于生产关系。目前所有制已经基本解决了，所有制方面的问题，要做的已不多了，但在劳动组织、工资、福利、奖励、税收、利润、价格等方面，还没有完全解决，还有很多缺陷，需要加以调整。有什么缺陷呢？

第一，在劳动工资与劳动组织等方面，我们沿袭了不少旧的规章制度。许多官僚资本主义企业，都是原封不动地接收过来。很多旧的规章制度也沿袭下来，如年终双薪仍照官僚资本一样办。税收虽取消了苛捐杂税，但一接收下来，仍按过去制度执行。物品价格改了一些，也是比照原有价格，并不是我们所理想的。在劳动组织中，很多旧的规章制度，如厂长、工程师的工作，工头指挥工人，我们照样

办,改了很多,没有改好。还有很多旧的,这些旧的不完全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一条缺陷。

第二,我们搬了一些不适合中国情况的外国规章制度。新建厂矿虽然没有资本家,不是接收旧的,但也搬了一些旧的,同时也搬了一些外国的,有教条主义,不能适应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有些是搬对了的,有些不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些也要改,不然也会阻碍生产的发展。

第三,某些规章制度定得不合理或原来是合理的,但现在情况起了变化,需要进一步改。如劳动保险条例,规定八年以上工龄请病假照发工资,这样一年只作三天工,仍拿一年的工资。落后的工人钻了我们的空子。这些都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现在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提高群众觉悟与积极性。应当改变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一些新的合理的规章制度,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如果不进一步改善,就会阻碍工业的发展。

从解放以来,我们在劳动工资制度方面,已在几个问题上相当程度地陷于被动。

(1)我们从旧工厂、国民党的官僚资本、合营工厂接收了很多的工人、职员,或从社会上招收进来,不论是机关、工厂、商店,只要进来了,不管有无工作,就不能辞退,又不能让他转作别的工作。作车工的只能作车工,作钳工的只能作钳工,也不能叫他暂时回去,没有事只好让他打扑克、吃饭,还要骂娘,这不是被动?

(2) 学徒毕业后,必须分配工作;没有工作,分配别的工作也不行,也是打扑克、骂娘。现在已有些改变,但改变不大。

(3) 大学毕业生、中技毕业生,也只能分配他们所学的工作,学什么就必须派什么工作,无工作也不能作其他工作。

(4) 临时工招进来后,过一个时期,不管生产上有无需要,就要求转为正式工人。

(5) 某些工资福利规定过高,只要提上去了,就难于改变。要往高处提可以,如洗澡、理发、手纸,夏天喝汽水、吃西瓜,有的还要发雪花膏。有的县以下工厂的工资福利,比国营工厂还要高一些。最近这些方面有些改进,不论洗澡、理发都增收了钱。有些厂矿过去有分散主义,未经批准,就自己增加上来。现在有些不合理的,要采取措施取消,但不能降低多数人的收入水平。现在是生产大跃进,降低是不利的。是否可以想些办法补救,如改善伙食、办好托儿所等。不要使多数工人不高兴,不高兴对生产是不利的。

估计全国机关、工矿、商店工薪人员有二千四百万人。有人说多了七百万,有人说多了四百万。单是商业就多了四百万,工业多了四百万,共八百万,如每人每月平均工资六十元,每月就是四亿八千万元,一年就多拿五十七亿六千万元。我们的行政费才二十一亿。多一百万人,就吃掉了好多个工厂,这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中央和各省的劳动部门,对劳动的管理方法有缺点。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没有作好,特别是劳动调配工作。要知道调配的是人不是钢材,调配不好,就要叫喊。有的把纱

厂工人调到煤矿,还不让他回来,回来原工厂又不要。所以说劳动调配工作缺乏群众路线与政治思想工作,应该在调配中,作政治工作,要安排好。如安排不好,是否可以考虑调回去。劳动调配不要在全国到处调配,应以地方调配为主。还有劳动调配与工资管理不统一,几个地方管,各自为政,分割了势必增加工资。因此,提议劳动部门今后应作为一个口,直接归党委领导。因为这个工作牵涉到各方面,劳动部门的政治领导要由省委领导。调配要经过政治动员,先派代表去看一看,回来报告。这样愿意去的就去,不愿意去的就不去。劳动部门作的是人的工作,要学会作群众工作,作政治工作,要充分作好政治工作。让他们自己下决心去不去。试一试把你们劳动部门的人也随便调配一次,看你们是否受得了。

解放初期,我们对职工采取包下来的政策是对的,现在对一切人采取统筹安排也是必要的正确的。对地主、资本家我们还安排,当然,对工人也要安排。但安排的范围要更宽一些,更广泛一些。不能太窄,要有灵活性,要有回旋的余地。上山下乡也是一种安排。如果有的只能安排作局长,作副局长就不干,这是不对的。作局长、副局长和作普通工作以及上山下乡都是安排。对工人也应该这样。如有的只能在城里当售货员,下乡就不行;把工人招进来,就不能辞退;当了局长,就不能当副局长;当了营业员就不能下乡,这种办法只有中国才有,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办法。在苏联,招进来可以辞退。我们招了不能辞退,免得影响社会秩序

这是对的，但只包不能退，就会陷于被动。当然，苏联和东欧国家和我国不同，他们劳动力少，特别是煤矿与建筑工人辞退后，容易找到工作。我国劳动力多，情况不同。应该说，劳动力多也好办，不是不好办，基本条件是好的。各行各业不是没有人。因此有几个问题，请同志们考虑：

在工厂有多余工人的时候，招收的工人没有工作可作时，是否可以暂时辞退？需要的时候再来。是否可将多余的工人不辞退，而暂调作其他工作？是否可以暂时回家种地？或者派他们去上山下乡？需要时再请他们回来。如果工人只能作这样工作，可是这样工作的人多了，没有工作作，他们又拒绝作别的工作，又不能辞退，这样势必陷于被动。目前我们不是反对浪费吗？这种状态是很大的浪费。多四百万人，每年支出几十亿。我们反浪费反出几十万、几百万，而劳动力的浪费是一笔大帐，一年几十亿没有人考虑。

现在我们不准备大批地辞退工人，这样作没有好处。但目前没有工作，是否暂时可以作别的工作，照发工资，或暂时下乡劳动。目前没有工作，也不辞退，暂时作别的工作，这是有道理可讲的。可以在工人中展开辩论。不要把机关、工厂多余的人员没有事放在那里，可以让这些人去作临时工人。要充分作好群众工作，不要单纯作调配工作。至于谁去谁留，是个大问题，是否可以轮流去。除了特殊有技术的以外，大家都可以轮流的去。要是工人问你们去不去？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去不去？要答应去，不能说不去。事实上一千人有二百人去，必须有厂长或党委书记带着去。

现在被动的事情，可以争取主动。特别现在机关干部与工厂干部下放后，已经有些主动，可以说服工人。对现有工人的问题，可以初步争取一些主动，实行以上办法，至少打破工人中“养老院”、“铁饭碗”的观点。一定要告诉工人，多学几样手艺。现在青年工人只能作一项工作，是否能多学几样手艺，会作工又会种地。只要能耕地，我们一切都活动了。只会一门，将来国家和自己都为难。

我的意见在县以下新建的工厂，趁早实行新办法，以后新建的大工厂，是否也可以实行新的办法。是否可以搞一套新办法，让老厂实行老办法，新厂实行新办法。和井泉、大章⁽¹¹²⁾同志谈过，建议把四川省作为典型试验，拟定一套新办法，以后新建工厂实行新办法，撇开旧办法，完全根据实际情况办事，不管旧的条例，按照新办法招收工人，愿意来的就来。实行这样的新办法，当然有很多复杂问题，在全国一下实行还有困难，但可在四川试行。

我找煤炭部徐达本副部长谈过一次，向他提出：煤矿不要招收附近的农民作固定工人，只招收他们作临时工人，学习三个月，临时工的工资可以高一些，但不实行劳保条例。需要十个临时工，我们训练三十个。可以讲清楚，需要时请你们来，不需要时就回去，或者三十个人轮流作工，这实际是相对固定的临时工，也是长期分班轮换的熟练工人。这些人完全是附近的农民。有人提出，这样作农业社可能不同意。这可以和农业社讲清楚，订合同，这样对工矿、国家、农业社都有好处。这就是劳动后备力量。要使工农合一，

不要使农民完全离开农村。矿山的劳动后备力量，大约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够了。这样不脱离农村的劳动后备力量，工厂要的时候，到工厂作工，不需要时可以回农村种地，很机动。煤矿可以这样作，其他工厂也可以这样作。你们雅安农代工的办法就很好，农忙时，工厂工人可以回去支援农业。山西叫长期合同工，可以不叫临时工。煤矿可以这样作，其他工厂、基本建设队也可以这样作。

工厂的安排不要太集中了。工厂如何使用农村的劳动力，是个很大的问题。陶鲁笳^{〔113〕}同志提出在产棉区的乡镇办小纱厂，我同意他的办法。纱厂女工到四十岁就不能作细纱工，工厂可以在附近吸收临时工，事先签订合同，不实行劳保条例，不脱离农村劳动，年纪大了，可以让他们回去，允许他们的女儿来代替他们作工，不给退休费。也可以采取每年放两个月的假，或者放农忙假，不给工资的办法。

所有工厂设备的能力，都不是全部发挥的。我们国家储备物资的办法，不一定全部都是储存东西，只要我们储备一定的生产能量，即储备一定机器、原料、劳动力等，在必要时，加工突击出来，这实际上就是物资储备。

现在不要随便招收工人，可以到农村招收年轻的、有文化的、思想好的，调皮捣蛋的不要，可以象挑女婿那样挑些好工人。在六亿人口中，挑选几百万人是可以作到的，除了老工人、技术工人可以固定，其余限制在几个主要地区招收工人。在招收工人时，合同上要写清楚，学好手艺，有工作就作，没有工作可以暂时回家，或担任其他工作，有工作时，

优先录用他们。

究竟办大厂优越，还是办小厂优越，各有各的优越性。办小厂的优点是可以减少基建投资和行政管理费用等，能更适合于多快好省。

职业病问题。很多工厂都有职业病，现在的克服办法是加强劳动保护，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但对严重危害健康的工作，是否可以考虑规定一定的年限，到了年限，调作别的工作。调作别的工作以后，工资可能会降低一些，但这样不会影响工人的身体健康。还有慢性病，一病就病几年。在招收工人时也可以在合同上签订处理办法。在签订合同时要加上政治条件，如规定：在工厂工作要爱护工厂财产，把工厂当成自己的家和把工厂工作当作自己工作来作。

工厂不要太集中。工人应该联系农村，不能脱离农村。参加农业社的，应该给社交公积金。特别是县以下的工厂，农民可以学手艺，工人可以学会种地，不要把工人与农民分得太清楚，要使工人接近农民，使城市接近农村，要使农民无产阶级化。要又是工人，又是农民，这对将来消灭城乡界限、工农界限是有好处的。目前把工厂办得分散，很多工人是农民子女，没有事可以放假，让他们回农村生产。季节性的生产也可以停产。不要使工人脱离农业社，要使工厂、农业合作社、工人三方面正确建立关系。又是工人，又是社员，作到互相协作，互助互利。至于家在城市的工人，又不是农业社员，他们回家又不能生产，要另想一些办法。照

现在的规定,停工期间工资发百分之七十五,但在城市没有事可作,可考虑下乡,作些临时工。

关于工人工资究竟多高?怎样才算合理?现在这样是否合理?再低一些或再高一点是否更合理?请你们多考虑一下。怎样才能促进生产,才能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作到多快好省。大概工人的工资水平一般比多数农民高一些才合理。至于技术工人的工资,需要更高一些,但是不是要比多数农民高得多,才算合理,这样恐怕理由不充分。有人说:多给点工资,生产就好,少给点工资,生产就不好。也不一定。至于新建工厂的工资没有老厂高,工人不干。是否有这样的问题,也不一定。总之,我们要节省一些,工厂要在工作忙时增加工人,工作少时可以减少,要有回旋余地。工资定得合理、恰当一些,就对国家、工人、农民都有好处。常常是工人工资越高,工作反而不积极了。如有的煤矿七八级工人每月挣二百多元,比矿长还高,那么多的钱,满可以生活了,又何必多干呢?不一定工资高了,工人的积极性就高。当然,我们必须关心工人的生活,关心工人的思想状态。关心工人不一定就是增加工资,把工资调整得更合理,使工农关系更好,这不仅是关心工人的生活,而且是关心工人的政治地位。根本不管是错误的,要关心工人,但不要片面,既要关心工人生活,又要关心国家积累。工资水平要经常变动,今后工人工资终究是要逐步提高的,不是永久不变的。因此,要求四川在新办工厂中,创造性地工作,创造一套新办法,使之有利于生产,工人高兴,农民满意。这套

新办法，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要实行新办法，除技术工人外，一般不要从外省调工人，一般的工人应从本省、本地解决。从外省招收工人，也有好处，免得闹地方主义，但困难也相当多，如广东的工人调四川每天要洗澡。

今天，我只大体上讲一讲，要你们去创造一套办法，是否可行，要先作典型示范。拟定几条原则报中央、国务院批准，取得合法后再普遍搞。你们这样作，可以自由，可以创造。这样是否会犯错误？是否会陷于被动？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陷于被动。如果犯了错误，我和你们共同负责。我想不一定会犯错误，不一定有危险性。如果行不通，按旧办法执行也不迟。我提的以上办法，是按四川省生产力的发展情况，实事求是地去建立崭新的一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没有旧的因袭，没有教条主义。今后全国也可能要实行。目前老厂可以按老办法，但在一个厂里不要实行两种办法。老厂是否要实行新办法，将来再决定。

关于半工半读问题 致马文瑞^[114]信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马文瑞同志：

送来关于招工问题的报告和技工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都收到。这些文件都应当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已印发给政治局会议各同志。

昨天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学校教育问题，除开重申教育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方针以外，又进一步地确定了学校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一看这个方针就可以知道，学校教育问题不只是同教育部门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同劳动部门以至其他许多产业部门也有密切的关系。昨天的会议没有要你们来参加是一个缺点。请你们认真地研究一下正在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有关学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一切问题，包括城市中的和农村中的，你们都应当研究。你们的眼光应当看宽一些，你们的研究范围应当包括各类的合作社，各种的工厂和机关，并且包括各种的学校，而不要局限在一种工厂制度的范围之内，你们的思想就

可能获得更多的解放，就可能发现和提出更多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办法。

自从在学生中提出勤工俭学和半工半读的口号以来，群众热情很高，全国各地都已行动起来，在实践中有了多种多样的创造。群众在实践中所创造出来的这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具体形式，都值得研究。一般地说来，在农业生产的劳动中这种结合较为容易，而在工业生产的劳动中，就还必须创造若干条件，例如在学校中加建若干工作作坊，并加少数技师和技术工人作为指导，在工厂附近加建若干教室，并加少数专业教师，工厂和学校的管理教育制度都要相应地作若干改变，妥善地安排学生们和工人们进行生产劳动和学习的时间，才能使学校教育同工业生产劳动相对固定地结合起来。而这恰恰是你们应当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学校教育同工业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式是会有许多的，但是我想，其中会有一种最高的方式，这就是学校同工厂合而为一的方式。我现在把我的想法写在下面，请你们研究一下，并且请你们酌量，是否可以在几个新建的工厂中进行试验？

譬如说吧，新建的纺织厂以及其他操作技术不很复杂的工厂，这些新建工厂要招收大量的新工人，可以一律招收初中毕业生，经过半年训练，进工厂作工，实行四小时工作、四小时上课，分为六班轮换工作和学习的制度，发一半工资。如此，普通的高中和大学，是要学习八年毕业的，这种

工人延长一二年,即用九年或者十年的时间,学完高中和大学的课程。如果减去音乐、体操及其他一些不必要的课程,也可以在八年或者九年的时间内学完高中和大学的课程。他们在大学毕业后,就可以转业作另外的工作,工厂再招收另一批初中毕业生来进行工作和学习。至于技术复杂的机器制造厂和其他工厂,可以考虑招收高小毕业生先在技工学校学习三年,学会工作技术,同时学完初中课程,按照学徒待遇。然后进工厂作工,实行半工半读,发一半工资,也可以在八年九年甚至多十年之内学完高中和大学的课程。此外,在这类工厂中,也还可以考虑,实行六小时工作、两小时上课、发四分之三的工资的制度,在四年或者五年内学完中等技术学校的课程。

实行这种劳动制度和学校制度的工厂,就使工厂和学校完全合而为一了。工厂管理机关不只要管理工厂生产,而且要管理学校教育。国家只在工厂附近加建一些教室和集体宿舍,增加一些专业教员,所费不多,却可以多办中等技术学校和大学,大大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多快好省地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促进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界限更快地消灭。经过实验,如果证明这种工厂和学校只能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实行,我们可以把它控制在一定的数目之内,不作更大范围的推广;如果证明这个办法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而不致引起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不协调;如果我国年轻一代的工人多数愿意这样做(一年来农业中学的大量发展已经证明我国年轻一代的农民多数是愿

意这样作的),那么实行这种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办法,就能够在不大增加国家开支的条件下充分满足我国青年们的升学要求,并将促使我国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由于我国人多,劳动力多,人民对于生活水平要求不高,青年们又有远大高昂的志气,是允许我们这样做的。

有人说,过多地组织青年工人和农民进行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可能使我国的劳动力感到不足,特别会使城市的劳动力感到不足,引起青年农民过多地进入城市,增加城市人口。在你的关于招工问题的报告中说,现在仅仅在各企业、各部门内部进行调剂,已经不能满足我国工业所需要的劳动力,而必须从城市和农村中招收相当多的新工人。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有一点不同的看法,请你加以斟酌。

现在不论城市和农村,劳动力都有感到紧张的某些现象,但是我觉得我国劳动力的资源还有很大的潜在力量可以发掘。你说,在各企业、各部门内部进行调剂,已经不能满足需要,这对许多企业来说大体是实在的情形。但是问题是在我们计算劳动力资源和需要之间的矛盾的时候,是应当以各个城市和农村的整个社会为单位来计算呢,还是只以各个企业、各个部门现有的劳动力为单位来分开计算呢?

不论在城市和农村,我国广大的妇女还远没有从分散繁琐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如果我们认真地系统地把妇女的家务劳动以及其他为生活服务的事业集体化,组织成为相当大规模的集体经济事业,那我们就能够从社会上解

放极大的一批劳动力来进行生产，并使青年们能够腾出时间来进行学习。

此外，在城市中，还有不少的全劳动力和大批的半劳动力没有加以利用，也有很多全劳动力只担负半劳动力就可以担负的工作，青年学生们还愁着缺少勤工俭学的门路。这些都是很大的劳动力资源，只是由于我们没有适当地去加以组织，现在还难于利用。我们的某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也限制我们去利用他们。这样，他们是不满意的。他们要求利用他们的劳动力，广大的妇女也要求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请你们考虑一下，是否可以这样作：就城市中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加以调查，作出较为精确的计算，然后进行说服动员，根据群众的要求和觉悟程度逐步地适当地在不太增加国家开支的条件下加以组织，并且进行较大范围的调整，使城市中一切愿意劳动的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尽可能地分配他们进行适当的劳动，并且采用较为灵活的劳动制度（如每日工作四小时或六小时，发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三的工资等），广泛利用妇女和半劳动力，并且设法用半劳动力去代替一些不需要用全劳动力就可以做的工作。如果这种办法行得通的话，那就可能解除多数城市劳动力紧张的情况，比较彻底地消灭了社会失业现象，就业的人加多，青年们用半工半读的方式进行生产和学习，也不致引起社会劳动力的过分紧张，妨碍社会生产的发展。这样，也可能减少从农村招收新工人的数量。而最重要的，则是大大地提高了社会劳动力的利用率，对于社会是一个很大的节

省。这是仅就改善社会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方面所能得到的节省来说的，至于改良劳动工具和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文化水平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所得到的节省还不在于内。

以前有很多人是愁着城市劳动力多下来不好办。如果按照上述办法组织城市劳动力，当然就更大量地多下来。由于工业的大跃进，由于可以在城市的街道上办许多小工厂，这些多下来的劳动力是会有事做的。将来，由于工业的进一步机械化，集体手工业和集体服务事业的逐步机械化，又可以逐步地腾出一些劳动力来满足工业继续跃进的需要。如此看来，今后在城市中是会要经常进行一些劳动力的调整的。

我请你们对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研究一下，如果你们赞成的话，请你们同若干工业部门和教育部门、青年团、工会的同志商量一下，看是否可以选若干新建工厂进行试验？对于第二个问题，也请你们考虑一下，如果你们赞成的话，选择个别的中小城市或者大城市中的个别区进行调查，待调查清楚之后，再考虑是否选择个别城市进行试验。

敬礼！

刘 少 奇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半工半读, 亦工亦农*

(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

讲一讲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问题。

我所说的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有一部分是结合的,既是劳动制度,又是教育制度,又是学校制度。就是在农村里面办半农半读的学校,在工厂里面办半工半读的学校。农忙的时候种地,农闲的时候读书,或者一个星期做工,一个星期读书。要把这种制度作为正规的劳动制度,正规的教育制度。

就当前来说,只实行一种学校制度,实行我们现在这种学校制度,是不能普及教育的。我问了一下,山东学龄儿童入学的只有百分之四十九,有的农村里面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学龄儿童不能入学。安徽学龄儿童入学的比山东还要少一点。江苏多一点,有百分之六十的学龄儿童入学,但农村里面也有一半的学龄儿童不能入学。所以,用目前这种教育制度不能普及教育,国家负担不起,家庭也负担不起。如

* 这是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党内报告会上的讲话。当时共讲了两个问题,本书收入的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果一个家庭有四五个小孩子上学，有的进小学，有的进初中、高中，有的要进大学，那不但一般的工人农民家庭负担不起，恐怕今天在座的同志的家庭也难以负担，也要发生困难。那末，用一种什么办法，既能普及教育，国家和家庭又能够负担得起呢？那只有除开现在的全日制学校以外，再办那种半农半读或者半工半读的学校，就是小孩子大体上自己可以搞到饭吃，国家稍许补贴一点，家庭补贴一点。因此，可不可以设想，现在的这种学校不再增加了，现在这种学校的教育经费也不加了，国家以后每年还可以增加一点教育经费，把增加的教育经费拿来办这种半工半读或者半农半读的学校。从当前来讲，从普及教育来讲，我看必须采取这个办法。

从长远来讲，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可以逐步地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一九五八年，我在天津讲了一次，他们就搞了一百多个工厂来办这种半工半读的学校。这几年让它们自生自灭，大部分垮了。但是，这回我去，还剩下七个工厂办到现在，已经有两千多毕业生了。上海有工业大学，它是一个星期上二十四小时课，占工作时间十六小时，占业余时间八小时，五年毕业，今年就有八百多学生可以毕业。江西办了劳动大学，也是有成绩的。江苏、广东有农业中学。其他地方还有工业中学。它们都已经有一些初步的经验。据说，这些毕业生是比较好的。他们能文能武，就是说，既能脑力劳动，又能体力劳动；既能当工人、当农民，又能在科室办事、在研究机关工作；有些还

当了技术员。我认为，这种在半工半读的中等技术学校或者大学毕业出来的人，是一种新人。这种人跟我们不一样，跟现在的工人、农民也不一样，跟现在的知识分子也不一样，而是一种新的人了。他们没有那个知识分子架子。知识分子的架子是个大问题。我们现在普通学校的学生，初中毕业就看不起农民了，高中毕业就看不起工人了，大学毕业就更看不起人了。

一种新的学校制度，至少要五年才能初步总结经验，十年才能总结比较成熟的经验，加以推广。再过十年，我们革命胜利就二十五年了。今天着手试验，十年以后才能推广，今天不着手，十年以后还不能推广。因此，我主张每一个省，每一个大中城市，都来着手试办这种半农半读或半工半读的学校。

在农村，初级小学可以多办一些全日制学校，高小、初中以上的学校就办半农半读。仅仅办农业初中还不够，还必须办一种中等农业技术学校。这种学校的学生可以回家生产，也可以在国营农场生产，或者开荒。我的意见，应该充分利用现在国营农场的生产资料来办这种学校。训练出来的人具有中等农业技术学校的水平，可以回家去当农民，也可以到技术推广站、畜牧兽医站、拖拉机站等等地方去工作。

在大中城市，可以由工厂办一些中等工业技术学校，半工半读，四年或者四年半毕业；也可以由现在的一些技工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改为半工半读的中等技术学校；还可以

把一些停办的中等技术学校改为半工半读的学校。

我这么设想：再过五十年到一百年，中国的工人能够有百分之七十、八十是半工半读的中等技术学校毕业出来的，农民的半数是半工半读的中等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出来的。这些人读完了中等技术学校的课程，进一步学大学课程就容易了。其中有些人学政治，有些人学经济，有些人学文学艺术，也就容易了。这些人既能脑力劳动，又能体力劳动。在他们本身，脑力劳动跟体力劳动的差别已经是没有多大了，开始消灭了。可以由他们来当车间主任、厂长、党委书记、市长、县长。他们当了车间主任、厂长、党委书记、市长、县长以后，不要完全脱离生产，也是半日做工或者种地，半日坐办公室。如果五十年到一百年能够达到这个要求，那时我们国家的情况就会同今天大不相同，整个劳动生产率将大大提高，消灭三大差别的阻力就小得多了。

我们还可以设想，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制度和学校制度会是什么样的呢？到那个时候，体力劳动者即工人农民，每天只要劳动四五小时就够了。其余时间干什么呢？就是学习，或者办公、写作，或者唱歌、演戏，或者做政府工作、计划工作。到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专业的作家、演员、画家，也没有我们这种专业的党委书记、厂长、市长、省长、国家主席，都得要做工，都是业余的。国家主席也可以业余当嘛，有半天还不够呀？马克思曾经设想过，将来的儿童九岁起就要每天从事两小时体力劳动，十三岁起就要每天从事四小时体力劳动^{〔115〕}。九岁、十三岁还是读书的时候，所以，

我看这就是半工半读的学校。列宁讲过综合技术教育〔118〕，我想也是这种制度，就是掌握一门或者几门技术，同时也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科学水平。

我国现在的教育制度是不好的，必须改革。现在的全日制学校还不能不要，还是需要的，我认为以后不能再增加了。但是，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可以办，以后可以多办。现在是少数试办，不要大办，不要一下子铺开，一下子又垮台。要通过试办，取得经验，以后多办，将来要使它成为我们的主要的教育制度和学校制度。现在的这种学校寿命是不会很长的，但是，这种半工半读的学校我看一万年还要。

为了办好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的学校，应该办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农业高级师范、工业高级师范和中级的农业师范、中级的工业师范。要利用现在的国营农场、工厂、中等技术学校或者大学，来办一些这样的师范学校，重新培养教员，将来去教中等技术学校的课程。他们将来是半农半教、半工半教，做半天工、教半天书，或者是种半天地、教半天书，不要完全脱离生产。要培养这种新的教员，新的校长。

此外，关于劳动制度，我还提出另一个性质的，就是实行亦工亦农制度，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农村的工厂，季节性生产的工厂，农村的技术推广站、排灌站等等，都可以实行亦农亦工。城市里面有些厂可以搬到农村去办，就那个地方的剩余劳动力。大城市的季节工厂也可以实行亦

工亦农。就是农忙的时候开一班，农闲的时候，农民来了，开三班，看行不行？我们要训练农民懂得机器，机械厂可以吸收农民，农忙的时候叫他们回去，农闲的时候来学习，做半年工。这样的好处很多，家属可以不进城，又可以使农民学到技术，缩小城乡的差别、工农的差别。对个人，对集体，对国家，都有好处。

临时工转正，我历来是反对的，但是后来还是转了。我看以后应该减少固定工，或者少增加固定工，比较多地用临时工。有人说临时工不是正式工，只有固定工才是正式工，我曾经反对这个说法，临时工也是正式工人，都是正式的。但是现在的劳动制度里面没有这一条，应该改变。

必须使我们的工人、农民有文化，而且是有相当高的文化，我们这个国家的整个面貌才可以改变，才可以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将来才有希望进入共产主义。

实行固定工和合同工 并存的劳动制度*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实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是使学校制度与劳动制度相结合。另外,还要使工业劳动制度与农业劳动制度相结合,就是实行亦工亦农制度。我们现在只有一种劳动制度,固定工,有劳动保险,招来了不能退,要退很困难。以后,我看劳动制度不要只是一种,要尽量用临时工、合同工。这种临时工、合同工,也是正式工。有些工厂,历来就是季节性生产的工厂。例如糖厂、烟厂、榨油厂、碾米厂、面粉厂、造纸厂,就是用季节性的工人,有工作就来,没有工作就回家。过去上海、无锡那些地方都是这样。我们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反而把这些季节工改成固定工、常年工。这件事情做得真是蠢呀!

农村的工厂,农村的技术推广站、排灌站、畜牧兽医站、拖拉机站等,如果都搞成固定工,将来也不得了。国家给工

* 这是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干部会议上讲话的节录。

资，工作只有那么多。他们还可以种地嘛。所以，这些人人都要实行亦农亦工。

有些工厂不要办在城市里面，可以办到乡下去，利用乡下的剩余劳动力分散办。新开工厂厂址的选择，要就原料、就市场，还要就劳动力。看劳动力在什么地方，就办到什么地方。我们国家人很多，乡村里面有很多剩余劳动力，要充分利用这个特点。有些工厂办在农村，农民就有事做了。这样，对工人有利，对农民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日本有很多小工厂就是在农村里面，他们也是利用农民的剩余劳动力，很多产品是在乡村里面生产的。

城市里面有的工厂，我看也可以实行亦工亦农。如城市里面的纺纱厂，就可以农忙时开一班，农闲时开三班。纺纱厂可以这样，其他许多轻工业工厂也可以这样，制造机器的工厂也可以这样。农民在农闲的时候进厂做工，这个时候，不是开一班、开两班，而是开三班，日夜开，还不是一年的生产任务也完成了？矿山也可以这样。从前那个唐山煤矿我是知道的，那么大一个煤矿，历来是农闲的时候大量的临时工从农村到矿山来，进矿开坑道，农忙的时候临时工走了，剩一部分工人挖煤炭，出煤炭。这也可以保持均衡生产，煤炭还是出那么多。所以，大城市、大矿山都可以实行亦工亦农制度。这样，家属也免得进城了，农民也学到技术了，对缩小城乡差别有好处。

合同工当了多少年以后，也可以当厂长。每年做几个月工，熟悉技术了嘛。所以厂长也是亦工亦农。不开工时，

留个副厂长就够了。为什么合同工就不可以当干部呢？教育一下，一样能当。现在我们很多县委书记原来都是农民，我们军队的很多将军原来也是农民。农民可以当将军，当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为什么当厂长当不得呢？这个问题我们要这么看。不要认为工人可以亦工亦农，干部就不可以亦工亦农。这件事，干部要带头。你们广西不是有个工厂已经有八个干部转为合同干部了？这个好。只是这种干部现在还太少，我们要往这个方向走。

临时工转正，我是反对的，不赞成这件事，但是反对不了，还是转了。转了好啦，去年前年动员工人下乡，也算吃了苦头了。今后增加工人，不要增加固定工，或者少增加固定工，大量地用临时工。劳动保险制度也要修改。

还有人另外提出一种劳动制度，叫做义务工役制。有些矿山对身体有损害，搞久了会生职业病，可以照征兵一样，征去劳动几年，不等生病就换回去。轮换，这也是一种劳动制度。

注 释

1 俱乐部 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成立，是江西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工人最早的工会组织。——第1页。

2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首先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二一年八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随后又在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设立劳动组合书记部分部，作为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一九二五年五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撤销。——第1、61、282页。

3 李求实（一九〇三——一九三一），湖北武昌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参加领导“二七”大罢工。一九二三年春到安源，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委员、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文书股股长。同年八月当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候补委员，随后担任《中国青年》编辑。一九二四年夏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一九二五年秋回国，任中共豫皖区委委员和团豫皖区委书记。一九二六年任两广团区委宣传部长，主编《少年先锋》。一九二七年一月任团湖南省委书记，在团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任团的南方局书记。一九二八年夏任团中央宣传部长，主编《上海报》。一九三〇年担任中华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上海办事处负责人。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八日被捕，二月七日牺牲于上海龙华。——第12页。

4 工作处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组织多按照安源路矿两局原来的组织而区分为若干部，即工作处。路矿两局工作处共有四十余处，大部分集中在安源，少部分在株洲、湘东、紫家冲等地。——第13页。

5 京汉罢工 指一九二三年二月上旬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二月一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直系军阀吴佩孚下令禁止，反动军警强行占驻总工会会址。四日，京汉铁路工人二万余人举行总罢工，全路一千二百公里顿时瘫痪。七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调集两万多名军警，对汉口江岸、郑州、长辛店及其他各站罢工工人进行了血腥屠杀，造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全路工人被打死五十人，打伤三百余人，被捕入狱的四十多人，工人家属也遭到洗劫。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在敌人的屠刀面前，英勇就义。大罢工坚持

到二月九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省工团联合下令复工。——第16页。

6 李卜克内西 即卡尔·李卜克内西(一八七一——一九一九)，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竭力实现列宁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策略，在国会内以一票的少数，反对政府的战争预算。他同其他左派领袖秘密组织斯巴达克同盟，组织反帝战争的示威游行。一九一九年一月，柏林工人起义失败，他和卢森堡同时被反动政府杀害。——第18页。

7 黄庞 指黄爱和庞人铨。黄爱(一八九七——一九二二)，湖南常德人，庞人铨(一八九八——一九二二)，湖南湘潭人。黄、庞二人均为湖南工人运动先驱者。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两人在长沙创立湖南劳工会。一九二一年，两人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六日，因领导湖南第一纱厂工人罢工斗争而被捕，十七日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于长沙。同年五月一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决议，每年一月十七日为黄庞纪念日。——第18页。

8 孙中山 (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一八九二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一度行医。一八九四年赴京上书李鸿章，主张革新政治，被拒绝后到檀香山组织兴中会。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〇年曾联合广东的会党相继举行起义，均遭失败。一九〇五年在日本组织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确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和三民主义学说。在他领导的革命运动推动下，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帝制，成立了民主共和国。他回国后在南京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年因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妥协，被迫去职。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被选为理事长。一九一四年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重举革命民主派旗帜。一九一九年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一九二一年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主张，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同年十一月，应邀北上讨论国是，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主张，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继续和帝国主义及段祺瑞、张作霖等北洋军阀作斗争。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病逝。遗著编为《中山全书》和《孙中山选集》等。——第21、285页。

9 五卅运动 指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一九二五

年五月间,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的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北洋军阀的镇压。上海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在五月十五日枪杀了罢工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并伤十余人。五月三十日,二千余名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示威的学生中,有一百余名遭巡捕(租界内的警察)逮捕,被拘押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内,引起了学生和市民的更大愤慨,有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许多爱国群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六月,英、日等帝国主义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继续进行屠杀。这些屠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广大的工人、学生和部分工商业者,在许多城市和县、镇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第23页。

10 奉直军阀 即奉系军阀和直系军阀。奉系军阀是指以张作霖为代表的奉天省(今辽宁省)籍军阀集团;直系军阀是指以冯国璋、曹錕等为代表的直隶省(今河北省)籍军阀集团。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了北洋政府,并占据着东北、京、津及直隶北部、山东北部;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占据着直隶南部、河南、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等地。——第23页。

11 陈赞贤 (一八九六——一九二七),江西南康人,江西早期工人运动领袖。早年从事教育事业,因热心办学,被推举为南康县教育会长。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因领导当地人民反抗军阀拉夫斗争,遭搜捕,后去广东南雄开展工农运动。一九二七年一月任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和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同年三月六日在赣州被蒋介石反动派杀害。——第33页。

12 孙传芳 (一八八五——一九三五),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后期首领。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兼江苏司令。一九二六年镇压上海工人起义。同年冬其主力被北伐军打垮后,投靠奉系军阀。——第34、230页。

13 张作霖 (一八七五——一九二八),奉天海城(今属辽宁)人,北洋奉系军阀首领。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把持北京政权。一九二六年任安国军总司令。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李大钊等二十人。一九二八年六月同蒋介石作战失败,退回东北。由于他没有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要求,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于皇姑屯。——第34、285页。

14 赤色工会 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第37页。

15 苏维埃 是俄文 Совет 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权力机关的名称。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也称苏维埃政权,其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第38页。

16 黄色工会 原指为资产阶级所收买、控制的工会。一八八七年法国蒙索明市工人罢工,资本家收买工贼组织了一个假工会,来破坏工人罢工。当时罢工工人打碎了这个工会会所的玻璃窗,资方改用黄纸糊窗子。从此,资本家操纵的工会被称为黄色工会。中国的黄色工会是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所控制的工会。——第38页。

17 出版业工会 当时上海出版业工会,是国民党改组派操纵的一个工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大东书局工人举行罢工时,出版业工会曾发动商务、中华、世界、民智等书局工会发表宣言,表示支持。大东书局的工头为了执行资本家的命令,破坏罢工,就带领工人退出出版业工会,并进行复工。大东书局党组织的负责人没有识破资本家和反动工头的阴谋,并且不懂得在出版业工会内部发展革命力量的重要性,从“左”的错误观点出发,为了摆脱出版业工会的领导,也赞同退出黄色工会。——第40、88页。

18 国际联盟 亦称“国际联合会”,简称“国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组织。根据一九一九年在巴黎和会上通过的《国联盟约》,于一九二〇年一月成立。总部设在日内瓦。先后加入的国家有六十三个。美国本为倡议国之一,因同英、法争夺领导权失败而未参加。国联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是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对殖民地进行再分割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无形瓦解,一九四六年四月正式宣告解散。——第40、66页。

19 取消派 指托陈取消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共产党员,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来年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从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被称为托陈取消派。——第43、70、74页。

20 李立三 (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早期党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一九一九年去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二年任中共安源煤矿支部书记、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同刘少奇等一起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一九二三年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一九二四年任中共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一九二五年参加领导五卅运动。在第三、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先后担任全总组织部部长、秘书长、武汉办事处主任。一九二七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同年十二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一九二八年冬至一九三〇年,任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部长等职，是党中央领导成员之一。一九三〇年犯过“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一九三〇年去苏联，一九四六年春回国。一九四八年任中共中央东北局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并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劳动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曾当选为中共第四至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五、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九年当选为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45、86、216、316、344、399页。

21 职工国际 又称赤色工会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国际赤色工联。是共产国际领导的工会国际联合组织。一九二一年七月在莫斯科成立。其主要任务是组织战斗的工会团体，争取旧工会，同改良主义作斗争，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一九三七年自动停止活动。一九三八年二月宣告解散。——第47、55页。

22 上海工联 即上海工会联合会，是上海各赤色工会的联合组织。一九二九年六月成立，一九三六年结束。——第48页。

23 职工国际五次大会 指一九三〇年八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49、55、90、137、185页。

24 洗马沙 是广东话，意思是包工。——第54页。

25 花红 指旧历年关的奖赏金。——第54、81页。

26 TOSS 原稿如此，意思尚不清楚。——第56页。

27 立三时代 指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李立三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推行“左”倾错误这一时期。——第59、114、146页。

28 行会 是封建社会中城镇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同行业组织。一般由同业或相关行业联合组成，目的是为限制竞争，规定生产或行业范围，解决业主困难和保护同行业的利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行会逐步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第60页。

29 罗佐夫斯基 (一八七八——一九五二)，苏联人。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七年任赤色职工国际(也称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第64、217、294页。

30 冯玉祥 (一八八二——一九四八)，安徽巢县人。原为北洋直系军阀将领。一九二四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倾向革命，所部改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一九二六年九月在五原(今属内蒙古自治区)誓师，宣布参加国民革命。一九二七年曾参与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共活动。一九二八年，因与蒋介石集团发生利害冲突，举兵反蒋，先后爆发了蒋冯战

争和中原大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法西斯独裁统治。一九三三年五月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旋被蒋介石撤职。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采取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立场,反对蒋介石的内战,并与李济深等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一九四六年出国考察水利。一九四八年九月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途中,在黑海因轮船失火遇难。——第66、287页。

31 韩复榘 (一八九〇——一九三八),河北霸县人。国民党地方军阀。一九三〇年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不战而放弃山东。一九三八年一月为蒋介石所杀。——第66页。

32 立三主义者 这里的立三主义者是指当时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第71、100、103页。

33 巡捕房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租界”内设置的警察机构,是压迫人民和维护其特权的重要工具之一。——第72、108页。

34 西山会议派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国民党右派邹鲁、谢持、居正、张继、林森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等反动议案。随后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北京等地成立“地方党部”,从事反共活动。这批人被称为“西山会议派”。——第74页。

35 蒋派 指国民党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派。——第74页。

36 改组派 是中国国民党的派别之一。一九二八年底,陈公博、顾孟余等因不满蒋介石独揽权力,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拥护汪精卫,形成了国民党中的改组派。——第74、89页。

37 我们的决议案 指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职工运动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六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一九三〇年九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职工运动决议案》等文件。——第88页。

38 汪精卫 (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一九二五年在广州任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任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一九三八年底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一九四〇年在南京成立傀儡政府,任主席。——第90、296页。

39 布尔什维克 是俄文 *Большевик* 的音译,意即多数派。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党纲、党章时,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同马尔托夫等机会主义者展开激烈的斗争。在选举中央领导机关时,拥护列宁的人获得了多数票,称为布尔什维克。此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曾被称为布尔什维克,马克思列宁主义曾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第 92、197 页。

40 见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中共苏区工会运动决议案》。——第 118 页。

41 托洛茨基 (一八七九——一九四〇),苏联托洛茨基集团的首领。一九〇三年起与孟什维克合伙反对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二年组织八月联盟。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放弃了原有的立场,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十月革命后,先后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多次对抗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一九二七年被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被驱逐出境。一九三二年被开除苏联国籍。一九三八年组成第四国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一九四〇年死于墨西哥。——第 130 页。

42 两次代表大会 指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至七日在瑞金召开的 中国 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在瑞金 召开的中国店员手艺人第一次代表大会。——第 155 页。

43 农业工会十二县查田大会 大会由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和中国农业工会主持,分为两次举行。一次是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有瑞金、会昌、寻都、西江、门岭、长胜六县的农业工会支部主任参加;一次是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有广昌、赤水、太雷、胜利、石城、博生六县的农业工会支部主任参加。两次会各开五天,统称“农业工会十二县查田大会”。《农业工会十二县查田大会总结》就是刘少奇对于两次大会的总结。成文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第 161 页。

44 查田运动 是一九三三年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分配土地后开展的一次群众运动,目的是清查漏划的地主、富农,按照当时的土地法没收和分配他们的土地、财产。为了纠正运动中发生的“左”的错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同年十月作出《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并批准毛泽东所著《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依据。——第 161 页。

45 见列宁《怎样组织竞赛?》(《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93 页)。——第 174 页。

46 《红色中华》 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

央政府的机关报。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在江西瑞金创刊。一九三五年随红军长征迁陕北，途中曾出过油印版。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红色中华》改为《新中华报》。——第177页。

47 见列宁《论我们报纸的性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1页）。原文为“替‘它’做的工作要少些，坏些，从‘它’那里捞的钱要多些”。——第183页。

48 见列宁《怎样组织竞赛？》（《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6页）。原文为“才能清除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残余，清除人类的这些渣滓，清除这些无可救药的、腐烂的、坏死的部分，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第184页。

49 民族扫墓运动 是国民党于一九三四年发动的清明节祭扫黄帝陵及中华民族其他历史人物陵墓的运动。——第193页。

50 新生活运动 一九三四年二月，蒋介石在进行军事“剿共”的同时，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生活军事化、艺术化”等为口号，宣扬封建道德和法西斯主义。当时我党领导工人群众开展合法斗争，曾利用新生活运动，向统治者争取工人群众的某些经济利益。——第194页。

51 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号召建立由各党派联合组织的国防政府和由各抗日武装部队联合组织的抗日联军。这一主张后来未能实现。——第196页。

52 蓝衣社 即中华民族复兴社，一九三二年成立，是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一个特务组织。——第209页。

53 胡适之：（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即胡适，安徽绩溪人。早年留学美国。一九一七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宣扬实用主义哲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主张文学改革，提倡白话文。一九一九年七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对学术界颇有影响。一九二五年参加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与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对抗。随后追随蒋介石，反对人民革命运动。一九三八年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一九四二年任国民党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一九四六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九四九年去美国，后去台湾。一九六二年病逝。——第209页。

54 杨立奎（生卒年不详），当时是北平师范大学教授。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他曾指责学生运动，并上书蒋介石，呼吁国民党当局严办学生，解散北平学

生联合会。——第209页。

55 洛甫 即张闻天(一九〇〇——一九七六),江苏南汇张家宅(今属上海川沙)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苏联学习,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一九三〇年底回国。一九三一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九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三三年一月随同中共临时中央一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三四年十月参加长征。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在中共中央负总的责任。——第212页。

56 西安少壮军人的“左”倾暴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由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蒋扣留,东北军内部在如何营救张的问题上发生分歧:部分少壮派军官主张用武力解决,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主张和平解决。少壮派军官于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晨刺杀了王以哲。因为事变发生在二月二日,也称“双二”事变。这一事变带有“左”倾性质,故称为“左”倾暴动”。——第212页。

57 白劳德 (一八九一——一九七三),美国人。一九二一年为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一九三〇年当选为美国共产党中央行政书记,后任总书记。因宣传取消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一九四六年二月被开除出党。——第217、294页。

58 减租减息 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允许的程度(一般为分半利息)。解放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后的初期,在新解放的地区也曾实行过这一政策。——第224页。

59 牺牲救国同盟会 全称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一九三六年十月,薄一波、杨献珍等受中共北方局的委派到山西同阎锡山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接办了阎锡山创办的这个组织,使之成为一个抗日进步团体,在山西的抗日战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阎锡山开始时对牺盟会表示支持。后来阎锡山追随蒋介石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宣布解散牺盟会,许多牺盟会的干部和群众中的进步分子遭到杀害。原牺盟会中坚持抗日的成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抗日斗争。这个组织还培养了一大批领导抗日救亡工作的骨干。——第232页。

60 农工总会 即中国的民间秘密团体,参加者主要的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工人和流氓无产者。在团体内部采取家长制的组织形式,用宗教迷信为

团聚成员的工具。凡参加团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有互相援助的义务，有时还共同反抗压迫他们的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由于团体带有严重的封建性和盲目的破坏性，因而又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操纵和利用。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逐步地建立了完全新式的群众组织，在理会与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等这类落后团体也就失掉了存在的价值。——第 249 页。

61 经济主义 是国际工人运动中一种以追求眼前经济利益为特征的机会主义思潮。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现于俄国，以普罗科波维奇、库斯科娃为代表。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事情；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贬低和轻视革命理论的作用；反对建立集中的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企图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第 256 页。

62 工团主义 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思潮。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等地流传很广。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索烈尔、拉加德尔等人。工团主义者反对政治斗争，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工会高于一切和管理一切，以工会代替国家机构。——第 256 页。

63 无政府主义 是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于欧洲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蒲鲁东、俄国的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等。它否认任何国家和政权，否认任何权力和权威，鼓吹绝对自由、极端民主，主张建立一个“无命令、无权力、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我国“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在青年中曾有过较大的影响。一些地方先后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最初它们也表现过某些反帝反封建的意愿，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些曾经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青年转而信奉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则愈来愈趋于反动。——第 256 页。

64 托派 是托洛茨基派的简称，原为联共（布）党内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列宁主义的一个政治派别。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共产党员，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从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被称为托陈取消派。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出党后，在托洛茨基的直接撮合下，同其他托派分子相结合，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建立了统一的中国托派组织，陈独

秀被推为总书记。不久,它的领导成员先后被国民党逮捕,这个组织随即瓦解,但一些托派分子和托派小组织仍然继续进行活动。——第260、272页。

65 张国焘 (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一九年参加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七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历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还担任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和《劳动周刊》编辑主任等职。一九三一年后曾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他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背叛革命,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病死于加拿大。——第282页。

66 曹锟 (一八六二——一九三八),天津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一九一二年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历任北洋军第三师师长、长江上游警备司令等职。一九一六年一月奉袁世凯之命率兵入川对抗护国军。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控制了北京政权。次年十月他收买国会议员,被选为“总统”。一九二四年北京政变时被囚禁。后直奉两系军阀联合,他获释。一九三八年在天津病死。——第285页。

67 吴佩孚 (一八七四——一九三九),山东蓬莱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一九一八年一度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主张南北议和。五四运动爆发后,以“爱国军人”姿态,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主张取消中日密约。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支持曹锟控制北京政权。一九二三年残酷镇压京汉铁路工人运动。一九二四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战败。一九二六年又和张作霖联合,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同年在湖北被北伐军打垮,后逃至四川依附地方军阀。一九三九年病死于北平。——第285页。

68 北洋军阀 是清末袁世凯在北方几省首先建立起来的封建军阀集团。一八九五年清政府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节制。一九〇一年袁任北洋大臣,所建军队称北洋军。辛亥革命后,袁窃踞临时大总统地位,培植党羽,形成了控制中央和许多省份的地方政权的军事集团。一九一六年袁死后,这个集团分化为直、皖、奉三系。一九二六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一九二七年直系军阀被国民革命军消灭,一九二八年奉系军阀政府垮台。历时十七年的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结束。——第285、336页。

69 林祥谦 (一八九二——一九二三),福建闽侯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九〇五年进马尾造船厂当徒工。一九一一年到京汉铁路江岸机车厂当钳工。京汉铁路工会江岸分会成立时任会计干事，后当选为江岸分会委员长。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他在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大会受到军阀吴佩孚的阻挠和破坏，他回到江岸领导工人进行了坚决斗争。二月七日被湖北省督军府参谋长张厚生捕缚于江岸车站电杆上，逼他下令复工，他坚贞不屈高呼：“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同日牺牲于江岸车站。——第286页。

70 盖洋（一八八九——一九二三），湖北竹山人。一九一五年考入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从事律师工作，竭力为贫苦群众主持正义，被誉为“劳工的律师”。一九二一年九月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汉口分部工作，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发起武汉工团联合会（后改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被许多工会聘请为法律顾问。一九二三年任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二月一日同林育南、林祥谦等率工人代表到郑州举行总工会成立大会，同军阀吴佩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会后，积极参与领导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二月七日被反动派逮捕，十五日在武昌洪山英难墓义。——第286页。

71 共产国际 又称第三国际，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同年六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第287页。

72 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安徽合肥人。北洋皖系军阀首领。一九一二年袁世凯窃据临时大总统职位后，被任命为陆军总长。自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到一九二六年，曾任国务总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等职，长期把持北京政府的实权，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对外实行卖国投降的政策。一九二六年四月被冯玉祥驱逐下台。一九三六年病死于上海。——第289页。

73 顾正红（一九〇五——一九二五），江苏滨海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上海租界内英租界七厂工人。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领导罢工工人同厂方交涉时，遭日本资本家枪杀。——第289页。

74 张宗昌（一八八一——一九三二），山东掖县人。奉系军阀。一九一三年投靠直系军阀冯国璋，后又投靠奉系军阀张作霖。一九二五年四月被段祺瑞就任任命为山东军务督办。同年五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授意下，调集三千余军队，残酷镇压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杀害工人二十余人，造成青岛惨案。一九二七年勒逼集直鲁联军南下援助孙传芳对抗国民革命军，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时，其军队被逐出上海。次年五月退到山东。一九三

二年在济南被刺死。——第 290 页。

75 虞洽卿 (一八六七——一九四五), 浙江镇海人。大买办资本家。一八九三年起, 先后任德商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荷兰银行买办。一九〇六年创办四明银行, 组织南洋劝业会任会办。一九一八年发起组织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任理事长。一九二四年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五卅运动中, 在帝国主义指使下破坏人民革命斗争。一九二七年积极支持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一九四五年死于重庆。——第 290 页。

76 宣统皇帝 即爱新觉罗·溥仪 (一九〇六——一九六七), 清朝末代皇帝。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被迫退位。一九三二年在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策划下出任伪满洲国“执政”, 一九三四年改称“满洲帝国皇帝”。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被苏军俘虏, 一九五〇年八月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被特赦释放。一九六四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一九六七年病逝于北京。——第 291 页。

77 李济 (一八九四——一九七一), 原籍广东文昌, 生于上海。曾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厅厅长、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等职。一九二七年起历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行政院院长、中央银行总裁、外交部部长、广东省政府主席等职。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 与蒋介石、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合称“四大家族”。一九七一年病死于美国。——第 292 页。

78 苏兆征 (一八八五——一九二九), 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二年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同年领导省港大罢工, 任罢工委员会委员长。一九二六年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病故。——第 294 页。

79 李济深 (一八八五——一九五九), 广西苍梧人。北伐战争时期, 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留守广州。一九二七年曾参与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一九三三年联合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抗日战争爆发后, 支持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主张, 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策。一九四八年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任主席。建国后, 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一九五九年十月九日去世。——第 296 页。

80 许克祥 (一八九〇——一九六七), 湖南湘潭人。一九二七年春任国民革命军何键部第三十五师第三十三团团长, 驻防长沙。同年五月二十一

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事变，捣毁湖南省工会、农会及其他革命团体，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第296页。

81 宋庆龄（一八九三——一九八一），原籍广东文昌，生于上海。青年时代追随孙中山致力于民主革命事业。一九一三年担任孙中山的秘书，一九一五年同孙中山结婚，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在孙中山逝世后，坚决谴责国民党右派。抗日战争时期，她先后在广州、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医药工作和儿童保育工作。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创建中国福利基金会，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为劳动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在解放战争中，给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巨大的物质帮助。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逝世前不久，被接收为中共正式党员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第296页。

82 陈独秀（一八八〇——一九四二），安徽安庆（原怀宁）人。一九一五年九月起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八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以后的最初六年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其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否认无产阶级应当继续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和托派分子相结合，一九三一年五月曾被中国的托派组织推为总书记。一九三二年九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死于四川江津。——第297、338、344页。

83 叶剑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广东梅县人。一九二五年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次年参加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同年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极支持八月一日在南昌发动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起义，并率领第四军教导团南下广东，曾与张太雷、叶挺等一起领导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第298页。

84 项英（一八九八——一九四一），湖北武昌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曾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等职。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一九三一年后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务。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主

力长征，他奉命留下坚持斗争，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书记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在泾县茂林地区突围时被叛徒杀害。——第299页。

85 张浩（一八九七——一九四二），原名林育英，湖北黄冈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汉口市委书记、湖南省委常委、满洲省委常委等职。一九三〇年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补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一九三二年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海员总工会书记、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一九三六年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委员书记。一九三七年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一九三八年后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一九四二年三月五日在延安病逝。——第301页。

86 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会议 一九四四年五月一日至二十五日在延安举行。出席会议的有边区各工厂和生产合作社的厂长、工程师、技师和工人代表共二百余人。会议总结了边区工业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讨论并确定了进一步发展边区工业的任务、方针和政策。——第304页。

87 邓发（一九〇六——一九四六），广东云浮人。中国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领导省港大罢工。一九二七年参加广州起义，后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一九三〇年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届五中、六中全会上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三一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保卫局局长。一九四〇年后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一九四五年九月代表解放区职工出席巴黎世界职工大会。一九四六年一月回国，四月八日由重庆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第307页。

88 八路军 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主力之一。一九三七年八月，依据与国民党谈判的结果，红军主力部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八路军辖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同年九月，八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八路军一直在敌后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建了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等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粉碎了日、伪军的反复“扫荡”，作战九万九千八百多次，毙伤俘日伪军一百一十多万人，缴获各种枪支四十五万多支，机枪七千多挺，炮一千多门。并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屡次进攻。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时，八路军已发展到一百〇二万余人。——第308页。

89 新石门日报 石门即现在的石家庄市。《新石门日报》是《石家庄日报》的前身，创刊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从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起，随着市名的改变，改为《石家庄日报》。——第310页。

90 世界工会联合会 简称世界工联。一九四五年十月在巴黎成立。总部在布拉格。机关刊物《世界工会运动》。——第316、413页。

91 这里是指一九一九年刘少奇在河北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学习时，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在实习工厂做过钳工、锻工、翻砂工和木工等。——第332页。

92 第三党 即一九二七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分子在上海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他们反对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同时也不赞成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五年第三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各党各派合作抗日、共赴国难的号召，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一九四一年参加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七年改称农工民主党。一九四九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工民主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民主党派之一。——第338页。

93 董必武（一八八六——一九七五），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清末曾考中秀才。青年时代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一九二〇年在武汉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一九二四年任中共武汉地委书记、湖北省委委员，领导筹建了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任常务委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共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之一。建国后历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理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一九七五年四月二日在北京病逝。——第373页。

94 中国劳动协会 简称劳协。一九三五年二月成立。一九四八年八月，以朱学范为首的劳协成员代表劳协参加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宣布劳协作为团体会员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劳协召开代表会议，通过决议结束劳协组织活动，其工作人员和部分会员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所属组织。——第382页。

95 共商纲领 指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

议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民的代表共同制订的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统一行动的基础。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它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第384页。

96 雷炳林 原为上海纱厂工会会员，后作为资方代理人，成了厂长。——第386页。

97 抗美援朝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我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十一月四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全国人民以增产节约、报名参加志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全力支持朝鲜前线的作战。——第388、416页。

98 邓子恢 (一八九六——一九七二)，福建龙岩人。一九二五年参加革命。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县委宣传部部长、广西特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兼财政人民委员、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第四师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书记、中原局第三书记、华中军区政治委员。建国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兼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日在北京病逝。——第394页。

99 马恒昌小组 原是沈阳第五机器厂的一个小组，组建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一九五〇年北迁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开始后，小组在马恒昌带领下，向全国工人阶级发起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的倡议，得到了全国一万八千多个班组响应。三十多年来，这个小组完成了近五十年的工作量，实现革新九百项，曾三十多次得到国家、省、市、机械系统授予的先进集体称号。——第399页。

100 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日至十一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八百三十人，代表全国一千〇二十万工会会员。应邀参加会议的外宾，有世界工联亚澳联络局的代表，有来自亚洲、欧洲、澳

洲、非洲的二十个国家的工会代表，以及缅甸政府劳动考察团和在北京的各国和平人士，共一百〇五人。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总结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以来工人运动的的成绩和经验，制定国家经济建设时期工会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动员广大职工群众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新的经济建设时期的到来。——第 410 页。

101 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 981 页）。——第 411 页。

102 范明庆 当时任安源镇工会主席。——第 416 页。

103 黄静源（一八九六——一九二五），湖南郴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三年党派他到安源路矿搞工人运动。一九二四年担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株洲分部主任，并主持安源路矿子弟学校第七校的工作。一九二五年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副主任。同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反动军阀武装封闭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时被捕。十月十六日牺牲于安源。——第 416 页。

104 周怀德（一八八四——一九二七），湖南湘潭人。煤矿工人出身，安源工人夜校学员之一。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安源平巷中段总代表、工人俱乐部纠察队队长、纠察团团长、中共安源地委委员、安源总工会委员长等职。一九二六年参加安源工农支援北伐战争的活动，在安源保卫战中，积极地投入战斗。一九二七年六月五日，许克祥部队进犯安源，他率领部分同志转移时，被地主武装杀害于萍乡县芦溪苦竹山。——第 416 页。

105 谢怀德（一八八七——一九二八），湖南衡山人。煤矿工人出身，安源工人夜校学员之一。一九二二年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俱乐部纠察队副队长、纠察团副团长、修理厂总代表等职。安源罢工胜利后，受党组织派遣，到湖南水口山铅矿开展工人运动，到湖南岳北开展农民运动，并担任岳北农工会副会长。一九二五年被派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一九二六年随北伐军回到安源，参加北伐军转战南昌、九江。在九江负伤后又回到安源，参加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他所在的第二团在浏阳失利后，他率领部分工农武装在萍乡一带坚持游击战争。一九二八年一月在萍乡腊树下的战斗中中弹牺牲。——第 416 页。

106 刘昌炎（一九〇〇——一九二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二年参加革命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任安源矿区窿内党支部书记。一九二五年九月被派赴苏联学习。一九二六年回安源，任安源党支部书记，积极组织工人支援北伐军。一九二七年当选为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安源地委书记，领导安源工人打退了许克祥和当地反动势力的进攻。同年十月响应党举行秋收起义的号召，领导一支两千多人的工人队伍武装起义，在队伍自安福县转移途

经苦竹山时,被地主武装杀害。——第 416 页。

107 十二年农业发展的伟大计划 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这个草案是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一月公布。一九五七年十月公布修正草案。一九六〇年四月经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并作为正式文件颁发。纲要全文共四十条,提出了我国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副业以及农村商业、信贷、交通、邮电、广播、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发展规划。——第 424 页。

108 赖若愚 (一九〇一——一九五八),山西五台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中共太原市委书记、山西省委书记、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等职。一九五二年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在中国工会“七大”和“八大”上连续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第 441 页。

109 廖仲恺 (一八七七——一九二五),广东惠阳人。国民党左派。出身于美籍华人家庭。一八九三年回国。一九〇五年参加同盟会,是最早的会员之一。辛亥革命后,任广东都督府总参议,兼理财政。一九二二年后积极协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第 441 页。

110 谭延闿 (一八八〇——一九三〇),湖南茶陵人。一九一二年加入国民党。曾任湖南督军兼省长。一九二六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一九二七年任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等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代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同年七月参与汪精卫发动的反革命政变。——第 441 页。

111 邓中夏 (一八九〇——一九三三),湖南宜章人。早期中国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一九二〇年在北京参加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二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曾参加领导长辛店铁路工人、开滦煤矿工人、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一九二五年领导上海日本纱厂工人二月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中国共产党第二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八年在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大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一九三三年任中国革命互济会党团书记。同年五月在上海被捕,十月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遗著有《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 441 页。

112 井泉、大章 即李井泉、李大章。李井泉一九〇八年生,江西临川人。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大章(一九〇〇——一九七六),四川台江人。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第 449 页。

113 陶鲁笏 一九一七年生,江苏溧阳人。当时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

——第 450 页。

114 马文瑞 一九一二年生，陕西子洲人。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部长。——第 454 页。

115 参见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216—217 页）。——第 463 页。

116 参见列宁《俄共（布）党纲草案》（《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746 页）、《中央委员会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党员工作者的指示》（《列宁全集》第 32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10—111 页）、《论综合技术教育》（《列宁全集》第 36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557—560 页）等篇章。——第 464 页。

后 记

刘少奇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和杰出领袖。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曾长时间从事和领导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仍然对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十分关怀，倾注一腔心血。他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对工运理论造诣精深。为了发掘他在工人运动方面宝贵的精神遗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帮助读者特别是广大工会工作者了解、学习和研究他的关于工人运动的思想、理论，我们编辑了这本专门论著。

刘少奇的工运生涯是从一九二二年开始的。一九二一年他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一九二二年春从莫斯科回国后，先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随后到中共湘区委员会工作。不久受中共湘区委员会和毛泽东的派遣，到安源煤矿协同李立三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经过罢工、谈判等一系列斗争，迫使路矿当局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使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一九二三年初刘少奇接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职务。当时的中国，“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后，北洋军阀镇压工人运动，查封工会组织，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而安源工会却象一束“燎原之火”放

射着光芒。安源工会所以能“硕果仅存”，这展示了刘少奇作为工人运动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胆识、才干和闪光的思想。本书的开卷篇《对俱乐部工作的回顾》和《“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等文，反映了他早期的工运思想。

一九二五年五月，刘少奇以汉冶萍总工会会长身份，到广州参加筹备并主持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他在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副委员长，担负起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五卅惨案前夕，他前往上海，任上海总工会总务科主任，同李立三、刘华等领导上海工人展开反帝大罢工，推动了全国人民的反帝怒潮。一九二六年二月，他到广州接替因病休养的林伟民，代理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职务，同邓中夏等领导省港工人坚持反帝斗争，支持广东革命政府和北伐战争。一九二六年五月，他参加并主持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会上作《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阐述五卅运动后中国工运的概况及发展趋势，指出中国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在会上他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一九二六年十月，他到武汉，为全总迁址武汉作准备，同时参加湖北省总工会的领导工作。在武汉近十个月中，他领导武汉地区工人进行了许多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特别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参与领导了汉口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斗争，使大革命时期的这一反帝斗争取得光辉胜利。本书收入的他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报告和有关工会建设的几篇著作，表明了他这个时期工运思想的发展，反映了他对民族民主革命中工运方针和工会组织建设等方面的理论建树。

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长期领导白区职工运动。在艰苦的白区革命斗争中，他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

合,同“左”倾错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提出了许多指导白区职工运动的正确主张和策略思想。本书收入了他关于白区工作的几篇著作,主要反映对待黄色工会的策略方针,对待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的态度、罢工策略的运用以及白区职工运动总的方针和任务等等。这些著作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白区职工运动中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些著作同他对白区工作的其他文献中的一些主要思想,尽管当时曾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压制和批判,但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对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白区工作的胜利发展,起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曾指出他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他“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

一九三二年冬,刘少奇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他在苏区期间,对于在苏维埃政权条件下的工会建设和工运理论也是很有建树的。他为了在革命根据地的条件下,把工会建设成阶级工会,系统论述了苏区工会的会员成份问题。他针对当时苏区一些劳动部门在解决失业工人就业问题上存在的不正确的做法,提出要停止“强迫介绍”和救济失业工人的问题。他总结了工会在查田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指出:在查田工作中将中农当作富农来侵犯,将富农当作地主来消灭是错误的。他论述了苏区工会维护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重要性,提出要同忽视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倾向作斗争。他阐明苏区国有企业、合作社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提出这些企业中的职工要用新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他针对当时苏区国家工厂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国家工厂领导方针和管理方法,并且一再指出,国家工厂中的工会组织应极大的注意协助工厂改善管理,发展和巩固国家工厂,同时要改善工人的

生活,解决工人一切不安的问题,提高工人的劳动热忱;国家工厂的管理方针,应该用一切方法与工人合作,依靠工人的积极性;工人也应该以一切方法和工厂合作。他还专门论述了苏维埃政权下,工会的作用与任务问题。这些著作,对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内和新中国建立后的工人运动,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本书收入了他在这方面的有关重要著作。

抗日战争时期,是刘少奇在理论上成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他关于民众运动的许多论述,对于引导民众运动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组织一切劳动群众,组织一切抗日的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联合各党各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党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总方针。为此,组织民众的基本原则应当包括:根据民众的自动性去组织民众;根据民众的要求去组织民众;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组织民众。需要指出的是,在抗战前后,刘少奇还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揭示了我国工人运动的许多规律性问题,本书收入了他在这个时期写的《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工会工作大纲》、《论组织民众的几个基本原则》和《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等重要著作。

一九四七年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达到了转折点,在国民党反动统治走向最后崩溃的形势下,刘少奇又为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如何适应这个革命转变并继续前进的问题进行考察和思考。他对将要解放或刚刚解放的石家庄、天津、北平的工作,作了多次讲话和报告。本书收入了《关于城市群众工作问题》、《关于北平工作问题》、《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等几篇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稿。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肩负着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重任,仍然热情关怀和支持新中国工运的发展,不断解决工人运动的许多紧迫问

题,为新中国工人运动的理论、路线、方针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刘少奇一再阐明随着无产阶级取得政权而来的工运方针任务要有根本性的转变。早在一九四八年春,他在西柏坡就和周恩来、朱德向赴哈尔滨参加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谈话指出,现在的工运有新的情况,解放区的工运方针,就是毛主席的那四句话: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平津战役后,他同天津、唐山、北平的工人、职员、干部、资本家谈话中,反复阐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强调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重要性,指出这是城市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一九五三年我国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他代表党中央向工会七大的祝词中进一步指明,工人运动新的历史任务,就是实现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特别有赖于中国工人阶级作更有组织和更高觉悟的斗争的。一九五六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的祝词中提出,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到底,是生产的历史,新的生产技术不断地代替着旧的生产技术,先进生产者是人类经济生活向前发展的先驱,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先驱,千百万劳动者在先进生产者率领下为消除落后而斗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前进的一种动力。他的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指明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发展社会经济同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紧密关系,成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人运动的新的历史任务。

刘少奇一再着力探讨和研究解决国营工厂内部矛盾的问题,他一九五一年在谈邓子恢和高岗两篇文章的笔记中就指出,目前国营工厂内部已经没有阶级对抗和剥削关系存在了,工厂管理机关与工人的关系从根本上变为同志的关系了。但是国营工厂的内部结构,当然也是矛盾的结构。构成国营工厂内部的基本矛盾,就是国营工

厂管理机关与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就是国营工厂内部的公私矛盾。这种矛盾是长期内需要我们认真加以调整和处理的矛盾。目前在国营工厂中所发生的一切问题，大多是从这个基本问题上发生出来的，或者同这个基本问题有关的。这种矛盾与资本家工厂中的阶级对抗完全不同，它是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的矛盾，因此可以而且应该用同志式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 and 解决。国营工厂中的管理人员和工会工作者，在关涉工人阶级整个利益的问题上，他们具有共同的、一致的利益和立场，在关涉双方的各种个别问题上，又有某些利害矛盾，需要认真地加以调整。在工会工作中还有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党和工人群众对工会的看法具有差别性。工会工作必须从普通工人的要求出发，力求实现他们一切合理的能够实现的要求，然后逐步地提高工人人们的觉悟，来实现党的要求和目的。他曾指出人民内部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大量表现为分配问题，分配关系适合生产力，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要求工会密切同职工群众的关系，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他曾经尖锐批评工会不反映情况，要求工会起到党同职工群众之间的渠道作用。他从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矛盾、企业内部矛盾中来研究工会的作用和党对工会的应有的看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刘少奇一向重视和倡导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实行民主管理。一九四九年五月，他在华北职工代表会议的讲话，系统论述了企业的民主管理，要求工会积极推进企业管理的民主化，并且指出职工代表会议也就是工会的代表会议。以后，他又针对企业实行一长制削弱了民主管理的情况，一再提出要扩大企业的民主生活，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刘少奇一直强调和支持工会的组织建设。特别是在建国初期，为适应尽快把工人阶级与广大群众组织起来的客观要求，他一再指

出,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要派最强的干部做工会工作,并且批评了把工会的威信同党的威信、厂长的威信对立起来的错误思想。他还对有关工人阶级其他问题,包括工人教育问题、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劳动工资等等,以及对国际工运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主张。

刘少奇对于中国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一系列的论述,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他的理论比较全面、系统,是十分宝贵的。它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工运理论方面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今天学习研究他的这些著作,不仅对于我们了解中国过去的工运历史会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对于研究解决目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运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仍具有现实的借鉴作用和指导意义。

本书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合编。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方面有:马济彬、陈君聪、周志兴;中华全国总工会方面有:郭英、曹宏遂、方丹。

编 者